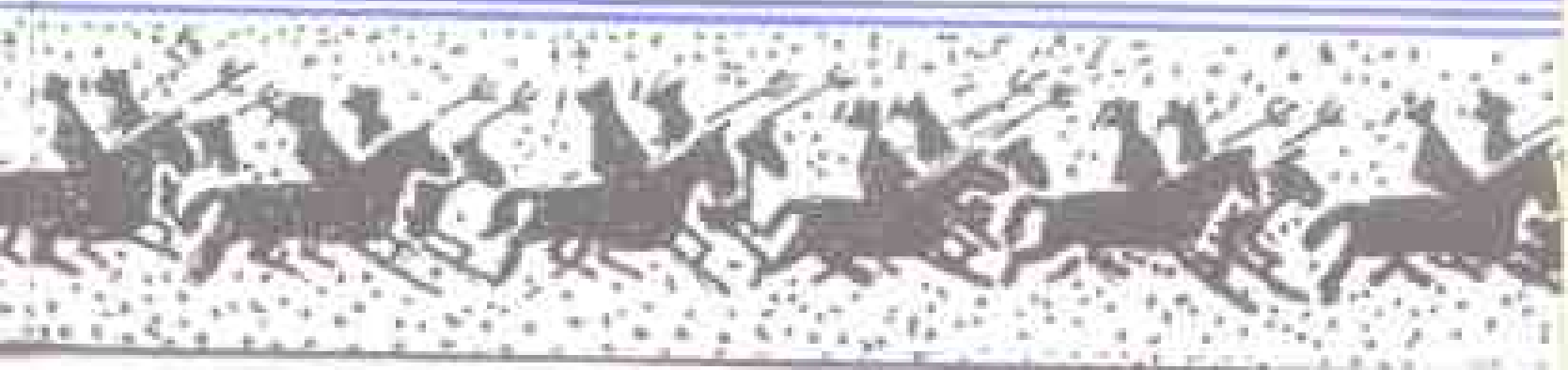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三分卷

巴  
林  
集  
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巴林史话

巴林古旗文史资料第五辑（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巴林史话

王兴贵 穆松

---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印刷装订：赤峰市蒙文印刷厂

责任编辑：扎木苏

装帧设计：阿拉坦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9.875 字数：238 千

印 数：1—2000 册

---

1997 年 9 月 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06-481-4/K·137

---

定价：13.90 元

## 序 言

巴林草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北方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蒙古族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草原各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巍峨耸立的赛汗罕乌拉高峰,奔腾不息的查干沐沦河水,蕴藏着知识的升华,积蓄着文化的沉淀。多少年来,虽然高山上的岚雾飘远了,平原上的河水流去了,但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轰轰烈烈的历史业绩,生动感人的历史事件,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繁花茂草般的历史轶闻,却一代一代地流传着。

文史历来为人们所青睐,因为它产生于群众之中流传于群众之口,许多是古籍里找不到的珍贵史料。文史文章自然朴实,有根有底,有情有景,可读性强,且一般篇幅不长,可以摊开来仔细咀嚼,也可在茶余饭后或行旅倥偬中浏览。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以亲闻、亲见、亲历的“三

亲”史料为主，采用调查研究、参校比勘的第二、三手资料著述，使之具备了一定的历史价值，能为读者提供一个颇为完整的认识。

我旗的文史工作按照周总理倡导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编著出版了许多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篇幅、不溢美、不贬损的好作品，受到旗内外读者的支持和珍爱。值此《巴林史话》出版之际特以此文为序。希望文史工作的同志们，进一步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更多的情况，抢救、采撷更多的史料，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丰富巴林草原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中共巴林右旗委书记 芒 来  
巴林右旗人民政府旗长 那顺孟和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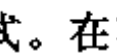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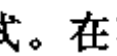
序言	.....	(1)
一	巴阿邻氏子孙们	(1)
二	喀尔喀与苏巴海	(9)
三	定边立旗巴林地	(15)
四	金枝毓秀在草原	(20)
五	弘吉刺惕八佐领	(28)
六	戎马一生乌尔滚	(41)
七	更替婚媾垂永好	(48)
八	康熙帝巡视巴林	(56)
九	浮空两道架彩虹	(63)
十	几度搬迁话王府	(70)
十一	热恋巴林将军王	(79)
十二	文人拉西彭楚克	(87)
十三	等级森严领地制	(91)
十四	佛教传播在巴林	(100)
十五	杖徙伯赫吉亚公	(109)
十六	末代亲王扎噶尔	(115)
十七	章京乌勒慧充阿	(122)
十八	奴隶火烧贝子府	(128)
十九	“疯”喇嘛沙格德尔	(134)
二十	巴林才女桃崇阿	(144)
二十一	解除蒙禁及放垦	(148)
二十二	癸丑战乱焚王府	(158)
二十三	日寇蹂躏巴林地	(168)

2050/8

二十四	不甘沦亡抗敌倭	(180)
二十五	炮火连天迎解放	(186)
二十六	曙光初上地平线	(194)
二十七	民主自治的号角	(205)
二十八	蒙汉联军战旗飘	(218)
二十九	震动大地的脚步	(228)
三十	捐躯草原的英烈	(235)
三十一	庆祝“七一”悼忠魂	(242)
三十二	“牧改”运动大风暴	(249)
三十三	巴林人姓氏渊源	(259)
三十四	巴林早期教育史	(269)
三十五	光彩夺目古文化	(276)
三十六	民间文艺绽奇葩	(288)
三十七	巴林习俗趣话多	(294)
后记		(307)

## 一 巴阿邻氏子孙们

每年春季,蒙古高原的春风刮到巴林草原的时候,尘埃满天,浑黄一片,大风过后,尘土落到地上去,给松软的土地罩上了一层皱纱。于是河水流淌,春草发芽,生活在巴林草原的蒙古族老年人就会高兴地说,“北方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地方,是故乡尘土刮来了,祖宗的恩泽降临了,今年定是个无瘟无灾牲畜兴旺的好年头”。

据史料记载,今天居住在巴林草原的蒙古人多是古代巴阿邻氏的后裔。他们最早居住地是额儿的思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蒙古语“巴林”的汉语译音用字从“巴阿邻”到“巴林”有一个十分漫长的演变过程。据巴林人乔吉先生考证,作为一个蒙古古老部落名称出现的“巴阿邻”,最早见于十三世纪蒙古文名著《蒙古秘史》。在十四世纪用波斯文写成的《史集》中有关巴林一词翻译成汉文时用“八邻”二字。而在《元史》中则书“把邻”,在《圣武亲征录》中作《霸林》,《辍耕录》将“八邻”误写为“入邻”。虽然汉文献对“巴林”的书写以多种用字出现,但在蒙古文献资料中一直保留 Bagarin (  ) 发音和书写形式。在有关(  ) Bagarin 的所有汉语译音用字中,“巴林”不仅起到了正确表达原文的音值,也起到了规范的作用。由此看出蒙古巴林部源远流长。



史籍还记载，巴林部在公元八至十世纪是蒙古高原的最古老的部落之一。在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史集》一书中，认为所有的蒙古氏族部落都是远古传说中的涅古思和乞颜二兄弟的后裔，他们子孙繁衍，形成蒙古选儿列斤和蒙古尼伦两个大部。巴林部属于尼伦蒙古。尼伦蒙古据传都是成吉思汗第十一世祖母阿兰豁阿夫人的子孙。她在丈夫去世后生了三个儿子。因为他们是阿兰豁阿夫人的“圣洁的腰脊”所生，因而称为“尼伦蒙古”，“尼伦”汉语为腰脊之意。巴林部是其三个儿子之一的孛端察儿的后代。

公元十世纪，这个时期是成吉思汗第十世祖孛儿只斤氏的创始人孛端察儿时代。据史书记载，巴林部是孛端察儿后裔所繁衍的部落氏族。《蒙古秘史》记载，孛端察儿与其兄征服一群“无主”之百姓时，“捉拿到扎儿赤兀惕部的名叫兀良合真的妇女，那个妇女又跟孛端察儿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她是被捉拿的女人，就给那个儿子取名叫‘巴阿里歹’”。巴阿里歹因是孛端察儿的儿子，以后他繁衍的子孙便成为一个氏族部落称巴阿邻部，即今天的巴林部。《史集》也记载，巴林部的邻部与朵儿边部相近，同出于一源。

当时与巴林部一样属于尼伦蒙古的诸部还有合答斤、散只兀、札答兰、忙兀、主儿乞等许多部落。巴林部在蒙古诸部统一之前，属于蒙古大部泰亦赤乌惕，游牧于杭爱山与不儿罕山肯特山之间，称“毛毡帐棚中的百姓”。

含巴林部在内的尼伦蒙古与选儿列斤蒙古合起来称为合木黑蒙古，意为全体蒙古人。他们共同拥戴合不勒、俺巴孩、忽图刺为首领，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蒙古联盟体，游牧在广阔的草原上，成为那个时期蒙古高原的主宰，孕育着后来征服欧亚大陆的伟大民族。

巴林部的祖先孛端察儿去世以后，巴林部众曾一度归属蒙古大部泰亦赤乌惕部。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巴林部已经繁衍为四大支脉，一曰巴阿邻，二曰蔑年巴阿邻，三曰你出古惕巴阿邻，四曰速客讷惕巴阿邻。

巴阿邻氏，其族长为豁儿赤。

蔑年巴阿邻氏，其祖为赤都忽勒孛阔，是孛端察儿捉拿来的妇人所生的巴阿里歹的儿子。他妻妾甚多，子孙亦多，蒙古语“蔑年”为“繁多”的意思。这一支脉的巴林氏族人较多。

你出古惕巴阿邻氏，其族长失儿古额秃额布干，他及其子阿刺黑、纳牙阿在泰亦赤乌惕部称“家人”。

速客讷惕巴阿邻氏，这一氏族的形成，据《史集》记载为，“八邻的一个弟弟，如前所述是三兄弟中的一个，他家中有一个年轻女奴。他看中了她，伺机与她发生了关系，于是她怀了孕……到了分娩的时候，她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畏惧主人的妻子，便从她的丈夫的皮袄上割下了一块貂皮，用它把婴儿裹起来，抛到了怪柳丛里，幸好他的父亲走过这座丛林。……把他带到家中，交给了母亲，让她将他抚养成人，后来出自这个儿子的子孙，虽然他们是巴邻人，但按分支的名字称为速客讷惕，因为在蒙古语中称怪柳为‘速客’，现在他所构成一个单独的部落”（《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

公元十三世纪末，蒙古社会充满贵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力之争，它们互相袭击邻部，抢夺牲畜，侵占牧场，掳掠奴婢，正如《蒙古秘史》（第254节）载“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经过消灭再消灭，兼并再兼并，投靠反投靠，背叛反背叛等一系列的动荡和改组，在原来部落林立的蒙古高原上，形成了各自组合依附的分疆对峙的部落集团。他们之间，为了争夺支配蒙古最高权力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战争和掠夺破坏了社会秩序，阻碍了经

济发展,不但破坏了生产力,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人们希望和平和安宁,希望有一强大部落和领袖人物结束战争,统一全蒙古。正是适应这一时代要求,成吉思汗铁木真出现了。他所在的乞颜·孛儿只斤氏族迅速崛起。1189年(宋淳熙十六年)乞颜氏贵族推举铁木真为汗,经过“十三翼之战”、“浯勒札河之战”,铁木真的力量不断强大。1200年(宋庆元六年)铁木真为了消灭对他统一蒙古造成威胁的强部泰亦赤乌惕部,会同克烈部王罕,大败泰亦赤乌惕于鄂嫩河上。

当时,你出古惕巴阿邻氏的失儿古额秃额布干老人与其子纳牙阿及其部属,在泰亦赤乌惕部塔儿忽台属下。在铁木真进攻泰亦赤乌惕部时,失儿古额秃额布干、纳牙阿父子将其主塔儿忽台捉住,原打算先杀了塔儿忽台,或者是俘虏,再投奔铁木真,后来联想到执捕札木合的属下曾被成吉思汗以“奴婢……拿正主罪”,将其子孙典刑的事,害怕铁木真责问“拿了正主”之罪不被宽恕,遂将塔儿忽台放掉,举部投奔铁木真。铁木真高兴地收留了他们,并为他们执而又放其主的行为大为褒奖,“特赏纳牙阿”,还声明“若你每(们)将他(塔儿忽台)拿来,我必杀了你每(们)”。以后,巴林部积极辅佐铁木真,参与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国的许多重大军事活动,在平乃蛮征西夏等多次战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集全蒙古贵族举行忽里台(聚会)。众贵族拥戴铁木真即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巴林氏族族长豁儿赤曾述其功说,“我贤能主孛端察儿,拿妇人处,同胞生了札木合并俺的祖。于札木合行,不合分离”,但是他却投靠成吉思汗,共同反对札木合。其部的兀孙老人(萨满)又提出“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帖木罕(铁木真)做”,同时还提出“你若做国的主人,与我个万户,再国土里美好的女子,由我拣选三十个为妻,

不拣说甚多语，都听从我”的要求。成吉思汗主宰后，本着与亲族共议的原则，将许多千户编为右左两翼。右翼各千户分布在直到阿尔泰山的蒙古西部地区，以提尔术和博尔忽为正副万户长（称其为右手万户）；左翼各千户分布在大兴安岭的东部地区，以木华黎为万户长，其中有原巴林部的三千户百姓。在成吉思汗周围，建立护卫中军，由巴林部的一支，你出古惕巴阿邻氏的纳牙阿作了中军万户，成为成吉思汗左手军大异密木华黎的副帅。纳牙阿的同胞兄弟阿剌黑也是开国功臣，封为左翼千户兼断事官。以后阿剌黑从成吉思汗征西域，攻陷费纳客忒和忽毡、食来忽毡，被迫封为淮安王。巴林部中的另一支速客讷惕巴阿邻氏亦有兄弟二人被封为左翼千户长，一名兀客儿——合勒札，一名为忽都思——合勒札。

成吉思汗既为巴林部的首领封了官阶，还赐了地域。成吉思汗对巴阿邻部的豁儿赤说：“在豁儿赤巴阿邻族三千户外，（再）与塔孩、阿失黑二人一起，把阿答儿斤氏族和赤那思、脱斡劣思、帖良古惕湊成万户，（由你）豁儿赤管辖，做万户，在沿着额儿的思林木中百姓之地，自由扎营居住，镇抚林木中的百姓……未得豁儿赤的同意，林木中的百姓不得做任何行动。”成吉思汗时代，西部蒙古为乃蛮部。乃蛮部当初居住在乞儿吉思地方，以后在黠戛斯人南下之时，乘回鹘汗国的崩溃，占领了从额儿的思河到和林的广大地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乃蛮部已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住在多山地带，一部分住在平原地区。这两部分的乃蛮部都在成吉思汗西征时被击溃，《秘史》说，“其后（1202年）成吉思汗与王汗两个人去征乃蛮古出古惕的不亦鲁黑汗，当到兀鲁黑·塔克的豁黑·兀孙的时候，不亦鲁黑汗不能对抗，就越过阿勒台退却了。从豁黑·兀孙追赶不亦鲁黑汗，越过阿勒台山，顺着忽木升吉儿兀泷吉追袭……顺着兀泷吉河追击，在乞湿泖

·巴失湖,赶上不亦鲁黑汗,就在那里使陷于绝境”。这就是多山之地的那部分乃蛮。平原中的那部分乃蛮,1205年春乃蛮古出鲁克汗和篾儿乞惕部的脱黑脱阿合兵,在额儿的思河的不黑部儿麻源头准备与成吉思汗作战,但等到成吉思汗远征军到来的时候,乃蛮的古出鲁克逃亡,在横渡额儿的思河的时候,多数沉没死在水中,余者后经畏兀儿和合儿鲁兀惕地方逃走。古出鲁克部败逃的路线,正说明他们是平原中的那一部分乃蛮。乃蛮败后,帖良古惕部和脱额列思部居住到这里来。据《史集》载,这两个部原住在乞儿吉思人和谦谦洲人的森林里,因而被称为森林部落,在俄费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一书所附古西伯利亚地图上,帖良古惕人被标在鄂比河(今鄂毕河)上游及其右岸支流托母河沿岸居住。《元史》中云“八怜(巴林)脱列思所隶户六万五千余锭”。脱列思即《秘史》的脱额列思,可见脱额列思部确为巴林部管辖。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大部分巴林人西迁,移之阿尔泰山西北额儿的思河上游。其驻牧地“东不逾金山,西不越额儿的思河”(《穹庐集》),整个元代,巴林人基本活动在这个地区。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以后,从十三世纪初叶到末叶进行了一系列巩固汗权开拓疆域战争,包括征服吉利吉思等部迎秃马部起义,迫使畏兀儿和哈刺鲁归附的战争,以及与夏朝金朝宋朝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协助成吉思汗开国的巴林部仍参加了这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你出古惕巴阿邻氏的失儿古额秃额布干之子纳牙阿协助木华黎征战,其孙阔阔出从旭烈兀西征。其另一个儿子阿刺黑亦是开国功臣,被封为准安王。其后代晓古台子伯颜于公元1253年从旭烈兀西征到伊朗,公元1264年由伊朗回国,又于公元1274—1276年为帅统兵征南宋。他们为大元帝国的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伯颜的父亲晓古台，为断事官，从宗王旭烈兀征西域。伯颜生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入朝奏事，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见伯颜貌伟，听其言厉，曰非诸侯王臣可比也，便命其留在身边共谋国事，遂敕以中书右丞相，次年拜光禄寺大夫，中书左丞相，朝中百事有难决者，伯颜一二语即决之，众服曰“真宰辅也”。以后改中书右丞，任同知枢密院事，此后还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时忽必烈对宋作战，集中力量攻取南宋汉水中游南北岸两大军事重镇襄阳、樊城。从至元五年（1268年）始，经过6年的围攻，终于在至元十年（1273年）攻破樊城，又招降襄阳，消除了南宋长江中游的屏障。至元十一年（1274年）伯颜被封为征宋统帅，统兵20万，以南宋降将刘整、吕文焕为先锋，水陆并进，大举南下。腐朽的南宋朝廷一味卑辞求和，文武官僚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财产纷纷投降。至元十二年（1275年）伯颜指挥元军分三路直趋临安，伯颜亲自指挥中道节度诸军，先后攻破招降常州、无锡、平江、嘉兴，直抵临安。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皇帝投降，临安为元军占领，南宋灭亡。结束了宋王朝三百余年的统治。

伯颜在南征进程中，治军严饬，深谋善断，善于用人，战胜攻取，进展甚速，迭克汉水及长江中下游各城。在攻克李家市新城后，挥笔写道：

小戏轻提百万兵，  
大元丞相镇南征。  
舟行汉水波涛急，  
马践吴郊草木平。  
千里阵云时复暗，  
万山萤火夜深明。  
皇天有意亡残宋，  
五日连珠破两城。

## 巴阿邻氏子孙们

---

诗名为“克李家市新城”。

伯颜灭宋回朝，归装唯衣被而已，未尝言功。复拜同知枢密院。至元十四年（1277年）诸侯昔里吉劫北平王拘丞相安童，胁宗王叛乱，伯颜率师讨平。至元十八年（1281年）燕王镇军北边，伯颜奉命以从。世祖谕曰，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身边，不可常人遇之。燕王每与谕事，尊礼有加。以后又率兵平海都叛乱。世祖崩，成宗即位时，为保证朝廷稳定，伯颜据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天命，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此年十二月，伯颜去世，时年59岁。葬白只刺山。元大德八年（1305年）追封淮安王谥忠武。至大四年（1311年）加赐宣忠，封子买的为金枢密院事集贤学士。

## 二 喀尔喀与苏巴海

有关明清的蒙古史籍都记载统领巴林部的首领是苏巴海。又因巴林部是内喀尔喀五部之首，故史籍上又把苏巴海称之为喀尔喀五部的首领。苏巴海本身不是古代巴林部落的后裔，或者不是“巴阿邻”氏人，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姓孛儿只斤，今天用汉语译写成为“鲍”姓。为什么巴林部的世袭首领由巴阿邻氏换成孛儿只斤氏呢？这要从元末明初蒙古中兴英主达延汗时代说起。

元朝中叶以后，蒙古社会曾一度出现剧烈的动荡。特别是成宗以后日渐衰落，皇帝奢侈不理朝政，国家财政枯竭，官吏专横贪污，各领地封建主领其所部实行封建割据，酿成剧烈的战争和内讧，出现了鞑靼部、瓦剌部、兀良哈三个大的集团。他们分庭抗礼互相争斗。这期间瓦剌部首领也先曾一度暂时统一蒙古，但是没有维持多久。他一方面受到蒙古正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另一方面受到瓦剌内部一些封建主的抗争，他的统治很快出现了分崩离析，蒙古社会重又陷入战乱和内讧之中。此后，从明初开始的百余年的战争风云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扫荡殆尽，各霸一方的封建主使蒙古草原陷于更加黑暗的苦难深渊。连年的内乱，使人民深受其苦。广大蒙古人民渴望和平，一些贵族也希望平息内讧，恢复罕权，这就为后来达延汗统一蒙古提供了社会条件。



## 喀尔喀与苏巴海

巴图孟和达延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巴图孟和自幼孤苦伶仃，但他因是黄金家族的后代很快受到封建主的重视。33岁的封建贵族满都鲁的遗孀满都海毅然嫁给年仅7岁的巴图孟和，扶持他登上了汗位，称大元大可汗，即达延汗，明人称之为小王子。满都海的这一作为赢得了怀着正统思想的蒙古贵族的尊敬，称赞她点燃了高贵的孛儿只斤之火，尊她为“赛音哈屯”“彻辰夫人”。巴图孟和即位以后，首先征服瓦剌，继而消灭亦思乌因，随后讨平右翼蒙古，至此左右翼蒙古完全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宣布不再设置由异姓封建主担任的太师、丞相之职，所有异姓封建主只能充任普通的官吏，而不能有自己的领地。他将统一后的蒙古划分为六个万户，万户下属鄂托克，万户和鄂托克的领主，全都由黄金家族的成员来担任。遂建成由大汗和大汗子孙们统治下的游牧的封建联合式的蒙古国。

达延汗将六个万户，按照传统习惯分为左翼三个万户和右翼三个万户。

左翼三个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其地域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喀尔喀万户，在察哈尔万户的北方，喀尔喀河流域；兀良哈万户，在今内蒙古中部地区迤北。右翼三个万户有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大汗驻察哈尔万户境内，统帅左翼三个万户，派济农驻鄂尔多斯万户境内，统帅右翼三个万户。

巴林部在喀尔喀万户的管辖之内。元代巴林人居住在额儿的思河，何时越过阿尔泰山东移来到喀尔喀河流域居住的呢？对此许多蒙古史学者进行过研究，据韩儒林先生研究发现，约十三世纪末，也就是元成宗时期，居住在额儿的思河的乞儿吉思诸部人移到东方来。脱乾赤斤玄孙乃颜的叛乱被镇压后，忽必烈曾命令在乃颜故地上由乞儿吉思搬迁来的部落居住（《穹庐集》）。这些搬迁来的部落大部分是“林木中的百姓”，这些部落中虽没明

确记载有无巴林部,但据乞儿吉思东迁的地理方位和巴林部的活动区域,认定十三世纪末巴林人就活动在喀尔喀流域,即今辽宁北镇县,镇远(今黑山),镇武,西兴等堡(今台安以西)和海州卫(今辽宁海城),东昌,东胜(今海城西北)等堡的关外一带辽阔地域。其驻牧地离明边 400 余里,达延汗划分的喀尔喀万户,巴林部族自然就在其中。

十六世纪初叶,左翼三个万户在达延汗去世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左翼兀良哈万户反叛,达延汗长孙卜赤汗联合右翼济农衮必里克墨尔根及济农弟俺答多次出征兀良哈。在平息兀良哈叛乱后将兀良哈万户分割,并入其它五个万户中。喀尔喀万户被分封给其子阿尔楚博罗特和格埒森札。阿尔楚博罗特领内喀尔喀,包括巴林部在内的扎鲁特、弘吉刺惕、巴约惕和兀者五个部落,属于漠南喀尔喀蒙古集团;格埒森札领外喀尔喀 7 部,分别由他的 7 个儿子统领,形成漠北喀尔喀集团。

内喀尔喀五部因活动在后金、明、察哈尔大罕势力的中间地带,一直为三者的争夺对象。明人称察哈尔大汗为小王子,云“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明史》卷 327),领有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和苏尼特等部。明嘉靖三十六年(1547 年)卜赤罕病故,其子打来孙继位,率部从宣府大同塞外的察哈尔旧地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西拉沐沦河流域,吞并泰宁、福余二卫,威逼女真各部,与明朝在辽东发生冲突。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打来孙卒后,其子土蛮罕即位,希图用和平分封的方法统一漠南各部,于明万历初年封察哈尔部的脑毛大(阿穆岱鸿台吉)、内喀尔喀的苏巴海、鄂尔多斯的黄台吉、阿苏部的哑速火落赤和土默特部的扯力克五人治理政事。由此巴林部的苏巴海统领漠南喀尔喀五部,势力一度强大起来。

苏巴海的父亲名虎喇哈赤,那个时候巴林部比较强大。《万

《历武功录》卷十二记载,虎喇哈赤为达延汗之孙,统领喀尔喀五部,势力十分强盛,“勃勃著名于塞上矣”。《水晶念珠》、《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证》等史籍还记载,虎喇哈赤去世以后,他的五个儿子分别是喀尔喀五部的首领。这五个儿子是卫征、苏巴海、乌班贝穆多克新、索宁岱青、舒哈克卓里克图鸿台吉(炒花)。五部中苏巴海统领的巴林部最为强大,实际上苏巴海是喀尔喀五部的首领。《万历武功录》记载“延之苏巴海愈益驍悍,每当出入即秉薰张旗,鼓金吹螺”。还记载喀尔喀五部当时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明边广阔的辽河地区,距明边 400 余里。

明时,封建统治者为了遏制边外蒙古的发展,限制和取消边界上的互市贸易,或者实行不平等的交易,这样经常引起磨擦,以至酿成冲突和战争。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苏巴海引兵八千余骑,在明之降将黄永的引导下,从镇安堡过广宁城至青云台,十月,从义州大清堡入王汉屯。蒙古军遂与明军发生战斗,经过厮杀,双方互有伤亡。当年十二月苏巴海又引万余骑从辽阳攻入长胜堡,以后至次年一月,多次攻入长胜堡。四月,苏巴海引八千余骑兵分两路,一军扑向镇武堡,一军袭邢百户等台堡,之后入墙子路岭引诱明军,与明备御苟麒交战。战斗中苏巴海指挥部队骤起驰射,疾军冲入,大败明军,虏人掠马,声益壮之。九月入锦州大胜堡,十月从大胜堡入凌河,十一月从高台堡入沙河。次年正月从长静堡入鞍山,又从长定堡入打莺台,击毙明备御王承德。此役大胜,逼使明政府在明边开设贸易市场。

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明在边境互市,声称抚赏蒙军,并假互市贸易趁蒙古军麻痹大意,借机捉捕苏巴海部下阿某赤等三百余人作为人质,必欲得黄永后方解免。苏巴海恐人质过多,部众有怨言,遂于四月二十日,将黄永银铛至明伏法,明始释阿某赤等。由此,苏巴海及其部众积怨在心。此后在整个明万历

初年，冲突连年不断，而且愈演愈烈。明万历六年（1573年）苏巴海率所部 8000 余骑，欲攻铁岭和沈阳，此时明军四路大军齐聚，欲围歼蒙古军。苏巴海侦知后，火速退出边外，驰至雕背山。明军李平湖率部从镇宁堡出塞 120 多里，欲与内喀尔喀蒙古军决一雌雄，但见喀尔喀军队精勇，不战而还。

此后至明万历十年（1583年），苏巴海率巴林部在内的内喀尔喀蒙古军和驻屯兀良哈的左翼汗军与明军每年都有战事，或胜或负，打打停停。有的战役规模较大，如明万历二年（1574年）苏巴海携同土蛮部，聚大兵十余万众，西自虹螺经历广宁直抵辽河，延袤 500 余里。明军也大增兵力，明总兵李成梁到沈阳督战。在蒙古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明朝被迫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四月在大同宣化互市，于广宁开议市交易马匹牲畜与丝绸米面。另一次大的战役于明万历九年（1582年）初，苏巴海聚喀尔喀兵数万再度攻明，三月，苏巴海军以辽河为险与明李成梁大战，因炮火不敌而败退。四月，苏巴海又以一万余骑，从孙真台入，杀明军千总陈鹏、把总潘汝戢，及视兵曹义等 360 人，伤百余人，大捷后，以 3 万余骑攻辽沈开原。明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苏巴海一面命部下班季来、那亥尔只额等去明寨侦察敌情，又令子巴吐儿、巴颜巴吐儿驰赴清细河，使塔刺亥、大四红传箭到明关，谓商讨买卖开办互市，一面亲率 2000 余骑到镇夷堡袭击明军。明大将军李成梁调参将李平湖迎战。李平湖射技最精，交战中，贯弓于矢急射苏巴海。苏巴海右肋中箭落马，被明之苍头军李有名割首而亡。

苏巴海亡后，苏巴海的弟弟炒花及侄老撒、卜儿暖抢回尸体，由妻哈屯、妹夫花大裹尸归营，以布殓，葬于塔母户渡下。巴林部众官兵及喀尔喀各部官兵皆去帽顶，免冠示孝致哀，老幼尽哭泣，又建房于斯，由酋长九家，每家派一人守陵。

## 喀尔喀与苏巴海

---

苏巴海一生骁勇，且形貌异常。《万历武功录》记载，“始苏巴海伏殿刀死，当披盔甲臂手，汉使降夷长汉往验，级大如斗也”。

苏巴海有四个儿子，长子巴吐儿，次子巴颜巴吐儿，三子千谷，四子召里吐。苏巴海死去，长子巴吐儿决心为父报仇，曾借土蛮之众攻明，后来也战死在疆场。苏巴海的次子巴颜巴吐儿接替长兄巴吐儿继续率兵攻打明朝，但是没有达到目的，自己也受了重伤，于是率巴林部后退，驻牧于旧辽阳迤北适两河之间，蒙古语称此地为“哈孩额力苏”。这个时候喀尔喀五部由苏巴海的弟弟舒哈克卓里克图洪台吉所领。彼时，满州女真努尔哈赤强大起来，喀尔喀五部为其攻破，五部益衰弱，退至西拉沐沦河一带，依附于察哈尔林丹汗。

### 三 定边立旗巴林地

公元十五世纪末叶，达延汗的直属领地察哈尔在达延汗之后逐步形成八个鄂托克，明人称之为“八大营”。这八个鄂托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鄂托克的名称流传下来，有的被淹没而消失。流传下来的有浩齐特、苏尼特、乌珠穆沁、敖汉、奈曼、克什克腾，消失的有塔塔儿、兀鲁、阿速、克木章古特等。公元十六世纪初叶，察哈尔达来孙库登汗由锡林郭勒草原北部越兴安岭东移，迁到西拉沐沦河流域，悉并兀良哈三卫地。当时游牧于西拉沐沦河流域的巴林部置于大汗的控制之下。

明末，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汗国，对靠近它的蒙古诸部采取“征”与“抚”的策略。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喀尔喀巴林等部与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和好，相约共同征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攻明铁岭卫，弘吉剌惕部宰赛以兵万余助明，被后金生擒。为救出宰赛，第二年十月喀尔喀五部的28名诺颜“刑白马乌牛盟誓”，向后金乞和，其中有巴林部苏巴海之孙额布格德依洪台吉。

当时，察哈尔大汗与明议和共同对抗后金，因此，察哈尔胁迫其所控制下的喀尔喀巴林等部与后金背约。为切断喀尔喀等部与后金的联系，察哈尔部从中作梗，劫掠后金通往喀尔喀科尔沁的使者献给明朝，还抢夺后金的财物牲畜。努尔哈赤大怒，于

## 定边立旗巴林地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亲率诸贝勒征讨察哈尔。丁丑日出十方寺,渡辽河,轻骑疾驰,分兵八路并进,先至巴林部。巴林部的首领苏巴海之孙囊奴克弃寨逃走,被后金四贝勒皇太极射死。后金夺取巴林环屯七寨。辛巳日,命诸贝勒率兵征西拉沐沦。努尔哈赤谕曰“马力乏即还”。诸贝勒未至其地而返。三贝勒夜行相左,至西拉沐沦俘获畜产无数。随后巴林部的一些诺颜开始与后金往来。察哈尔大罕十分恼怒,指使喀尔喀扎鲁特部劫夺后金派往科尔沁的使者。努尔哈赤先传檄喀尔喀扎鲁特背盟之罪,接着率大兵起行,先进攻扎鲁特部,俘获巴克及其二子并拉什西布14人,斩其首领贝勒鄂尔其。又遣楞额哩等以兵600征讨巴林部(巴林和扎鲁特为兄弟部),驱哨燎原,声势浩大,这样一来使巴林部和扎鲁特部首尾不能相顾。后金军队进入巴林以后,俘获人口270,驼30,马牛1000余,羊2000余。

次年,天聪元年(1627年)察哈尔大部以喀尔喀各部抗击后金不力,兴兵攻掠喀尔喀诸部,扬言服从者养之,抗拒者杀之,巴林部和扎鲁特部遭掠尤甚。两部不堪掠夺,投奔科尔沁部,但又不见容于科尔沁。巴林部首领色特尔遂率子色布腾侄满珠习礼归附后金。《清太宗实录·卷四》载:“巴林部落贝勒塞特尔(色特尔)、台吉塞冷、阿玉石、满珠习礼来归。塞特尔(色特尔),塞冷等,蒙古喀尔喀所属也。蒙古察罕儿(察哈尔)林丹汗,既破喀尔喀,于是塞特尔(色特尔)、昂阿遂举部投奔蒙古嫩科尔沁国。科尔沁贝勒复扰害之。至是,率部来归。”

巴林部归附后金,并向努尔哈赤献上骆驼马匹。后金政权对巴林部的归降十分重视,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出迎5里,赐大宴款待。此后,巴林部的色布腾和满珠习礼等率巴林部众参与了后金征服察哈尔林丹汗和征伐明朝的战争,并且在战斗中屡建功勋,受到了清廷的赏识,为后来定边立旗封爵打下了基础。

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冬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伐明,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为向导,喀喇沁部众、敖汉部众加入伐明大军的行列。巴林部众在首领色特尔、塞冷的率领下,也参与此次征战。在攻打明朝昌黎县时,巴林部、敖汉部、奈曼部、扎鲁特部的蒙古军攻城。皇太极谕曰“若攻克其城,城中财物,任尔等取之”(《清太宗实录》)。蒙古军一鼓作气攻克此城;以后又克遵化,围燕京。

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夏四月,皇太极又率大军征讨察哈尔,大军过辽河西拉沐沦河,巴林部色特尔、阿鲁科尔沁部奔巴楚虎尔等各率所部蒙古军会合,过喀喇沐沦河(今查干沐沦河),越兴安岭,大军直指林丹汗。察哈尔林丹汗闻满洲大军来攻,更有巴林等部的蒙古军配合,大惧,遍谕部众,弃木土皆西奔。以后,巴林与扎鲁特等部又随同满洲阿济格左翼军攻占明朝大同宣府边外。清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征明,攻塔子岭,巴林部的兵马参战。此次战斗十分激烈。明军凭借边墙拒守。巴林兵众从边城东小门平坦处举火炮竖云梯攻之。巴林部阿玉什率领属下索尔吉等捷足先登破城,诸军相继攻入。九月,又攻占青山关、盖家口、青山营,之后又随皇太极攻打锦州、塔山、松山,擒明总督洪承畴。此次征伐,先后克3府18州67县88城池。

后金(清)统治者在征服察哈尔林丹汗以后,为稳定和羁縻蒙古各部,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划定蒙古诸部牧地,将巴林部的驻牧之地定于西拉沐沦河中游北岸,与镶黄旗蒙古以扈拉琥、瑚呼布里都、克里叶哈达、瑚济尔阿达克为界。巴林部牧地的位置在古北口东北780里,至京师960里,东西251里,南北233里,略呈长方形状,东至阿鲁科尔沁,西至克什克腾,南至翁牛特,北至乌珠穆沁。在划定牧地的同时,将巴林部分为左右两翼,封色特尔为巴林右翼扎萨克,满珠习礼为巴林左翼扎萨克,



确定两翼扎萨克的驻地分别为济尔哈郎图河(今沙巴尔台河)。还编定所辖户口,巴林部长色特尔 800,台吉满珠习礼 800。

巴林右翼扎萨克色特尔病故以后,其子色布腾接任扎萨克,掌管巴林部。后金崇德四年(1639年),色布腾代表巴林部在扎滚乌达地方参加了八部十一旗的楚古拉干(昭乌达盟)会。

1644年清兵入关以后,巴林兵众随固山贝子巴哈对明作战,迎吴三桂投降,战败李自成,平定山东。清顺治三年(1646年)随额尔和硕亲王陶都追剿苏尼特堂吉思部,立下了战功。巴林部首领色布腾和满珠习礼多次得到皇帝甲胄、驼马、布匹等赏赐。

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帝以蒙古诸部归诚已久,立下赫赫战功,敕曰“尔等秉资忠直,当太祖太宗开创之初,诚心以附,职效屏藩……两朝恩宠。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芳名于不朽,不亦乎”(《清实录》)。遂为蒙古各部封爵。封巴林右翼扎萨克色布腾为辅国公,巴林左翼扎萨克满珠习礼和台吉塞冷为固山贝子。塞冷因于天聪年间尚郡主,又称额驸将军固山贝子。同年,建旗制,编佐领,建巴林右翼旗和巴林左翼旗。钦定巴林右翼旗执政扎萨克为辅国公色布腾,巴林左翼旗扎萨克为固山贝子满珠习礼。巴林右翼旗扎萨克驻地托钵山(今巴颜套白山),巴林左翼旗扎萨克驻地阿察图陀罗海(今敖日盖)。两旗于驻地建旗衙门,又称扎萨克衙门,为旗最高政权机构,由清政府直接管辖。旗衙门由执政扎萨克 1 人总理旗务。其下设监印协理 1 人,东西协理各 1 人,专管印鉴、旗务,协助旗扎萨克管理军务。协理下设扎赫拉其(章京) 1 人,掌管事务梅林 2 人,分管庶务、收支、司法等事宜。梅林下属扎兰 3 人,以辅佐梅林。扎兰之下,设必车赤数人,专管簿记文牍。

旗衙门之下设佐领,巴林共设佐领 32,左右两旗各得 16。佐

领亦称苏木，设苏木章京 1 人，承旗扎萨克之命，办理所属苏木一切事宜。佐领初为军事编制，每佐由 150 个箭丁组成，每佐领（苏木）下设骁骑校和领催，负责军事和税赋等。此后二百年，西拉沐沦河北岸的巴林草原便成为巴林右翼左翼扎萨克的世袭领地。

## 四 金枝毓秀在草原

清顺治五年二月，从京都通往蒙古草原的一条古道上出现一队人马，循驿路踽踽而行。走在前面的50余骑士分列两行，左面一行是白马骑士，右边一行是黑马骑士。骑士们全是蒙古装束。他们行走整齐，不错不乱。马队后面隔一节便是二吾杖二对瓜二骨朵二绣宝孔雀伞，再后面是六面伞扇遮掩着的硕大的毡围车辇。辇前两柄黑纛引路。辇后是满载什物的五十辆车子。再后面便是若干百姓。这些人衣着杂乱，老老少少，拖儿带女，慢慢蠕动。这一日来到一条河流跟前，车辇停住，毡围的门帘挑处，在婢女的搀扶下，一位盛妆青年女子走出来。她抬头一看，只见这条河宽约里许，遍地明冰，太阳一照宛若一条银带。沿河吹起小风，刮得河岸的沙子溜溜地跑。青年女子不禁浑身一抖。使女连忙取过一个吉祥杂宝苏绣斗篷给她披在身上。一个老妈妈劝她上辇，青年女子摇了摇头，执拗地立在寒风中，手搭眉檐朝河北望去。但见河对岸突兀耸立一座高山，青虚虚白莽莽耸入冻云之上。她唤过乌和尔达问：“这条河就是失烁摩伦河吗？这山就是大青山吗？辽史上说的巴尔当哈拉山吗？过了这条河就是巴林旗地吗？过了大青山就是巴林旗王府吗？”乌和尔达跪禀：“禀公主，您说得对极了，您看，河对岸山下的那些红顶子蒙古包，是巴林王爷在那里等着迎候您呢。”公主点了点头，舒眉展眼朝红顶

子蒙古包望去。

这个公主就是大清皇室固伦淑慧公主。她此行辞别京都，来到千里草原，下嫁给巴林右翼旗辅国公扎萨克色布腾。这是清帝入主北京后第一个下嫁的皇室闺秀。这个固伦淑慧公主，闺名阿图，清天聪元年出生于沈阳后金帝宫（今沈阳故宫）。公主是清太宗皇太极之女，清世祖福临帝之姊，清圣祖玄烨帝的胞姑，为孝庄文皇后的亲生女儿。孝庄文皇后在封妃前生有五个女儿，有后来的固伦雍穆长公主，固伦淑慧长公主，固伦端献公主等。固伦淑慧公主是她的第二个女儿，排行皇五女。史籍上记载淑慧公主为皇四女，是世祖章皇帝之妹有误。康熙帝御笔写下的固伦淑慧公主的圻志文中记云，“太宗文皇帝之女，世祖章皇帝之姊，朕之姑也”。

固伦淑慧公主为什么清朝入关即下嫁到蒙古巴林呢？说起来与清皇室的权位争斗很有关系。说到皇室的权力之争，不能不说青史有名的一代女杰孝庄文皇后。皇后姓李儿只斤氏，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为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蒙古科尔沁和建州女真部努尔哈赤联姻，她与她的姑姑姐姐先后嫁给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出嫁时年仅13岁，由其生母亲自护送到努尔哈赤处，将她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皇太极当侧室福晋。清崇德元年（1636年）被册封为永福宫庄妃，淑慧公主出嫁时，因其母被册封为妃，遂被晋封为和硕长公主。庄妃于后金崇德三年（1638年）生下皇太子福临。福临5岁时袭了皇位，改元顺治，母以子贵，庄妃被封为皇太后。淑慧公主因母亲为皇太后，遂晋为固伦长公主。

孝庄文皇后是个不同寻常的女性。为闺时就胸怀大志，习文演武，为妃时才貌出众，后宫之人无与伦比。在清军入关这件事上曾有功于清廷。传说后金崇德六年（1641年），明蓟辽总督洪

承畴在解锦州之围时被清军生俘。皇太极看中他的才干，想收降他，但是费尽心机，洪承畴只是不降。洪绝食以抗，表白他不事二主的忠心。正当后金满朝文武无计可施之时，庄妃自告奋勇，扮成汉女手捧人参汤进入囚室，曰：“妾也是被掳来的，闻君不甘凌辱但求速死，何不饮此毒药？”洪承畴万盼速死，即饮之。待饮后，庄妃笑道：“此乃人参汤，我也不是汉女，而是皇妃，皇帝爱才心切，才使为妃前来，不顾羞耻矣！”又百言相劝，陈说利害，终使洪承畴降清。此后洪引清兵入关一路破竹，占领了中原。由此庄妃在朝野名声大震。皇太极去世后，按理应是豪格继位。豪格是继妃乌拉纳拉氏所生，在皇太极 11 个儿子中，他居长，为皇长太子，且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初封为贝勒，继晋为亲王，掌户部，洪承畴即由他俘获。孝庄妃为让自己的儿子继皇位，她自己登上皇太后的宝座，实行了一整套的拢络多尔滚，置豪格于死地的计谋，其中下嫁 17 岁的亲生女儿来蒙古就是这个策略内容之一。

公主深知母意，一切照办。传说初来巴林时，她的夫君巴林多罗郡王色布腾已有原配夫人名叫查干达日。原来巴林色布腾王爷在京朝觐时，孝庄文皇后见其仪表堂堂，立有战功，又任昭乌达盟长，便将皇女赐嫁于他。皇上金口御言，既说出口哪能收回。此番公主下嫁巴林，色王爷只得将查干达日隐藏它处，以图蒙混过去。谁知公主耳聪目明，一到巴林就发觉了此事。公主当时大放悲声。伴娘们一齐来劝，都被公主轰了出去。这样过了一天一夜公主不哭了，又看了一天一夜书，第三日走出帐篷，面朝京都向母后焚香遥告：“母亲，我阿图小女虽则不才，但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我愿为皇朝出力，谨记母后之言，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为皇家大业万死不辞。”遂召见查干达日，言说今后共伴夫君，辅佐额附，治理地方，安抚蒙众。

礼隆内女下嫁蒙古草原，而且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朝廷

为了表明“北不断亲”的主张，自然要大办而特办，别的陪嫁暂且不说，光跟随公主来到蒙古草原的陪房户就有 300。这些户口有原来侍奉公主的宫女，但大多是京郊宣化一带的满人汉人。他们多数都是工匠，称 72 行。这些人后来都融合为蒙古族，但工匠行业世代相传，汉族人口还记着他们的汉姓和祖居之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还一代一代地传着银铜匠、铁匠、木匠、瓦匠、皮匠、盆瓦匠等手艺，有的还开办手工作坊。但是这些匠人们在当时来到蒙古草原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兴建王府殿宇和土木住房，排街列巷，种田种菜。这些在巴林草原简直亘古未有的事惊动了四方，各盟各旗都知道了皇女来到了巴林。固伦淑慧公主成了人们仰慕的人物，遂使蒙古安定，心向朝廷。现今居住在巴林右旗东部的弘吉刺惕部的蒙古人就是投靠公主来的，在公主的保护下来这里定居，避免了蒙古部落内部的一场纷争。一个时期，漠南东部蒙古盟旗出了事情，都要向公主禀告，由公主裁决，不必奏请京都。皇帝有了事情，由公主传谕。这样既快又稳，保证了蒙古盟旗的稳定，而且为蒙古各部参加清廷统一全国的战争起到积极的作用。

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不藉宗教的力量实现其统治的愿望，维护其统治的地位。历史以来，儒释道三教分别在不同时期兴盛传播，成为统治者宣扬的为人民群众所信仰的精神支柱。清廷入关，原满洲人信仰的萨满教渐为关内汉族信仰的释道教所取代。清朝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必须用宗教的力量推动其统治政策，因此在固伦淑慧公主下嫁巴林时，孝庄文皇后就让她带来和尚道士，并众多经卷和法器。公主完婚不久，就出资命自己所带工匠于王府附近修筑了一座龙王庙，供和尚在庙里住持诵经，并广收弟子。因当时居住条件所限，公主破例容许道士的弟子们可以不住庙，娶妻生子，称“伙居道”。

此后不数年，固伦淑慧公主又将藏传格鲁派喇嘛教引进巴林。公主深知蒙古民众信仰喇嘛教（黄教）由来已久，及此教对安抚蒙众作用的真谛，于是她几度进京，得母后谕示。为使喇嘛教迅速传入巴林草原，她不甘落后，开始考虑兴建喇嘛庙。修建寺庙耗资费物，怎么办？有办法，砖瓦石灰由所带陪房工匠在当地烧制，木材则从有名的巴尔当哈拉山（大青山，今白音汉山）大松林里采伐。银两哪里出？公主毫不吝啬倾其所有，再不够，由色布腾王爷集旗众捐募。终于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在王府西南朝格敖力格尔地方，建成当时巴林草原第一个也是东蒙古地区最大的喇嘛庙。此庙前后两座高大殿宇，前殿悬匾圆会寺，后殿悬匾普觉寺。此后数十年间，后殿曾一度毁于大火，遂保留此殿法名圆会寺，蒙古名为特古斯布力德格勒庙，当地人习称西大庙，今日虽仅存遗址，但堆积物如小山一般。圆会寺建成后，公主进京，奏请朝廷，从青海名刹请来一位名叫额尔德尼嘎布其的达喇嘛来寺掌教，并在蒙古青年男子中挑选其聪敏者传授佛经度为弟子。由此巴林草原盛传喇嘛教，佛经上的美妙说教很快使得蒙众信仰，蒙古人的头上升起了佛的光环。他们每事必拜佛，每言必诵佛，一切苦难归于前世的罪孽，一切不幸归于自己对佛敬之不诚。天长日久，意志钝颓，甘愿受辱不敢抗争。他们有子送庙当喇嘛，争个当世消罪来世荣华，遂使蒙古人口锐减。为了使草原众生皈依佛门，公主不惜重金万两自京都抄写一部“金字甘珠尔经”，在经文的后面记上了捐资制经的固伦淑慧公主和她的丈夫色布腾与四个儿子的名字。除此而外，还用大量黄金，制做金佛金塔多尊供奉寺内。据传由于兴建此庙将公主的积蓄耗费殆尽，可谓用心何其良苦也。

就在圆会寺建成的这一年，巴林右翼旗额附多罗郡王扎萨克色布腾病故。当年36岁的公主忍着悲痛，办完了丈夫的后事，

举办了寺庙落成庆典。据原存圆会寺的《巴林蒙古王公世系表》一书记载：公主曾说过，我兴建此庙是为我皇祖政权的巩固和佛教的兴旺。

固伦淑慧公主虽然远嫁蒙古草原，但也一直关注和参与宫廷内部的皇权之争。顺治帝薨逝，孝庄文皇后利用鳌拜，稳住朝野，立年仅8岁的康熙帝即位，以后数年临朝听政，在康熙14岁亲政时，一举捕获阴谋篡权的鳌拜。所有这些，固伦淑慧公主都积极参与。《巴林蒙古王公世系表》记载说，康熙帝8岁登基时，就是固伦淑慧公主抱着上殿的。公主对母亲孝庄文皇后可谓母女情深。据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孝庄文皇后患疾，公主虽年56岁但不顾疲劳日夜兼程回京探视母病，亲手煎汤熬药，护理不离左右。皇后亦非常喜爱固伦淑慧公主，多次嘱咐康熙皇帝护视阿姑。康熙帝承祖母之训，表示“迎养以乐暮年，毕姑一生，皆朕之事”。康熙帝亦感姑母之恩，十分孝敬，对公主一生所为十分嘉奖。云公主“齿德俱茂，迥异诸姑，朕敬礼有加”。康熙帝在巡视塞外之繁忙的军政事务中，也不忘北方草原的这位姑母。康熙帝在祭文中曾这样写道，“自昨秋行边相见，顾瞻颜色，稍异平时，知惟摄卫之失宜，恐为风霜所患苦，极劝来归，勉进医药”。公主在京治病其间，皇帝尤为关心，“朕尝亲视，以至再三”，但终于“疾竟费瘳，以及永诀”。

固伦淑慧公主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去世，享年69岁。从顺治五年（1648年）公主17岁下嫁时算起，在巴林草原生活了52年。长期生活在巴林，使她对蒙古草原有了深厚的感情，在那里她留下了自己的儿女根亘。她热爱那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还有她治下的蒙古胞众，不然她为什么临死以前立下遗嘱，将她的尸骨运回巴林草原落葬？

对于固伦淑慧公主的故去，康熙皇帝十分伤心，这一点从皇



帝三谕祭文看得出来。公主逝去之时皇帝谕祭文，行殡之时帝再谕祭文，灵车将发往巴林帝三谕祭文。读祭文中字句，那些肺腑之言出自皇帝亲笔。现将全文录之于次。

朕惟诗美王姬。礼隆内女，出来下降，谊切同源。而令德考终，加恩无替，粤稽往牒，觐此为难。惟我公主，出自我皇祖，金枝毓秀，玉质含章。向日慈闱，尤深怜爱，一切护视，以属朕躬。朕祇承训言，弗敢失坠，更缔婚媾以垂永好。常语姑勿忧在外服，终当迎养以乐暮年。毕姑一生，皆朕之事。日月逾迈，出降五十余载。礼仪不衍，用享多福，子孙昌衍，朕甚嘉之。自昨秋行边相见，顾瞻颜色，稍异平时。知惟摄卫之失宜，恐为风霜所患苦，极劝来归，勉进医药。朕尝亲视，至于再三，而疾竟费瘳，以及永诀，乃曾无戚容，欢然顺去。於戏！凌云一笑，知无身后之余忧；抚棺长辞，不负生前之夙诺。办丧皆出于内府，推恩不忘于后人。祀事肃将，凡筵展告，明灵不昧，来格来歆。

以上为一谕祭文。

惟公主诞膺淑质，托体天家，仰承我圣祖母之劬劳，益夙娴于内则，出降藩服，历有岁年。壶仪聿修，纤毫无闲，齿德俱茂，迥异诸姑。朕敬礼有加。祇承先志，知向者，恩勤之志，予有先觉之明；今兹送终，一无所苦，朕深惊异，用慰永伤。於戏！生兼五福，去无一尘，达此所难。在我闺阁，足流辉于彤管，以纪盛于内宗。行殡有时，加兹谕祭，星沉旧邸，还依往日宫中；云去流沙，长断来时山色。薄陈祖奠，用展衰衷。

此是二谕祭文，多为行殡之时。

惟公主属在懿亲为朕姑，厘降藩服为王母。女宗无忝，内则悉娴，多福罄宜，怡然怛化。顷者，两颁谕祭达以谕章，叙慈闱怜爱之深情，暨朕躬祇承之。至意荣哀之礼，事事有加。践夙昔之盟言，谅明灵之默鉴，兹者，遁车将发，藩国是归，緬容卫之徂征，

经山川之绵邈，凡昨岁迎来之路，即千秋长去之途。瞻望弥勤，情怀曷极。特遣皇子，往护丧行，助引绋之劳，视窀穸之事，一切庀具，如朕亲临，俟宅兆之孔安，度歿宁之无撼，呜呼！自初薨以及将窆，情莫罄于哀诚；从旧邸以返新阡，礼必其于敬谨。昭朕始终之异数，增姑魂魄之余欢。申荐几筵，尚其歆格。

上为祭文之三，当为灵车将发之时。

固伦淑慧公主逝于正月初十日巳时，遗骸葬于当年八月二十四日辰时，初葬白音汉山葛根绍荣，迁葬于凤凰山前，再葬于巴林“查汉摩伦河西巴颜昆都伦山”。查汉摩伦河即今之查干沐沦河，巴颜昆都伦山即今之额尔登乌拉山。陵地前后各有一小山，前照巴颜和硕山，后依道木图山。陵园东向，为四方形院落。四周围以丈许高墙，院落最深处是公主陵墓，一个很大的圆形坟茔。墓前不远处是祭殿。祭殿建筑高大，前廊后厦，叠椽抱柱，两侧各有掖室，祭殿前面是门殿，门窗涂有绿漆。再往前是陵园的前院。院内有南北陪房各三间，中间竖有祭碑，碑高三丈，书满蒙汉三种文字。建国后，陵园毁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出土有固伦淑慧公主骨灰罐和圹志文。细读圹志，似仍出于康熙皇帝之作。全文录于次。

制曰淑慧长固伦公主

太宗文皇帝之女

世祖章皇帝之姊，朕之姑也。生于天聪六年二月十二日亥时，薨于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十日巳时，春秋六十有九。卜以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辰时，窆於查汉摩伦之河西巴颜昆都伦之名山。呜呼！朕纘鸿绪念系皇祖之女，皇考同气之亲，方期骈集繁祉，永享大年，何意剧而薨逝！朕怀震悼，曷其有极，为卜兆域，并设垣宇，窀穸之文，式从右制，祭享仪悉循典章，勒之贞珉，用志生薨之年月，惟灵其永妥于是焉。

## 五 弘吉刺惕八佐领

清天聪年间，朝廷给蒙古诸部定边封爵，将巴林部的牧地封在西拉沐沦河以北。从此蒙古巴林部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但今天居住在巴林右旗东南部的牧民大部分却是弘吉刺惕部的后代，巴林人称其准奈曼苏木（东八佐领）。

当初，清政府为了分散蒙古的力量，利用蒙旗封疆将各部旗互相孤立起来，即限制各旗之辖境，封锁各旗之疆界，使他们互不相属。朝廷禁令规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如越出本旗疆界游牧或与外旗往来者，王、公、贝勒、贝子、台吉等无论管旗不管旗，皆罚俸一年，无俸的台吉和属民百姓则按例罚取牲畜。这样一来，实际上每个扎萨克旗就成了一个封建领地。蒙古首领们得到了封疆领地权十分高兴。

那么，蒙古弘吉刺惕部人，是怎么到了巴林部的牧地居住呢？巴林蒙古族牧民恩和巴图曾撰文记述这样一个传说。

明末清初喀尔喀五部是札鲁特、巴林、巴约惕、兀者和弘吉刺惕。喀尔喀五部之一的弘吉刺惕部其先的游牧地在今辽宁省铁岭一带，不知何时何故迁徙到呼伦贝尔草原，而迁到巴林的原因是部族内讧。弘吉刺惕的小达尔罕诺颜去世之后，在谁来承袭扎萨克爵位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鄂托克的蒙古贵族坚持“长子掌旗政季子守家业”的惯例，推举了芒哈拉岱青承袭爵位，但满洲

陪官们却怀疑芒哈拉岱青对大清王朝有异心，力荐所谓“智勇双全”的季子袭爵。

此事最后由清廷定夺，令芒哈拉岱青承袭爵位。芒哈拉岱青尽管有蒙古人推举和皇帝的恩典，承袭了扎萨克爵位，但同满洲陪官们的摩擦难以消除。巴特尔诺颜不忍看到这种局面，给其弟芒哈拉岱青暗递短笺，“将灶主困于户，率三兄弟及三十部弘吉刺惕，尽除龟蛇之族”。这种可能招致氏族之灾的想法，使芒哈拉岱青诺颜惊恐万状。于是，借口“兄长年高体衰”免去了其兄巴特尔诺颜的军职，让巴特尔诺颜的两个儿子兀拉代、兀苏台继承。

当时，漠南漠北的蒙古举旗反清，使清廷吓得如同惊弓之鸟。巴特尔诺颜尽管已卸甲赋闲，满清陪官们对他仍不放心，最后用毒酒致死才算罢休。为了掩饰这桩罪恶勾当，他们对兀拉代、兀苏台兄弟二人夸赞说，“兀拉代的背力超过博古伯勒古岱，兀苏台的箭法赛过哈布图·哈斯尔”。与此同时，策划挑起鄂托克的内部分裂，兄弟阋墙。他们鼓动拉布泰洪、兀拉代、兀苏台等人说，“你们应南下到克哈河一带去驻牧，那样，皇帝一定会看重你们，赐予扎萨克爵位，甚至有可能把你们两位英雄招进京城当近卫将军”。

这年阴历五月十三日，在呼和哈达博格多敖包庆典上，拉布泰洪台吉同芒哈拉岱青诺颜争吵，以致兵戈相见，互相残杀，死伤很多人，芒哈拉岱青诺颜一方最后惨败。拉布泰洪台吉当即藏匿旗印，收拾所有财产、畜群，率领所属十佐领南下。

弘吉刺惕部尽管是惯于迁徙跋涉的游牧部落，但在盛夏酷暑中昼夜兼程，急速行进，显得疲惫不堪。他们过了小兴安岭，满洲陪官们带着军队突然悄悄的离开了。这样一来，迁徙的人们不知去什么地方，只好漫无目的地向南奔。没有了满洲陪官，人们倒轻松了许多，行进速度也放慢了不少，也有不少人悄悄溜回了

老家,也有很多人从老家追赶上来寻找妻室儿女团聚。从后面赶来的人们说,芒哈拉岱青诺颜已驰书京城,把洪台吉告到朝廷了。拉布泰洪台吉听了大为震惊,知道自己上了满洲人的当,但悔恨莫及。他们只好加紧赶路进入巴林右翼旗境内,投奔下嫁巴林郡王色布腾的固伦淑慧公主寻求庇护。拉布泰洪拜见公主,一五一十地禀告事情的原委并求他救命。公主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说:“我可以奏请圣上,免你一死,但你须精诚报效圣朝。”

皇帝接到芒哈拉岱青诺颜的奏本正要发怒时,固伦淑慧公主的奏章也到朝廷。公主奏“拉布泰洪台吉已投奔到巴林旗,请圣上宽容,免其一死,赏赐给我巴林为盼”。皇帝看了公主的奏章后,说“拉布泰洪台吉今日既然投奔了公主,就把他交给公主好了”。

固伦淑慧公主对弘吉刺惕部众施以洪仁博义,亲自在阿布吉干图呼和少荣山南麓设大账,带去很多的布帛、米面和药物,隆重迎接了他们,给拉布泰洪台吉及其所属的十佐领的台吉诺颜每人绸缎一匹,给庶民部众分发了米面、酒肉,给老弱病患施以药物,如此大宴三日。其时正秋高气爽,哀鸿南征,历尽重重苦难的人们此时悲喜交夹,触景生情,怀念家乡及骨肉同胞,借酒兴唱起了哀惋的歌,闻者无不流泪。公主及随从也极为动情,遂将呼和少荣以南至昆都楞芒哈、西拉沐沦河,以东至乌力吉沐沦河的广阔而丰美的草场慷慨地赐予了他们。弘吉刺惕部喜出望外,连连拜谢公主的恩典,为了永久纪念公主及巴林王公台吉们的友善仁慈的美德,将阿布吉干图呼和少荣山(汉语意性情反复无常的尖子山)改称为“赛汉章图乌拉”(汉语意为性情美好的山)。如今座落在巴林右旗洪格尔苏木境内的赛汉章图山就是当年的阿布吉干图呼和少荣山。

弘吉刺惕部的一、二佐领定居于幄希尔罕山(今伊图古图罕

山)、哈达图河一带,三、四、五、六佐领定居于顿图格尔罕山、乌力吉沐沦河一带,七、八佐领定居于古日班淖尔附近,九、十佐领定居于昆都楞芒哈、西拉沐沦河一带,从此过上了平安的日子。他们为了报答公主的恩遇,年年月月给公主进贡。公主和旗扎萨克衙门也非常看重拉布泰洪台吉,奏请朝廷把他擢拔为协理。

弘吉刺惕部归附巴林部以后,他们的摔跤手、神箭手和快马多次在巴林旗那达慕上夺魁,对此巴林部的一些台吉和诺颜们大为不悦,心生嫉妒,说“英雄苏巴海的子孙难道甘心落后于弘吉刺惕”?他们从所部各佐领抽调壮汉、骏马加紧训练。按说这本是兄弟之间的争风,但在满洲陪官眼中,巴林、弘吉刺惕二部的合并则意味着对他们的潜在威胁,于是他们无中生有节外生枝地告到了朝廷。他们想起“云聚则成雨”的祖训,施展了离间弘吉刺惕、巴林二部关系的阴谋诡计。

这一年春天,王府里养的一条最好的猎犬得了病,咬了府里的好几个人。满洲陪官趁此机会收买阴阳,散布这是心腹之人为害征兆的谣言。巴林郡王听后,心生疑窦,暗自嘀咕这个心腹之人到底是谁?从此,郡王心上投下了一道阴影。

此年阴历十月二十五日,巴林王公们在西大庙参加宗喀巴圆寂日诵经深夜返回王府的途中,听到东南方向一声轰雷般的巨响,随即一颗巨星自东南朝西北方向陨落。郡王见巨星陨落,心中十分纳闷,寻声望去,半夜里的东方泛出黎明似的鱼肚白。“那边为什么有这样的白光?”王爷问左右。“咳!王爷您今天才发现,东南边泛这种光已经不止一次了,据阴阳说……”满洲陪官趁机给郡王递上了半截话。几天后,郡王的身体欠安,陪官说,这是弘吉刺惕人要篡夺旗扎萨克权力的征兆,必须把弘吉刺惕的祖传旗印夺过来。

谗言惑旗众,毒箭戳人心。然而,不仅善良的巴林人还是住

在巴林境内的弘吉刺惕人,对这种情况丝毫没有察觉。这时,东有科尔沁西有唐古特举事反清制造叛乱,所以,清统治者恐惧蒙古各部,千方百计分散他们的力量。在平定科尔沁时,清廷不敢派遣巴林的蒙古军队,怕他们伙同对方倒戈反清,尤其不能让弘吉刺惕巴林二部偕行,这如同放虎归山,危险很大。出于这种猜疑,皇帝令巴林的蒙古军去平息西夏叛乱。当时巴林的色布腾郡王病体未愈,奏请朝廷让儿子替他出征。巴林旗军出发不久,原明朝辽东总督后降清立过汗马功劳的吴三桂在南方称帝,举兵反清。清廷命令各地蒙古军去平定吴三桂之乱。巴林郡王接到圣旨后,令弘吉刺惕部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悉从戎远征。

拉布泰洪台吉接到郡王的命令,认为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便将弘吉刺惕部所有男丁交给兀拉代、兀苏台两个诺颜带领出征。兀拉代、兀苏台两个诺颜带着未满二十岁的儿子登上了征程。

临走时,兀拉代、兀苏台领着所属十佐领的头目及儿子拜见公主。公主用玉樽斟酒亲自赐予兀拉代、兀苏台诺颜,祝福道:“孩子,祝你远征凯旋,让弘吉刺惕部名扬天下!”

兀拉代兄弟出征一年多,杳无音讯,家乡的父老深感不安。这时,拉布泰洪台吉接到巴林王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五月五日,愿与协理在哲热图集中打黄羊围。协理带领人马向东南两个方向行围。我从西北方向行围,双方人马会合于赛汉章图山南。此次见面,我想见一见你们珍藏的祖传旗印,务请带上切莫忘记”。拉布泰洪台吉读毕巴林郡王的信,即派人把行猎时间地点等通知所部十佐领,一面准备携印而行。聪慧的协理夫人劝道:“巴林王爷说顶礼求见咱们的旗印,恐有诈。如果诚心敬仰旗印为什么非要带到猎场?印鉴也不是刀枪棍棒。”儿子萨邦台吉也说:“巴林王爷真要见咱们的宝印何不到咱这里?王爷是圣主成

吉思汗的金枝，我们也不是庶民百姓的后裔。”任凭妻儿苦苦相劝，老协理执意不改初衷。行猎日期到了，老协理从佛龕取出珍藏的宝印，包在蓝缎子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出发了。弘吉刺惕部向有不分男女老少掷棍投棒打猎的习惯，因此这一天，他们黎明前就出发，摆队列围，朝猎场中心地带追赶。打围圈收拢会合了，善良的弘吉刺惕人还在催马唆犬，张弓搭箭，掷棍投棒，使黄羊纷纷倒地。但是弘吉刺惕人毕竟老少居多没打下多少猎物。巴林的猎手个个年轻力壮，老远可以看出他们驮在马鞍上的猎物多得几乎拖地。围场收拢会合之后，巴林的猎手们慷慨卸下猎物，热情的分送给弘吉刺惕部空着手的人们。

午时，帐篷支起来，处于正当中的饰以云纹大帐格外醒目。巴林郡王色布腾满脸堆笑走出行帐，亲自将老协理请进帐篷里，摆下酒宴款待。酒过三巡之后郡王起身用清水洗手，焚香净身，小心翼翼地接过弘吉刺惕的祖传宝印，将宝印顶到脑门求福之后，传给手下人看。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学着王爷的样子顶礼求福，越传越远。行帐外人声鼎沸，争先恐后地嚷“给我！给我看……”。王爷不动声色的陪着弘吉刺惕的老协理拉布泰洪台吉，不时斟酒，谈笑风声，频频劝酒。外面人声悄然静了下来，老协理以为人们已经顶礼求福完了，便对郡王说：“现在该把宝印装匣了。”郡王传令道：“送还宝印！”门外静悄悄无人应承。许久进来一个侍卫禀道：“宝印不见了！”王爷佯装暴怒，厉声喝斥：“下贱的奴才！快给我找回来！”

老协理喝得晕晕乎乎，一听宝印不见了，立刻踉踉跄跄地跑出行帐，用嘶哑的嗓音喊：“还我的宝印！还我的宝印！”扎木苏台吉拨开众人到父亲跟前，问道：“我们的宝印是否失落了？”几乎急昏了的老协理跌落在儿子怀里。萨邦台吉等弘吉刺惕的台吉诺颜们也闻声赶来，一面劝慰老协理，一面求告王爷：“郡王开



## 弘吉刺惕八佐领

恩,请求您一定要把宝印找回来!”巴林郡王当即召集所部各佐领头目道:“今天打猎的人不准放走!一伙一伙地,一个人一个人地搜一遍!一定要把宝印找出来!”遂封锁了猎场,不分上下挨个搜,直到黄昏也没有找到。暴雨倾盆,霎时,平地积水尺余,行帐已挡不住水,人们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又冷又饿,实在难捱。夜间,大部分弘吉刺惕人悄悄回了家。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解闷开心才打猎的,有的家里没有人,有的只留下年幼的孩子看家,遇上这么大的雨,自然放不下心。第三天早晨云开雾散了,但平川汪洋一片。巴林王和弘吉刺惕拉布泰洪台吉只好放走众人,约好之后再再来寻找宝印。

雨水终于退去了,双方如约前来,翻着泥浆找了七天也未见宝印的影子。老协理经过这次的打击,身心交瘁,口吐鲜血昏厥过去,被四个人抬着回了家。如今在巴林右旗洪格尔苏木东北部的塔玛干召就是当年弘吉刺惕部丢失宝印的地方。

弘吉刺惕兀拉代、兀苏台率领的巴林旗军经过几年辗转征讨,尽管在连年的战争中,弘吉刺惕部人表现出色英勇无畏,攻城掠地所向披靡,报效国家凯旋而归,但也死伤惨重。

兀拉代、兀苏台骁勇善战,带兵有方,主帅把他们二人留在京城,准备引见给皇帝,受封领赏。这时巴林郡王恰恰也在京城。他听到论功行赏名册中有兀拉代、兀苏台二人,禁不住妒火中烧。郡王当即用重金贿赂主帅,又用金银珠宝贿赂京城六部及理藩院文武众臣,将镇压吴三桂军功记在自己两个弟弟名下。兀拉代、兀苏台兄弟二人在战场出生入死地奋战七个春秋,却被幽禁在一个小院里达半年之久。对他们来说,被困在这种小院子,比在战场上拼死拼活更难熬。终于有一天早晨,主帅派人告诉兀拉代、兀苏台,时下不能让他们二位诺颜觐见皇上,有事日后再说,不久朝廷便派几个兵丁押送他们回乡。一同参战的有功人员都

得到了朝廷优厚奖赏,唯独没有兀拉代、兀苏台二人的份。而且,当他们二人长途跋涉回到家时,仁慈的母亲和叔父拉布泰洪台吉已经去世了。

原来,半年前弘吉刺惕部的勇士们从战场上回到家乡时,兀拉代、兀苏台的母亲没见到自己的两个儿子的身影,就以为儿子阵亡了,当既哭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他们的叔父拉布泰洪台吉被王爷欺辱含恨弃世。他们听了这一切,悲痛难忍忧恨满腔,竟把手中的酒杯握个粉碎。兀拉代、兀苏台兄弟俩回来后,经常去巴林王府,指问巴林王爷:“你们为了讨好朝廷,派我们弘吉刺惕的子孙上战场,为什么不但不照顾留在家里的父老孤寡,反而欺负他们?”并且每次去都要讨还那枚弘吉刺惕部祖传旗印。巴林王被他们逼得无奈,只好假意答应找回他们的祖传宝印。装模作样令其下属各佐领抽五十兵丁,在丢失宝印的地方架起蒙古包挖一口井住下来,让兵丁们挖地寻找弘吉刺惕旗印。今洪格尔苏木东部塔玛干胡都格就是当年寻找宝印时打的井。

延之巴林右翼旗多罗郡王乌尔滚当政时,东八佐领的弘吉刺惕部台吉赛音宝音是银匠,手艺绝佳,巴林王就把他叫到府上,常年给自己制作各种金银饰器。赛音宝音早年丧偶,他的儿子阿由尔扎纳从小随父亲东奔西跑,形影不离。父亲进王府,他自然常在王府中玩耍。阿由尔扎纳眉清目秀,性情温和,虽然年幼,待人接物象成年人那样文雅得体。巴林王看中了他,便让他给自己的独生子琳布当胡德。阿由尔扎纳当了胡德之后,跟琳布一起念书。阿由尔扎纳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熟读蒙、满、汉文字。

多罗郡王乌尔滚报效国家多次参战,于康熙六十年在军营亡故,其子琳布继王位。琳布承袭王位后,把好伴当阿由尔扎纳封为旗扎萨克衙门的塔玛干必车赤,对此,旗内外的满洲陪官们十分不满,聚众当面斥责,“自太祖明法掌印必车赤应从有学识

的满洲人中选之，而今让一个小珠腊沁掌管印章，岂有此理”。琳布王爷受到这些指责，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当初我承袭王位的时候，你们反对我袭位。而今我已经袭位，任用一个小小的必车赤，你们都不让，简直是欺人太甚”。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呵斥：“我们蒙古人，别说一个必车赤，还能在朝廷作官，你们识相点！”盛怒之下，在京打死了一名满洲侍卫官，严惩了府内一些官吏，换掉了一部分苏木扎兰。这件事引起了满洲陪官们的愤恨。他们煽动那些被撤职的官吏及巴林、弘吉刺惕二部人，给年轻的琳布王爷罗织很多的罪名，上告清朝皇帝那里。没过几年琳布王爷终于被这帮奸贼恶棍诬告削爵。

阿由尔扎纳对这些丑恶现象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正在苦闷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一位老差夫匆匆忙忙跑来悄悄告诉他，“今夜必有大祸，立刻离开此地”！阿由尔扎纳听了老差夫的劝告，左右寻思了片刻，一横心，潜入衙门内府，打开密封的印柜，将弘吉刺惕部早年祖传宝印取出来揣在怀里，跨上骏马，向故乡东南方向的十佐领奔驰而去。

机智勇敢的阿由尔扎纳离开王府的时候，找到那守夜的更夫，说：“你进府告诉，就说我阿由尔扎纳带着弘吉刺惕祖传宝印回家去了。”这个更夫从心底里钦佩阿由尔扎纳的胆量，不愿把此事通报府内，但又怕连累身家性命，犹豫良久，最后还是通报了王爷。王府里顿时人喊马叫，乱作一团。王府的官吏们说：“府内进盗贼了，旗扎萨克的大印被盗走了！”便集合王府的卫兵追捕阿由尔扎纳。阿由尔扎纳快马加鞭一口气爬上了查日斯台山梁，他回首了望，清楚地看到王府兵丁骑马追了上来。他整了整马鞍，系紧腰带，稍歇片刻，等骑兵赶到跟前时大声喊道：“兄弟们，我只是找回来了我们弘吉刺惕的祖传宝印。弘吉刺惕部与巴林部本是同宗兄弟。我不希望兄弟之间干戈相见，希望你们平安

地回家去吧！”说完纵马下山。追兵深知阿由尔扎纳的厉害，派两名兵丁回府报告情况，然后远远跟着阿由尔扎纳，以免让他跑掉。走到长满柳条和芨芨草的弘吉刺惕敖包时，阿由尔扎纳突然不见了，追兵们十分焦急。正在这时，满洲陪官们率兵赶到，大发雷霆：“你们这些酒囊饭袋，眼睁睁地放跑了一个大活人！”蒙古军务梅林只好花言巧语替自己辩解：“在查日斯台山梁上我们同他杀了一阵，黎明前天太黑，让他趁机溜掉了。”满洲陪官们下令：“放火烧树林和草滩，并挨个查弘吉刺惕的每个浩特，活捉盗贼阿由尔扎纳！”这样放火烧杀十余天之后，在昆都楞芒哈发现了阿由尔扎纳。阿由尔扎纳不畏强暴作战身亡。今巴林都希苏木南部的朝黑勒都根达坝（即打仗的山梁）就是当年王爷的军务梅林的兵丁与阿由尔扎纳拼杀格斗的地方。今胡日哈苏木境内的塔玛干芒哈，就是当年阿由尔扎纳战死的地方。沿着西拉沐沦河岸居住的弘吉刺惕部第九、十佐领的牧民纷纷南渡西拉沐沦河移居到翁牛特贝勒旗境内。巴林王发觉此事之后，立即派兵在西拉沐沦河北岸设立了哨卡把守，不准弘吉刺惕部其余八佐领渡河。因此，有了“哈日杰”这个地名。今胡日哈苏木哈日杰嘎查就是当年的哨卡哈日杰。有了哨卡，弘吉刺惕人大批迁徙已不可能，但他们从未间断一两户地偷渡西拉沐沦河迁入翁牛特贝勒旗内。于是王爷又下令沿昆都楞芒哈南边立一行木头界牌，禁止弘吉刺惕人翻越木牌，今西拉沐沦苏木牌毛都嘎查因此而得名。哨卡和木牌都没能阻止弘吉刺惕人，后来巴林王派四等台吉住在此地，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些充当密探的巴林台吉之中的一些人，为了得到王府的赏识和提携，竟把弘吉刺惕人家常话都记下来，加油添醋地向上报告。因此，东八佐领的人私下交谈时，先把对方叫到一边，避开那些密探，贴着耳朵悄悄说话。这种谈话相沿成习，至今巴林的一些老年人见面就开玩笑说，“你

们是在唠东八佐领的家常吧”？

以上，虽然为传闻，但经考证，这部分蒙古人确是属于古老弘吉刺惕部的后裔。传闻中的地名沿用至今。

关于弘吉刺惕部，有关的蒙古史籍里记载颇多。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著名文献资料《史集》记载，弘吉刺惕部，是远古传说中蒙古族宗祖涅古思的后代，属于蒙古迭儿列斤部，弘吉刺惕部是最先离开涅古思和乞颜二人生息的摇篮“额尔古纳昆”的。他们是从一个“黄金壶”里出生的三个儿子之一的后代。弘吉刺惕部是其长子一系，亦乞列思和斡罗忽纳惕出自其次子一系，合刺纳惕和弘里兀惕出自其第三子一系。《史集》还记载这样一个传说，蒙古族形成之初十分孱弱，他们被封锁在一个铁山里。他们为了出山，便聚众拉风箱融化铁山。铁山里边的弘吉刺惕部落未经商议提前出了狭谷，结果不小心踩坏了其它部落的炉灶，脚被烫伤，因而传说弘吉刺惕的后人都有脚疾，据说是因为偷偷出山罪孽落在他们脚上。

最初，弘吉刺惕部的游牧地在今呼伦贝尔地区的根河、得尔布尔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元史·特薛禅传》记载的苦烈儿、温都尔斤，即今之根河和得尔布尔河之间的山峰。迭烈木儿即今之得尔布尔河，也里古纳河即今之额尔古纳河。成吉思汗时代，弘吉刺惕部与额勒只斤、巴儿勿惕部彼此驻牧之地相邻而联合在一起，他们印记全都是同一个，他们互相联姻，不与成吉思汗为敌，全都在者台诺颜的特薛禅中供职。弘吉刺惕部世代与蒙古乞颜部通婚，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旭真和妻子都是弘吉刺惕部人。蒙古大汗窝阔台时代，曾正式下过诏旨，“弘吉刺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因此弘吉刺惕部受到种种殊遇。1214年成吉思汗率军进攻金国拉岱青驻地达里诺尔之北的迭蔑可儿时，发布对弘吉刺惕部分封领地的诏旨。于是弘吉刺惕部的驻牧之

地由苦烈儿、温都尔斤、迭烈木儿一带迁至今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今赤峰市北部的广大地域,其中就包括今之巴林草原。弘吉刺惕部的拉布泰洪台吉率部来巴林似有回故土之意。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开疆辟土的征战中,弘吉刺惕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部长特薛禅立功受封,其子按陈、按陈子赤古都被封为千户诺颜,统领原弘吉刺惕部的四个千户,并被编为木华黎左手万户之中。在以后的蒙古军进攻金国时期,弘吉刺惕部与亦乞列思、兀鲁兀惕、忙忽惕、札刺亦儿等部组成著名的五投下。在由木华黎亲率的诸路探马赤军中,就有弘吉刺惕部按陈诺颜的三千骑兵。有元一代弘吉刺惕部以今赤峰市北部克什克腾、巴林、翁牛特草原为中心游牧。当时弘吉刺惕首领按陈以今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北的答儿脑儿为营幕中心,在那里建立元室公主的离宫,后建为应昌城,为驻冬之地。夏季则驻全宁城,全宁城在今翁牛特旗乌丹镇。应昌和全宁二城,不仅是弘吉刺惕部的政治中心,还是漠南草原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洪武年间,明军北征大宁全宁等地,弘吉刺惕部几乎覆灭。16世纪中叶,达延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弘吉刺惕归属蒙古内喀尔喀五部,由阿勒楚博罗特之子虎喇哈赤的第三子兀班贝穆多克新所领。当时兀班部驻牧于今辽河以北地带,史籍称“开原铁岭西北七百余里”,“古路班升户儿大汉把都楼子”一带。蒙古图门罕时代,领有喀尔喀五部的苏巴海与明朝作战战死以后,弘吉刺惕部兀班的子孙们成为五部中的最强者,曾组织五部与明作战。后金兴起后,为胁迫蒙古喀尔喀部与明作战,曾擒拿弘吉刺惕部首领并作为人质相约攻明。

弘吉刺惕在兀班当首领时,号称三十部众。居住在巴林的弘吉刺惕部是三十部中的一部分。据弘吉刺惕后裔恩和巴图所记,其世谱为:兀班有二子,即小达尔罕诺颜和昭日格图诺颜;小达

## 弘吉刺惕八佐领

---

尔罕诺颜有五子，即巴特尔诺颜、芒哈拉岱青诺颜、秉图诺颜、白恒达楚呼尔诺颜、拉布泰洪台吉。长子一系巴特尔诺颜有二子，即兀拉代、兀苏台。兀拉代诺颜有四子，即查干阿尔斯兰诺颜、查干毕力格诺颜、苏门查干诺颜、敖特根诺颜；敖特根诺颜有二子，即赛音宝音、呼乌宝音；赛音宝音有一子为阿由尔扎纳诺颜。小达尔罕诺颜的第五子一系拉布泰洪台吉有二子，即萨邦台吉和扎木苏台吉；萨邦台吉有六子，即那顺扎布台吉、罗格金巴台吉、白斯古楞台吉、白布台吉、道布台吉、杜拉玛台吉；杜拉玛台吉为三等台吉，有三子，即达萨协理、达木扎台吉、博迪台吉。上述的拉布泰洪诺颜所领的弘吉刺惕部众都居住在巴林草原。今天大家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着巴林这个美丽的家园。

## 六 戎马一生乌尔滚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初二日清晨,霞光像往常一样照耀在一座红瓮般的山峰上,本来就是赭色的山峦越发显得斑斓多彩。山峰兀耸,在它的脚下是一大片数平方公里的平坦高地。高地被哈尔哈河和泡子河分成南北两片。南片驻扎着清朝大军。清军按照左翼军统帅福全的部署,建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阔二十余里,营营之间首尾联络,屹如山立。隔河对岸北片,称乌兰布通,驻着进攻清朝的新疆蒙古绰罗斯厄鲁特部的噶尔丹部队,数万骑兵部队依林阻水,缚驼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毡毯,环列如城,号曰驼城。噶尔丹为了防止清军的进攻,以守为攻,以驼为阵。清军与噶尔丹部的这一场战争关系匪小。若噶尔丹胜,可长驱直入京都,因此处离京都仅七百里。若清军胜,则使北部边境永靖,腾出手来对付南方三藩之乱。

清军投入战斗的兵力约十余万,其中有从京都发来的大兵,也有邻近蒙古各部骑兵,主要有巴林部、喀喇沁部、阿鲁科尔沁部等。巴林左右二旗参加的兵众较多,据《巴林蒙古王公世袭表》记载,巴林右翼旗十五岁至六十岁的男丁,不分台吉属民和奴隶悉数参战。对于这次关键性的战斗,清军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他们针对噶尔丹以守为攻的驼城战术,感到单凭冲击是不行的,于是调集火器营,以铁心炮、子母炮轰击驼城,



打乱噶尔丹的阵脚。噶尔丹的军队大都隐在林内，他们以河流高岸为屏障，固守阵地，不断地从卧驼之间隙发射炮弹。这一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和残酷。自日出到黄昏，枪炮声震耳欲聋，清军几次发动进攻，均“为河泥所阻，回至原地而立”（《清圣祖实录》卷148）。内大臣佟国纲率部循河而进时，被流弹击中死亡。黄昏以后，清军再一次组织进攻，此次由佟国维指挥，火器营以重炮轰击围城骆驼，使驼毙于炮，遂打开缺口，使噶尔丹驼阵一分为二，继而蒙古骑兵冲锋陷阵，“阿鲁科尔沁二等台吉栋纽特率三十余兵趋前站，皆战死”（《清史稿》）。在这关键时刻，只见一骑白马的缁衣青年，指挥巴林部骑兵跃出阵地，刮风般地冲向敌阵。在河泥之中部分骑兵伤亡，青年大吼一声，率余骑扬鞭催马跃上高岸，向驼阵猛扑过去，随即卷入山腰，恰与清军绕山而击的部队相遇，两军合为一处，横出击敌，驼阵自破。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多罗郡王鄂其尔次子乌尔滚。

乌尔滚生得精壮骠悍，大眼紫面，自幼骑马习武，作战十分勇敢。此次朝廷命巴林部参战，本来应由扎萨克鄂其尔亲自率部作战。无奈鄂其尔身患痼疾，不能前往，乌尔滚自告奋勇，代父出征，指挥数千名巴林右翼旗骑兵冲锋陷阵。若在别人，不等过河就退回来了，皆因乌尔滚指挥得当，他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面，台吉子弟紧随其后，再后面方是属民箭丁。台吉族子弟都是好马，未为泥河陷住，这样就冲出了一条道路。战斗结束以后，清廷查寻记录赏赐有功之人，乌尔滚勇敢善战荣立战功，并进京领功朝觐，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他所率部下鸿格利德子孙被封为头等台吉，布和图尔昂嘎子孙被封为三等台吉。康熙帝看中了英姿勃勃的乌尔滚，翌年，便将亲生女儿和硕荣宪公主嫁到巴林草原，乌尔滚遂成了皇室和硕额附。可以说这是皇帝对乌尔滚乌兰布通之战战功的最大封赏，同时也决定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乌兰布通战役之后,清军虽然获胜,但是噶尔丹的实力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而清朝的军队和蒙古兵众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此役,清军左路军统帅过高地估计噶尔丹军的实力,在噶尔丹求和的烟幕下,没有乘胜追击,坐失战机。史籍载噶尔丹“由克什克腾之什拉穆楞载水横渡,越大磧山宵遁,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什拉穆楞河,就是现在的西拉沐沦河,乌兰布通所在的萨里克河,因在西拉沐沦河之上游,故统称西拉沐沦河。大磧山即是从乌兰布通大红山至刚噶诺尔之间的沙丘。《经棚县志》记载说“兴安岭西麓之沙丘相连克力更一带,均为沙磧,古名大磧山”。噶尔丹战败之后,集聚兵力,希图卷土重来,为此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皇帝再度亲征,兵至克鲁伦河。乌尔滚率巴林骑兵随康熙大军出征,受命率部众到乌珠穆沁参战。此役清军获胜,在昭莫多地方大败噶尔丹,使其丧失了赖以发动战争的兵力。

这以后,准噶尔部接连不断地发生内讧。先是,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乘机自立为准噶尔罕,并率兵堵截噶尔丹,不让他回归故土。噶尔丹腹背受敌走投无路奔青海,在阿察阿穆塔台地方自杀。二十年后策旺阿拉布坦强大起来,称霸新疆,还出兵西藏,不断与清朝发生冲突,成为清朝西北方的最大威胁。清康熙五十六年,双方再度发生战争,朝廷命乌尔滚率部从征西陲。此时的乌尔滚已经袭爵,当上了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多罗郡王固伦额附。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还出任昭乌达盟盟长,总管昭乌达盟戎务。清康熙五十五年朝廷封他为副将军董督二十三旗戎务,并命令他率二十三旗兵马从清朝大军讨伐策旺阿拉布坦。出征之时,乌尔滚与其弟桑利达登上旗之佛山白音汉山,在山顶的敖包上插了天马佛幡,盛祭敖包,然后离旗而去。当时的场景生离死别,十分悲壮。后来的人们将这一情景编了一段故事,名

字叫“二公主送夫西征”，简要录之于次。

说的是大清康熙五十四年夏，巴林大雨如注，接连十余日不开晴。路上行人断绝，但是却挡不住驿马往来。原来皇帝诏示巴林右翼旗多罗郡王固伦额附乌尔滚，立即带领东蒙古二十三旗蒙古兵丁，随清朝大军去西北征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

准噶尔部在哪里？从巴林说往西再往西，要经过五盟十三旗。接到诏旨后，王府上下立刻为乌王爷出征作准备。这日是二十三旗兵马会齐的日子。清晨，固伦荣宪公主早早起来，命仆妇取出乌王爷那领石青色片金绿罗通绣九蟒的崭新郡王爵服，亲手给夫婿穿在身上，然后束上嵌着四颗猫眼石的金镶玉朝带。郡王爵服穿完了，还要外套补服。又命人取过几领补服，公主选了件赭褐色饰四团五爪行龙前后圆补的给乌王爷穿上。前后左右看了看，对襟合适，袍襟将膝，半袖过肘。最后将一顶连托三节饰冬珠七颗的朝冠戴在乌王爷头上。末了默默地望着丈夫的面庞，伸出手去，将丈夫鬓脚的一根白发拔掉。“看，你都生了白发。”

“公主，我都四十五岁了，就要老了，能没有白发吗？不过我身体强壮，武功不减当年，到了战场，一定会再次立功受赏，一定能使皇上岳父欢心。”

“别贫嘴，这一次出去要十倍小心，我打算让桑利达弟弟随你去，也好有个臂膀。是不是让儿子琳布也去？”公主说。

乌王爷略皱眉头想了一下，说：“公主，谢谢你的关照。桑利达弟弟智勇双全，此次出征，有他在左右，确实好多了，可是我们两个都去了，旗政谁来管呢？”

公主说：“这个我想过了，旗政嘛就交给我来管。难道你不相信我能够管得好吗？你想想看，这些年你常年在在外征战，桑利达年龄又小，旗政实际不是由我管着吗。就说你虽是本旗的王爷，

哪一件事没问过我,都是我作的主呢。王爷,我所惦记的不是旗政而是你。桑利达弟弟一定要去,不然我是不放心的。琳布儿子你也要带去,让他见见世面去。这孩子太骄奢了。你看,你今日要出征,他不来送你,跑到哪里酗酒去了。”

公主话还没有说完,忽听外面门响,琳布酒醉如泥地由两个仆人搀着撞进来。公主见了,怒起心头,喝令鞭打儿子。王爷趋前一步止住,说:“这个孩子太不争气了,不入学斋读书,整天喝酒打牌瞎胡闹,只念他年龄小,饶过这一回。谁让他是我们的独生子呢,将来还等他承袭爵位呢,一旦打坏了可怎么办?公主,看在为夫的面上原谅他吧。只是我走以后,把他留在家里,你要从严管教。”

公主执拗地说:“还是把他带到战场上去吧。”

“公主,”乌王爷急道:“此次远征,说不上何年何月能够回来。再说能不能回来……不能把我们的根亘扔在战场上啊!”

乌王爷有些酸楚,不由得滴下泪来。公主也十分伤心,拉住丈夫的手抽泣。“那么,就依了你吧!”

乌王爷的弟弟桑利达穿着整齐走进来,说:“王爷,公主,咱们的旗军已经起行了。时候不早,我们祭山去吧。”

公主说:“那就快起行吧,我到门德敖包送你。”

在巴林旗王府的南边,有一座名山。它的前面是西拉沐沦河,它的后面是查干沐沦河。它是辽朝大契丹的发祥地。辽五代祖勃突就生于此山。勃突力大无穷,勇猛异常,力敌万人,生前统一契丹各部,死后葬于此山,山的名字便叫巴尔当哈拉山。康熙皇帝来了以后,将此山改名白音汉山,成了旗之佛山。此后,每当巴林兵出征,都要在此山祭祀佛祖,祈求获胜,平安返回。这次出征,恰逢巴林五月十三日祭敖包的日子,远远近近的旗民百姓都来到,一是送了出征,二是祭祀敖包。乌王爷同桑利达来到的时

候，满山坡到处都是人。

巳时将要到，法器奏响，喇嘛们诵起经来。不一会，由八个身材魁伟的蒙古汉子抬着煮熟的整牛整羊供祭在敖包前面，乌王爷亲手给敖包插上青松翠柏，挂上一丈五尺多高的天马佛幡。然后牵着翁根佛马绕敖包转了三遭，再举起招福神箭，插在招福神筒里，口中连连呼叫“福来！福来”！旗民百姓一齐唱起祭歌：

众山之首的白音汉山佛哟。

屹立在群峰之巅，

神力无比的大罕山哟，

雄踞于万山顶端。

山峦在四周屏绕哟，

朝霞向它俯首鞠躬。

苍苍莽莽千山万岭，

唯白音汉山立柱苍穹。

……

午时将要到，乌尔滚带领旗军来到西拉沐沦河渡口的门德敖包。此时，固伦荣宪公主正等在那里。旗民百姓也都聚拢来。他们也是在这里同当箭丁出征的亲人告别的。

“公主，请回吧！祝愿公主平安，旗民兴旺！”乌王爷认镫上马。

“王爷，早去早回，佛爷保佑多打胜仗，频送家书。”公主送到桥头，立在桥之中央说。

王爷走了，旗丁走了，公主仍然凭风而立在桥上。她的身后是数不清的旗民百姓。常言道：

人生最苦是别离，

公主送夫征西陲。

一生不离征鞍马，  
今日出战几时回。

乌尔滚此次带兵出征，连续征战六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桑利达身受炮伤。据载，桑利达带领巴林部的兵丁攻打厄鲁特军队，俘获几百敌军，交于大将军。清廷查记录封诸战功者时，将桑利达封公，出任旗协理职。乌尔滚也得到皇帝嘉奖，帝谕昭乌达盟部队自备粮草、马匹非常辛苦。因此多次得到封赐。据史料记载，在连续六年的征战中，乌尔滚仅回巴林旗一次，“其母病歿，帝允其回巴林服丧百日”。

清康熙六十年(1723年)巴林右旗扎萨克乌尔滚奉命率部回师，在回军的途中由于积劳成疾去世，享年五十一岁。乌王爷歿后，葬于巴林右翼旗齐齐哈尔图王陵。清雍正六年，固伦荣宪公主病歿后，乌尔滚的骨灰与固伦荣宪公主遗骸合葬于巴颜陶拜山阳。1972年固伦荣宪公主墓被发掘时，发现在公主棺椁前有一白瓷罐，内装白色液体，稍南侧有一骨灰罐和残损衣物。罐外壁以金字书写“额附副将军多罗郡王”。出土的墓志较详细地记载了乌尔滚的生平及功绩。照录如下：

驸马乌尔滚，系元室之胄也，为巴林多罗郡王办理旗务。乃我太宗文皇帝第四女(按《清史稿》载第五女，这里恐有误)淑慧国长公主之嫡孙也。康熙四十三年嗣封王爵，使统领十一旗事。五十五年董督内属国二十三旗戎务，北讨测旺妖星(按测旺即策旺阿拉布坦)犹炽，未酬敌慨之心，梁木忽摧，转甚英雄之痛。遂于康熙六十年二月十三日薨于军，享年五十一。男一人，女一人，男琳布袭封王爵，女为显亲王妃。

## 七 更缔婚媾垂永好

“更缔婚媾以垂永好”。这是康熙帝御笔所书。此语出自御赐固伦淑慧公主祭文，“朕祇承训言，弗敢失坠，更缔婚媾以垂永好”。说的是康熙帝承祖母孝庄文皇后“联姻蒙古，安抚边疆”的谕示，谦恭地说自己不敢使联姻之事辍断，再次缔结良缘与蒙古垂恩结好之事。事实正是如此，康熙皇帝在位三十年的时候，将次女荣宪公主嫁给巴林右翼旗的台吉乌尔滚。当时公主下嫁时是十九岁，丈夫乌尔滚是二十二岁，固伦淑慧公主还健在，时年六十二岁。由打固伦淑慧公主这边说，乌尔滚是公主与色布腾王爷的长子鄂其尔之子，是公主的嫡孙。从京都皇室那边讲，荣宪公主是淑慧公主娘家的侄孙女，荣宪公主应称呼淑慧公主为姑奶奶。从辈份来说，荣宪公主与乌尔滚成婚当是一个辈份。

固伦荣宪公主所以能够与乌尔滚成婚，固伦淑慧公主生活在巴林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康熙二十九年巴林西邻乌兰布通地方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战事，清朝大军与新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武装力量打了一次大仗。当时康熙皇帝亲征，派大臣在巴林旗境内的西拉沐沦河上的公主桥指挥战斗。巴林部派乌尔滚率部参战。这一场战斗打败了噶尔丹，乌尔滚作战勇敢立了战功。据传康熙帝曾召见乌尔滚，见其年方二十一岁，英姿勃勃，一表人才，心中欢喜，次年遂

将亲生女儿和硕荣宪公主嫁于乌尔滚为妻。公主下嫁聘礼甚为丰厚，金银绸缎自不必说，随嫁陪房人就有 240 户，与固伦淑慧公主的陪嫁奴一样，也是各种匠人俱全。他们来到巴林以后，在王府附近定居。此时加上固伦淑慧公主带来的 300 户，光陪房户口就是 540 户。这在当时来说可谓一个不少的数目。史书记载，巴林析部建旗之初，巴林右翼分得人口 800 户。此番随嫁陪房人口占当时全旗人口的一半以上。并且集中在一处居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聚落。在聚落里面，有王爷府、圆会寺等高大的砖瓦建筑，也有土坯石块垒成的低矮平民屋棚。远远望去屋顶宝刹金光闪闪，空中雾霭蒸腾，这在当时蒙古草原可谓奇观壮举。住在草原上如星斗般蒙古包的人们惊奇赞叹而仰慕，将这里称作益和板兴，即硕大的板兴房屋。数百年来名称演译，渐称大板，即今日巴林右旗人民政府所在地大板镇。

大板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的中心。这里住着掌管旗权的至高无上的扎萨克，衙门府住着处理全旗政务的管旗章京。他们拥有朝廷恩赐的封疆土地，旗内的山川草原人丁户口都归王爷所有。这里还住着皇室下嫁的“体托天家”“出降藩服”的公主，盟旗王公四时八节都到这里参拜。陪房匠人们为满足公主王爷和台吉贵族们的日用所需，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作坊。跑草地的“拨子”们也来草原经商，吸引着旗内外蒙古民众来这里交易，因此这里成为四通八达的商品集散地，自然而然成了经济活动中心。旗内信喇嘛教的蒙古人都要到旗庙荟福寺朝拜佛祖，当然便是信仰中心。据有关史料记载，益和板兴不但在巴林，就是在东蒙古也是十分有名望。这一切同荣宪公主下嫁巴林关系极大。

荣宪公主初嫁巴林时，被封为和硕长公主。一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才被封为固伦长公主。不过荣宪公主被封为固伦



长公主并非因生母晋为皇后，而是得到朝廷优旨褒奖。公主下嫁时夫婿乌尔滚年方二十二岁。在当时，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是乌尔滚的父亲鄂其尔。公主下嫁的第三年公爹去世，在谁承袭扎萨克位子的这一件事上旗之上下曾有过争论。原来鄂其尔有子三，长那木德格，在鄂去世那年已三十一岁，次子便是公主的丈夫额附乌尔滚，三子的名字叫桑利达。按照正统承袭应是长子那木德格，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殊情况，因乌尔滚是额附，顺理成章的应当是额附担当一旗之主，且乌尔滚有战功，才貌双全智勇过人。人们都希望乌尔滚袭爵任巴林右翼旗第三世扎萨克。据传公主在这一点上明智克己，极力劝说台吉与旗民，并在上报朝廷承袭的文书上将乌尔滚的名字勾掉，换上大伯那木德格的名字。这一举动一时为之称颂。此事在她的御赐碑文上有记，“奉苹藻以流徽，无惭妇道；协珩璜而著美，克尽母仪”。虽然此言属于礼仪之文，但可略见一斑。

荣宪公主十九岁来到巴林至五十六岁去世，在蒙古草原生活了 37 年。公主平生身居蒙古草原，但深深懂得祖母固伦淑慧公主下嫁蒙古安抚蒙众巩固皇祖开辟的皇朝政权之志向，铭记皇父让她来蒙古草原实现“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之目的。其时，沙皇俄国不断袭击大清国，入侵东北战略要地雅克萨城和喀尔喀蒙古所居的色楞格河流域，煽动喀尔喀蒙古脱离清朝，入俄国国籍。俄国还借南方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的机会，加强对北方蒙古地区的侵扰。他们以提供武器、重金收买蒙古上层人物等卑劣手段，发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头子噶尔丹叛乱，肢解北方领土，进攻清朝政府。为了痛击反叛，打破沙俄的梦想，粉碎叛军进攻，巩固北部边疆，康熙皇帝经常巡视塞外，并在北方兴建行宫，行围木兰围场。其间也曾来到巴林右翼旗王府驻蹕。为此，公主和夫婿乌尔滚决定在巴林右翼旗王府所

在地大板修建康熙行宫。

行宫仿照京都四合院的格局，建得优美壮观富丽堂皇。康熙皇帝驻蹕此处，大为高兴，曾给荣宪公主亲笔题写“金枝衍庆”匾额。康熙帝对黄金家族皇室宗女在塞外蒙古草原枝脉繁衍续接不断很是高兴。这同后来的御赐固伦荣宪公主碑文上的“荣宪固伦公主，辉分玉叶，派衍璇源”是同一个含义。关于康熙皇帝题写匾额，在巴林草原代代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当年，康熙帝来到行宫门首，上了七级台阶，举目望去，只见青虚虚瓦顶，光溜溜墙壁，红漆抱柱，细棂门窗，不由叹道：“好一座建筑！不过这得多少银两？我的闺女，皇父从来不许奢耗。”公主道：“皇父听禀，建此行宫并非女儿奢侈堕落，孩儿知晓皇父近年多次离京北巡，皆因北边不靖，沙俄入侵我大清国土，叛逆扰我疆境不宁。巴林本是军事要塞，女儿在此兴建行宫，一来迎接皇父到来，二来与地方永结友好，显示我蒙古心向朝廷，众呼万岁。至于银两，皇父知道祖母固伦淑慧公主遗有四门台吉，公主之族，人口繁衍，十变成百，百变成千——这些银两都是众人湊集而来；再说砖瓦当地烧制，木料当地取材，工匠是我出嫁时带来……”

皇帝听了龙心大悦，道：“皇儿远在千里之外还替父皇想着社稷之大事，我黄金家族可谓永盛不衰矣。取笔来，我要为儿题写匾额，遂题下“金枝衍庆”四个大字。此匾后来一直保存在行宫。可惜“文革”毁掉，唯有照片留存。

公主一生笃信佛教，承祖母固伦淑慧公主之志，为传播佛教，在原龙王庙的基础上扩建殿宇，增塑神像，建成娘娘庙，后来又建了一座玉皇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公主出资又在行宫东南侧不远处修建另一座庙宇，就是现在的荟福寺。当时王府附近已经有一座圆会寺，为什么还要另建一座庙宇？民间流传着

几种传说。

一说来源于风鉴先生看风水。固伦荣宪公主下嫁以后不几年，巴林右翼旗王爷府接连不断地死了几个大人物。清康熙三十二年，也就是公主下嫁巴林的第三年，公主的公公旗扎萨克鄂其尔病故。清康熙四十三年，新任扎萨克公主的大伯那木德格去世。清康熙三十九年，公主的婆祖母固伦淑慧公主故去。公主的夫婿于清康熙四十三年袭爵，当年三十五岁，王府上下担心乌王爷会不会也是个薄命的扎萨克，便请风鉴先生破统。风鉴先生说王府居地风水虽好，只是王府东南有邪魔俯瞰，对王爷和公主有妨害，应该在那里建一座庙，每日锣鼓声音不断，号角声音相连，就可以防备克星。于是就在那里建了一座庙。另一种说法是由庙宇最初用的名称而来。这座庙宇初时曾一度称为“虎庙”。“虎庙”怎么来的？传说荣宪公主的夫婿乌尔滚平生两个嗜好，一是作战，二是狩猎，每日身不离鞍。有一次去白音汉山打猎，见一只斑斓老虎，按常理猎虎的时候，须先向山佛祭祷，禀明来意，并请求山神恩准方可捕获。这一次偶然遇见，老虎震怒摆尾嘶喉，腾空跃起扑向乌王爷。乌王爷闪开身子，露出后边四个猎手。猎手们扎枪一齐向虎刺去，虽然刺中老虎，猎手们也都吓昏过去。老虎带伤逃走，乌王爷纵马追去。等到猎手们苏醒过来，乌王爷和老虎都不知去向。这老虎逃掉尚可，要是乌王爷有个好歹，那还了得，他们寻了三天三夜不见踪影，只得回王府禀告。固伦荣宪公主闻听，如同轰雷震顶，哭得泪人一般，一面派人上山寻找，一面请喇嘛诵经祈祷。荣宪公主面佛祷告：“佛祖在上，保佑夫婿平安回府，我再造庙宇，重塑金身！”才祷告毕，忽听人们喊叫乌王爷回来了。公主一看，乌王爷举着马，马身上搭着一只猛虎。许愿还愿，公主出资在王爷府东边朝格图淖尔地方建成一座喇嘛庙。还将王爷所猎之虎去骨去肉，皮内实草，眼内嵌珠，立在庙堂

之上。因此人称虎庙，蒙古语曰巴尔斯苏模。后来雍正年间，庙宇扩建。清理藩院赐号荟福寺，并拨给喇嘛度牒费。在巴林，固伦淑慧公主的圆会寺和固伦荣宪公主的荟福寺兴建，使得王府一带喇嘛增多，经声不断，后来又在这里定期举办庙会，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各旗都来参加，使得“益和板兴”热闹非凡，真正成为四方蒙众信仰中心。

固伦荣宪公主的夫婿乌尔滚一生骁勇，惯于征战。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参加了有名的攻打噶尔丹的战役。公主成婚以后，仍多次送夫婿带兵参战。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乌尔滚率巴林部众到乌珠穆沁作战。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乌尔滚嗣封王爵后，统领昭乌达盟蒙古十一旗军多次出征。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乌王爷奉命率部往阿尔岱山一带驻防，遏止蒙古厄鲁特部的策旺阿拉布坦入侵。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任昭乌达盟长，同年以副将军的身份董督二十三旗军务，率兵征讨策旺阿拉布坦连续六年。固伦荣宪公主为大清社稷计，每次都亲自送夫作战。出征之时，公主的小叔桑利达亦随军前往，这样旗内的一应政务都落在荣宪公主身上。

荣宪公主处理旗内政务十分谨慎，宵旰劬劳，不敢稍逾。每事必亲自过问，发布指令必签章押印，至今公主水晶印章保存在内蒙古博物馆。公主处事公平，疾恶如仇，在巴林流传着公主巧审右梅林一段佳话。传说当年乌王爷西征以后，旗内一些梅林扎兰便狂妄自大起来。女人掌管旗政在蒙旗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即使是皇室公主他们也没看在眼里，一些人开始胡作非为。一日，公主到旗内查干坤兑一带视察下情，听说右翼梅林强奸了这地方一个平民的女儿。公主十分气愤。但为了弄清此事，令王府卫丁将右翼梅林缉捕归案。公主心想若是我审，他必不肯直说，于是便让那个地方的坤都达审理。右翼梅林自恃官高，根本不把

坤都达放在眼里，让坤都达把那个女子找来，当面调戏，并当众述说奸辱女子的事情，喝问谁人敢管。右翼梅林正在大耍威风喧闹之时，固伦荣宪公主从后面出来，喝令鞭一百，罚银千两及九九牲畜，向受害者赔礼道欠，先行革去官爵，然后上奏朝廷。公主此举，大快人心，自此以后，大小官吏不敢为非作歹，旗内大事小情悉听公主指挥。这样一来可使夫婿安心作战，保卫大清疆土。对此御赐碑文上赞道，“彤管扬八州，慎早嫔夫内则；丹纶焕异彩，荣光爱於宗亲”。旗众对她奉行唯谨，敬之若神明，称二公主娘娘。

公主对上孝顺，很得皇父康熙帝的钟爱。清康熙四十八年，固伦荣宪公主闻得皇父患病，便日夜不停地赶回京都，亲自照顾皇父饮食睡眠，亲自料理煎汤熬药，早晚问安，关心备至。在公主殁后，墓志铭上专门记载此事。“圣躬不豫，公主视膳问安，晨昏不辍，四十余晨未尝少懈迨”。皇帝病愈之后，对公主降旨褒奖说，“公主克诚克孝，竭力事亲，诸公主中尔实为最”，于是将荣宪公主由“和硕”晋升为“固伦”。

荣宪公主晚年，由于夫婿乌尔滚常年在外征战，又患痼疾，十分思念，时常萦绕于怀放心不下，还由于独生子琳布酗酒赌牌很不听话，公主虽然多方教导，只是屡教不改。这样一来思夫忧子，奄奄成疾，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病故，享年五十六岁。公主亡故以后，雍正帝派大臣到巴林料理丧事。因提前没作准备，只得将公主灵柩停放在圆会寺内，择巴颜陶白山阳坡修筑享殿，构筑地宫，过了一年另四个月，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八月十九日辛酉落葬。

公主尸骸保存极好，1972年出土时，虽埋葬240多年，尸身没有腐烂，宛如生人一般，发长二尺，垂于脑后，满头珠宝翠钻，腕套金镯指戴戒指，身穿十层衣服，足蹬大红缎满帮绣花靴子。

这些都是珍贵的出土文物。主要有：

珍珠团龙袍：黄绿色缎面，上面用珍珠绣制八个团龙，团龙排列有序，须爪毕露，栩栩如生。袍之围领和袖边上都用小粒珍珠缝制，嵌成“卐”形图案，整个龙袍共用大小如一的珍珠一万二千粒。这件团龙袍收藏在赤峰市博物馆，多次被选送到国内外展出。

八凤金冠与金簪：八凤金冠金顶圈上镌雕金凤凰8只，金龙5条。金簪有金花兰簪、金菊花簪、梅花金簪、麻姑金簪、盘肠玉饰金叶簪、红珊瑚五蝠金簪，这些金簪有的嵌宝石，有的嵌钻石，更有名贵者嵌猫眼石等。

朝珠手镯戒指耳环：大粒朝珠一串共108粒。黄金镯4只。金镶钻石戒指2只，上镶钻石6粒。金耳环4只。龙形嵌珠金坠10只。

这些珍贵文物为各级博物馆收藏，如今为无价之宝。

## 八 康熙帝巡视巴林

今天,在巴林右旗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件满绣黄龙的缎袍,当地人称之为龙袍,说是当年康熙皇帝私访巴林留下的。文物部门视为珍贵,便把它收藏起来。近年国家组织文物专家赴各地考察文物鉴定文物。专家们听说这个文物有来历,便仔细鉴定,结论是这件龙袍确属皇家帝王之物无疑。为什么康熙皇帝的龙袍遗在巴林草原呢?为什么落到寻常百姓之家呢?提供龙袍的巴林牧民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清康熙年间,在巴林草原西边乌兰布通地方,朝廷同蒙古准噶尔噶尔丹部打了一仗。清军打败了噶尔丹,巴林草原从此安定。参加乌兰布通战役的巴林兵丁陆续返回家乡,说康熙帝亲临战场,扬手祭起一道神光,劈开噶尔丹的驼阵,清军一涌而上,打败敌军。要是不的话,巴林兵丁都得死在阵地上。“佛喇嘛!”百姓们对康熙皇帝顶礼膜拜,有的人家还把康熙的绣像供在佛爷的位置上。

传说有这么一天,在巴林右旗北部赛罕山下的官道上走过来一队人马。走在前面的是两个骑黑马的壮年汉子,后面是七八个骆驼驮子。走在中间的是一个骑着黑毛驴的三十八九岁中年人。此人一付清瘦的黄白净子面孔,唇下留撮稀疏的山羊胡须,穿衣着靴和众人一般无二,都是一样颜色的褪旧袍褂。这种打扮

正是经常来草地做买做卖的经商老客。在这伙人中那骑黑毛驴的戴着黑色长绒小帽，一看就知道是掌柜。过了几道山峰，掌柜的催着毛驴，毛驴迈开莲花小走，顺着山麓西来。眼前是一片大塔拉，绿草茂盛，岚光遍地。在大塔拉的中间拄天拔地竖着一座玲珑塔，塔顶宝刹闪着金光。掌柜的勒住黑毛驴朝两旁骑黑马的通事问：“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里是辽代的庆州了，当年圣宗秋收，爱其秀美，建号庆州。圣宗曾在这里驻蹕，说万岁后当葬此。你们看，北面我手指的那座山峰名庆云山，那山上葬了辽帝和后妃。这个地方确实是风水胜地。”“扎！”众人躬揖，差点没跪到地上去。掌柜的捋了捋胡子，抬眼望了望天光。正是午时，灼热逼人，众人口干舌燥，牲畜也有些倦意。掌柜的说：“通事，我们该打间歇息吃点什么了。”“扎，万……掌柜的。”通事下马拱手道：“由此向前不远，就是喀拉沐沦河，河岸上有一个艾里，我们到那里去吧。”掌柜的点头应允，一行人起程下了山岗绕过宝塔，果然看见有几个蒙古包离离拉拉散落在河岸。掌柜的指了指远处的那几个蒙古包道：“我又累又乏就在眼前的这个蒙古包歇脚，你们仨一帮俩一伙散到那几个蒙古包去。”众人依命而行。

掌柜的与通事遂奔前面蒙古包，立刻有几条狗吠吠唁唁迎了上来。二人也不下坐骑一直来到蒙古包门前。包门响处，从里面钻出一个六旬以上的老额吉（老女人）。她很有礼貌地闪在一旁，将客人们请进屋内。掌柜的朝老额吉点了点头，掖起袍襟拎着马鞭子进了蒙古包。包里西北立着油黑的佛龕。佛龕内燃点着黄油灯供佛，佛龕上哈那（蒙古包木壁）挂着一个东西，用黄缎子蒙着。掌柜的不偏不歪一屁股坐在佛爷龕下面。老额吉见了掌柜的举动十分恼怒。按说跑草地经商的大掌柜应当熟谙蒙地风俗，可眼前这个人全不懂。不说你见了老年人不问好是大不敬，不说你听见狗叫不下坐骑不懂事理，不说你拎着马鞭子进屋



不知忌讳,最让人气愤的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坐到佛龕前,将佛爷挡到后面去!“喂,我尊敬的客人,请你坐到旁边去!”老额吉大不乐意地说。掌柜的听不懂,仄着耳朵问通事。通事说,草原的规矩,西为客位北为佛位,北边是不能坐的。“哈哈,这么说我坐在这里最合适了!”掌柜的哈哈大笑道。

这一下可惹恼了老额吉,她上前一步扯下蒙在佛龕上面的锦缎,厉声说:“你知道,这里是供奉什么人的吗?”二人举头一看,原来是一幅绣像。老额吉指着绣像说:“这是当今佛祖康熙皇帝。你们敢坐在皇帝的位子上?要是让我那倔老头看见,不打折你们的肋敲断你们的腿,拖出去喂狗才怪呢。”掌柜的听了笑得更厉害,转过身来仔细看了看像,道:“这个像又肥又胖,哪里是什么康熙皇帝,这分明是个鬼判官。”老额吉大怒,举起夹牛粪块的火钳要打下去。掌柜的乐呵呵地止住道:“老人,不要发火,当今的皇帝乃是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脸儿,一撮掩口胡须,我是亲眼见过他的。”老额吉吃惊道:“你见过皇帝,那么你住在京都?那么你是皇商?”掌柜的笑着点头。通事道:“老额吉,我们掌柜的又累又饿,快给我们弄点吃的吧,还要赶路呢。”“那好吧,不骑马的人不懂口齿,不走草地的人不懂规矩。那就请先喝碗马奶酒。”说着老额吉又敬酒又端奶食,最后盛上来的是喷香可口的阿模斯粥,味美异常的陶呼力汤。二人吃得酒足饭饱,又美美的睡了一觉。临起身时,掌柜的对通事说:“谢谢老人照顾,我们给老人留下饭钱。”老额吉道:“有花的草原美,有客的人家美,怎么能够要过往客人的饭钱呢!”掌柜的皱着眉头想了一下说:“自古吃人家的饭,赏人家的面,既然不要钱,那就留个念想吧。通事,就把我包袱里那件黄袍子赏给她吧。”通事立时取过一个明黄闪亮的缎袍。老额吉接到手中,甬说穿过,见都没见过,觉得受之有愧,要还给客人,却见掌柜的骑上黑毛驴走了。通事说:“三天后,巴林

王府若要取这件衣服,你要让他以一沟牛一坡羊换,否则不要给他。”果然,三天后王府的管旗章京来到这里,说:“前儿康熙爷私访路过这里,将一黄龙袍给一家抵了饭钱,王府给一沟牛一坡羊来换。”老额吉对家人说:“康熙爷来到咱们家,祥光就照在咱们蒙古包的顶上;皇上的佛妆留在咱家,就保佑咱永世安康,快把它藏起来吧。”于是这件龙袍就保留到今天。

上面说的只不过是流传在巴林草原的一个传说。但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确实多次巡视塞外来过巴林。其时,沙皇俄国野心勃勃,阴谋入侵我国。先是以武力占领东北地区龙江流域,接着占领了我国战略要地雅克萨城,入侵到我国喀尔喀蒙古包楞格河流域,不断煽动喀尔喀蒙古贵族脱离祖国,以后又借清朝南方三藩之乱的机会,以提供武器重金收买等卑劣手段策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为了打击侵略,平定叛乱,康熙皇帝有时带兵出征,有时巡察要塞之地。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康熙帝巡视东北,亲自部署反击沙俄入侵,筑墨尔根城(齐齐哈尔)。清康熙二十四年,派兵攻打盘踞在我国东北重镇雅克萨城的沙俄军队,逼使侵略军乞降。在胜利的基础上,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方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俄军退出中国领土。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亲征,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以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连续率兵亲征噶尔丹。康熙帝多次出巡塞外,巴林又是战略要地,自然要到巴林巡视。除了带兵打仗巡视巴林,还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姑其女下嫁巴林,因此每次到塞外来,都要到巴林驻蹕。

康熙帝一共来到过巴林几次,其说不一。但据可靠的史料记载有这么几次。《清史稿》载,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庚子,康熙帝玄烨驻巴林和硕公主第”。文中的巴林和硕公主是康熙帝的

次女固伦荣宪公主，于清康熙三十年从京都下嫁到巴林右翼旗，事隔十年皇帝来巴林看女儿，当在情理之中。并且那一年是康熙胞姑固伦淑慧公主死后第二年，皇帝对其姑感情很深，在京病歿之时，曾三读祭文送葬巴林，此年皇帝来巴林亲自祭奠姑母，也是可以想象的。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皇帝敕造玉皇庙于巴林右翼旗王府附近，还为此庙题匾“吉祥云”三个字。据传说巴林右翼王府为了不违圣命，虽隆冬时节以酒和泥赶造玉皇庙。当年康熙帝是否来过，史料无载，但庙宇和匾额俱保存下来了。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巡视东北，稳渡公主桥来到巴林，据《巴林蒙古王公世系表》（内蒙图书馆藏）一书记载：狗年（丙戌年）康熙帝幸巴林巡狩驻公主第。此次到巴林御谒西召（圆会寺）恩赐随身所佩弓箭。箭上镶嵌金饰。谕曰：公主姑姑建庙之地，山灵地杰，祝愿此庙佛祖万古长青。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巡视塞外诸蒙古地。据《清华录》一书记载“八月，辛巳，康熙驻蹕和硕荣宪公主第”，“九月，癸酉，康熙驻蹕和硕荣宪公主第”。

皇帝多次巡狩巴林，至今留下许多美好的传说，许多地名与皇帝有关。巴林右翼旗王府北部有座非常秀美的山峰，起初的名字称托钵山，康熙皇帝到此山巡狩，大为赞美，人们便将此山更名为“巴彦陶拜山”。巴林右翼旗王府南面的那一座山，旧称巴尔当哈拉山。如今称为白音汉山，据说这座山是康熙皇帝改的名呢。为此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有意思的神话传说。据说巴林王府东西大庙喇嘛法会诵经时都把名山的神佛请来享受香火。山佛之中的巴尔当哈拉山佛没受过皇封，众山佛都看不起他。正当此时，忽闻康熙巡幸巴林，年轻的巴尔当哈拉山佛一夜之中三次给巴林王乌尔滚托梦，要求王爷帮忙请求康熙皇帝赐封。乌尔滚当即答应，可是由于事多忙乱给忘了。这日皇帝巡狩已毕就要启驾

离开巴林了。皇上龙辇前呼后拥，王爷台吉排队相送，循着驿路来到塞力莫，这地方是巴尔当哈拉山的一道大洼，过了洼就出了巴林地界。虽知刚要过去，突然刮起风暴，呜呜山响，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皇帝不能行进，只好驻扎，这风一连刮了三日不止。乌王爷突然想起此山佛请赐名一事，当即说于皇帝。皇帝哈哈大笑：“这好办，待风住日出，我倒看看取一什么名字好。”说也怪，那风渐止，艳阳当空。皇帝朝山上一望，只见山似屏风，高有百丈，嶙峋山石，巍峨雄壮，翁崩古松，郁郁闭闭，山脚平地，绿草茵茵，牛羊满坡塞谷，十分富饶美丽。皇帝随口赞道：“真是一座富绕的神山啊！”富绕的神山蒙古语称白音汉，由此巴尔当哈拉山改名为白音汉山。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为了实现“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之目的，除了不断巡视，还令各地建造行宫，以为驻蹕之所。巴林既为军事要冲，皇帝又多次来这里巡狩，岂有不建行宫之理？于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兴建了巴林行宫，也称大板行宫。当年秋天，康熙帝巡视北方，曾驻蹕巴林行宫。此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虽经二百余年苍桑岁月，风雨剥蚀，这组建筑一直保存完好，当年皇帝一应用物摆放如初。据文物干部成顺撰文回忆，这组建筑为封闭形的四合院落，通两进。前一进正厅为“议政厅”，五楹，三明两暗，东西掖室各两间。厅堂靠北迎门立有硬木制做蓝色彩雕屏风一座，雕制五条金龙戏珠，五条龙的龙头悬空飞舞。屏风后面为六扇漆门。出了漆门为接檐卷棚抱厦。抱厦红漆抱柱，周围以蓝色隔扇门。东北西北厦檐角上悬挂两颗金光闪闪的斗大鍍金垂珠。后进院后厅亦五间。连接前后大厅陪厢是一封闭式回廊。庭院宽阔，一条甬路直通大厅，甬路两旁各栽柳叶梅一丛。后厅台阶上门两侧各置一鍍金铜质仙鹤。

后厅为康熙帝起居之所。五楹厅堂三明两暗。两暗间在东侧，以檀板五块为壁。五块板壁中间那一块上方绘制“龙凤呈祥”图案，下方绘制“松鹤延年”图案。其它四块分别绘有松竹梅兰。北壁前是通往二暗室的走廊，廊壁悬挂康熙绣像。二室仍施木板为间壁，绘各种图案。两个暗室都是满铺土炕，上铺竹织细席。东面一间为皇帝寝室，西边一间供皇帝阅卷读书。龙座西向，炕榻上有雕龙硬木靠背，绣龙黄缎坐垫，紫檀炕桌，上面陈放文房四宝，瓷制笔筒，白银蜡台，紫铜香炉，两个暗室的门上都悬黄缎绣金幔帐。大厅三明间，靠北墙放置高大紫檀色银花铜饰立柜两个，柜上放置紫檀木箱，柜前放长条春凳。靠西山墙横放紫檀卷书形长案。案上居中放一八角形坐钟。钟之两侧为黄釉瓷制竹节形帽筒，筒中插鸡毛尘掸和马尾拂尘。再西侧置同治彩掸瓶和茶罐。长案两旁，南有铜器五供，北置青铜鼎彝。山墙壁上高悬“福寿康宁”四个金字，间有“麻姑献寿”“鹤鹿同春”“刘海戏蟾”“百福开臻”四幅壁画。在明间厅中央抱柱之间置御座，前设御案，案下放雕花木制脚踏，案左右置绣墩。整个厅堂地面铺方砖，上面方格顶棚。明间棚上悬挂四个六角形彩绘宫灯。

如今，康熙行宫已经作为历史文物，被列入赤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人们观瞻之所。

## 九 浮空两道架彩虹

在翁牛特草原与巴林草原的接界处,有一条流淌了多少年多少载的河流,她的名字叫西拉沐沦河。此河为西辽河上游的重要支脉,发源于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克什克腾旗的白岔沟,史籍记载源出于平地松林即在此地。此河由西向东,汇集众多支流,到巴林境内,水势颇大,浩浩荡荡。河床很宽,最宽处有数里,窄处也有半里之遥。此河在唐宋时期曰潢水。《唐书·地理志》载“营口北四百里至潢水”。标出西拉沐沦河至营口的确切方位,最早使用了潢水这个名称。契丹强盛以后在巴林腹地建辽国,都城曰上京临潢府,“临潢”即都城近潢水而得名。

此河在地理上十分重要,但是要在河流上架桥梁却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条河流从地质来讲,多少万年前地壳变迁,于西拉沐沦河南北形成地层断裂带,因此河道处于低洼之地。西拉沐沦河的两岸处在科尔沁大沙漠的尾端,因此河水冲远流沙,黄糊糊的流淌。大概潢水这个名称即因此而来。由于水运黄沙,河床河底不断变迁,今天这里可以行车,明日这里便是沙井,人马车辆掉进沙井就不要想出来。当地人们说这条河是馋河,哪年都要吞嗜人口。唐宋辽时期,在这条绵延千里的河流上只架了一道桥梁,当时称潢水石桥。《辽史·地理志》载,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宋使薛映从辽中京到上京国都,记载“渡潢水石桥旁饶州,唐

于契丹尝置饶乐，今渤海人居之”。此桥在《武经总要》、《富弼行程全录》等书中亦有记载。辽以后元明各代，战争频仍，巴林草原的居民几度迁移，桥梁经久失修，被洪水冲毁荡然无存。

清廷入关以后，从京都通向北疆设立多条驿路，其中古北口一条设 10 个驿站，驿站锡喇木伦、噶察克中间要通过西拉沐沦河。但当时河上无桥，来往行人只得冬季跑冰，夏日涉水。这样不但有碍交通而且溺水者颇多。人们渴望在此河上架设一道桥梁。正如后来重建桥梁时的碑文所说，此河“东西接域，南北连壤，为驿站要路，蒙满汉之通衢，而安可不设桥梁也哉”。况且这条河流，深不能通舟，浅不能行车，只有架设桥梁，“雪拥马蹄脂辖不伤，失河水霜伪人迹，历揭免叹无苦匏”。因为这个原因，清顺治十七年（1660 年）嫁于巴林右翼旗扎萨克的皇室固伦淑慧公主出资建桥。此桥为双孔石拱，建在两岸有岩石，河中间有石岛的地方，桥身连结两岸岩石和石岛实际上是两桥相连状。从河南岸到河中间石岛有一桥，跨度约一丈五尺；从石岛至北岸又一桥，跨度约一丈八尺。桥面石条砌筑，两侧筑有石栏，石栏柱上雕有蹲狮。南桥桥基较高，洪水时亦能露出水面，北侧桥基一经大水便没于水中。平时水于桥下分为二流，洪水暴涨时合二而一。洪水期和解冻期，于北岸建一临时木桥，夏秋即拆去。那个时期，人们将此桥恭称公主桥，为纪念固伦淑慧公主，“因河水澎湃，为病民行，乃相其地，建斯桥于河上”。

关于公主建桥之事，草原上流传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

清顺治十七年八月的一天，两驿马急急霍霍地直奔巴林右翼旗王府，进了王府大院，正赶上王爷色布腾信着马蹄袖子走过来。驿者双手捧上一个信札。色布腾一看送信人是驿站章京，没有急件章京是不会亲自出马的。再一看那信，黄缎封皮，扣着理藩院的封戳，信的上角打着十万火急的红色印记。色王爷启封阅

信,只看几眼便脸变手抖,扭头进了王府内宅,将信札递到固伦淑慧公主手中,说:“禀知公主,皇太后有疾,请看急递文书。”公主听了这个消息,犹如炸雷轰顶,只阅几行便泪流满面,坐立不安,连连说道:“夫君,这可怎么好!亲娘病重,我们应当速速地进京!”固伦淑慧公主与母亲孝庄文皇后感情深笃,超过一般的母女亲情,这不但是女以母贵,没有母后,就没有今天的固伦淑慧公主。另外还有一层,母女二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原来在皇太极歿后,朝廷出现最高权力之争。母女二人密切配合,为了稳朝廷抚边疆,公主毅然下降蒙古,从繁都闹市来到千里荒漠,实现满蒙和亲永垂友好之大举。固伦淑慧公主自来到巴林,一十二载没回京都,每日思念母后,惦念朝廷之事。今日忽闻母后病重,她的那份油煎火燎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色王爷从来敬重公主,虽然她是他的妻子,但她是皇室金枝玉叶,因而每事必禀唯命是从,今见公主伤心悲痛的样子,也不由得鼻中酸楚,含泪道:“禀知公主,母后病重,理应速速进京,无奈连日天降大雨,失烁沐沦河水暴涨,旧有石桥已被冲毁,怎么能过得去呢?”公主怒道:“夫君,莫要哄我,既然桥毁,驿信是怎么传过来的?”“禀公主,因此信急迫,由驿站之人将信缚于雕翎之上,飞矢传过来的。”“那即刻修桥!”“扎!”色王爷不敢违命,立传牌旦尼达,找来东西协理管旗章京四大梅林商议此事,然后集中各色匠人火速赶到失烁沐沦河架桥,可是放进多少石块木料,全都顺流漂走。公主又忧又急又气,逆血攻心,一下晕倒。王府内外一时慌了手脚,捶拍叫唤,请医送药,乱成一团。正乱着,忽从外面走进一个衣服褴褛满脸污秽的巴达尔沁,高喊:“公主勿忧,我是来接你过河的。”色王爷连忙盛宴款待。巴达尔沁吃完喝完,用衣袖抹了下嘴巴说:“你们要想速速过河,请于明日午时去失烁沐沦河烧香祭拜,祭过三天三夜,自然能够过得河去。不过,王爷得带上乌龙驹。”说完甩



着烂袍衫走了。

众人将信将疑，无奈回京急切，只得依着办了。次日午时，公主和色王爷来到河岸，摆下香案焚香祷告：“上苍冥冥，下土殷殷。尝闻周官有一定之制，夏令有不易之章，除道成梁自古皆然，吾本大清皇帝固伦公主，今河水澎湃，为病民行，祈祷神灵，保佑水消桥通。”此时天降大雨，阴风飏飏，公主跪在那里仍旧祷告不止。三日过去，雨过天晴，巴达尔沁乐陶陶地转来。只见他撤了香案，从色王爷手中牵过乌龙驹，领着公主王爷和王府众人及旗民百姓来到一个急流湍湍的地方，飞身上马，大声唱道“沙迷渡口，水围暗礁，夹岸双峰，浮空两道”，唱完一夹马肚，鞭马提缰。那乌龙驹腾空跃起，扑通落在河心，稳稳当当地站在水中，原来那是一个石岛。众人看了，无不吃惊，又见巴达尔沁再次催马提缰。那马朝对岸跃去，四蹄正好搭在对岸的岩石上。色王爷一下子明白：“禀公主，我们过河有望了。刚才巴达尔沁不是说嘛，沙迷渡口，水围暗礁，不就是说此处可以建桥；夹岸双峰，浮空两道，不就是说依河中石岛为基，桥建双孔？”公主说了句“佛爷保佑”，再看河对岸的巴达尔沁，扔了乌龙驹，蹒跚着朝南去了，隐隐地传来他刚才唱的那歌。数日后，双孔石桥建成，公主渡过此桥回京探视母病，从此失烁沐沦河上留下这一桥梁，人称“公主桥”。

以上虽是传说，但此桥的兴建确与固伦淑慧公主有关。二百年后，重修此桥时曾立有碑文。碑上说：“露白葭苍，渡河者不待营心于野渡；风清霜陨，过水者堪托凭桥乃风立。行人孰不感大公主仁慈，心诵吾皇上之大德也哉。”

据《东蒙古志·道路篇》记载，由于西拉沐沦河流沙为岸，所以很难建桥，整条河上仅有两座桥梁。河之上游有普渡桥，中游便只有这一座公主桥。因此这座桥梁成了民众之通衢，军事之要

塞。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皇帝亲督大军,扼守此桥,指挥了有名的打败噶尔丹的乌兰布通战役。当年康熙帝听到噶尔丹要进犯的消息,下诏亲征噶尔丹。在整个战斗部署中,命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领左翼军,出古北口,与敌正面作战。命安北大将军恭亲王常宁领右翼军,出喜峰口,在锡林郭勒草原与噶尔丹军队相遇。此次战斗清军失利。噶尔丹乘胜率部长驱直入,南下到了克什克腾草原乌兰布通地方。此地离京都仅700里之遥,情况比较严重。康熙皇帝从京师来到波罗和屯督阵,为防止噶尔丹向东南过西拉沐沦河进犯,派将领索额图、阿喇尼、阿密达等率蒙古兵扼守公主桥,因为这座桥梁是西拉沐沦河中下游渡河的唯一交通要道。据说康熙帝亲自到公主桥视察过。250多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日宣战,1945年8月,苏军越兴安岭南下进攻日军,机械化部队就从此桥通过。当时水涨,苏军铺设钢轨过桥。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党九十三军欲北进巴林,也企图从此桥通过,解放区军民扼守此桥,给反动派以严厉打击。可见这座桥梁历来是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乌兰布通战役是以清军胜利而告终的,因此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帝到巴林巡狩,来到这座桥时,下了车辇,向当地百姓采风问俗,命热河府随行官员将此桥载入《承德志》,并諭示当地官民“恐难永久,累岁修葺”,还高兴地召见了修桥的石匠。匠人们感恩,将皇帝下马上马脚踩之石刻痕镌字砌在桥梁上,遂有康熙皇帝的上马石下马石云云。

清咸丰六年(1856年)此桥经过一次大修。当时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多罗郡王那木色委派旗员番丹达(旗王府总管)、扎兰杨江,会同七棵树的合成公、万泰隆等商号,及本旗旗民捐募资财修桥。桥成之后,勒石为碑以记。将碑置于桥中石岛的碑膛内,中华民国二十九年洪水暴发,将碑冲倒,落于河中。谨将碑之全

文录之于次。

尝闻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周官有一定之制，夏令有不易之章，是以除道成梁，自古皆然。况吾沙尔沐沦河，东西接域，南北连壤，为驿站要路，蒙满汉之通衢，而安可不设桥梁也哉！虽然古之人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皆有定制。而桥之物亦安用哉？盖乘马服牛负载更难，负载任重致远，泽行尤慎于山行，惟建斯桥，雪拥马蹄脂辖不伤，失河水霜伪人迹，历揭免叹无苦匏。是以顺治十七年巴林扎萨克多罗郡王祖母固伦淑慧公主，因河水澎湃，为病民行，乃相其地，宜建斯桥于河上。于康熙四十五年驾幸东北，稳渡此桥，采风问俗，命将此桥载《承德志》焉。迄今二百年，露白葭苍，渡河者不待苦心于野渡；风清霜陨，过水者堪托凭桥乃风立。行人孰不感大公主仁慈，心诵吾皇上之大德也哉！然而无往不复者，水能长流；无坚必破者，桥岂朽椎？是巴林扎萨克多罗郡王公主之遗恩，荷吾皇上之巡狩，累劝岁修，恐难永久。乃委巴林旗员番丹达、札兰杨江，会七棵树、长汉他拉铺、永泰当、合成公、万泰隆，四方劝摊资财，重修斯桥，以期长久，而永垂不朽矣！於是四方善士，同声相应，踊跃乐从。乃因其旧制，鸠材庞工，不日成之。而巴林桥焕然一新，孰几乎常存万古哉！今将众善芳名刻列于左，并撰俚词以志之。

沙迷渡口水围山，  
桥上行人去复还。  
万善同修垂不朽，  
千家共济俾无难。  
浮空两道天光映，  
夹岸双峰地势还。  
到此诸君回首望，  
巴林远在翠云间。

御前行走兼管御园事物昭乌达盟长兼兵备扎萨克加级记录  
三次巴林扎萨克多罗郡王那木色。辛亥生员王徽德撰。太原府  
寿阳县任佩衡书。经理人番丹达。大清咸丰六年岁次丙辰秋月。

## 十 几度搬迁话王府

《皇朝藩部要略》记载：天聪八年（1634年）冬十月乙巳，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蒙古牧地疆界。“巴林部与镶黄旗蒙古，以克哩叶哈达瑚济尔阿达克为界；翁牛特部与巴林，以瑚喇琥护呼布里都为界。……既定界，越者坐侵犯罪，往来驻牧，务会齐运动，毋少参差。其分定地方户口，巴林部长八百，台吉满珠习礼八百”。当时钦定巴林部在西拉沐沦河北岸，将巴林部析为左翼右翼，两翼的首领谓扎萨克。扎萨克居于何地？《大清会典》书“二扎萨克同居济尔哈朗图河之北”。济尔哈朗图河即今沙巴尔台河。后金天命年间巴林部首领在这里定居。这条河流中间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因为方圆几十里只有这么一块巨石，人们称为神石，向它祈求幸福，因而称此石为济尔哈郎图哈达（幸福岩），大约河以石得名，史籍便将这条河称之为济尔哈朗图河。河道不宽水也不深，但是淤泥特别厉害。据当地传说，百年以前一猎人活捉一只狼交给王府。王府把狼圈在铁栏内喂养，一日不慎跑出来，明干白音家的群狗把狼撵到河中，狼竟陷进去跑不出来死掉。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河流后来又改名为沙巴尔台河，意即淤泥河。沙巴尔台河两岸是一片硕大而肥腴的草原。河东岸是丰美的草场，生长着没膝深的各种牲畜喜食的草类；河西岸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地，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河岸旁的二阴滩则长

着丈余高的芨芨草和密密丛丛的灌柳。辽代时曾有契丹人在这  
里居住,因为遗留着契丹人的居址、坟墓和田厰。

清顺治五年(1648年)建旗制分佐领,钦定巴林右翼旗扎萨  
克驻托钵山,巴林左翼旗扎萨克驻阿察图陀罗海。托钵山即今之  
巴彦套白山,位于查干沐沦河北岸。古托钵山怎么变成今日的巴  
彦套白山呢?据传,康熙皇帝来巴林巡狩,曾在此山打猎,见山峰  
秀美大加赞赏,于是人们就将这山称作巴彦套白山,即皇帝看中  
之意。

巴林右翼旗王府什么时候从沙巴尔台搬迁到巴彦套白山下  
的呢?那是固伦淑慧公主下嫁巴林以后的事情。公主初嫁成婚  
是在沙巴尔台王府。据传当时为迎接公主的到来专门踏测了一  
条通往沙巴尔台的道路。巴林色布腾王爷沿途三迎公主。首迎  
在西拉沐沦河迤南 200 里后来被称作乌嘎塔拉嘎花的地方,即  
今之翁牛特旗梧桐花镇所在地。梧桐花是乌嘎塔拉嘎花的汉语  
变音。二迎是门德和硕,于西拉沐沦河北岸,后来人们堆敖包以  
祭,称之门德敖包。三迎在察则尔图,如今是巴彦尔灯苏木察则  
尔图艾里。最后迎至沙巴尔台王府。如今在王府北不远处有芨  
芨草滩的地方,人们叫它“上王古里”,意为公主的初居之地,谓  
公主住不惯毡包曾在那里筑屋居住过。沙巴尔台王府搬迁到巴  
彦套白山南麓查干沐沦河北岸,是公主来到巴林以后的事。巴彦  
套白山王府习称大板老王府。据考兴建大板老王府应是顺治五  
年到康熙六年间的事,即公元 1648 年到 1667 年的十几年间,因  
为康熙六年(1667年)圆会寺建成庆典,标明在王府的西侧,可  
见当时王府已经建成,而且旗扎萨克已从沙巴尔台迁来。传说公  
主来巴林以后,即按照巴林右翼旗扎萨克驻托钵山的规定,选址  
建府。传说公主从内地请来风鉴先生将王府地址选在北望巴彦  
套白山为五龙相争之雄姿,兆尔后必然英雄倍出;南望查干沐沦

河绕过十三道石门,兆具备永攻不破的防线。遂在河之北岸高埠之地兴建。王府建筑规模和格调,因年代久远,历经搬迁已不可考,唯残砖遗瓦甚多,其中不乏琉璃瓦残片,看来当时建筑规模甚是可观。

旗王府从沙巴尔台搬迁后,固伦淑慧公主带来的若干陪房户口和王府奴仆一并迁来,新址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聚落。王府建在查干沐沦北岸的高台上,台吉户、陪房户和王爷台吉们的仆从奴隶,则住在王府东侧不远处的低洼平地 and 靠近河边的二阴滩里,因而形成三个自然屯落,即王府居地为上板兴,中间低地为中板兴,靠近河滩的为下板兴。因为王府建筑巍然壮观,台吉和陪房户的房屋林立,在当时只有蒙古包帐篷的草原上可谓一奇特景观,远近蒙古人将这里统称益和板兴,汉语为“大房子”之意,以后演变成为大板。清康熙年间,修建了经堂庙、玉皇庙和圆会寺,固伦荣宪公主下嫁巴林右翼旗所带陪房户口也在王府附近定居。后来又建荟福寺,喇嘛人口增加。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朝廷一次为圆会寺荟福寺拨 80 名喇嘛度牒费,实际喇嘛不止这个数。粗算起来,那个时候的益和板兴住户不下五百,人口逾千,成为当时蒙古草原上的远近闻名的重镇。可是不过百年,这么热热闹闹的地方却突然沉寂下来,王爷府又重新回到两扎萨克共居地沙巴尔台。

王府为什么搬迁回老地方,什么年代搬迁? 史籍无载,失去考据。但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乾隆四十一年,巴林右翼旗第八世扎萨克巴图郡王出任定边左副将军,翌年署镇边将军出镇乌里雅苏台,旋被清朝大臣和珅陷害革职赴京,临行之时,从沙巴尔台起程,在旗北名山打猎,由洪格尔大坝出旗。以此推断,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巴林右翼旗王府已搬迁至沙巴尔台。

据世代传说,巴林右翼旗王府于清乾隆初年搬迁,其原因大

体上是躲避灾难。这里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传闻。说是清雍正八年秋天,巴林右翼旗王府刚在巴彦套白山阳坡阿如宝楞安葬了固伦荣宪公主,准备秋祭的时候,突然接到在京都的大公爷桑利达的信件。信上说旗王爷琳布在京都因人命案披罪,按大清律性命不保,可能身首两处,又写着某月某日运尸回王府的事,让巴林王府准备迎灵。这一噩耗不啻晴天霹雳,房梁摧倒,王府上下人人恐慌个个惊骇。王爷眷属以至一二三四等台吉哭天喊地泪水横流,从白天哭到黑夜,又从黑夜哭到白天,竟没一个劝的。因为王府上下没有作主之人。谚语说“没有哈那盖不起房,提不上水水桶没梁”。说起琳布王爷,他本是乌尔滚王爷和固伦荣宪公主的独生子,自幼骄惯,赌博酗酒,不谋正道。乌王爷死后更是厉害,公主思夫忧子,盎然长逝。琳布虽然袭爵当了王爷,一应旗政全由大公爷桑利达管着。此次王爷和公爷一同进京,家中自然没有主事之人。临了还是扎赫拉其抹了把眼泪找到牌旦尼达,一同去见福晋:“福晋太太,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桑大爷来信说已经出京,我们也得提前作准备了。”福晋干哭,原来不主事,如今更是一片主意都没有,只是干点头。说是准备,无非是装殓之物。三日之后,准备停当,又过二日便拉着棺材到公主桥旁的门德敖包等候,准备盛殓琳布王爷的没脑袋尸体。恰巧从京都回来的人也到,两边的人聚到公主桥时,都大吃一惊。王府这边接灵的人看见那边马身上跳下一个黑头汉子,那不是琳布王爷是谁呢?原来琳布王爷没死活着回来了。琳布王爷看见紫釉大棺,立刻明白,滚落马下痛哭不止。大公爷桑利达过来,抹了把老泪,说:“皇上恩赦,这不活着回来了。”众人一看琳布的打扮也明白了。进京朝觐时穿的通绣九蟒郡王朝服不见了,换上素布不镶领袖的蒙古袍。外面罩的五爪行龙补服不见了,换上了一件素色捻襟马褂。头上没有了顶戴,脚下没有方脸朝靴。这分明是削了爵位。



琳布王爷不但郡王爵没了，连旗扎萨克的官衔也给撸了，不过到底保住了性命，大家还是很欢喜。众人连忙将王爷迎回王府。

过了几日，欢喜劲一过，人们又伤心起来，回想过去巴林王族自从先祖色布腾立功建勋受赏以来，接连迎娶公主到旗，可谓与朝廷姻亲不断，成了皇亲国戚，十分荣耀了得。谁知此次竟败在琳王爷手里。又联想起接二连三乌王爷病歿军中，没几年公主命归黄泉，刚刚葬了公主，琳王爷又被削爵。莫非有什么不适宜？须请个风鉴破绽破绽才好。王府上下这一呼声传到桑利达的耳朵，桑利达公爷立请风鉴。风鉴说，王府东边的下板兴是个苇滩，苇滩临河，河对岸的那座山是孤山，这山罩着王府，有俯瞰之嫌，如不破绽，王府势必日下。“那就赶快破绽！”公爷桑利达说。琳王爷年轻膝下无子，王府上下当然只听大公爷桑利达一句话了。于是立刻请喇嘛，设祭坛，垒麻尼堆，插麻尼幡。这样一来，把下板兴的滩地全围起来了。喇嘛诵经须九九八十一天。才诵了十多天，王府这边受不住劲了。原来王府居址虽然地势高耸，可就是地下没水，打不出井来。王府用水都到下板兴去拉。这回喇嘛诵经，把水井围在麻尼堆内不能动用。大公爷桑利达叫过牌旦尼达问：“陪房七十二行里头有没有看水脉打井的？”“有，郑五就是领着打井的。”“打井！”桑利达一下令，郑五领着人在王府前面的土台子上打起井来。不几天就打下十多丈深。恰巧这个时候郑五病了。夜里待星星出全时，郑五悄悄告诉老婆：“今夜你下到井底照我在井底划的圆圈，一铲就能刨出水来，牌旦尼达说过，谁掘出水给两个金元宝。我有病，你替我下去挖，我在上面守着。”老婆刚下到井底，郑五忽见大公爷桑利达带着人查看井来了，他害怕大公爷知道他的隐秘，连忙躲藏起来。大公爷来到井口朝下一望，正赶上郑五的老婆挖出了水。这水倒映星光，把桑利达吓了一跳，闪在一旁喊：“坏了，打漏地气了！”

郑五的老婆不知上面的情况，见水上得涌，便朝井上喊：“嗨，我说，拿个箩来用用。”她要用箩筐堵住泉眼。桑利达突然听见里边有女人说话，吓得毛骨悚然，拔腿就跑，边跑边喊：“了不得了！地底下有人说话了，地气打漏了，此地不能住了。”地气漏，风水破，就这样王府搬家了。搬到那里去，当然还是回到沙巴尔台。一是那地方地势平坦水草丰美。二是那地方曾是首代王爷被封爵当扎萨克的地方，也是迎祖奶奶固伦淑慧公主之地。三是那地方风水好，发旺，要不怎么巴林王爷屡建战功呢。

传说归传说，但是巴林右翼旗王府确实复迁回沙巴尔台，在那里一直居住到清末，近200年。据文物保护部门实地考察，清朝末年沙巴尔台王府建在紧靠沙巴尔台河北岸的高台子上，殿宇高大，上覆券圆筒瓦，前出廊后出厦，墙壁磨砖对缝，门窗细棂雕刻。王府坐北朝南，院落方形，南北长160米，东西宽88米。院墙两米多高，以大块青砖砌就。南面和东面各有一个大门。东大门隔一胡同便是衙门院。衙门的院落比王府稍小一些，有南门和西门。衙门的西门和王府的东门相对。两门当中的胡同有一眼水井。衙门院的东侧是喇嘛的住处，于王府西约七八里处建有“格斯尔庙”（一说关帝庙），在王府东约八里处建有一座菩萨庙。王府衙门在毁于兵燹以前，据当地人回忆，王府分前后两进院落。前一进院有正殿五楹，东西陪殿各三间，进门之处有门房。后进院为王公台吉们的住宅，有二排六栋房屋，前一排三栋，每栋七间，住着王爷协理的眷属。后一排每栋五间，住着台吉们的眷属。衙门院是一进院落，迎门是正厅，为管旗章京办公之所。左右厢房是办事房，大厅后面是杂物房和监狱房。据记载，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这座建筑毁于兵燹，王府又迁之大板（益和板兴）。

王府此次搬迁的原因须从清光绪末年巴林右翼旗西部放垦

说起。清末，八国联军大举进犯，衰落腐败的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清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解决因每年大量赔给帝国主义银两而造成的国库空虚，遂把“开放蒙荒”“移民实边”搜刮押荒银作为在蒙古地区实行新政的主要内容。清政府在调查蒙情中，认为开垦巴林西部广大草原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于是授意和胁迫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报效放垦。清光绪三十四年建林西县，这样一来，垦地原右旗牧户 600 余全被赶到旗中部。他们对夺地放垦非常不满，障勒之事不断发生。这些牧户一部分在沙巴尔台落户，因而内外草场纠纷不断。垦荒期间，旗方与垦务当局不断发生争端。垦务刚开始时，垦务局设立在乌力雅苏台川的苏布敦庙，热河都统也派来一些军队驻扎。这些军队纪律很坏，歧视当地牧民，破坏宗教活动，甚而抢掠烧杀无事不干。这些军人穿的是黑色军装，当地牧民称他们为哈日其日格，即黑军。在苏布敦庙，这些军人经常到庙内抢劫绫罗绸缎金银财宝，使喇嘛们无法进行正常的法事活动。喇嘛将珍贵的经卷和贵重物品全部搬到沙巴尔台王府隐藏起来后逃散。此庙佛灯熄灭，钟声断绝。此后一些准备搬迁的牧户也被抢劫。旗方多次到林西交涉，但是军阀横行，不得结果。

时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成果，军阀之间出现连年混战的局面。这时漠北蒙古哲布尊丹巴在帝俄的唆使利用下，乘国内战乱之机宣布成立大蒙古国，自封为日光皇帝，组建蒙古圣军，因为是黄装，民间称之为黄军。日光皇帝向内蒙发出檄文，要全部内蒙古盟旗都归顺大蒙古帝国，胁迫内蒙古青壮年到漠北参加圣军。内蒙各旗如呼伦贝尔额鲁特总管、陈巴尔虎总管、索伦旗总管等，组织叛军宣布“独立”，投靠帝俄，出卖了领土主权和资源。继而哲里木盟科尔沁右旗乌

泰发动叛乱，日光皇帝封其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总司令”。乌泰发布“独立宣言”，反对共和，接收帝俄援助，阴谋脱离中国。巴林也有些人北去参加叛军，但是人不多。因为巴林右翼旗扎萨克虽然居住北京，但控制着巴林局势。他认为哲布尊丹巴是喇嘛首领，在他看来，“喇嘛当权坏国事，女人当权坏家事”。当时只有受刑事案件牵连的暴乐等人参加了黄军，但是他们刚到外蒙古边界的尤格吉尔庙，就被当作奸细抓了起来。此后巴林蒙古人很少北去投靠叛军。

1912年冬季，哲布尊丹巴叛乱集团煽动内蒙古失败后，遂以武力侵占内蒙古各盟旗。1913年3月，北洋政府为阻止外蒙古军队窜入和内蒙古王公独立，派毅军副司令陆军中将热河副都统米振标为赤林镇守使，率24万军队驻林西县城、统布、经棚、乌丹、赤峰等地。秋十月，外蒙古叛军巴布扎布率二三千人越锡林郭勒草原攻占经棚，围攻林西，使毅军遭到严重打击，后来奉军援军赶到，方击溃巴布扎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癸丑战乱”。毅奉军队在平叛中纵掠巴林草原，抢掠焚烧巴林右翼旗王府。毅奉军在追击外蒙古巴布扎布叛军时，除了烧毁沙巴尔台王府，还捣毁了巴林右旗的苏布敦庙、嘎拉达斯台庙、乌牛台庙、珠腊沁庙、太本庙、索博日嘎庙、新庙、岗根庙等。旗地受到骚扰，牧民的牲畜被赶走，财产被抢劫，蒙受了极大的苦难。

此次兵燹，使王府前院的所有房屋毁于大火，殿宇也遭到严重毁坏，仅存殿堂与厢房。兵乱之时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正在北京，他回到王府后，想要修复王府，但热河官员要求巴林右翼旗王府迁到大板。此后在中华民国初年，于大板康熙行宫西南处建筑四合院，王府遂复迁至大板。大板王府建筑规模不大，房盖没有覆券圆筒瓦，而是鱼鳞瓦片。外墙没用砖砌，仅以泥垛。占地面积不大，按外墙算，东西67米，南北47米。布局简单，大厅前

## 几度搬迁话王府

---

为两根旗杆，大门里面为二门，二门以内方是王爷居住的地方。里面有厅堂五间，左右两翼各有耳室，两侧有东西厢房。王府搬来以后，厅堂为印房。左耳室为王爷的家庙佛堂，右耳室为王爷居室，厢房住着王爷的内眷和王府总管牌旦尼达。内院墙后是仓库。两侧各有一跨院。东跨院靠后，是男奴女仆居住的地方；西跨院靠前，是王府的粮仓。在王府的北侧，为西向开门的衙门府，通常是旗务章京处理旗之政务的地方。整个王府至今保存完好，现辟为旗离退休干部活动场所。

## 十一 热恋巴林将军王

巴林草原上有则谚语说，“狂风刮起来雄鹰难展翅，沙漠陷进去烈马难奋蹄”。在巴林历代扎萨克里头，出了一个刚勇之人，他就是巴林右翼旗第八世扎萨克巴图。他刚直不阿心怀远大志向。但是在清廷镇抚蒙古的氛围里，却如狂风中的雄鹰陷蹄的烈马一般。

史籍里对巴图王爷记载不多，唯记其是巴林右翼旗第七世扎萨克琳沁的长子，生于清乾隆初年，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袭爵多罗郡王，当上了巴林右翼旗执政扎萨克。此时的巴图王爷不到二十岁。此后没过几年又当上了八部十一旗的昭乌达盟盟长，一枚盟印放在了巴林多罗郡王的大堂上。清乾隆四十年被皇帝赐为亲王品级，清乾隆四十一年任定边左副将军，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出镇乌里雅苏台。时间不长便被革职，并被免去旗扎萨克的衔位，调往北京，不许留在旗里，大约是怕这位将军远离京都滋生是非。

民间传云，巴图王爷刚勇机智，臂力过人。据说巴图王爷担任昭乌达盟长时，有一次盟旗聚会，六盟四十九旗的王爷盟长都到了，巴图王爷因故来晚。他鞭马来到会盟地点一看，盟长及旗扎萨克们都在大蒙古包里喝酒，外面一溜十三根拴马桩子都拴严了马。与他相识的盟长、旗王爷端着酒碗出来，取笑他说：“巴

图王爷如果找不到拴马桩子拴马，就骑着马喝碗酒回去吧。”巴图王爷围着拴马桩子转了一圈，果见没有桩孔供他拴马。他情急生智，将护卫人员的七八根红缨扎枪捆在一起，尖朝下杆朝上，朝地下用力扎去，竟把枪扎到地下二尺多深，这样在十三根拴马桩子旁边又添了一根。仆人们上前扳了扳纹丝不动，便把马拴在这些扎枪杆上。一直到盟旗会议散了，也没有人能够从地里把这些扎枪拔出来。

但是流传得最多的要数智斗大权奸和王申了。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每年都要在京都以北木兰围场行秋收之礼，实际上是战备边防，训练兵马。届时蒙古各部旗都要参加。这年秋天，大典开过，皇帝突然问道：“此番收礼，蒙古诸旗俱到，为何不见巴林王巴图？”典礼官出班奏道：“启禀圣上，皆因北方沙俄屡犯我边，巴林将军王巴图把守关隘，故未能参加收典。”皇帝正欲点头应允，旁边走出大奸臣和王申。这家伙是当时朝中最为显赫的大臣，他窃取权柄，玩弄权术，索贿受贿，陷害忠良。因巴图王爷不给他进贡送礼，便对巴图王爷常怀怨恨之心，此番伺机奏道：“陛下容禀，臣闻将军王巴图借驻关隘之便，常怀高傲之心，新近又谋得三件宝物，好马宝刀神箭。臣闻这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号曰千里追风驹；那宝刀削铁如泥，能够劈山出水；而那神箭百步之外能射倒劲松。”乾隆皇帝是好战之人，闻听此言，龙颜不悦，说：“好个巴图王爷，得了宝贝，不来见我，是何道理。朕要亲眼看看这三宝，不知从边关到此有多远？”“二千多里。”“传朕旨，命巴林将军王巴图三日之后午时三刻谒驾。”皇帝金口御言，一语既出，驿官立时上马，五十里一小驿，百里一大驿，飞往边关。其实皇帝算错账了。二千里地打来回就是四千里，既使巴图王爷日行千里，还须四日赶到。他把送信的日子忘了加进去。等驿官到了边关，已经两日过去，至多还有一天零两夜的时间了。巴图

王爷要是不去,便是违旨,违旨杀头;要是晚到,便是欺君,欺君掉脑袋。巴图王爷只好命人守住关隘,连夜赶奔木兰围场。和珅说得不错,巴图王爷确有好马,不过不是一匹,他骑一匹跨一匹,轮番骑着奔跑。行了一夜,次日清晨来到西拉沐沦河边。巴图王爷下了马,心中盘算,离午时顶多还有三个时辰,到此方赶了一多半路程。又见河水暴涨,想绕到巴林桥上已经来不及了。便牙一咬心一横,紧紧马肚带朝河心走去。刚刚跳进河里,忽听有人喊叫。巴图王爷回头一看,是一个衣服破烂满脸污黑的巴达尔沁喇嘛。他便不理睬,扬鞭催马,谁知才迈几步,一下陷入河中拔不出腿来。原来这西拉沐沦河全是流沙底,要是掉进沙井,就别想出来了。好在千里追风驹硬棒,猛地一跃将他拖回到岸上。此时日已升起,巴图王爷不禁一阵焦急。巴达尔沁见王爷急煎煎的样子,用手向王爷摆了一下,向西呶呶嘴,用手指了指对岸,边打手势边哇哇,原来是个哑巴。哑巴不由分说牵了巴图王爷的马逆流而上。巴图王爷明白了这里不能过河,便跟哑巴巴达尔沁喇嘛向西走去。行到流急浪高的地方,巴达尔沁让王爷抓住马尾,他牵着马冲入水中。经过一阵拼搏果然从这里过了河。巴达尔沁突然开口说道:“西拉沐沦河水再大,永远流不到岸上;王爷要午时赶到围场,朝着我手指的方向。”

三日后的午时就要到了。皇帝要进午宴去,和珅一旁跪禀:“巴林巴图王爷此时未到,必是不尊皇命,谋反边关,请皇上降旨捉拿,如不缉捕归案恐边关从此不靖。”一语未了,忽听一阵马嘶,守门军禀报说,将军王巴图到了。和珅吓了一跳吃了一惊,暗道:“好厉害的巴林王,此人不除,必为后患,遂又心生一计,领着巴图见驾,道:“皇上闻听你好箭法,新近又得了神箭。又听说你力大无比,一箭能射倒一棵大树。皇上此番召你来要看你的箭法。”巴图王爷说:“圣命难违,下官从命。”皇帝大悦,道:“巴图箭



法如此神通，传旨文武百官明日午时看定边左将军巴图箭射古松。”和珅挽着巴图的手出来，对巴图王爷儿狠狠地说：“射不倒树便是欺君之罪，明日你的死期到了。如果送我良马百匹，黄金万两，我可免你一死。”巴图王爷啐了一口道：“奸臣贿官，你还嫌贪得少吗？”忿然离去。但他愁肠百结，任力气再大，怎么能一箭射倒合抱松树？他趁着月色走出寓所，扶树泣曰：“我巴图掉头不足惜，只憾边关吃紧无人抗敌。”巴图王爷正哀叹间，忽听树里有人说话。“王爷不要伤心，你看这树虽粗里面却是空的。我们从里面已经将根砍断，明天你一箭射来，树就倒了”。说毕唱道，“老松虽然粗，敌不住我陶高沁的斧；王爷的神箭到，树倒如粪土”。次日午时，文武百官护驾来到，巴图王爷站在百步之外，试了三次弓弦，和珅喜了三次。最后弓弦响处，巴图王爷的利箭射出，这一箭果然厉害，箭尖箭杆全部射进树里去，外边只剩下雕翎箭羽。再看那树渐渐倾斜，“咚”地一声倒在地上。文武百官同声喝彩。恰在此时，报马跪禀：“沙俄攻打边关，隘口吃紧！”

皇帝焦急，和珅却喜上眉梢，心想，此番巴图王爷的死期到矣。使趋前奏禀：“区区沙俄，朝廷何须发大兵，只须巴林巴图王爷到益和漫罕邀上朝格敦王爷，同去边关即可御敌。”

益和漫罕遍地流沙，绵延千里寸草不生。巴林巴图王爷邀上朝格敦王爷的兵马，横贯沙海昼夜兼程向边防行进。此时正是六月天气，烈日炎炎，火焰般地炙烤着沙漠，象一团火球在沙上滚来滚去。朝格敦王爷的兵马在沙窝走了两天，又饿又渴，躺在沙丘上起不来。朝格敦王爷说：“巴图王，听说你有一口宝刀，能劈石出水，就救救大家吧！”巴图王爷叹了一口气说：“这是人们的传说，就是再好的宝刀也不能劈石出水。这都是和珅要害我，想出这么个主意来，我死不足惜，想不到连累了你们。我们还是咬着牙走吧。”又走了一天路程，来到一个光秃秃的石岩下。巴图王

爷扭头一看,不用说士兵,连朝格敦王爷也昏倒过去了。巴图王爷手把岩石,二目圆睁,怒骂和珅,一刀劈下去。只听轰地一声,岩石断裂,断石后面出现一个石洞,一股湿乎乎气流涌出来,不一会儿,又飘出一缕缕蓝幽幽的烟雾。巴图王爷高兴地喊:“好啊,有烟就有火,有火就有人,有人就有水,朝格敦王爷,我们进去看看!”说着钻进洞里去。果然不错,里边有一个喇嘛在那里烧火煮茶,旁边有石坑,坑里汪着一潭水。巴图王爷捧起木钵盛水,先让朝格敦王爷喝了个饱,然后让每个士兵都喝足,最后自己喝了,将木钵还给喇嘛,说:“谢谢佛爷喇嘛,救了我们这些人的性命!”喇嘛摆了摆手说:“不要罗嗦,过喝快行,去晚了隘口不保。”巴图王爷谢过,带着士兵穿过沙海直奔戍边大道,打退沙俄,保住了边关。

巴图王爷经过这一场,细想当今朝廷奸贼当道,纲纪败坏,此番要不是众百姓搭救,早就没了性命,日后一定为黎民百姓好好戍边卫国。谁知时隔不久,朝廷即下敕书,解除巴图王爷定边左将军职务。巴图王爷情知这又是和珅作祟。他长叹一声鞭马回到家乡巴林旗。巴图王爷刚来到旗王府,朝廷的诏书又跟过来了,命巴图十二日之内,返回京都,否则便是渎旨之罪。巴图微笑一下,将诏书扔在一旁。

五日过去了,巴图王爷没有动身。八日过去,他还是没有启程的意思。别看巴图王爷不着急不上火,却把王府上下急得热锅蚂蚁一般。为什么他们着急?大清律明定,一人获罪,殃及全族。巴林旗的台吉都是姓孛儿只斤,巴图王爷一有罪,台吉族的所有人都有罪,不但台吉家族有罪,连台吉的仆人奴隶都有罪。可是这些人干着急谁也不敢向巴图王爷进言,因为这个王爷在巴林扎萨克一系里头官当的太大了,称将军太爷王;爵进的太高了,称和硕亲王,比开旗的一世扎萨克郡王还高一级。再一个原因是

巴图生性倔犟，天不怕地不怕，在朝敢跟和王申斗，还能怕谁？凭这儿，巴林人把他敬若神明，唯命是从。

众人眼巴巴地等到第九天头上，才见巴图王爷清早起来，认真梳洗毕，穿上紫蟒服，扣上金镶玉朝带，戴上宝石朝珠冠，又命人取过定边左将军印鉴，牵过金鞍银鞴追风驹，王府衙门上至协理章京，下至必车赤牌旦尼达，还有闲散公爷台吉，无数旗民百姓都齐刷刷地等在王府前面，要给巴图王爷送行。巴图王爷走出门来一看，不由嘴角挂上笑容，说：“我亲爱的旗民百姓，我过去大难不死，全仗僧俗百姓拥戴与帮助，但最终没逃过奸臣的诬陷。我本来想回旗和百姓共牧牛羊，哪知他们召我回京问罪。百姓们，你们说我应朝哪边去呢？”

“南边。”人们以为巴图王爷要进京都，异口同声答道。

“不对，我要朝北边去。这是我在巴林的最后几日了，我请求我的旗民帮助我再打三天猎。今天我们到旗北川图山上猎狼，你们立刻回去取弓箭布鲁。好了，都快去吧！”“扎！”众人应声而去。

整整三日，轰围、整围、推围、紧围、合围，巴图王爷指挥各苏木的猎手把川图山上的野狼围歼殆尽。合完围，奖赏了众猎手，他站在川图山顶上，命人取过将军王大印，放在巨石上面，说：“我巴图从此辞官不作，就把这个印鉴放在此山之巅。川图山的狼既然已经打尽，那么这个山就叫作阿巴达林台山吧！”从此在巴林草原的北部，就有了一座叫阿巴达林台的山峰，汉语称它为印盒山。

次日早晨，巴图王爷带领猎手又向北行。旗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人们看见他每到一座山峰都要打一次猎，打完猎都在山顶上扔一件东西，先是在一个山峰上扔了顶戴朝珠，接着在另一个山峰上脱了朝服，又在一个两峰之间的隘口上扔了马鞍。最后在他要走出巴林界的矮山上，命人堆积敖包，他亲手插上柳枝祭了敖

包，然后转回身来，面朝巴林山山岭岭远近草原，滴下了留恋的热泪。再以后他只身离开了巴林草原，一直没有回来。有说他去西方求佛当了喇嘛，有说他闲居北京至终，但史籍上没有记载。不过在巴林与他相关联的几个地名流传下来，人们把巴图扔下顶戴朝珠的山峰称作景斯图敖瑞，把他扔了朝服的山峰称拉托台，把他扔下马鞍的山隘称额莫伦坝。人们还把巴图王爷怀恋旗土滴洒热泪的地方称作洪格尔达坝。

以上虽系传说，但是也说明不管是谁对人民做了好事，人们就不会忘记他。巴图王爷虽然是封建王公，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戍边卫国与敌作战的勇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赢得了人们的恭敬和爱恋。至今，巴林草原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绿缎的被子，  
折叠的印痕已经破旧，  
圣母的化身，  
惦念着将军王爷。

白缎的军袍，  
胸襟和袖口已经破旧，  
圣母的化身，  
惦念着将军王爷。

真诚的巴斯尔圣母，  
至高无上的圣帝，  
高贵的三尊信佛，  
众多的沙那比尔。

## 热恋巴林将军王

---

在巴彦套白的北边，  
有巍峨的黑山，  
还有三江水，  
心爱的巴林草原。

## 十二 文人拉西彭楚克

公元十八世纪中叶,巴林草原出现一颗灿烂的明珠——著名的蒙古史学家拉西彭楚克。

拉西彭楚克,姓孛儿只斤,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从他这一代开始往上说,他的父亲名齐让达尔扎。他们弟兄三人,长兄阿尔达喜迪,次兄劳博桑丹金,他是老三。祖父名巴拉珠尔,巴拉珠尔有两个儿子,他属祖父的长子一系。曾祖父名格日勒图,辅国公爵位,他是曾祖父第七子一系。拉西彭楚克的第四辈祖是巴林右翼旗首任扎萨克多罗郡王色布腾,他属于色布腾第三子一系。再往上数,他第五世祖色特尔,第六世祖巴嘎巴特尔,第七世祖是有名的统领喀尔喀五部的巴林部首领苏巴海,第八世祖是虎喇哈赤,第九世祖阿尔楚博罗特,第十世祖则是蒙古中兴英主巴图孟克达延汗。

拉西彭楚克出生于巴林右翼旗,约生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时他的父亲齐让达尔扎是三等台吉。拉西彭楚克青少年时期,受其祖父的影响较大。他的祖父巴拉珠尔任巴林右翼旗协理。祖父在弟兄中排行老七,人称七大爷。七大爷学业精深,满腹经纶,曾在旗扎萨克府邸开办必车赤学斋。拉西彭楚克遂逢机缘入学斋就读。他自幼聪敏好学,记忆过人,又得益于祖父的严教,所以知识广博,功底深厚,熟谙蒙满汉藏文字,熟读各朝各代

各种文本的典籍。

清朝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巴林右翼旗巴拉珠尔协理年逾八旬,向旗扎萨克巴图要求辞去协理职务,并推荐其孙拉西彭楚克担任协理。旗扎萨克巴图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喜爱拉西彭楚克的才华与人品,正赶上到承德行宫朝觐皇帝,拉西彭楚克年十八岁,又是台吉子弟,可以列入年班朝觐,于是巴图王爷带他去承德行宫觐见皇帝。此次得到朝廷的复准,拉西彭楚克遂晋为旗协理职。因为他排行老三,旗民称之为“三大爷”。不久,巴图王爷任清朝定边左将军,离旗北去出镇乌里雅苏台。拉西彭楚克也离旗到京都雍和宫研读蒙藏文经典史著。

在京期间,拉西彭楚克潜心于研究与撰著蒙古史,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完成蒙古编年史巨著《大元国水晶念珠》。

《水晶念珠》是拉西彭楚克的代表作。此书由绪编部分和五个专章构成。绪编开篇明义,作者提出写作此书的目的意义,解释了书名《水晶念珠》的含义。第一章论述蒙古族的起源,比较详尽地择录了蒙汉文献中有关蒙古族源流的记载。第一章记述的是蒙古汗统源流,主要是成吉思汗先祖从孛儿帖赤那到也速亥的家族世系。第三章是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记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史实,以及成吉思汗以后元代诸帝的世系情况。第四章记述由爱育识里达腊汗至达延汗时代的蒙古诸汗的世系情况,林丹汗与后金之间的战争以及林丹汗之子额哲·洪果尔降清的过程。第五章记述成吉思汗诸弟的子孙后裔、蒙古诸部诺颜的世系及俺答汗时代喇嘛教传入蒙古等事。

这部著作有着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蒙古史著名学者巴林人乔吉先生在谈到这部史书的历史价值时说,“必须指出,在所有的蒙古编年史中这部书最彻底地列举了成吉思汗以来的血统系

谱,从而使蒙古编年史的类型达到完善”。乔吉还从以下方面对此书进行了评述:拉氏所著《水晶念珠》在十八世纪记述蒙古历史的蒙古文编年史中是极其详尽的一部。他在编写此书时虽然大量参用了《元史》和《续资治通鉴纲目》等汉文史料,但是书中更多的史料则为汉籍中所不见,而这些史料又极其珍贵,对后来研究蒙古史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水晶念珠》所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在很多情况下与汉文记载不同,因此在这一方面,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水晶念珠》述中有评,而且篇幅宏大,体例严谨,内容翔实,文字简洁优美,为蒙古史著作中所不多得,因此倍受推崇。可以说拉西彭楚克对于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言论形成了拉氏史学思想,对研究十八世纪蒙古族史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水晶念珠》问世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国蒙古史学者竞相研究和评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匈牙利著名蒙古史学家李盖提教授,在蒙古地区旅行时发现了《水晶念珠》,1933年在《内蒙古旅行简报》(布达佩斯,1933第26页)上发表文章,介绍《水晶念珠》,评论此书为“一部尚不为人知晓的历史著作”,从此《水晶念珠》被介绍到西方。其后,西德蒙古史学家海西希教授对《水晶念珠》进行了较详尽的研究,1946年他在北京影印出版了《水晶念珠》(北京天主教大学《东方学研究》第十期),还编写绪论,并对各种抄本中的内容异同及《水晶念珠》的作者进行了首次详细的研究,成为《水晶念珠》研究的开拓者。1958年,海西希教授的巨著《蒙古宗教与宗教历史》一书问世。在这部书中他又开列专章对《水晶念珠》进行深入研究。美国的田清波教授也是研究《水晶念珠》的一位卓越学者。早在1911年,他在鄂尔多斯收集到《水晶念珠》的两种抄本,195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影印出版。田清波教授撰写绪论,对《水晶念



珠》的历史价值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苏联齐科夫斯基在他的《东方研究所藏蒙文手抄本与刊本》一书中,开列专章介绍《水晶念珠》。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璞尔来、毕拉、察罕等人都发表文章研究过《水晶念珠》。国内研究《水晶念珠》的著名学者有乔吉和呼和温都尔。呼和温都尔于1985年在呼和浩特铅印出版了经他校勘和注释的《水晶念珠》五种手抄本。巴林人乔吉教授是研究《水晶念珠》及其作者的著名学者,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拉西彭楚克生平考述》,西德刊物《中亚研究》第19期予以转载。此文对拉氏生平及其家族世系等进行了较详尽的研究。乔吉还发现拉西彭楚克另一部传记体文章《格鲁坚赞·赛音绰克图活佛传》,并发表文章予以研究。拉西彭楚克歿年失考。

巴林人为出现这么一位历史学者而自豪,尊敬的称其为“三大爷”文人,或巴林拉西彭楚克。

### 十三 等级森严领地制

清王朝统一蒙古后,给予蒙古贵族封疆土地权,即将蒙古按满八旗的建制编成一个个蒙旗,给每一旗划定领地,由旗扎萨克行使领地的最高统治权。将领地的人口划为贵族与属民等级。阶级分明,等级森严,形成了封建领地扎萨克制。

蒙古部落素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又由于战争及灾荒等其它原因,迁徙不定,没有较固定的区域和领地。蒙古诸部归附后金以后,天聪八年(1634年)后金政权将蒙古诸部牧地,封给各旗扎萨克作为世袭领地。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召开多伦伯朝会,重新调整内外扎萨克牧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理藩院要求各旗扎萨克将领地山川景物四至八界绘图呈报。次年清廷颁布《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外蒙古扎萨克领地遂在法典上予以肯定。据《蒙古游牧记》记载,巴林一部二旗的地理位置在古北口东北七百八十里,距京师九百六十里。领地东西长二百五十一里,南北长二百三十里,略呈长方形状。南于翁牛特旗以西拉沐沦河为界,北于哈达图吉鲁克、布固图黑山与乌珠穆沁旗为界,东于鄂拜山与阿鲁科尔沁旗为界,西于碧柳图山与克什克腾旗为界,东南于玛达虎沙地与阿鲁科尔沁旗为界,西南于迈拉索图哈达图哈起克与克什克腾旗为界。西北于阿鲁亥喇汉山、洋图哈喇和硕与克什克腾旗、乌珠穆沁旗为界,东北于巴

彦乌兰岭于乌珠穆沁旗、阿鲁科尔沁旗为界。当时巴林部虽然被划分为左翼旗和右翼旗，固定左右翼扎萨克驻地以及所属人口。但两旗同游牧。二旗属民交错居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整个清代。为了保证这种领地制度的实施，清政府于康熙朝以后陆续制定了一些领地封禁办法，不断地颁布诏旨解决有关边界争端、禁止越界放牧、人口迁徙等事。

蒙古部落封建领地建立，领地扎萨克就成为凌驾众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成为领地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代表。以扎萨克为主的封建贵族是领地的统治阶级。在巴林，孛儿只斤氏世为贵族，又依其战功和门第分别封以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的待遇。其爵位最高者为领地扎萨克。有清一代，巴林公以上的爵位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辅国公等。据地方志书记载，巴林右旗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辅国公爵位。清顺治七年（1650年）色布腾晋多罗郡王，世袭至琳布削职，之后又由辅国公桑利达袭封郡王。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桑利达之子琳沁晋为和硕亲王。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琳沁子巴图袭郡王，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晋为和硕亲王。曹德纳木道尔吉之子那木吉勒旺楚克承袭父爵为和硕亲王。那木吉勒旺楚克之子阿拉莫斯巴特尔降袭郡王，延之扎噶尔袭郡王爵，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晋和硕亲王。辅国公在巴林右旗有二系，第一世扎萨克多罗郡王色布腾三子格日勒图为一系，四子那木札为一系。格日勒图一系袭至琳沁长子德勒克时，曾于清乾隆十八年（1783年）晋为固山贝子，之后，德勒克之子孙再袭爵时，都是辅国公爵。那木札一系一脉相承直至民国初年业希诺尔布。巴林左旗封爵位为固山贝子。扎萨克满珠习礼为一系，世袭罔替，凡十三世。色梭为一系，这一系固山贝子虽有爵位但不执政，称闲散贝子，凡十世，这系贝子亦世袭爵。公以下为台吉。巴林台吉较多，巴林右旗第一

世扎萨克与清皇室固伦淑慧公主所生四子,分为四门台吉,即每一子为一系,世袭罔替。每一系又衍生支脉,以至台吉户口世世增加。巴林左旗两系贝子家族,每世除分别有一人承袭贝子外,其余亦为台吉。此外清顺治年间,增有弘吉刺惕部兀班之孙拉布泰洪台吉子孙一系。至清末这些台吉共有139人。按照清廷的规定,所有这些台吉分为一二三四等。关于台吉的官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题准,台吉顶戴坐褥,照内官阶定制。一等台吉同内官一品官,二等台吉同内官二品官,以下类推。台吉身故的,准其子孙暨亲兄弟世袭罔替。清康熙元年又题准,公主之子及亲王子弟授为一品,郡主之子及郡王贝勒之子弟授为二品,县主之子贝子公之子弟授为三品,台吉之子弟为四品。因此后世在台吉的称呼上有一二三四等台吉,亦称一二三四品台吉。在台吉承袭和晋级上也有相应的规定。清朝建国之初规定,授予品级者须年十八岁。乾隆十七年题准,加恩将袭爵之子加一级,亲王长子郡王贝勒长子为一等台吉,贝子台吉之子为二等台吉。清乾隆四十二年又题准,军前有功者赏给二三等台吉,准予世袭罔替。这些平民有军功者也晋为台吉,使贵族人口增加。这样一来这些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王公台吉就形成了封建贵族阶级,成为巴林草原的统治者,清廷为了笼络蒙古贵族,维护这些贵族的统治地位,下诏旨颁法令,规定蒙古亲王以下六等爵位的承袭者,由朝廷给以优厚的岁俸。亲王年享受朝廷俸银二千两俸缎二十五匹,郡王俸银一千二百两俸缎十五匹。以下逐级减少,至辅国公年俸银二百两俸缎七匹。巴林右旗的扎萨克因系亲王及郡王品级得俸甚优。乌尔滚王爷因是固伦额駙加享俸银三百两。这样,蒙古贵族便甘心依附于清廷。朝廷还规定各旗扎萨克及其以下的协理参领佐领必须从贵族台吉中补放,这就确保了贵族的世代统治权力。还规定蒙古台吉占有旗丁作为他们的终身使役,《大清

《会典事例》记载，一等台吉十五名，二等台吉十二名，三等台吉八名，四等台吉四名。还确定蒙古王公台吉依其爵位高低领有一定属民人口，以供其奴役和剥削。

领地统治者的权力机关是王府和衙门。王府是旗扎萨克办理政务之处。王府的常住人口除了扎萨克的眷属外，还有王府的总管牌旦尼达，王府管家德木齐，其下有宝什浩和白德。据原在巴林右旗王府供职的巴彦尔灯居民旦巴巴斯尔回忆，清末巴林右旗王府先后任过牌旦尼达的有塔布花地方的色布森格、赫旺。牌旦尼达不由贵族台吉充任，而是从扎萨克的奴丁选任，又称顶命牌旦尼达。清廷规定如果扎萨克触犯大清刑律，牌旦尼达可以顶替扎萨克受刑。清廷还规定，依据扎萨克的爵位不同，额定骑从护卫仪仗人员，亲王六十人、郡王四十人、贝勒三十人。旗扎萨克是郡王亲王爵位，额定仪仗人员较多。扎萨克每有外出，要按固定程序排列仪仗，牌旦尼达是仪仗队的头目。在巴林右旗王府衙门管家称达德木齐，主管王府大院的内务。他手下有三个德木齐和带有银质虎头牌的宝什浩。德木齐之下是管理王府库房的白德。清末，巴林右旗王府有白德六人。除此而外，王府还常年使役下等杂役（塔呼尔）四人，王爷的猎手（吉德沁）十二人，侍奉（胡德）十八人，厨役六人，女佣六人。这些佣人随时选定，一般无固定限额。王府既是扎萨克的私宅，也是扎萨克的议事之所，通常为一旗之权力的象征，执政扎萨克印鉴就放在王府。巴林右旗王府由沙巴尔台搬迁到大板后，王府内院的正厅便存放印鉴。扎萨克要员议事，大体上每年只有两次，一次是正月十五开印会，一次是腊月初一的封印会，旗内一应大小事情均在印务会上解决，印务会都在王府召开。

衙门是旗扎萨克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一般由协理台吉主管，有东协理西协理和掌印协理管旗协理之分。各旗不一，在巴

林右旗清末只有一个协理，名卜日来。协理必须是台吉族的成员，一般从闲散王公和一等台吉中遴选。协理的任务是承扎萨克之命，佐理一切旗务。若扎萨克年幼，由协理代行旗扎萨克的职权。扎萨克进京觐见皇帝，一般要由协理侍随。承协理之命办理旗务的是管旗章京。管旗章京二品顶戴，一般从台吉族遴选，台吉中没有适任者，可从平民中选任。清末民初，巴林右旗管旗章京先后有哈丰嘎、乌勒辉充阿、金奇贤等人，都是从平民中遴选补任的。章京之下有分管梅林，处理分管事务，三品顶戴。清末巴林右旗有七个事务梅林，其中一个梅林管印务，两个梅林管刑罚，其余四个梅林分管所属苏木。除了旗之官员外，衙门日常办事人员还有必车赤。必车赤即衙门的文书人员，无有限额。清末巴林右旗王府有必车赤十余人。必车赤有正衙和空衙之分，正衙常驻衙门，空衙轮流值班，再其下便是各苏木派来的使役人员。

为了便于管理，旗之下设苏木章京或称苏木达，秉承管旗章京或分管梅林之命办理苏木事宜。一般无固定办公地点，大多理事就在苏木达的蒙古包里。苏木达属下额设骁骑校（昆都）和领催，承苏木达命办理苏木事务。苏木之下设嘎查，嘎查有嘎查达一人。嘎查达由嘎查箭丁担任，承苏木达之命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实施旗王府衙门颁布的法令、清查户籍、催办税赋等事。嘎查达下属旗之役吏，不过是王公贵族奴役属民的工具而已。

清廷不但确认王公贵族的特殊身份，还规定属民对领主有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每个不是领主的蒙古人都必须有其领主，即设有没有领主的蒙古人，每一个领主必有一定数量的属民。未经许可，属民不能随意离开主人的领地。属民违背领主意志，要被处罚或监禁，甚至处死。

封建贵族的等级制度和平民的人身依附制度就确定了蒙古封建社会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各等级的僧俗封建主便是封建统

治阶级，而属民则为被统治阶级。

被统治阶级的属民中的箭丁户，蒙古语称阿拉巴图，他们是属民中人数最多的基本阶层。他们是赋役的承担者，按清廷的规定服兵役，兵员须自备马匹，有的甚至终生服役。阿拉巴图最沉重的负担是驿递。这些在驿站传递的人称为驿丁，蒙古语称乌拉齐。他们不但要为驿站服役，而且要缴纳差役开支、官员供养、负担贡品等。除此而外还要服贡役，即做劳役和缴纳实物。实物规定：年有羊40只者交羊2只，有羊20只者交羊1只；有牛两头者交米6锅，有牛1头者交米1锅；百户以上者，每10户征马一匹牛车一辆；有3头乳牛者交奶油1肚，有5头乳牛者交奶油2肚；羊百只者交毡子一条。遇有进贡、会盟、祭祀等，封建主还要向阿拉巴图摊派征收定额的马匹、牛羊、车辆、奶制品、奶酒、毡毡等物。封建主欠下的债务也要由阿拉巴图偿还。清朝末年，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扎噶尔在京娶亲，靡费浩大，欠银数万两，以后都是由旗民负担。随丁是跟随主人终身为主人服役和世代相袭的属民。清制规定上至亲王郡王，下至台吉，每人都有数量不等的随丁。随丁属于主人，没有什么权利也不负担箭丁所负担的义务，主人可以随意将其出卖赠送。随丁的劳动所得全都归领主。他们甚至没有人身保障，清制规定领主杀死随丁，只罚“二九”牲畜而已。在巴林还有陵丁户，这些人是看管王爷及公主陵墓的人。他们的地位比随丁还要低下，通称珠腊沁。在巴林右翼旗还有庄丁户，这些人是公主胭粉地的佃户汉人，居住在隆化县波罗河屯的庄头上，地位与随丁同。庙丁，蒙古语称沙那比尔，是喇嘛封建主的牧奴。这些人口的来源多是封建主由自己的牧奴中捐献出来的，也有离开领主主动去寺庙放牧牲畜的牧民。他们不服兵役，不承担旗内各种劳役，终身为达喇嘛们效劳。处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是奴隶。他们处境极为悲惨。他们不入丁册，不在人

口之列，世世代代是领主的家奴。奴隶可以成家，但其后代世世为奴隶。

清廷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除了建立森严的等级阶级制度，还制定了蒙古地区封禁制度，主要有户籍制度、编审制度、禁止与外地及汉人婚娶制度、稽查种地汉人制度、与外地往来制度等。

户籍制度即蒙古禁卖人出口，其已入档之蒙古人，不准擅卖，未入档之庄头，只准其在本旗买卖。它处逃来之人，二日内逐出。王公官员不准私养人子。有同姓后继者不准抱养异姓之子。侍妾所生之子为子，生子之妇不准嫁卖。若无近族，亦无异姓之子，其家产给王公台吉。除档内所载喇嘛，不准容留无籍私行喇嘛。康熙十年题准，凡喇嘛将自已家奴及它姓送庙之人作为班弟，或容留无籍之格隆班弟者，将该管之喇嘛革退，罚牲畜三九，格隆班弟各罚三九。作为班弟，送之喇嘛处，或隐匿在家，及容留无籍游行之格隆班弟者，将都统以下，领催以上，同本人一并交部，分别议处治罪。在外番蒙古地方，除籍名之喇嘛班弟，旨令驱逐，倘不作驱逐，或隐匿容留，及将各该属家奴为班弟者，事发，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各罚俸一年，无俸之台吉，罚 50 匹马入官，仍革职，闲散台吉鞭一百。又定，凡蒙古地方骁骑壮丁不准私为乌巴什，违者照私为格隆班弟例治罪。又定，蒙古妇女不准私为齐巴罕察（尼僧），违者亦照私为班弟例罪之。

编审制度，即清初定蒙古民丁年 60 岁以下 16 岁以上男子都编入丁册，有病者除之。每 3 丁共一马甲。遇有出差等事，以两丁差遣一丁留家。后又定蒙古壮丁三年一次编审，有隐之者，将所隐之丁入官。隐之 10 户者，管旗王、贝勒按罚 1 户，出入人令改附愿往旗分。顺治四年又题准，如有隐匿之丁，将该丁入册，隐之 10 人者，将管旗之王、贝勒等各罚俸 3 月，管旗章京副章京



罚牲畜三九，参领佐领罚二九，骁骑校各鞭 80。诬告隐丁者鞭 100 罚三九（清代处罚牲畜从一九开始，最高为九九。每一九九头牲畜，即马二，牛二，乳牛二，犏牛（二岁子）二，犍牛（三岁子）一）。

禁止与外地蒙古及汉人婚娶制度，即清廷于康熙十八年题准，台吉等擅自与喀尔喀额鲁特缔结婚姻往来者，革去爵秩，不准承袭，所属人全给其近族兄弟，除妻子外，家产牲畜都入官，所属人随往者，各鞭 100，罚牲畜三九，将所属之女遣令随嫁，女之父鞭 100。康熙二十二年又题准，王以下至闲散台吉违禁与喀尔喀、唐古特、巴尔虎等地贸易、结亲者，照定例治罪。又定，凡内地民人（关内汉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耕种、贸易，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倘私相嫁娶，查出，将所嫁之妻离异，还给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例治罪，知情主婚及说和之蒙古人等，各罚牲畜一九。嘉庆六年议准，嗣后将民人娶蒙古妇女之处，严行禁止。其业经娶过者，任伊等两家情愿，均令陆续带回原籍。禁止后，仍有私娶蒙古妇女者，一经旁人告发，将主聘妇女之人枷号 3 月，满日鞭 100，将违例之民亦枷号 3 月，满日鞭 100，解回原籍。失察之该台吉罚三九牲畜，该扎萨克罚俸 6 个月。

稽查种地民人制度，清乾隆年间规定各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闲散王、贝勒、贝子、公等，私自招聚民人开垦地亩，1 人至 10 人者，罚俸一年，失察之盟长等，罚扎萨克盟长俸一年；11 人至 20 人者罚俸二年，失察之盟长等罚俸二年；21 人至 30 人俱罚俸三年；41 人至 50 人俱革职留任，五年无过，报院奏请开复。50 人以上者革职不准开复。无俸协理台吉、闲散台吉，招聚 1 人至 10 人罚二九牲畜；11 人至 20 人罚三九牲畜；21 人至 30 人罚四九牲畜；31 人至 40 人罚五九牲畜；41 人至 50 人革职罚五九牲畜。所属蒙古等私自招募汉人开垦地亩者，无论人数多

寡，官员革职，罚二九牲畜；平人枷号半年，满日鞭 100，严行管束，失察之该台吉塔布囊、该扎萨克协理台吉等，分别罚九。如仍不悔改，依旧违犯，或私募开垦者，发往南省交驿站充当苦差。

蒙古地方与外地往来制度，清朝初年规定蒙人出口，均需登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定，蒙古地方寄居民人(汉人)择其良善者，立为乡长、总甲、牌头，专司稽查踪迹可疑之人，报官究办。如有作奸犯科者，将该乡长一并治罪。又定，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是非著，交理藩院通飭内外诸扎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为管束。卑各遵循旧俗，留心严查，倘有游民习学邪教，即拿获报院治罪。蒙古人等贸易，稟明扎萨克王公等拟一章京为首领，令 10 人以上合伙同行，若无首领之人或滋生事端，各坐应得之罪。

领地扎萨克制度使蒙古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残酷的阶级统治严重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使草原人民长期蒙受压迫和苦难。

## 十四 佛教传播在巴林

藏传佛教传播在内蒙古草原的教派是格鲁派,亦称黄教派。

黄教传入巴林,史料记载的最早时间是蒙古林丹罕时期,大约是公元1592年至1634年。《巴林右旗志》大事记篇记载,公元1626年从西藏来蒙古传播佛教(喇嘛教)的夏尔巴呼图克图在察罕索博日嘎城内(即今巴林右旗北部辽庆州城)建成“大神变塔”和“天降塔”。为弘扬佛教,他还在城内刻立经碑(石碑今已无存),公元1893年6月俄国传教士来内蒙古考察,亲眼见到这座石碑,并将碑上的碑文记录下来,编入《蒙古及蒙古人》一书公诸于世。据波滋德涅耶夫所记,此碑雕刻的是藏文和蒙文凸文字。藏文字体较大,蒙文字体较小。碑文的内容是以佛的名义颂林丹汗的伟业及建造“大神变塔”“天降塔”的经过,记载1617年从西藏来到林丹汗身边弘扬佛法的夏尔巴呼图克图的业绩。近代专家们在研究这件事时称此碑为“林丹汗碑”,因为碑为蒙古北元时期的大罕林丹罕所建。

喇嘛教传入蒙古始于十六世纪后半期俺答汗时代。《蒙古源流笺证》一书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俺答汗出征撒里畏兀儿,在途中遇上了许多藏族商人和一千多个喇嘛,这是他初次接触喇嘛教。俺答汗遂打算仿照忽必烈和八思巴建立经教之朝,邀请黄教高僧来蒙古传教。明隆庆五年(1571年)第三世达

赖喇嘛索南嘉错派高僧阿兴来蒙古传教，遂使俺答汗、钟金哈屯（三娘子）以下，举国部属皈依佛教。明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汗和索南嘉错在仰华寺会面，召开法会，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法会上俺答汗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索南嘉错上俺答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车臣）罕称号。此事在林丹罕碑上是这样记载的，“在这个北方的国家里也同样如此，赖有长生天的神助，蒙古成吉思汗德高望重，英名远扬。到他的第三十六代，诞生了大转佛法宝轮的菩萨的呼毕勒罕，即岱明车臣（彻辰）成吉思汗”。十七世纪初察哈尔林丹罕益于信奉喇嘛教，曾组织人力物力将一百零八卷的《甘珠尔经》译成蒙文，并邀请夏尔巴呼图格图到他的罕庭传经。这件事情也载入了碑文，“他统治着许多异族国家。首先汉族和唐古特族的国家，他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而主要的是，由于早就定下的天意，他以自己的信仰和虔诚为这个国家请来了天之瑰宝——受到古代君主法王尊崇的喇嘛，在知识、慈悲和力量方面，具有一千道毫光的曼殊师利的呼毕勒罕，即普遍被称为阿难陀师利波陀罗的教主夏尔巴。他们以喇嘛和施主之间的互相联系作为基础，把不信教的愚昧一扫而光，使它成为一种陈迹……创造了身体、语言和精神的崇拜对象，重新发展了僧团，把宗教的花坛培育得欣欣向荣”。

巴林的插汉城则正是林丹罕罕庭所在地之一。巴林人蒙古史学者占·达木林苏荣曾著文考证，“明嘉靖年间至天启七年（1627年），北元罕庭在西拉沐沦河北面，插汉城是北元的陵寝之地”。“据蒙古史料记载，林丹罕罕庭有一座城池，城的位置在北山名曰阿巴嘎山，据插汉城正东200里，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有一座古城，叫查干浩特城。一般认为该城始于辽代，金、元、明沿用。古城北有一座大山，名阿巴嘎山”。阿鲁科尔沁旗是巴林

的毗邻。林丹罕于其陵寝罕庭处修塔祭佛弘扬佛教之举可想而知。“这里自古以来有一座敬经塔，专一地信奉胜利者(诸)教的至尊法王显示曼殊师利的技艺，发出慈悲的阳光，随着国势日强，二蘊的各部充满了他的纯洁精神，他也想按照古时印度和西藏的菩萨圣王的神圣榜样扶植佛教。他对于北方诸国芸芸众生的利益和幸福的源泉——佛教至为诚敬并视为瑰宝，因此将已遭破坏的旧日的一切加以复兴和整顿，特别是为了纪念高贵的教主们的功绩，并把曾祖们扎萨克图汗的遗体举行火化，他建成了法身崇拜的对象——大神变塔。又为了实现母后的愿望，建造了天降塔。他按照典藏中所载的经义，用奇珍异宝建起了这两座蔚为壮观的崇拜对象以及其它许多法身崇拜对象以后，就使(这个国家)充满了光辉，把天下照耀得辉煌壮丽。……最后在我佛升天以后的三千七百五十九年的丙寅年沙拉邦月初三完成了(这一事业)。”由此可见，喇嘛教在当时已经广泛传入蒙古，在巴林草原尤其如此。

清朝征服蒙古以后，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除了设置将军、都统、大臣分别地域控制蒙古外，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在蒙古地区兴黄教。统治者深谙制服蒙古的真谛，即以佛教教义束缚蒙古封建主的思想 and 行为，给他们生来就有统治蒙古民众的权力，但不允许与清朝分庭抗礼，这样可以免除北方蒙古侵扰；另外蒙古地方宗教的发展，给社会增加了一个新的不劳而获的阶层，这样使整个社会负担都压在平民身上，遂使社会生产逐年低下，使蒙古地区逐渐衰弱。清朝的乾隆皇帝对此曾一语道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以不保护之。”

清政府在蒙古推行喇嘛教主要策略有二。一曰不断扩大喇嘛上层的各种特权，二曰广建寺庙扩大喇嘛教的影响。

扩大喇嘛特权即给予其政治权力。清政府采用六代国师的

办法和明代俺答罕与索南嘉措共同制定的待遇办理。绰尔济封号的喇嘛等同于洪台吉，喇木札木巴、噶木楚封号喇嘛等同于台吉，格隆等同于塔布囊，欢津太师、托音、齐巴噶察、乌巴什、乌巴之察等同于一般官吏。在皇都，给地位最尊的喇嘛赐名国师和禅师，授予他们最高的名号、职衔和特权。在蒙古地方，令其享受与蒙古王公同等的待遇，封为扎萨克达喇嘛、达喇嘛、苏拉喇嘛，再其下封为德木其喇嘛、格苏贵喇嘛，以及格隆班弟喇嘛等。清康熙初年巴林右旗在固伦淑慧公主主持下兴建的圆会寺，就从青海请来传经喇嘛封为扎萨克达喇嘛令其掌管全旗教务。以后，随着喇嘛教的发展和扩大，各庙又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封号的喇嘛。对于下层喇嘛也给予相应的封号，如绥本喇嘛、尼拉布喇嘛、索端喇嘛、翁斯德喇嘛、格益格喇嘛、果尼尔喇嘛、却依格喇嘛、翁布喇嘛等。这些喇嘛名号，巴林各庙都有。

清廷出于扩大喇嘛教影响的需要，还给予喇嘛以种种优待。其一是安排喇嘛上层年班进京觐见。对于驻京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转世多次，来京三次以上的，其坐褥可以冬用狼皮夏用红褐，可以乘坐绿围车。喇嘛驻京由朝廷给以钱粮，从扎萨克达喇嘛、达喇嘛、德木齐喇嘛以至格隆班弟等，钱由每日银一钱五分八毫一厘一丝至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不等，米从二升五合到一升三勺七抄一撮不等。这样一来上层喇嘛自然而然的产生优越感。他们更加热心于对朝廷的效忠，充当统治者愚昧与压迫蒙古平民的工具。其二是规定呼图克图喇嘛可以转世。转世采用奔巴(金瓶)的方法和朝廷封任的制度，这样清廷就把喇嘛教领袖人物牢牢掌握在手中。巴林左右旗都有转世活佛。其中海力根台庙有转世活佛五世，善庆寺有转世呼图克图一世，昭恩寺有转世活佛六世，阿贵庙有转世呼毕勒罕四世，荟福寺有三个葛根转世，重庆寺有一个葛根两个呼毕勒罕转世，隆福寺有一个

呼毕勒转世,嘉佑寺有一个呼毕勒罕转世,宣教寺有两个呼毕勒罕转世,东拉新其勒庙、岗根庙、要尔吐庙各有一呼毕勒罕转世。这些葛根呼毕勒罕最多转世十三次,最少二三次。以巴林右旗重庆寺为例,第一世葛根丹珍,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出生于巴林右旗东八佐领宝日胡硕艾里札兰班丹达家。第二世转世葛根名玛尼巴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生于梅林巴雅拉图家,曾赴北京雍和宫亲自请来甘珠尔经。第三世转世葛根名达木仁苏荣,1912年生,为当时东八佐领管旗章京之孙。因家中富有,聘为葛根后出资增修庙宇多间。第四世转世葛根幼名拉巴喀,出生于巴林右旗查干诺尔的一个牧民家庭,父名陶格陶胡,解放后土地改革时还俗,取名宝音斯钦,在查干诺尔当牧民。此庙葛根再未续嗣转世。其三是封给各寺庙庙仓牲畜土地和庙丁。各庙的主持达喇嘛等有职喇嘛均由朝廷按持有度牒数目拨给钱粮,并鼓励各地诺颜给寺庙捐助牲畜和土地,有的笃信喇嘛教的诺颜把自己的牧奴连同土地牲畜捐献给寺庙。这些奴隶被称为庙丁沙那比尔,供寺庙驱使和奴役。庙丁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但终生而且世代被寺庙的有权喇嘛所奴役。在巴林,大的寺庙主持有十数个庙仓,大的庙仓有土地数百顷,牲畜上万头。庙仓住有庙丁户,他们除了负担给寺庙主持放牧牲畜、拉脚运输、割柴打草等差役外,每年还要三次在寺庙诵念大经法会时贡献牛羊。庙内所需一应物品,庙丁户都必须随要随送,不能耽误。他们没有任何权力,也不上丁册。在巴林有的庙仓庙丁户竟达百余。其四是赋予寺庙主持行政司法权力,这主要体现在寺庙的上层喇嘛可以压迫和奴役普通喇嘛。这些普通喇嘛有为主持专管衣食住行和杂物的绥本喇嘛,有专管诵经的翁司喇嘛,有负责整理经物法器乍玛用物的果尼尔喇嘛,有专门经管庙仓的翁布喇嘛。这些喇嘛经常遭受掌权喇嘛的打骂和刑罚,直至处死。若喇

嘛班弟忍受不了寺庙封建主的酷刑而逃走,则受到更重的处罚。清廷规定:喇嘛班弟等私自逃走又自行投回者,初次鞭六十,二次鞭八十,三次鞭一百革退;若由人拿获者鞭一百革退。各庙喇嘛若不遵守庙规,该师可呈请驱逐。上层喇嘛不但拥有喇嘛界司法行政权力,还参与处理社会政治事务。晚清时规定上层喇嘛可以兼有社会行政职务,这样在僧俗两界都可以行使行政司法权。其五是在蒙古民众间极力推行喇嘛教,使所有的蒙古人都信仰,以至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上层喇嘛利用信徒笃信喇嘛教这一心理,每年都要举办数次大型诵经会。这些经会的所有费用都由信徒摊派或施舍。巴林右旗圆会寺荟福寺每年正月十五日诵嘛恩经会,六月十五日愚热勒经会,十一月十二月也都有经会。这些经会算下来,需牛百余头,羊数百只,炒米四五百石,黄油二三千斤,奶豆腐二百多块,米面数石,还有点心、糖果、哈达、线、纸、颜料等。这样的经会并非一庙如此,庙庙皆为。这些物品一是摊派,二是由笃信佛教的民众向寺庙施舍。所有这一切,除了经会费用,余下的都归寺庙主持所有,因而庙仓财产逐年扩大。民众除向庙仓施舍外,每遇婚丧、疾病、瘟疫、灾害等事还要请喇嘛诵经,甚至日常无事也请喇嘛诵念太平经招福经,同样要捐赠大量牲畜与财物。

广建寺庙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喇嘛教的又一重大策略。为了发动蒙古地区广建寺庙,历代清朝皇帝亲自带头建庙。康熙皇帝在多伦诺尔建汇宗寺,雍正皇帝在库伦建庆宁寺,乾隆皇帝在承德离宫外面建了好几个名寺,影响深远。皇帝带了头,由皇室下嫁到蒙古地区的公主也仿效皇帝建寺。顺治初年下嫁到巴林的固伦淑慧公主和康熙年间下嫁到巴林的固伦荣宪公主,先后在王府所在地建造圆会寺和荟福寺,成为东蒙古草原首建庙宇之一,同时也是巴林草原的名庙,亦称旗庙。清朝中叶,清



廷要求蒙古地区除了旗扎萨克建庙，旗下各苏木也要建庙宇，每个苏木至少要建一座庙宇。于是寺庙大量兴建，仅巴林地区就建造二三十座大庙。

巴林地区的庙宇建筑，分藏式和宫殿式两种，以宫殿式为多。建筑年代大都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朝，当时建在巴林左旗的庙宇有衙门庙（乌兰白其庙）、海力根台庙、查干白其庙（新贝子庙）、隆善寺（前召庙）、善福寺、昭恩寺、床金庙、太本庙、贝子庙、岗根庙、乌牛台庙、索博日嘎庙、北太本庙、陈板庙。其中最著名的庙宇是善福寺，为巴林东部蒙古喇嘛教信徒的信仰中心。此寺建于唐代真寂寺的石窟前，因是洞窟之寺，又称之为“阿贵图庙”。庙宇建成之后，佛祖曾谕信徒，此地出现圣兆霞光，因而又称之为格力必尔召，又因寺内供奉的是石雕释迦牟尼卧佛，又称之为和布特召。此寺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盛时有喇嘛217人。寺之主持封号是呼毕勒罕，历四世。每年阴历五月十三日是善福寺的法会日，全旗喇嘛来此参加法事，成千上万信徒领受佛的恩典。巴林右旗建筑的庙宇有圆会寺、荟福寺、阐化寺、嘉佑寺、重庆寺、隆福寺、西拉新其勒庙、东拉新其勒庙、宣教庙、珠腊沁庙、苏布敦庙、要尔吐庙、查干宝力格庙。较兴盛的名庙为荟福寺。此寺为康熙帝次女固伦荣宪公主聚资修建，以后不断增建。整个庙宇宏伟壮丽，庄严肃穆。寺内主持有三个葛根，称东葛根、南葛根、巴格喜格根，传十三世。每年阴历六月十三日是荟福寺的经会，诵长寿经为皇帝祈福。诵经之时，不但全旗喇嘛齐聚，昭乌达盟还规定，每逢荟福寺经会时全盟各名庙每年轮流派出50个喇嘛来这里诵甘珠尔经，经会完毕还要上报清廷理藩院。因而这个庙宇在东蒙古地区很有名气。喇嘛庙的兴建，喇嘛教的兴盛，使得喇嘛人数大量增加，据《巴林右旗志》记载，清乾隆二年全旗喇嘛人数不足五百，到清光绪三十年，喇嘛人数增

加到 4053 人,而当时巴林右旗蒙古男性人口不过 2 万,占当时男性人口的五分之一多。

喇嘛教的传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腐朽的封建势力在人民的头上横行,也使社会形成了一个喇嘛阶层,众多的成年男子当喇嘛诵佛经不从事生产劳动,从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使蒙古地区的经济日益落后。但作为宗教文化,喇嘛教的传播也给蒙古草原带来了佛国雪域的文化源流和佛教经典中的有关医药、天文、数理等方面的知识。一些寺庙建有学部,培养喇嘛掌握这些学问。在巴林右旗名庙荟福寺,葛根下设教务部,教务部下设丁哈尔拉桑(天文数理)、昭德巴拉桑(卜易)、玛纳拉桑(医药)、确热拉桑(教务管理)。一些聪颖及学业精深者在这方面很有造诣。巴林右旗阐化寺一世活佛格鲁坚赞,天性良善,聪慧锐敏,逢苦难必发慈悲之心。十三岁时入庙当喇嘛,拜乌云达赖喇嘛为师,受比丘戒。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逢乌拉特旗绰尔济喇嘛从科尔沁返回途经巴林,格鲁坚赞随同他到了内蒙古西部名寺崇福寺(小召),拜见了寺之主持三世奈只托因,在那里领教佛家经典。清雍正四年(1726 年)他从崇福寺回到巴林右旗,在家乡潜心修习佛经。清乾隆五年(1740 年)他从巴林动身前往西藏求经,至次年来到西藏名寺哲蚌寺专心修练经法,获得“热绛巴”(博学之士)的称号。在藏期间,格鲁坚赞曾晋谒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和六世班禅罗桑贝丹意希,向活佛赠送礼品,接受活佛的教诲。清乾隆十四年(1749 年)在他离开西藏回旗的时候,提出日后要为在哲蚌寺修法的蒙古喇嘛修缮房舍,于是受到七世达赖的嘉奖,被赐予“额尔德尼·墨尔根·绰尔济”(宝贤法王)的封号。回旗途中在佑宁寺拜见了青海蒙古著名法僧松巴堪布·意希班觉,在崇福寺再次拜见了奈只托因三世。回旗以后,被旗扎萨克任为扎萨克达喇嘛。格鲁坚赞为实现在藏诺言,云游漠南

蒙古诸旗募化资财,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又到西藏,将募化所得3000两银子捐给哲蚌寺。为此七世达赖大为嘉赏,赐给他法服法冠,赠言“汝所祈愿教化诸所在东方,应为东方之众生宏扬佛法,广施利益”。格鲁坚赞依佛之教法于次年返回巴林,从此在巴林和东蒙古地区传播佛法以至终生。清乾隆三十四年,主持修建阐化寺,任阐化寺第一世法台。格鲁坚赞潜心佛教一生不辞辛劳,多次往返于雪域佛国和蒙古高原,带来了西藏佛教文化,促进了蒙藏地区的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他在传播佛教经典的同时,也用藏医藏药为民治病,解除民众瘟疫疾病之苦。几乎与格鲁坚赞同时,巴林左旗的达日玛达来喇嘛也远离巴林到内蒙古西部地区深造,获“拉仁巴”学位,并以其渊博的学识用藏文编著一部《浩尔创金》(汉语译为《佛教在内蒙古的传播》),叙述成吉思汗家族及其后裔们崇信佛教的情况、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以及清代蒙古地区黄教传播与管理情况。此书由于叙述精辟,成一家之言,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巴林左旗还有一奔波于西藏与内蒙古之间的有成就的喇嘛岭·吉克梅特罗古罗思嘉木措,在西藏学经时博学多思,颖悟力强,被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土登嘉措封为“法王堪布”,并带回达赖所赐的120卷《甘珠尔》经。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虔诚于佛教的喇嘛们的奔波,使喇嘛教在巴林传播开来,于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嘉庆以后,喇嘛教逐渐衰弱,其原因主要是清政府消弱了对蒙古的利用,其它宗教进入蒙古,上层喇嘛腐败,以及新的进步的民主思想传播,使数百年来在蒙古民众头脑中深信不疑的喇嘛教开始动摇,就连喇嘛内部,对喇嘛教提出质疑的,如沙格德尔等人亦不在少数。

## 十五 杖徒伯赫吉雅公

清同治年间,在巴林孛儿只斤台吉族里头,出现一个神童,他的名字叫伯赫吉雅。当时巴林右翼旗扎萨克那木吉勒旺楚克是昭乌达盟盟长。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各旗王府衙门都要开办必车赤学斋,吸收贵族子弟入学,培养懂得蒙满文字的大小官员。由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需要藏文翻译人才,必车赤学斋也讲授藏文。伯赫吉雅是四等台吉的子弟,自幼聪颖过人,入学数年很快掌握蒙汉满藏文字,积累了许多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清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伯赫吉雅十八岁,以台吉子弟的身份编入年班入京朝觐。年班朝觐怎么回事?这是清廷给蒙古王公台吉定的规矩。与其说是朝廷优待蒙古贵族,不如说是一个羁縻政策。这项政策清初始定,清顺治年再定,凡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都统等,准予年节来朝。以后各朝逐渐完善,分定班次轮流进京,规定年满十八岁者入班朝觐。因为巴林公主子孙台吉多,对巴林台吉赴京朝觐另有规定。乾隆年间钦定巴林、敖汉、科尔沁公主之子孙姻亲台吉等,定为四班,科尔沁、巴林每年各派台吉十员进京觐见。嘉庆年间因公主之子孙台吉等生齿日繁人数众多,故定为六班,一年一班,轮流来京。此次朝见按照班例伯赫吉雅与旗扎萨克郡王那木吉勒旺楚克同行。到了京都入宫

觐见同治皇帝时，恰遇那天皇帝无事闲坐，情舒心顺，便同那王爷和巴林台吉子弟攀谈起来。从打康熙皇帝之姑固伦淑慧公主与巴林王族结亲，巴林王公台吉便成了皇戚，每次年班进京，都被皇帝高看一眼，接到宫中去住。眼下皇帝高兴，便要叙谈叙谈往事。同治皇帝先问了巴林的民情之后，有意考问一下巴林的王公子弟，问起哪位皇帝何年何月巡狩过巴林，皇祖姑母两位公主何年何月怎么嫁到巴林，巴林王族祖辈怎么成为额驸，谁人立功受赏，作为皇室之胄得过历朝哪些恩遇。还问到有关蒙古王公觐见皇帝的由来，以及有关蒙古部落疆理、设官、会盟、边务、俸禄、贡献、朝觐、康饷等事。那木吉勒旺楚克年事已高，而且他本是不学无术之人，怎么回答得出？一问三不知，把皇帝气得眼蓝。末了，皇帝问众台吉子弟。伯赫吉雅当即立起，将皇帝所问之事逐一答出，不错不谬在情在理，还道出许多上和君意下达民情的道理，并引用蒙、满、汉、藏四种文字之经典。皇帝听后，频频点头，大为赞赏，将伯赫吉雅唤出班列，仔细端详，见其人不但口齿伶俐机变，且端庄俊雅举止大方，大加褒奖，命人看坐。这座位靠近皇帝，竟在那王之上。皇帝当即赐封伯赫吉雅辅国公。此事《蒙古清季实录》曾记载“清同治三年正月庚申，命巴林四等台吉伯赫吉亚公銜”。

这一件事，曾轰动一时。巴林出了才子，本是一大幸事，可那王却不以为然。他觉得伯赫吉雅当众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是出了他的丑，有意使他难堪。皇帝赐坐在他的位子之上是将来要取代王位之兆，于是心怀忌妒。伯赫吉雅年轻气盛，得了皇帝的宠爱，一下子从四等台吉升到公爷銜，了得！那叫连升六级，再有三级就是郡王，就和那王爷平起平坐了。回旗以后，没等理藩院关于升公的旨到，就穿起辅国公的服饰来。从京都回来时正是二月时节，天气尚冷，便头戴辅国公金龙两层冬珠五颗上挂红宝石的

冬帽,不久又换上帽端罩用紫貂,里子月红缎,正面点缀舍林装饰冬珠一颗,正顶点缀金花装绿松石一块的夏帽。还穿上前后四爪正蟒方形补服,腰匝四个金牙玉方版的朝带。又于属民当中,选精壮者做为护卫骑从,还向属民征集马匹银两,购置公爷一应之所需,一时十分荣耀。

这年七月,巴林右翼旗王公台吉齐聚齐齐哈尔图王陵祭祀列祖列宗。伯赫吉雅穿着公爷的服饰戴着公爷的顶戴,领着若干护卫前呼后拥来到。他感到自己能有今日之荣耀,全靠祖宗的荫庇,所以竭尽祭祀之事,一切活动由他安排,轻慢众台吉与旗官,殴打陵吏毛滚达庆查日勒。此事反映到王爷那木吉勒旺楚克那里,那王别看不学无术却老谋深算,暗使陵吏打碎伯赫吉雅的帽顶,意不承认他的公爷衔位。果然陵吏在祭灵仪式进行中,寻故用烟袋将伯赫吉雅的公爷珊瑚帽顶打碎。由是引起一串诉讼事端。

巴林右翼旗扎萨克那王状告伯赫吉雅私放护卫 13 人,违背朝廷大法,当革除四等台吉职务。伯赫吉雅状告那王指使下人殴打公爷,毁坏皇帝所赐之物,犯下欺君之罪。彼时那王盟权在握,伯赫吉雅的状态别说到热河都统那,连昭乌达盟也没出去,就被那王押下不准上告。那王的状态却告到热河都统麒庆处,进而转呈京都。伯赫吉雅感到诸事不顺,十分烦恼,适逢阿鲁科尔沁旗丁克尔葛根来旗,伯赫吉雅请葛根给以破绽。丁克尔葛根虽是喇嘛黄教派,却也笃信萨满“尚巫信鬼”,于是在一铜盘放入面鬼灵嘎鬼图,在面鬼的身上插了若干钢针,然后每日插针诵念“杜古尔道格沁”经咒。那王听到这件事情后,十分气恼。待伯赫吉雅七七四十九天诵完经将面鬼扔到野外时,那王命人捡回,以此为证说伯赫吉雅诵念黑经,在面鬼灵嘎鬼图内写那王的名字咒骂,借以达到陷害王爷的目的。于是那木吉勒旺楚克将此证据,连同

伯赫吉雅私放护卫勒派马匹等事一并具状上告。

两次上告均有结果。头一次那王上告的关于伯赫吉雅私放护卫勒派马匹之事，状案呈之热河都统麒庆处，麒庆准状，并奏请朝廷，朝廷准奏，批将伯赫吉雅暂行革职，立案刑讯。《蒙古清季实录》记载：“清同治四年（1865年）辛酉谕内阁，前据麒庆奏送查台吉伯赫吉雅被控私放护卫等款，请旨革讯，当降旨将伯赫吉雅暂行革职，归案严讯。”那王第二次状告伯赫吉雅，麒庆亦上奏朝廷，加进诵念黑经一节，并提出对伯赫吉雅的定罪意见。这一案《蒙古清季实录》记载得十分详细。麒庆奏称：“该已革台吉传讯后，即捏报患病，希图耽延。现经查明，伯赫吉雅於私放护卫一节，业已供认不违。其念黑经一折，查明灵嘎鬼图所写之字，译之为该盟长那木吉勒旺其格（那木吉勒旺楚克）。并据达喇嘛色楞呈出刊板经卷，查对相符。至于勒派马匹一节，据该盟长册报，伯赫吉雅派所属共出马四百三十匹，牛五十二头，并勒派银五百二十五两，又取具台吉彭素克拉布斋等数十人结呈。该已革台吉勒派情形，与该盟长所开清册相符，众证确凿，应先拟结。伯赫吉雅除私放护卫念诵黑经等事，尚轻罪不议外，请照监临官吏挟势及豪强他人，求索所部内财物，计脏准枉法论，折半科罪，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查其所犯情节严重，应不准其折枷，照例实发，解交理藩院定地发遣。是否允协，请飭理藩院核复。拟俟该台吉病痊，再行讯供，定拟之处，请旨办理。”朝廷接到麒庆奏折，于同治四年八月壬戌，命刑部左侍郎灵桂，大仆寺卿刘昆，驰赴巴林旗查办案件。他们查办后即核复曰：“此案既据麒庆奏称，证据确凿，岂容任令该已革台吉捏病耽延，以致巨案久悬。著即先行完结，以免案证拖累。伯赫吉雅前在神机营捐马五百匹，议叙公衔之案，若即撤销。至麒庆所拟伯赫吉雅罪名及其余各事宜，著该衙门核议具奏。”

伯赫吉雅对此不服，虽在病中但拟状委其叔祖母上下奔走，具状上告那王和热河都统麒庆二人，告他们一个陷害台吉，一个听受情托，并陈述冤抑等情。朝廷复派灵桂、刘昆驰驿前往查办。这一次查核，结果不但维持原判，而且惩办了一些帮助伯赫吉雅翻供之人。这件事情在《蒙古清季实录》中也有详细记载：

“兹据奏讯明该台吉畏罪诬控各情按律定拟一摺。此案已革台吉伯赫吉雅，将伊属下杨得书等私放护卫，先后共十三人，复勒派伊属下人等捐送马匹，索借银两。其念诵黑经，於内填写之字，与巴林王那木吉勒旺其格名字相同，亦涉咒诅。均经审实，并无屈抑。该台吉於麒庆奏结后，辄敢起意翻控，向宛主嵩、马良行贿作呈，添砌情节，尽属子虚，实属肆意妄为，种种不法。著照所拟，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役。马大（马良）受脏代作呈词，添砌都统受托等情，希图将案提京增减情罪，实属目无法纪，著革去议叙未入流，从重定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喇嘛官东（达尔玛扎布）转属马良作呈，过付银两，著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剥黄，不准折枷，由热河都统解送理藩院定地实发。宛立嵩代伯赫吉雅写作呈词得受谢金，徐均钧、杨得如、郑祥春、徐继功、魏墨林贿属作呈，过付银两，所得杖徒罪名，均著照所拟办理，一并交热河都统定地实徙。喇嘛西拉听以念经，於灵嘎鬼图内字迹可疑，并不阻止，著与掌坛之喇嘛吉克默特，并描写之喇嘛棍楚克扎布、必里克图均杖八十，鞭责发落。马玉麒於伊叔马良作呈，讯不知情，唯以由配释回之犯，并不回籍，潜行来京，著照律笞责，递交原籍办理。在逃之陆星阶并著严缉务获。其伯赫吉雅私放之护卫等官，均著即行斥革。巴林那木吉勒旺其格於伯赫吉雅前犯各节，并不严加管束，以致勾衅争讼，亦属不合。热河都统衙门理刑办事司员宛立俊，於伊弟宛立嵩受贿作呈，虽不知情，亦属失察，均著交该衙门照例议处。热河都统麒庆，审讯此案既无听受情托等



事，著毋庸议。”

至此，此案告结。伯赫吉雅“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役”。充役期间，以其学识渊博能言善辩之才被守边将军看中，提拔到官府中任教师。此后三十年过去，时过境迁，在守边将军们的帮助下，伯赫吉雅拟状上呈，陈述冤抑，叙说并无诵念黑经咒诅王爷之事，以及放护卫征所属银两事情虽有，但另有情由，要求朝廷重断是非。朝廷恩准，伯赫吉雅遂获释回到家乡巴林右旗。此时年已六旬，闲住圆会寺。伯赫吉雅一生无娶，仅抱养一子，名都楞和什格。这时的伯赫吉雅年事已高，无甚进取。巴林神童殒灭荒野，歿年七十余岁，终成黑暗的封建统治官宦倾轧的牺牲品，令后人不胜赞叹。

## 十六 末代亲王扎噶尔

公元 1944 年(伪康德十一年)夏季的一个多雨日子,在通往巴林的官道上驶来一辆灵车。要进大板街的时候,人们看见走在前面的是萨嘎拉扎布,他端着扎噶尔一个尺大的遗像,后面便是旗衙门仲奈,他捧着骨灰盒,再其后便是若干迎灵之人。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和硕亲王扎噶尔道尔吉故去了!扎王怎么好端端地死去了呢?据巴林人阿其吐撰文回忆,扎王任伪满洲国兴安局总裁的时候住在长春,诺门汗战争以后的一天,日本关东军设宴招待他,回来就得了痢疾,不几天就死了。当时人说,扎王是被日本人毒死的。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死他呢?这要从扎王的经历说起。

扎王是巴林右翼旗第十二世扎萨克多罗郡王额勒奇木巴雅尔的独生子。清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巴林右翼旗要尔图庙村。系李儿只斤氏,名扎噶尔道尔吉,后来人们都习称扎王。

扎王少年时,在沙巴尔台王府“必车赤”学斋读书,拜管旗章京巴拉珠尔为师,学蒙汉满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年仅十二岁的扎噶尔承袭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多罗郡王的爵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朝廷赐其“乾清门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任昭乌达盟盟长的阿鲁科尔沁王爷,借口扎噶尔袭爵没有向盟里履行例定程序,要罚银 7000 两。

管旗章京巴拉珠尔不敢抗拒,承应下来,签名画押出以字据。但是协理由本沁不同意付“罚银”,派乌勒慧充阿去北京理藩院告状。阿旗王爷听到此消息后,自知理亏,忙托人说和,赔情道歉了事。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肃亲王善耆从北京来东蒙视事,到巴林后住在康熙行宫,扎噶尔前往拜见。肃宗王见扎噶尔仪表堂堂,对答如流,是个年轻有为的王爷,回京城之后,奏本称赞扎王。当年十二月慈禧太后传旨将扎噶尔召进北京,“上奉慈禧皇太后御勤政殿,扎噶尔一人瞻覲”。其后又赐命扎噶尔“御前行走”。太后对扎噶尔印象颇佳,遂将其娘家侄女赐嫁给扎噶尔为福晋。

福晋初来巴林时患眼病。一次,福晋随扎噶尔去达尔罕山打猎,在山后沟用泉水洗了一次脸,回来后眼疾加重,视力逐渐减弱,以至双目失明不久去世。后来当地人称她为索胡尔福晋(意为瞎子太太)。

扎噶尔与这位福晋婚后,共生四女,长女和三女出嫁以前病死,次女鲍子静与本旗仲奈结婚,结婚时仲奈为伪满驻大板兴安骑兵第四团的连长。四女与巴林左旗和子章的儿子恩和森结婚。

扎噶尔王自从其福晋病故后立誓不娶,虽很多人劝他续弦,扎王始终不允。扎鲁特旗王爷劝扎噶尔再娶,生子接代,扎王也没有答应。后来他们背着扎噶尔给他娶了个侧室福晋,扎王不去迎娶,没有办法,只好去一个台吉代他迎回了王府,但是扎王始终没有与这位侧室福晋一起生活。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光绪帝奉慈禧太后旨在乾清宫诏见扎噶尔,赏双眼花翎。同年,朝廷授意扎噶尔将旗西部的乌力雅苏台川牧场以报效的名义请求放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肃亲王善耆、理藩院左承姚锡光等人来巴

林调查蒙情,筹划移居垦荒等具体事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热河都统廷杰派知县王顺存为垦务总办,在乌力雅苏台川的苏布敦庙设立巴林垦务局。同年五月,李铨接任巴林垦务总办,开始勘丈划段定则,其后又续放川图坤兑和玻力坤兑等地,共勘定8252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张文灏和莅斯士接任巴林垦务总办,规定荒价,招民垦荒,设立了林西县,垦地即正式从巴林右翼旗划出。当时住在这些地方的巴林右翼旗牧民600多户,克什克腾旗牧民400多户,对夺地放垦非常不满,阻碍勘丈之事不断发生。克什克腾旗章京乐山以巴林右翼旗历年征地租,坚持不搬走,并向热河都统控告,这虽然是两旗争讼,实际上是反对清廷的放垦。由于放垦牧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和大片丰美的牧场,被迫挤向旗的中部地带。

巴林放垦的结果,使巴林左右旗牧场日趋狭小,牛羊数量下降,放垦地区也由于水土流失,使很多水草丰美的草场变成沙丘。同时由于移民实边,经常发生农牧矛盾,如民国十一年(1922年)林西县境内冻死了几个乞丐,驻林西的热河都统汤玉麟部军官崔兴武和林西县大商人葛启祥(又名葛会章)制造事端,命将死尸偷偷扔到巴林右翼旗西南部毛敦道布、乌尼根图、巴彦琥硕地方,然后诬赖这些地方的蒙民逼死人命,逼迫住户搬到和布特哈达沙窝子里去,抢占了这块丰美的土地和草牧场。

扎王驻京日久,与喀喇沁扎萨克贡桑诺尔布交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北京日本使馆派出特务多名,他们一路经由喀喇沁王府,带着喀喇沁右翼旗贡桑诺尔布给扎噶尔王的信来到巴林右旗的大板王府。扎噶尔遂派大板街赵化民当向导,并给准备了马匹,取道乌珠穆沁草原,前往海拉尔。日本人都化妆成喇嘛,在海拉尔企图炸毁铁桥,瘫痪俄军运输线。但因俄军戒备森严没有得逞,仅炸毁铁路钢轨一段,即逃奔张家口,回了北京。此

次之前,还有穿喇嘛服装的日本人来大板找扎噶尔。一个叫冲,另一个叫横川,他们是北京日本驻华使馆派出来的,以爆炸东清铁路嫩江大桥为目标的“别动队员”。他们由北京坐骡子驮轿出发,经过古北口越茅金坝,一直到喀喇沁王府,找他们的同伙伊藤、吉原两个人,然后密谋了两日。贡桑诺尔布王爷让他们下榻王府西庙备极款待,临走时都给换上了喇嘛服装,并派亲信辛占柱护送到巴林右翼旗大板的扎王府。扎王派赵化民送往哈尔滨,途中被东清铁路的警备队发觉,逮捕枪决。赵化民逃回了大板。

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得东北和内蒙的控制权以后,不断有日本人到巴林右翼旗境内,有的逗留,有的过境。扎噶尔王由于喀喇沁贡王的影响对这些人加以保护。日本人名义上是游历考古,实际是记录风土民情、测绘地图、照像、搜集军事情报资料。

1910年,扎噶尔与日本人片谷传藏订立了合办“东蒙古招殖盛德公司”的契约,允许其经营“开垦荒地,酿造烧酒,开采矿苗,经营牲畜,收买畜产,批趸杂货,发行钱帖”等,资金10万元,各出5万元。扎噶尔以提供房屋、耕地、矿山(包括金矿、大理石、煤、叶腊石矿)折合现金垫支。此后扎噶尔与日本人交往越来越密切。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为了使蒙古王公贵族“归怀内向”,曾派周正朝率员“慰问”昭乌达盟。周到巴林旗后扎噶尔王热情接待。周正朝向袁世凯的报告中说“该王(扎噶尔)住京日久,甚为开通,深悉民国共和意旨”。并说“巴林扎噶尔王、敖汉王爵位较崇,关系较重。巴林右翼旗王三月一日动身来京觐见”。扎噶尔遂长途跋涉进京,代表本旗精诚内向,拥护民国。十月,民国政府将扎噶尔加封为和硕亲王。

中华民国二年(1913)一月,帝俄唆使外蒙古哲布尊丹巴三

路出兵进攻锡、昭二盟。扎噶尔王谴责帝俄侵略内蒙古罪行，强烈反对《俄蒙协约》，对哲布尊丹巴的远征军的抢夺行径，深为痛恶。他向袁世凯的报告中提出“蒙民均被蹂躏”，“大部人抛弃庐舍田园，逃入深山营穴而居”。他还在动乱中组织武装捍卫地方，保护蒙古民众。由于扎噶尔有功于大局，被民国政府授于一等大绶嘉禾章，后又晋升为昭乌达盟盟长。热河都统阚朝玺曾先后赠给扎噶尔两块金匾，一块上写“东蒙锁钥”，另一块上写“倚若长城”。

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扎噶尔因私自游历日本租界地旅顺、大连被袁世凯革除盟长职务罚俸一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扎噶尔继续担任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兼昭乌达盟保安长官。日本人在巴林西部开设了东升泉烧锅，在黑山头开设了种羊场。民国七年(1918年)，日本人簿益三到大板，开办了“蒙古产业公司”，收购牲畜、皮毛、土特产品，销售布匹、杂货、烟酒、米面，并准备大量收购牛羊，放“苏鲁克”。这项计划因巴林右翼旗公爷业喜诺尔布反对没有实现。这些日本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实际是从事政治活动，干着拉拢收买蒙古上层的勾当。他们对蒙旗上层人物，除了交往送礼外，还大量供给贷款。扎噶尔、三喇嘛、鲍二爷等一些官员和有权势的人，都曾向日本人借贷，共约5万余元，这些贷款基本上没有偿还。日本人对此也不在乎，他们说“我们不怕赔账，以后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就是了，可以放宽到三、四十年”。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扎噶尔王在北京向日本人借款3万元，民国十七年(1928年)向大连“满铁”借款5万元，这些借贷都是以本旗土地作抵押的。按照合同扎噶尔将旗的公有牧场，从黑山头到太本敖包，沿嘎拉达斯汰河两岸，东西长40多里，南北宽10多里的土地租给了日本人使用。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侵占热河的一路日军,从通辽经开鲁、天山、林东,于3月5日占领巴林右翼旗大板。在大板开设产业公司的日本人簿益三的儿子簿守次,随日军前来大板,在扎王府住了几天。扎噶尔王和簿守次一同去赤峰,和日军司令官田中接洽,并联络卓索图、昭乌达各旗的扎萨克会集赤峰,向当时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发了贺电。扎噶尔由于迷恋清室与满洲皇帝,一步一步钻进日本人的圈套,成为侵略者的猎物,终于酿成他的人生悲剧。

日寇侵占热河以后,废除了旗扎萨克制度,任命扎噶尔为伪巴林右翼旗旗长。不久伪满洲国建立兴安西分省,扎噶尔出任省长。日方在扎噶尔任省长时,对他的评价是“此人体魄魁伟,性格直爽,通晓事理,善于演讲……”,“在民国十八年夏季张学良对蒙人的土地施行掠夺暴政时,带头进行反抗,因在洮安示威曾受监禁,所以兴安西分省省长最适合”。

1937年(伪满康德四年)7月,伪满洲国设立兴安局,扎噶尔被调任新京任伪兴安局总裁,列席伪满洲国国务会议,辅佐国务总理大臣。

1939年(伪满康德六年)诺门罕战争暴发,日军在沈阳组织中央军事代表团,关东军司令部原打算派扎噶尔参加与指导蒙古的边界谈判。但扎噶尔从新京到了沈阳后,日方又令他立即返回新京,然后另派秘书萨嘎拉扎布(巴林右翼旗大板人)为代表去参加了与外蒙古的谈判。此事扎噶尔王已意识到日本人对他的态度有变。1940年扎噶尔突然失去了伪兴安局特任总裁的职位,改任伪满洲国参议,1941年任伪参议府副议长。

1944年(伪满康德十一年)夏季,日本关东军在新京专门设宴招待扎噶尔。宴会后,扎噶尔患了疾病。扎噶尔的女婿仲奈打电话告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扎噶尔闻后,流着眼泪说“仲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把我的病情透露给日本人呢?”

这回全完了”。扎噶尔害怕日本人利用治病的机会暗害他，对此仲奈也十分后悔，但扎噶尔也没再说什么。此后扎噶尔反复写了“霸王别姬”四个字。日本关东军几次派人给扎噶尔治病，扎噶尔的病情日益恶化，很快就死去了，终年六十岁。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说扎噶尔王爷是被日本关东军害死的，巴林各界人士对此很关注。

扎噶尔王爷死后，骨灰从新京运回巴林右翼旗。根据扎噶尔王爷留下的“今后如果王公世袭爵位恢复的话，在巴林四门台吉中选确恩普勒袭王位最适合”之遗嘱，巴林右翼旗的台吉和百姓自发性的举行了由确恩普乐继承爵位的仪式。



## 十七 章京乌勒慧充阿

乌勒慧充阿系巴林部尼楚古惕氏人，汉名乌善清。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巴林查干沐沦河畔景斯图山东侧的牧业村庄里。他的父亲桑嘎是个普通的牧民。乌勒慧充阿为人机敏，有胆识。至今草原上流传着有关他兴学办教、扶困救危、抗争军阀的几件事。

乌勒慧充阿是巴林十二、十三世扎萨克时的三个章京之一。幼年时曾在王爷身边当仆人，就学于“必车赤”学斋，精通蒙、汉、满文。

乌勒慧充阿成年后，身材高大魁伟，红光满面，眼睛特别明亮，炯炯有神，性格刚毅。他十七岁那年，使巴林右翼旗从一次灾难中解脱出来，所以在他十九岁时，负责管理旗衙门内务，二十三岁那年，当上了管旗章京，主持了旗政。

乌勒慧充阿对于历史、地理、法律进行过多年的研究，他写过一本历史书籍《查干图和》，详细叙述了蒙旗边境的自然地理情况，记载了巴林出现过的历史事件。乌勒慧充阿热爱旗民，特别注重民族文化教育。

二十世纪初叶，在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乌勒慧充阿认识到，蒙古民族要从愚昧中解脱出来，就得接受文化，就得办教育，这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所以提出了兴办

教育的建议。当时蒙古地区注重建立寺庙,对办学校根本不重视。乌勒慧充阿办学的主张,得不到很好的支持,办学困难重重,障碍很多。乌勒慧充阿克服了很多困难,1910年在大板创办了“普励学校”,当年就招生百余名。这所学校是巴林右翼旗民族文化教育的摇篮,为发展巴林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普励学校是今天巴林右旗重点学校之一大板一小的前身,为我旗学习与使用民族语言文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乌勒慧充阿与哈丰阿章京合作,于1905年请来了满族教师乌簿山给附近村里的孩子教书,后又聘乌到“普励学校”任教。1920年乌勒慧充阿又聘请多伦任教的阿木古楞老师来旗(汉名张辑武,喀喇沁旗人)在苏布敦庙建立学校,给十几个孩子教书。这样一来,查干沐沦、沙巴尔台、巴彦尔灯等苏木,涌现出更多有文化的人,村里的学校一个接着一个地建立起来。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巴林遇到连续几年的干旱,草场干枯,全旗的牲畜有被灾难吞没的危险。乌勒慧充阿以一个青年章京的身份,把阿巴哈纳尔旗王爷、乌珠穆沁旗王爷请到本旗西北边境地带,举办那达慕大会,请两位王爷在各自的旗与巴林毗邻的地区,划给一部分草场。乌珠穆沁王爷借着酒劲儿满口答应,说“巴林有牛皮大的草场足够了”!乌勒慧充阿对此表示感谢。到分草场那天,乌勒慧充阿将百张大牛皮割成细细的皮条儿,用细皮条儿为量绳,在阿巴哈纳尔、乌珠穆沁、克什克腾三旗交界地带西南面的呼来塔拉、西北边的哈拉特尔郝来、北边的达兰图路戈壁、南边包括扎哈乌兰呼和布尔淖尔量出草场几万亩,又建了“巴林敖包”,全旗大部分牲畜都到那里去出场,使巴林摆脱了旱灾,牧业逐渐兴旺起来。后来人称这块草场为“巴林锡利”,今于克什克腾旗北面,锡林浩特南边几十里的地方,属锡盟白音锡勒牧场管辖。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的“癸丑战乱”，是由于袁世凯统治下的北洋军阀与外蒙古王公贵族之间的激烈争夺给巴林人民带来的灾难。在热河都统姜桂题和“前敌司令”毅军首领米振标的包庇下，一伙地主在巴林博林古日本坤迪、其诺图音古日本坤迪、樱桃莫胡尔等地大面积开荒，引起了牧民的不满。米振标以加强边防为由，从毅军二十营四万将士中，调出十七个营的兵力，在赤峰以北的经棚、干珠尔庙一带驻防。当时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告独立，网罗内蒙部分王公，组织军队，准备内犯。

1916年1月8日，外蒙古“独立政府”再次派遣巴布扎布率部内犯，攻到林西城东门外，占据了有利地形，用大炮从山头往城里轰击。毅军被围在城内，形势危急，眼看城内军民从西门撤退。当时巴布扎布正站在城东山头用望远镜观望战场，其部下有个叫巴图孟和的，为死去的哥哥额尔敦孟和报仇，突然开枪将巴布扎布打死，然后投降了米振标，去请功领赏。巴布扎布部见主将身亡，仓惶溃退。

米振标因伤亡很多，愤恨交加，与从开鲁前来增援的关德胜部的五个营汇合在一起，声称“血洗巴林”。他们认为巴布扎布部下的蒙古兵中有一部分是巴林人，所以以平乱为名，将沙巴尔台庙和沙巴尔台的巴林王府纵火烧毁，接着又焚毁了岗根庙、索布敦庙、珠腊沁庙、乌牛台庙等几十个庙，抢劫了巴林百姓的牛羊几千头只。急报传到旗王府里，当时旗衙门只有25名卫兵。在旗民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乌勒慧充阿与他的车夫格力格仲奈二人，从大板出发到旗西部杜归恩希热米司令率部扎营之地，说有要事，必须面见米司令本人。米振标得知乌勒慧充阿独身一人，必定有事，便将卫队排成两行，举刀持枪，让乌勒慧充阿从两队列中进来。乌勒慧充阿面无惧色，从容镇静，昂首挺胸走到米

振标身边。他严厉地说：“我是巴林管旗章京乌勒慧充阿，代表本旗面见米司令，我盟和哲盟、锡盟保卫地方家乡的联合队伍，就要来到了，你们再敢前进，就接上了火，但战争都有损失，谁胜谁负怎么能预料？我今天孤身一人前来，是考虑到双方的利益；你们不动兵的话，我说话算数，决不会和你们作战，但你们硬要打下去，就在这儿把我砍了吧！”米振标原来就认识乌勒慧充阿，听他这么一说有道理，再说如果真的有援军，就不好办，因此他立即决定收兵返回林西，回林西后处决了杀主求荣的巴图孟和。此后巴林牧民回到家乡，重建家园，开始了新的游牧生活。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刚建立的林西街道上，增添了不少买卖货摊。当时克什克腾旗有个牧民到林西来赶集，买了不少东西存放在一家货店。正当他找回来车拉货物的时候，店里的小掌柜翻脸不认，说你买的货物早已拿走，还要什么？还找来旁边卖糕点的人给以作证。克旗牧民说不过只好去找驻林西的巴林翻译（又称巴林衙门）的乌勒慧充阿向他告状。为了解决此事乌勒慧充阿准备了酒席，宴请了林西街买卖行的掌柜们。克旗牧民买货的那个商店大掌柜，接到乌勒慧充阿的请柬之后，穿上绸缎长袍马褂，打扮得很漂亮前去赴宴。席间乌勒慧充阿指着他的马褂说，你这衣料真好，做得也合适，我也想做你这样的衣服，把你的马褂暂借给我，我找人买来布料，按这衣样做一件。大掌柜忙脱下衣服交给了他。乌勒慧充阿立命手下人拿着大掌柜马褂到其商店，对小掌柜说：“大掌柜告诉你们，将克旗人的货物全部交给我们！”并拿出大掌柜的那个马褂作证。就这样从那里拿回来了克旗蒙古牧民买的全部货物。这下可吓坏了这家铺子的大掌柜，他一看情况不妙，急忙给乌勒慧充阿送礼。乌勒慧充阿将货物和送来的银子装上车，到米振标司令的镇守使衙署作了如实的汇报，并要米司令处理这个案子。米司令毫无办法，对乌

勒慧充阿说：“你接手的案子，还是由你来办吧！”乌勒慧充阿来到巴林衙门后将那个骗人财物的两个掌柜和那个为虎作伥的卖糕点商人，一起敲锣打鼓在林西游了街。

自从实行“移民实边”以来，一时垦务局林立，人口渐增，搬迁户到巴林越来越多，跟着拦路抢劫偷盗经常发生。查干沐沦的牧民老布僧去通辽卖盐回来已经到了巴林境内，却被一帮人抢劫了十五辆满载的牛车。被抢劫一空的牧民来找乌勒慧充阿哭诉案情。乌听案情之后领着老布僧的儿子，到被劫现场附近村落去查找，在一家终于发现了牛车大鞅上的记号，以此为线索，最后侦破了这个抢劫案子，追回了全部货物和十五辆牛车。

林西开垦后，有个地主外号“田瞎子”与热河汤玉麟都统勾结伪造假证，把本来没有划给林西的巴林西部的几百顷土地占为己有。他说巴林王爷已把此地卖给他了。当时的管旗章京乌勒慧充阿识破了田瞎子伪造公章，勾结汤都统企图抢占土地的阴谋，于是与旗里的其它官吏们商定后，调集旗兵，备了酒席，宴请田瞎子和从热河来的官吏，在酒桌上将他们扣押，然后便准备到北京告状。

动身时，乌勒慧充阿对大家说：“你们不用到北京来看我，想知官司的输赢，就去田瞎子家，若看到田家屋顶上长满草，窗玻璃破了，就是我打赢了官司。”乌勒慧充阿最后在京都揭穿了田瞎子的阴谋，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

光绪二十年（1895年），乌勒慧充阿到北京去上缴巴林一年的牧业税，把银子交给银库领收据时，记账的官吏把数目故意写少，乌勒慧充阿说：“你这样压低数量我就不交银子，给退回来！”那官吏冷笑着说：“你那银两已放进了银库，你认识自己的，就拣出来吧！”乌勒慧充阿在银库中，拣出了自己的银子，过秤后不多不少正好够数。那个银库官吏目瞪口呆，最后还是如数给记了

账。乌勒慧充阿拣银子时想到了骆驼驮着长途跋涉撞击磨擦去锈发亮，便认出来了。

清代，赤峰街有个叫“白帽铺”的买卖家，每年在锡盟、巴林一带做买卖，成群的赶走牛马，当时有规定，要向赶牲畜经过的旗交纳税。可“白帽铺”势力大，几年未向巴林纳税。这一年，乌勒慧充阿去北京路过赤峰时，突然将“白帽铺”掌柜抓了起来。“白帽铺”大吵大闹要求放人，乌说：“纳税是国法所定！俗话说，有山大的汉子，也有天大的国法，什么掌柜将国法不看在眼里，那我们就去北京处理，这里无法解决！”这一下，“白帽铺”管事的和小掌柜们慌了手脚，觉得情况不对头，于是通过赤峰县知县老爷说情谈判，最后按照巴林方面的提议补交了几年的税款并负担了乌勒慧充阿去北京的路费，才了解了此案。

乌勒慧充阿晚年笃信佛教，他为了做善事，专门制做了红铜海锅和铜壶铜水桶捐赠给巴林右翼旗十三座庙每庙一份。海锅上面还刻着献词，下面刻“施主乌勒慧充阿献赠”。他还曾在公主桥（今巴林桥）南面连接着加修了个小拱桥。

乌勒慧充阿是蒙旗封建官吏，但他敢于抗拒军阀，保护民众利益，还做了些须办学修桥之事，因此受到了称道，他的故事也就流传下来了。

## 十八 奴隶火烧贝子府

在巴林草原，到处流传着一个火烧狐狸精的故事。说的是清朝末年的一个深秋季节，巴林贝子府张灯结彩，大排筵宴，为的是海林贝子要娶小老婆。在草原上王公贝子的老婆称为福晋太太，既然是小老婆，人们便称之为少福晋太太。这位少福晋不同一般，在娘家科尔沁草原乃是天仙一样的美人儿。缘由这一层，贝子府又平添了许多热闹。一时间，参加婚礼的各旗王公台吉，喇嘛俗人，来了成千上万，真比“悠热鲁”庙会还热闹几分。可是把新娘接到王府的时候，少福晋太太却昏迷不醒下不了彩车。据迎亲的人说，彩车经过扎鲁特草原的时候，正赶上那里行围打猎，许多猎人围追一只芝麻花狐狸。这只狐狸尖嘴长尾，脊背的毛绒芝麻花一样的美，两肋的毛绒则象火红的绣球。这狐狸被猎人追得晕头转向，一下子钻到迎亲队列中，再一跃跳进新娘的彩车里面，悠悠不见了。娶亲的人们打开彩车篷帘寻找时，哪有狐狸的半点踪迹。少福晋脸色泛白，眼珠上翻死过去。虽则如此，婚礼还是照例举行了。待七八日后，少福晋才慢慢苏醒过来，此后长得一天比一天媚丽动人，把个老贝子喜欢得恨不的含在嘴里咽到肚子里去。可草原的人们却悄悄议论：大事不好了，贝子爷娶来个狐狸精，巴林草原要遭受大灾大难了。果然，这狐狸精确实厉害，到府不久，就一天一个花样的变着法儿，把贝子和大

福晋弄得围着她团团转,真正的说一不二。贝子府的男奴女仆也叫他使唤得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少福晋还有一个毛病,看见骑马的就东躲西藏,看见拿枪炮布鲁的就喊爹叫娘。因此,贝子下令,谁也不许骑马进贝子府院,更不许背枪弄炮拎马鞭子,否则轻打重刑,格杀勿论,弄得全旗上下人人提心个个吊胆,没事谁也不敢到贝子府来,为这有多少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死于非命。这还不止,过了一两年,少福晋直嚷着吃人肉喝人血,贝子当然不能让她吃人,但是每顿饭必须看见人血方进食。这一下奴仆们遭了罪,每天都有人被打得鲜血直流。把个王府上下恨得咬牙切齿。天长日久,大家想了一个主意,就是怎么样使这个狐狸精现原形。有人说精灵最怕雄黄酒,喝了就显形。这一年春天,恰值贝子从北京年班回旗,少福晋命人备菜给贝子洗尘,先是喝奶子酒,接着喝白干酒,在他们喝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仆人端上来雄黄酒,贝子和少福晋也乘兴喝下。果然不一会儿,少福晋显了原形,长拖拖的一只大母狐狸。众人忙把贝子喊醒。贝子一见,“妈呀”一声吓得真魂出窍背过气去。“不好了,福晋太太被狐狸精吃了,打狐狸精啊!”人们一拥而上,将狐狸精少福晋当即打死,又放火烧死精灵。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火燃起来怎么能扑得住,将贝子府烧了大半拉,天降大雨方将烈火熄灭。

上面叙述的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巴林左旗海林贝子府于中华民国初年被奴仆放火烧毁,海林贝子和福晋太太被奴仆杀死之事真真确确。史料记载,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将巴林部析为左右两翼旗,钦命满珠习礼为巴林左翼旗执政扎萨克,封爵固山贝子,封满珠习礼从弟色棱亦为固山贝子,世袭罔替而不执政。钦定执政贝子王府在阿察图托罗海,闲散贝子王府在海兴塔拉。至清末光绪年间,执政贝子满珠习礼一系传十三世,最后一世封爵贝勒。闲散贝子色棱一系传至第十世,仍是贝子爵位,名



色旺拉普坦。蒙古语称“闲散贝子”为“海林贝子”。火烧贝子府事件就是海林贝子及其福晋手下的奴仆欢岱所为。

这个事件震惊东蒙古各盟旗，朝廷曾过问此事，督促地方查办。《巴林左旗志》历史大事年表记载：“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旧历十一月初十，巴林左旗闲散贝子色旺拉普坦及其福晋被奴隶花代（欢岱）根皮勒杀死，并纵火烧毁贝子府。”1913年癸丑年（民国二年），袁世凯派周正朝为特使，自正月十八至二十二日，来巴林贝勒旗进行宣谕慰问，并查访海林贝子被杀一案。他在《呈报大总统及国务院蒙藏局文》中写道：“该旗闲散贝子色旺拉普坦被身刺一案，沿途查访，因伊妻福晋平日待人稍刻，该府奴才根坡勒（根皮勒）等夙怨已深，于旧历十一月初十日，乘该贝子黎明出外查看马群，行到炮手花岱（欢岱）门首，被根坡勒开枪轰伤，移时殒命，并将跟随二人登时枪毙。根坡勒等拥入府中，又将福晋致死，尸身焚毁，府内财务、快枪、马匹洗掠一空，直往库伦逃逸。众口皆同。”在《巴林左旗志》人物篇中对杀死海林贝子的欢岱是这样记叙的：欢岱，蒙古族，原是海林贝子家庙小喇嘛，后来给海林贝子色旺拉普坦当贴身奴才炮手。欢岱为人有胆识，有正义感，对海林贝子和贝子福晋敖拉格尔（人称狐狸精）压迫奴隶的行为恨之入骨。1912年旧历十一月初十，欢岱根皮勒等人乘海林贝子外出查看马匹之机，开枪将海林贝子击毙，接着拥入府中将福晋打死，并放火烧了贝子府。事后乘驼向锡林郭勒大草原驰去，下落不明。

作为被统治者的奴隶欢岱根皮勒敢于造反封建统治者，把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掀翻置于死地，这是等级森严的封建领主制腐朽没落的必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蒙古地区阶级社会的原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矛盾迅速尖锐起来。一方面是封建领主穷凶极恶压迫剥削领地牧民，一方面是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剥削阶级的觉醒与反抗。这样一来，蒙古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在巴林奴隶火烧贝子府事件前后，卓索图盟出现了“八支箭”人民反苛敛抗征兵的斗争，伊克昭盟发生独贵龙运动，还有十九世纪末叶的敖汉旗白凌阿的起义等。这些事件说明，火烧贝子府不是偶然事件，是残酷的阶级压迫的结果。

事实正是如此。据海林贝子府一带的蒙古族年长者回忆，海林贝子府对男奴女仆压迫十分惨重。被称作狐狸精的福晋太太虐待仆人尤甚。海林贝子色旺拉普坦的福晋是科左中旗扎萨克的女儿。她自从嫁到海林贝子王府后，目空一切，凶残狠毒，府中的奴仆们恨透了她，叫她狐狸精。她立下了许多摧残奴仆的刑罚，奴仆们稍有不慎就会受到狐狸精的鞭抽、棍打、针扎、罚跪和滚水浇头等酷刑。在贝子府服役的奴隶干活两头不见太阳，吃的是炒米楂，喝的是以杏木疙瘩熬水代茶。狐狸精却吃的是美味佳肴，每顿饭还要打骂奴隶，称福晋太太“不见血不吃饭”。长期侍奉她的女奴一个名叫乌由，一个叫旭热。她俩饱尝其苦，受尽了折磨，白天侍奉一天，晚上贝子福晋抽大烟喝酒，直至深夜还不准歇息，烧茶送水稍有不周，福晋即把滚汤打翻，烫伤她们的手脸。更有甚者，还在女奴裤裆中塞进一只猫，在外面抽打吓唬。使猫在女奴下身乱抓乱挠，女奴苦不堪言，狐狸精却借此取乐。冬季，不发给女奴棉衣。她们只好以破皮袄裹身。狐狸精嫌脏怕味，不准穿皮袄进屋，她们只能穿单薄的衣服听使唤，终日冻得瑟瑟发抖。贝子福晋在暖炕上饮酒欢娱，若见她们冻得发抖，就把她们唤进屋里，令其站在炭火盆旁，加火烘烤，直烧得浑身红肿溃烂。有时还把女奴的衣服扒掉，让其光着身子站在地下，简直不把奴隶当人看。女奴们痛恨贝子和狐狸精福晋，个个咬牙切齿。

海林贝子有若干男奴隶，其中有一个叫根皮勒，他是贝子府

女奴旭热的哥哥，在府中当炮手兼管府库枪支弹药。还有一个名叫欢岱的奴隶，他原是侍奉贝子庙麻格斯尔锡热勒图喇嘛的庙丁。麻格斯尔是海林贝子色旺拉普坦的叔父，因欢岱办事机灵，又有一手好枪法，就把欢岱送给贝子当随从。

欢岱为人很有正义感，看不惯贝子福晋压诈奴隶的卑劣行为，常常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男女奴隶。根皮勒的妹妹旭热喜欢欢岱的人品，便同他产生了爱情。欢岱同情喜欢旭热，亦与旭热友好。此事后来被福晋狐狸精得知，她十分忌愤奴隶们的恋情。在她眼中看来，奴隶们就是干活的牲畜一般，不应当有什么恋爱婚姻和家庭。更使她忌恨欢岱和旭热的还有一宗事。福晋曾与贝子庙喇嘛私通，此事旭热知道。欢岱在庙内当庙丁时亦有耳闻。福晋恐此事泄露出去，便千方百计要把欢岱赶出府去。最后她想了个一箭双雕之计，以勾引府内丫头为由，令人将欢岱吊在马棚内痛打一顿，然后将其赶出贝子府，罚做砍柴烧木炭刨疙瘩的苦差。每当欢岱向府中交疙瘩时，她还借口数量不够，将他打得皮开肉绽。受苦受难的奴隶欢岱的胸膛中燃烧起复仇的怒火。

欢岱的悲惨遭遇，引起乡亲和众奴隶们的同情，也恨透了福晋。1912年旧历十一月七日，欢岱和心腹好友根皮勒商议，并通过占卜，认为此日是“红喜鹊唱歌——降天火”的日子，按惯例这天又是巴林左翼旗的传统猎日，正好乘贝子进山打猎时举事造反，将福晋杀死报仇雪恨。计议妥当之后，根皮勒事先将府库偷偷打开，取出长枪四支、匣枪二支、子弹若干，以备举事之用。根皮勒为了防备万一，又将库中剩余枪支撞针全部卸掉，子弹藏起。

十一月九日，欢岱以准备出猎为名，去马群挑选精良马匹，并把海林贝子的骑马也抓走。不料马信将此事泄露，连夜告知贝子说欢岱有反叛之意。海林贝子色旺拉普坦将信将疑，当即令根

皮勒从库中取出一支长枪，准备翌日清晨亲自去马群察看究竟。根皮勒情知此事泄露，夜间出府，找到欢岱告知此事。二人计议一番，觉得一不做二不休，随机应变。他们准备好枪马，潜伏于欢岱家中，等待贝子的到来。

十一月十日，天将黎明，果然海林贝子骑马来到欢岱门前。贝子见自己心爱的骑马在院子里拴着，立时气得暴跳如雷，大喊欢岱出来。欢岱钻出蒙古包，手握长枪。贝子喊一声：“你还反了呢！”便顺过枪来朝欢岱扣动板机。哪知他的枪没响，对面欢岱的枪却响了，击中海林贝子。海林贝子当场毙命。欢岱根皮勒二人眼看贝子死了，便飞身上马直奔贝子府，寻找福晋报仇。欢岱在女奴的帮助下，从灶坑里将福晋拖了出来，先用木棍将她的腿打断，然后将她扔进熊熊燃烧的陈年疙瘩火堆里。

欢岱根皮勒除掉海林贝子色旺拉普坦和福晋后，将贝子府内的金银绸缎、枪支弹药尽数装载车上，令人赶到牧场，又抓了良马劲驼，一行人直奔北方锡林郭勒草原而去。

时值袁世凯特使周正朝任“昭乌达蒙旗慰问使”，来到巴林左翼旗查访此事，他一面给袁大总统写信呈报，一面为镇压奴隶举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请颁发快枪五十二支，每支附子弹五百粒”，以资保卫蒙旗地方。又请“飭缉歼毙贝子夫妇之正凶根皮勒欢岱二人，务获究办。若使漏网，恐各旗防不胜防”。

鉴于此，巴林左翼旗派丁各地捉拿凶手，移时报称，“在西乌珠穆沁旗之贝子庙地方，将欢岱等人捉到，缚于驼背游原，盖因天气极寒，全冻死于驼上，后将尸身弃之”。据说不曾捉到为民除害的勇士，人们只是应付差事而已。

## 十九 “疯”喇嘛沙格德尔

问我的祖居吗？  
是富饶的大巴林。  
问我的家乡吗？  
是银色的查干沐沦。  
问我的尊父吗？  
是放牧的德钦拉希。  
问我的敬母吗？  
是闪光的月亮。  
问我的身份吗？  
是善福寺的游僧。  
问我出来干什么吗？  
背看扁背架追赶太阳。

这是当年沙格德尔唱过的歌，至今流传在巴林草原。

清朝光绪年间，在巴林旗查干沐沦河畔，住着一个穷牧人。他家桩下无马，圈中无畜，靠给诺谚放牧过活。他的名字叫德钦拉希，膝下两个儿子，长沙格德尔，次色音高力布。沙格德尔生来心灵手巧，聪颖伶俐，乡亲们都十分喜欢他。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笃信喇嘛教的德钦拉希想，我家世代受苦，到我这一代更是吃不饱穿不暖，不交好运，现在孩子们长大了，让他们念佛行好

别再受苦。于是他便把两个儿子都送到善福寺当喇嘛，好让佛爷保佑着，过一生舒服平安的日子。

这一年是清光绪元年(1876年)，沙格德尔年方七岁。从此，他便离开家乡到庙里学经、诵经、上佛供、点佛灯，伺候达喇嘛，恭敬翁斯达，整天忙个不休。庙门象一张利牙巨嘴，吞嗜了他的童年、青年，眼瞅着二十多年过去，转眼已经三十来岁了。

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强的沙格德尔在庙堂里不但熟读经卷，而且学会了蒙藏文字。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扩，分析鉴别能力的不断增强，在外出诵经与社会各界接触中，他开始对佛经上的那些呆板乏味的说教感到厌倦，对佛门等级森严的教制和掌权喇嘛对普通喇嘛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气愤。他便经常借机走出庙门，到艾勒的蒙古族群众中。他尤喜好听蒙古书、好来宝等，这些有活力的有浓重生活气息的民间艺术深深地感染了他。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由于他有特殊的颖悟力，很快地熟谙了民歌、谚语、民间传说和故事，并能即兴吟唱许多诗和歌谣。在不断地与贫苦牧民交往中，他了解到令人愤慨的许多人世间不平之事，如诺谚压诈属民和奴隶的狠毒，达官显贵们卑劣的阴私，居于佛门净地的上层喇嘛与贪婪无耻富豪勾结敲骨吸髓抢男霸女的阴谋伎俩，直至草菅人命的残忍手段，等等。这些和在贫苦和逆境中长大的沙格德尔嫉恶如仇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贫困与屈辱，尊严与卑微给了他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他开始从心底里憎恨贪官污吏们的狡猾与狠毒，憎恨一些掌权喇嘛们的贪婪与伪善，而对贫苦牧民和喇嘛弟兄的苦难与不幸则给予怜悯与同情。嫉恶如仇的性格使沙格德尔容不得这些。从青年开始他就与这个黑暗的时代开始了搏斗。

开始的时候，他用短诗与好来宝讽刺和鞭挞庙堂的黑暗。

满身是一股臭尿味，

屁股却坐在高堂上。  
连“高瓦”都念不通，  
头上却戴着高顶帽。  
连“扎普”都看不懂，  
硬要巴结当“扎胡”。  
好在召庙是用岩石砌成，  
才勉强保留到如今。  
如果是黄油炸面捏成，  
早被万恶的达喇嘛们吞尽！

巴林草原上有则谚语说，狼恨牧人，狗恨长棍。在那个时代，森严的佛门重地怎能容得下正义的呼声，凶残的掌权喇嘛们恃强凌弱，强辞夺理，说沙格德尔靠着能说会道两片嘴唇吐出的污言，沾污了神圣的佛祖；仗着自己的学问和嗓门，扰乱了庙堂诵经的秩序。并以这些罪名，把他拉到佛堂上，狠狠地毒打。

沙格德尔脊背上遭了毒打，可是心里却明白：穷喇嘛要告状吗？你无处申冤！但是黑暗的枷锁关不住他正义的呼声，他疾呼：

圣洁的佛殿啊，  
变成了人间地狱；  
一心要修身成佛的喇嘛呀，  
成了牛头马面的魔鬼。  
我沙格德尔揭穿了你们的肮脏，  
在仁慈的佛像前，  
可怜我，  
笃信佛祖的血肉之躯，  
染红了他们的棍棒。

那时候，穷喇嘛实际是庙奴，挨了打无处去伸冤。但是法棍下的沙格德尔却直立不屈。他一直不断地编唱揭露和讽刺那一

些掌权喇嘛们罪恶的民间诗歌和好来宝,并且走出庙门到社会上去。草原上的谚语说,是好马越骑越快,是硬骨头汉子越打越硬。他看到喇嘛庙与王爷府勾结欺压平民奴隶的事情,就唱好来宝讥讽他们:

当今的世道,  
我实在受不了。  
菩萨成了鬼怪,  
王爷成了龟孙。  
贫民见不到太阳,  
牲畜见不到青草……

又唱,

顶天立地的赛罕乌拉山,  
黑云为啥压你重重,  
修身行善的奴才喇嘛,  
刑罚为什么离不开你的身。

沙格德尔不断地编唱抨击社会讽刺当权者的诗句,当然也就不断地遭到毒打。可怜的沙格德尔被这些两条腿的黄狼黑狐们“咬”得遍体鳞伤,后来连伤痛带生气就病倒了。

沙格德尔一病几个月,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苦命人的骨头总是结实的。病魔将他折腾得筋黄皮瘦,却没有夺去他生命的灵光。在黑虎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盛夏季节,善福寺(格力毕尔召)举行盛大的“庙会”,不但本地贵族、诺颜和各庙喇嘛都来参加,附近盟旗上至盟长、旗扎萨克,下至平民百姓也都来了。僧俗两界男女老少汇成了人山人海。这天,沙格德尔拖着久病初愈的身子,一手提着瓶烧酒,一手拄着拐棍,爬上了寺庙后面的灵岩山。此时庙会开得正热闹,达喇嘛诵经,王爷训话,百姓



们跪了一山坡磕头。他厌恶极了，将满腹的忧愤对着山羊唱道：

咩咩叫唤的山羊娃子们啊，  
愿你们吃饱鲜嫩的青草，  
让喇嘛沙格德尔我，  
为你们唱几首歌。  
常言说山羊最怕生疥，  
喇嘛最恨达喇嘛。  
这些我不把它放在心上。  
你们看在我们巴林旗的故乡，  
这里有一座美丽的寺院。  
石刻的佛像个个威严，  
无数的弟子来来往往，  
时时季季庙会热闹非常。  
可如今它成了巴林旗的地狱，  
辉煌的殿宇暗然失光。  
镀金的佛爷毫无神灵，  
那里面充满了罪恶阴谋和苦刑！  
寺院的房屋啊倒了墙塌了顶，  
店里掌权喇嘛呀不知佛不懂经！

恰好此时，参加庙会的盟长、旗扎萨克、各庙达喇嘛和诺颜贵族们带领僧众百姓来祭灵岩。沙格德尔拄着棍子立在岩前，拦住他们的去路，大声呼喊：

“我要打官司啊，我要打官司！”

王公诺颜们听了很惊奇，道：“你这个穷喇嘛，要跟谁去打官司，告那一个……”

我要和苍天打官司，  
我对黄金与大地有恨；

我对“阿力雅布鲁”佛有冤，  
我对你们掌权的诺颜有仇！  
因为老天失去了情爱，  
大地失去了尊严，  
佛爷失去了神灵，  
官老爷们无法无天！  
当今活着的不敢睁眼，  
死了的灵气不敢弥散。  
总有一天，老爷们不如一只鸡，  
诺颜们不如一条狗！  
哈哈，哈哈，  
我要打官司，  
我要跟你们打官司！

沙格德尔说着唱着，气得两眼通红，浑身颤抖狂笑起来。

王公贵族诺颜们听了沙格德尔这番穿心刺骨的话，一个个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旗扎萨克达喇嘛见势不妙，害怕丢了脸，忙说：“这是个疯喇嘛。来人，把这个疯子从路上赶开！”

由此疯子沙格德尔闻名于旗内外。

庙会过了以后的一天早晨，沙格德尔将自己的破袍烂褂卷成一个包裹拴在扁背架背在身上，拄着两根柳木拐棍走出庙门。他对弟弟说：“他们说我不疯，其实我一点也不疯。常言说亥年间的杏结得大地托不动，我享受不起寺里的洪福，要走出庙门，远走高飞，空手抓黄羊尾巴去了。”

弟弟不愿哥哥到处流浪，惹事生非，当有权者的笑料，有钱人的鞭稍，便要劝他，但见沙格德尔狂笑着说：“弟弟，你当你的鬼喇嘛，我去当‘巴达尔沁’了。今后，上天入地都有路，放下帽子就是家了。”

从此，草原上的人们经常看见沙格德尔喇嘛身背破扁背架，手拄两根拐杖到处飘流浪迹草原。他脚上套一双底朝天帮贴地的破靴，身上穿一件花套花，风吹叶飘的破喇嘛袍子。他有时铺天盖地睡在野外，有时在艾勒的穷牧民家借宿，王府衙门的殿堂上也能见到他，远近盟旗没有他走不到的地方。不过，不管他走到哪里，只要是碰见那些害民的王公贵族大小官吏，就用辛辣的诗句讽刺他们，嘲笑和揭露他们的种种罪恶。于是沙格德尔变成了富人见了毛骨悚然，穷人见了心情舒畅的人物。人们喜爱他，把他的许多事情编成故事讲，口耳相传，一代传给一代。这些故事有“沙格德尔说实话”、“请章京诺颜吃饭”、“大闹旗司会”、“在盟长大堂上撒尿”等。

“沙格德尔说实话”，说的是有一天沙格德尔游游荡荡来到巴林左翼旗贝子家里。贝子诺颜酒后闲得无聊，想拿沙格德尔开心，说：“疯喇嘛，你走南闯北，你给我说一说有什么令人高兴的消息。”

沙格德尔撩起破袍子呼煽着说：“贝子诺颜，你让我说实话吗？那我就说了。人们说，贝子诺颜变成了活阎王，台吉和达喇嘛们变成了吸血鬼。”

贝子诺颜大怒，喝令将他关进监牢狱饿死。沙格德尔大笑着，唱道：

贝子诺颜变成了活阎王，  
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  
我只是把众人的话转达，  
并没有杀了你的爹和妈。  
说了几句实话我的嘴有罪，  
难道我的胃肠也犯了王法？  
只要我的脑袋长在肩上，

不让我说实话比上天还难。

贝子诺颜无奈，只得命人把他轰出去。沙格德尔走出门外，脑后却留下一串嘲讽贝子诺颜的笑声。

“请章京吃饭”就更有意思。说的是每年巴林旗的庙会，旗衙门都要向旗民百姓摊派银两，掌管衙门的管旗章京就要趁机捞一把，中饱私囊。人们恨他但是又不敢得罪他，还得请客送礼讨好他。时间长了谁不给他礼品，他就报复谁，加摊税赋。沙格德尔很是气愤，想方设法替乡亲们出口气。他对众人说：“没落朝廷里的脏官，马鞍铺子里的跑堂，只知道到处搜刮民财，不知道何时谁来收拾他们的尸骨。趁他还没有见闫王之前，我穷喇嘛沙格德尔也请他吃顿饭。”于是他找到章京诺颜，说：“阔气的章京诺颜，请你到我家里去吃饭。马群毛色繁杂最美丽，诺颜你要同样待人最体面。”当着众人的面，章京害怕沙格德尔再奚落他，揭露他的隐私，赶紧到沙格德尔家里去。

沙格德尔装出殷勤的样子，把屋子扫得暴土狼烟，呛得章京掉眼泪，漂亮的衣裳落满了尘土。不一会儿，沙格德尔端上了用柞树叶子熬的茶，和干硬得骨头一样的奶豆腐。

“沙格德尔喇嘛，我牙口不好，这干奶豆腐我实在咬不动啊！”章京苦着脸倒退着说。

沙格德尔笑道：“据人说章京诺颜的牙齿，能把银子咬得粉碎，何况干奶豆腐。诺颜大人，请不要客气。”说着唱道：

我想给你杀牛宰羊，  
可连一根羊毛都没有；  
我想挥着皮鞭去抢劫，  
可手中没有这种权柄；  
我想写张告示去摊派，  
可大印在章京大人手中。

常言道调味的时候葱花香，  
换口的时候苦菜甜，  
请喝下巴达尔沁喇嘛的这碗茶。

管旗章京怕挨骂，拧着鼻子喝下树叶熬成的苦水。以后，这个章京收敛了许多。

沙格德尔成为游僧流浪的年头，正是敖汉王爷当盟长。这是个贪得无厌残无人道的家伙。沙格德尔背着扁背架来到敖汉草原，决心“治一治”这位盟长大王爷。他来到敖汉王府，自我介绍说：“不认得我吗？我是漠南四十九旗有名的游僧，班禅佛爷封我为‘普渡众生’的名号，我出身在大名鼎鼎的格力比尔召。”

敖汉王爷想起来了，是那年在“灵岩”唱歌的疯喇嘛，连忙命人端酒上肉。沙格德尔看着满桌的酒肉说：“谢谢盟长大王爷的恩典，可是我不能吃。那肉不是人吃的，只有狼才食用；那酒不是人喝的，只好倒进狼洞。”说着便唱起：

苍天它没有了恩典，  
大地它失去了爱怜；  
神佛没有了慈悲，  
掌权的诺颜们无法无天。  
佛堂和衙门搅在一起，  
遮盖了人间的真理；  
王公和诺颜串通一气，  
摆下臭气的酒宴和肉席。  
这里不如茅房，  
这里却胜过地狱！

沙格德尔唱毕，就在屋里撒尿。

敖汉王爷急了，让仆人抓住他，用皮鞭打他。沙格德尔大声呼喊：

要杀要打随你们的便！  
你们听着：  
黑皮鞭只能伤害我的皮肉，  
不能阻拦我为民伸冤；  
砍刀只能折断我的筋骨，  
不能封住我说话的嘴巴。

1931年沙格德尔由于贫病交加，病逝于巴林左翼旗善福寺，卒年62岁，葬于寺庙附近。他人虽作古，可他那一身凛然正气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却感染和鼓舞着人们。特别是他吟出的洋溢着朴素哲理和斗争激情的诗句，使人难以忘怀，世世代代留传下来。人们纪念他，艺人将他的故事编成蒙古书说唱，文学工作者武力更格等人将他的事迹写成书编成剧来颂扬。牧民们说，草原上的牛毛数不清，沙格德尔的诗歌唱不完。

## 二十 巴林才女桃崇阿

桃崇阿 1886 年出生于巴林右翼旗历史上著名的将军王爷——第八世扎萨克郡王巴图的后裔那顺孟和毛根达家中。

因为桃崇阿出生在这样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中，所以巴林各界都习惯的称她为桃努努（努努是满语，为贵族小姐的尊称）。

桃崇阿从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是活跃在巴林右翼旗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上的一代著名的蒙古族女性。

桃崇阿幼年时就很聪颖好学。她刚满七岁就向父亲那顺孟和学蒙满两种文字，又向其伯父学藏文，后来又在巴林右翼旗扎萨克衙门“必车赤”学斋读汉文。她不断努力和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蒙汉藏满四种语言和文字，同时还拜民间艺人为师，学会了画各种蒙古族传统的图案，也学会了竹笔字毛笔字及各种美术字。

她喜爱素妆，乐于生活在百姓之中，喜欢同牧民交朋友。

桃崇阿在青年时期研读了《蒙古秘史》、《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故事的海洋》、《三国演义》、《成吉思汗箴言》等蒙汉古典文学名著和其它一些历史书籍，也熟读了《蒙药验方》和《蒙药四部医典》等重要的书籍。她对读过的古典诗歌和药典的歌诀背诵如流。

她把教书、作画、行医等传播文化知识和救死扶伤作为人生

中最大乐趣。这种选择对桃崇阿来说还是有原因的。她走向社会经历了清政府的日益没落及家庭和个人生活的种种坎坷,了解了清廷在蒙古地区实行“北不断亲”的笼络政策及推行喇嘛教毒害愚弄欺骗蒙古人民的种种手段,目睹了中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在巴林一带刘桂棠、汤玉麟部烧杀抢夺无恶不做的野蛮行径,及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辽阔的蒙古草原,广大蒙古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情景。这一切对桃崇阿的影响很深,她对这个黑暗的社会更加不满。桃崇阿思索着列强进入,国是日非,朝廷腐败,侵略者掠夺。人民居无宁日的情景,感到中国人民,特别是蒙古人民受欺负、受苦受难是因文化太落后,人民没有觉醒,所以愚昧无知的信仰喇嘛教,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天神的保佑和菩萨的仁慈上。想到这一切的桃崇阿便开始兴办教育启发巴林的民智。

桃崇阿本人出生在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中,长大后,由于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被迫嫁给了有权有势的官吏之家。她的丈夫是巴林右翼旗末代管旗章京全齐宪,使桃崇阿不仅是一个贵族努努而且还成了名符其实的官太太。但她的心中已经产生的兴文办校的强烈愿望使她抛弃了这一切荣华富贵的生活。桃崇阿与她的丈夫全齐宪商量后,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全齐宪,自己从家中摆脱出来创办巴林右翼旗立学校。旗立学校的前身是早在1910年创办的“普勳学校”,在早也是桃崇阿幼年时期曾读书的母校——“必东赤”学斋。该校由于1922年旗地遭到军阀和土匪的抢夺以及连年受灾等原因被迫停办。1926年春,桃崇阿摆脱家务之后到旗扎萨克衙门找到王府的必车赤(文书、秘书)先生沙格德尔札布为校长,自己为教师,命名为“巴林右翼旗旗立学校”。

学校的架子搭起之后,由于刚起步困难很多,如教材须自己



编,招生也要到各家各户去做细致的工作给牧民群众讲读书的好处,学校没有经费要发动富户捐款。通过桃崇阿和她的同事们的努力学校开办了。学校的课程以蒙汉文和算数为主,还教画画、唱歌,开展游戏和体育活动。贫苦家庭的孩子食宿、笔墨、纸张等学习费用由学校想法解决。特别是在桃崇阿老师的影响下全校的二百余名学生中已有七十多名女学生,这在当时文化落后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旧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桃崇阿老师任教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到了1936年,巴林右翼旗北部比较偏僻的山村巴彦锡那艾勒的暴乐梅林要办家学,桃崇阿被聘任教。

她来到暴乐家中,办起了梅林家学,招收三十余名山村的孩子。桃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不同爱好和不同成绩,编了甲乙丙丁四个不同的班级。她上课内容比较丰富,不单教蒙古语文和汉语文,还教美术字,如蒙古族传统的竹笔字、毛笔字等各种写法,教算数的时候还结合珠算和记帐等,还给学生上体育和演唱等课程。她的学生额尔德木回忆,桃老师曾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画一只喜鹊在叫,另一只正往树上飞落,如果细看这一幅画,那就是一首诗歌、一句箴言或者一幅对联,这说明桃崇阿有很高的艺术创作才能。她还让女学生从家里带来一些针线活如蒙古靴子的靴帮、靴腰和其它一些针线活计,教学生们制作和绣花。

桃崇阿老师的学生现在遍布整个内蒙古地区,其中有的相当闻名。这与桃老师的精心培养和针对不同爱好有目标地教育是分不开的。桃崇阿还善长绘画、刺绣和剪纸。她做画刺绣有超人的艺术才能,她几笔就能画出较复杂的图案,曾刺绣过上有五片绿叶,下有凤凰起舞的图案。她留下了许多蒙古族传统的刺绣图案及其它作品。在她的遗作中蒙古民族民间气息比较浓厚的刺绣图案占主要内容。现已找到的桃崇阿遗作百余件,这些图案

大部分是蒙古民族民间流传各种风格的图案和活灵活现的蒙古族古老的烟荷包及服饰上的传统动物图案,及蒙古靴子上各种部位的不同云纹蝶纹图案,工艺十分精巧的各种枕面刺绣、被面刺绣图案等。她的这些绘制绣纳的花草鸟兽、龙凤蝴蝶等色泽鲜明,栩栩如生。桃崇阿在二十年代曾刺绣过特大的佛像,有两丈高,别具一格,远近闻名。此像1965年“四清运动”前还悬挂在巴林右旗古日古勒台庙会经殿正中央。1930年班禅大师来巴林时,桃崇阿绣制的“查干舒乎尔图汗”“那木苏来”两个菩萨像,曾受到了班禅大师的称赞和寺庙僧人们的敬佩。

桃崇阿在绘画、剪纸、刺绣上大有名气,得到了巴林各界的高度赞扬。她描绘刺绣的花草、树木皆取材于家乡巴林草原的风景。巴林赛汗山、白音汉山、套白汗山、查干沐沦河的风景,是她艺术的源泉。她还绘制以这些山水风景为题材的大幅风景画。但可惜的是她的这些作品同她的七十余篇诗稿几十张剪纸艺术品,在1948年巴林的“牧改”运动中毁掉了。现幸存的百余件图案和几件刺绣作品,是从桃崇阿的亲属达木仁旺吉乐家中找到的。

她不仅在教书、绘画、刺绣等方面有卓越的成就,晚年还研究蒙医蒙药,特别是对蒙医“四部医典”比较精通。她晚年常到达尔罕山、巴彦锡那山、阿巴达仁台罕山、巴彦套白山等地采集草药并配成蒙药给牧民治病,有时还自带药品到附近的敖特尔(放牧场点)和邻近的村庄施医。她行医一搬都是免费,特别对贫穷家庭从不收分文药费。

1945年解放以后,政府根据桃崇阿的医学造就,聘请她到巴林右旗人民政府开办的全旗第一期蒙医蒙药培训班任教。1948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

## 二十一 解除蒙禁及放垦

清代，清朝统治者为了分散蒙古削弱蒙古，建立蒙古诸扎萨克旗，限其辖境，封其疆界，使之成为互不相属的小块领地。同时，实行严格封禁制度，在蒙古诸部旗内部，严禁越界放牧及互相往来，不准漠南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巴尔虎蒙古之间进行贸易，更不准通婚。至于蒙汉之间往来，清朝多次发布禁令，严格禁止。不准汉人落入蒙古旗籍，不准蒙人到汉族地区与汉人到蒙族地区，不准汉人到蒙地农耕采矿经商，不准蒙人与汉人通婚，不准蒙人仿照汉人建造房屋演听戏曲、学习汉字及曲艺，不准用汉字取名，甚至人的名字只准以蒙古字义命名，不准许取用汉文字义。如果说客观上这些禁令在清朝初叶和中叶，对于安抚蒙众保持蒙古地方的安定和边疆的稳固、维持其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就这些政策本身来讲，人为的限制蒙古族地区之间及蒙汉地区之间、蒙古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社会交往及经济文化交流，便是一个极其反动的政策。它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了各族民众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意愿。事实上是禁而难止，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最终形成不可遏止的趋势，致使这些禁令日益松弛，有些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清朝末叶，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列强侵略势力进入蒙古地区，那些曾是清朝统治者忠实代理人的蒙古王公，有的成为外国侵略者收买拉拢的对象。列强中沙皇俄国是威胁蒙古地区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日益加重，人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越来越激烈。空前的国内外危机，激烈的社会政治矛盾，巨额战争赔款带来财政枯竭，使得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恪守旧制，清朝封建专制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为了挽救这岌岌可危的局面，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新政的目标之一便是解除蒙古禁令，开垦蒙地，移民实边。清朝建国之初，实行以联姻与封爵拢络蒙古，动员蒙古骑兵参战统一全国，实行封禁稳固边疆的策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蒙古的武装力量已经不能抵御侵略者的洋枪洋炮，加之蒙古封建上层有的在日俄帝国主义蛊惑收买下产生明显的离心倾向，因而清朝开国以来的以满蒙联合为特征的统治，已经转到满族贵族与代表汉族地主利益满汉官僚的联合统治。蒙古利益无甚维持之必要，蒙古封禁制度亦无保留之余地，解除蒙禁，改变蒙古封建领主专制便成了必然之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廷先是开禁蒙地，筹办垦荒，接着大量移民，再其后全面开禁。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发布理藩院呈送的关于为筹办蒙务应酌情变通旧例的奏议：一曰变通禁止出边开垦各条，在已经放垦的盟旗，允许汉民租佃蒙地，允许蒙汉之间典当买卖田产住宅。尚未开垦的盟旗，由有关将军大臣，各省督抚督饬，商同蒙旗奏请开放；二曰变通禁止汉人聘娶蒙古妇女各条，不仅允许而且鼓励蒙汉之间通婚，规定凡是蒙汉之间通婚者，均由各地官员酌情给予彩礼，以示旌奖；三曰变通禁止蒙古行用汉文各条，废止前朝规

定的不准延聘汉人教师、书吏，不准用汉文书写呈文、公牒，不准用汉文命名等旧例，在蒙古地方，今则惟恐其智之不开，俗之不变，断无再禁其学习行用汉文汉字之理。这一法令的颁布实行，是清政府解除蒙禁的明显标志。

巴林垦务早在“变通旧例”发布之前就已开始。巴林自清初虽然划分为两个旗，但并没有明确界址，属两旗共游牧之地，即是右旗治下有左旗户口，左旗治下有右旗户口，对上对外两旗扎萨克都说了算。但右旗是郡王旗，左旗是贝子旗，一般上报呈文都由巴林右翼郡王扎萨克具名。清政府所以要在巴林开办垦务，一是认为巴林地理位置重要，东扼日本人西上之路，北控俄人南下之途，是军事要塞。二是为解决热河经费及练兵饷项。热河都统廷杰在奏折中称“筹办热河防务，拟添防营，以资调遣，一俟巴林各旗荒务开办，饷项有著，再行续募三四营”。三是垦务之后筹办建县制。理藩院左承姚锡光即主张收回蒙古王公扎萨克支配蒙旗土地的传统自主权力，推行县制。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热河都统廷杰上奏，云“仿移民实边政策，放垦两巴林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派肃亲王善耆和姚锡光专程来巴林筹划垦荒移民办法，批准了热河都统屯垦巴林的奏议。皇帝下了谕旨，钦命巴林王贝对此“剴切晓谕”，热河都统勒办经年督促垦务。在这种情况下，巴林郡王扎噶尔“遵旨报效”，贝子色丹那木吉勒旺宝在热河签署了具结文字，明确放垦地点。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热河都统廷杰为派员勘丈巴林蒙荒先将办理大概情形具陈奏折》中是这样表述的，“热河都统兼管园庭事务奴才廷杰跪奏，为派员勘丈巴林蒙荒，先将办理大概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巴林蒙荒业经奴才勒办经年，并请旨敕下理藩部，剴切晓谕。旋据该郡王扎噶尔以巴彦察干沟、英图坤兑、枕头沟、哈拉盖沟四处平川荒地遵旨报垦，由理藩部据情报

奏,并抄录原奏治行前来”。“适巴林贝子色丹那木吉勒旺宝年班差竣,回旗道经热河,奴才复与商办一切事宜,仍劝令将该四处中间山荒一律报效,以杜后日蒙汉杂处纠葛之患。该贝子亦经面允照办,并取具切结在案”。巴林首报四处川地连同山荒长约八九十里,宽约二三十里。廷杰奏请朝廷“拟先派谙熟垦务之员,督率员书夫役,前赴该旗,就原报荒地,逐段丈量”。廷杰奏章上奏不久,于此年三月末,即委派候补知县王顺存为“办理热河巴林旗荒垦务行局”的总办,率领分界委员及垦务局的员书夫役驰赴巴林,很快在指报荒地开绳勘丈。后经符合与原报数量有差,廷杰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又上奏朝廷,“伏查巴林蒙荒,据该郡王扎噶尔以巴彦查干沟、英图坤兑、枕头沟、哈拉盖沟四处遵旨报垦……奴才速派熟悉垦务员司,督带夫役,于三月间前往开办,旋据复报,到差后会同该旗委员,指界开绳丈量,核与原报南北长约八九十里,东西宽二三十里地段不符。复经磋商,始据该王、贝子指定哈拉苏台及色布敦庙、老正沟、英图火烧等处荒地,添入原报四段之内一并报效,约共可垦之地二千顷”。这是巴林第二次遵旨报垦。

当时,巴林垦务局租赁色布敦庙房舍居住,辟为临时局址。六月,候补同知李燏前来接替王顺存任垦务总办,为将来设立县治之地又一次与巴林王贝交涉,要求续放宽衍平正之处设立县治。巴林王贝在垦务局迭经开导下再一次遵旨报垦。这件事在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热河都统廷杰为巴林报效之地西与克什克腾旗毗连,因克什克腾旗聚众与巴林旗构衅拟派员以杜争端事奏折》中反映出来。“巴林郡王扎噶尔、贝子色丹那木吉勒旺宝前经报效枕头沟等处,约地二千顷,因与原报地段不符,为地无多,不足以立县设官,缉安蒙众。迭经开导,即据该郡王、贝子续行指拨地段,东至阿归他拉及查干沐沦河等处,约近三千

顷。合之前次报垦之地，南至巴林桥，北至乌珠穆沁旗，约长二百里；东至查干沐沦河，西抵刘营、克什克腾旗，宽约五六十里，除去高山大河沙包不计内，可垦之地共五千顷”。这应该说是巴林王贝第三次报垦。至此，初步奠定了林西县之四至范围，同时也解决了县治无址的问题。垦务局遂在色布敦庙西乌力雅苏台川作为县治之址。垦务告竣之时，中华民国二年巴林王贝又第四次报垦或者说最后一次报垦。缘由开垦丈量之初，巴林王贝曾于东川图坤兑沟脑留地一段为蒙民放牧场。后来“荒界业已告竣一律重立鄂博”之时，巴林派梅林哈丰阿、赵福海前往划清界限，新立鄂博。当时于此一段汉人蒙人为柴草互争，‘巴林遂将此处一并报垦。此事热河都统熊希龄曾为巴林王向朝廷具奏请奖。奏折称“抑更有请者，该巴林王旗于会勘荒界时，查出川图坤兑沟脑地，该王本已留作蒙民牧场，不在报效之内，会以该处蒙汉之争柴草，即将此段荒地，一并划归报效界内，移请照章开放，分拨挂领。该王旗本意不过为息争起见，而竟慨然移请添列号册，一律照章放垦，虽荒地为数不多，而该王旗之热心向内，大义昭然，已可概见。可否抑恳据情呈请大总统优给奖励，以励各旗内向之忱”。

从清光绪三十三年开办垦务到清宣统二年，四年间垦地共多少？热河都统诚勋委派呼延杰前往勘丈。宣统二年三月，勘丈结束，呼延杰上报勘丈情形，“共丈得巴林蒙荒，上则地五百七十顷零七十四亩四分，中则地一千三百三十三顷五十一亩五分，下则地二千二百八十三顷零八亩四分，下下则地一千一百二十八顷七十四亩一分；上上山荒三百五十三顷七十六亩四分，下上山荒一千七百零九顷五十三亩五分，沙荒二百三十三顷零六亩三分；上等城基十五顷三十六亩，下等城基十九顷二十亩；上等镇基八顷五十三亩，下等镇基二十六顷十八亩”。以上合计近 8000

顷。其后又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垦务局和巴林旗会勘报效荒界时,又在巴林与克旗交界处查出下等山荒62顷划归垦务局及巴林东川图坤兑牧场等地续报,加上原文数,共8252顷余。勘丈勘界完毕以后,巴林垦务局归并到林西县署,巴林垦务基本告竣,巴林西部广阔草场析出建县。此地美丽富饶,北部为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山体挺拔秀美,原始森林莽莽萋萋。中部和南部丘陵草原相间,草原宽阔,宜农宜牧。全境河道纵横,南有西拉沐沦河,东有查干沐沦河,嘎拉达斯汰河从境内穿过。境内文物古迹很多,锅撑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大井青铜时代冶矿遗址驰名中外,还有清代修建的甘珠尔庙、乌牛台庙、色布敦庙等著名庙宇,以及许多古墓等。

巴林西部放垦,迫使那里的牧户被迫挤向旗的中部,致使牧场狭小,巴林左右二旗经常发生牧场争端,两旗遂有划定边界各于界内放牧的要求。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民国政府蒙藏院及热河都统派划界委员来巴林。划界委员王铁珊目睹巴林左翼旗的广阔而丰美的草场,认为大有可垦之处,遂上报热河都统。热河署令巴林左翼旗扎萨克报垦。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王怀庆咨请民国政府内务部开办巴林左翼旗垦务。同年在林西县成立“林西巴林左旗垦务局”,林西县知事钟熙中兼任巴林左翼旗垦务总办。此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巴林左翼旗扎萨克色丹那木吉勒旺宝向中华民国内务部及热河都统王怀庆、都统帮办米振标控告钟熙中“垦放荒地,并不按章会旗商办,一意孤行”,“里幕重重,有目共睹”。内务部则责成王怀庆先后派员密查和调解。之后钟熙中在林西离任,于林西设的垦局迁往巴林左翼旗。

据巴林左旗地方志编纂者王靖撰文记述,从1924年到1932年垦荒大体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称为初垦阶段。这一阶段大体上从1924年至1926年。1924年5月间,垦务局总办王铁珊会办色丹那木吉勒旺宝首由满札尔山西北巴林旗界起,北至瓜加拉嘎川、东至阿鲁科尔沁旗界的巴林左翼旗广阔草原开垦,周长215里,总面积1.04万顷。1924年末闾朝玺任热河都统时,改林西巴林左翼旗垦务局为热河省垦务总局林东垦务分局,局址设在贝子庙。自此贝子庙为林东垦务分局。

第一次续垦阶段(1926年至1927年),这一阶段也称第二次放垦。1926年下半年垦地从第一次放垦北边瓜加拉嘎川前、乌尔吉沐沦河迤东,北至刚提加拉嘎,东至阿鲁科尔沁旗界。中部沿乌尔吉沐沦河沙那川、阿尔德嘎川、杨家营子、炮手营子、哈拉海图、博拉罕图、乌登河两岸,南起罕吐柏北至王亲加拉嘎沟门,东西宽约22里,南北36里,总面积8586顷。

第二次续垦阶段(1928年至1929年),此次也称“新垦”阶段。此次放垦旗北部王干池、罕吐柏、乌孙吐鲁,南部芒汗吐、刀老毛道、索不嘎营子、哈达图、塔西沟等,还有好来吐川、美来吐川、东格德哈达至乌兰坝等地。

展垦阶段(1929年至1931年),这次展垦主要区域在今碧流台的四方城、漫撒子沟,浩尔吐的干支嘎,奈林坝至边墙梁一带。1930年以后重点办理规划林东城址事宜。1932年9月林东由设治局升为林东县。

巴林左翼旗放垦共4.8万顷,加上从满札尔山与札拉奈改山南部放垦的2349顷,共50349顷,加上巴林西部放垦的8252顷,共垦荒58601顷。

清政府强行放垦蒙旗土地,迅速激化了蒙汉民族矛盾和蒙古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放垦对于蒙族王公来说,毕竟有利可图,可以收取五成荒价银,但对于蒙古民众,根本没有什么实惠可

言。放垦地界内的牧户迁离故土，失去牧场。他们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与斗争，从垦务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

原来居住在巴林右翼旗西部报效放垦地段内的“所居人众千余户”，被迫“流离失业，迁徙本旗东境以谋生活”（中华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巴林王向民国政府蒙藏院的呈文）。这些牧民们世代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的草原是他们的生计之本，那里的土地是他们的衣食之源。放垦使他们背井离乡，流离迁徙，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巴林西北境翁古察、甘珠尔庙一带，还杂住着克什克腾的牧民。当垦务勘丈到那里时，当地牧民一百余人以边界不清为由要求免丈；“拦阻行绳”，“行绳员役，间受石棒微伤”。统治者当然不允许民众反抗，缉捕聚众肇事之人。牧民据理力争。热河都统廷杰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奏折上道出，垦地牧民“久经居，坟墓庐舍所在，不愿迁移等情”。

清政府在巴林垦荒勘丈过程中，随时都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清光绪三十四年巴林垦务总办张文灏上报文书披露“地方荒僻，素为马贼出没之区”，“蒙荒草味，流贼飘忽，迅急如风”。可见这位总办惶恐之极。他要求热河都统“向垦局中派员丈地，每绳须勇四名，以资保护”，“再添马队一哨，得与原有马队，分别随绳丈地，以及择要添扎，保护领户”。尽管如此，垦务还是不断受到抗击。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十余民众截击垦务局上递公文之人，送文马勇未及施枪，被民众击败而逃。

巴林垦荒以后，地区民族矛盾加剧。一些垦务局的垦荒大员们不顾蒙汉民众疾苦一味中饱私囊，荒价错乱，领垦不明，各种手续百弊丛生。中华民国十四年林西县知事张奉先在向热河都统呈文中云：“案查林西旧垦开办二十余年，总办历经十余任，所有一切事宜迄未结束……所余手续仍属乱如焚丝”。垦务总局利用权势，逼勒蒙民，连一向顺从清室，迭报垦地的巴林右翼旗扎

萨克扎噶尔都向热河都统呈文，揭发垦局“于本年秋，本旗台吉箭丁由未放地内割取青草，经总局向每芟刀一把索取租钱数千文，以致本旗台吉箭丁心中诸多不服怨声载道”，“此事经查，张总办竟取于未放荒地内，择其草盛之区，先不禀明，擅自出示，凡有割取青草发给小票，抽取草费，与民争利，殊属有伤政体”。虽民国政府以“贪小图私”罪对张总办给以制裁，但只是作给蒙民看的，事实尤甚。垦务之初尚能照章办事，待到后来索賂收賄逼垦之事时有发生，如今巴林还流传着“韭菜花换草场”的故事。据说在查干沐沦河的西岸有一片优美的草场，当地人称之为“韭菜花”草场。草场的四周垦地划归林西县，唯此一片住着牧户，归巴林右旗所有。这片草场为什么没有放垦出去呢？传说垦荒之时，这片草场是巴林北部牧民的最好的打草场。牧民们不愿意将草场划出垦荒，遂将此事反映到巴林右翼旗王府。管旗章京乌勒慧充阿出面交涉，垦务总办傲慢无礼地说：“蒙古人放牧用不了多大草场，看在你们王爷的面上给你们留下巴掌那么大的草场就够。不过你们得带黑的（鸦片）来。”五天过后，果然乌勒慧充阿带十个密封的黑罐子，作为礼品给每个垦务官员送上一罐。垦务官两手捧着糊着羔皮蒙着红布的罐子，觉得沉甸甸非是烟土既是银洋，便道：“好了，你们丈量草场吧！”等乌勒慧充阿划定草场，签字划押走后，垦务官员们打开罐子，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原来罐子里哪有什么烟土银洋，都是霉臭的韭菜花。巴林西部垦务据今八九十年，现今一些老年人还能回忆起当时一些情况。据巴林右旗沙巴尔台苏木恩和巴图回忆，巴林西部放垦时，居住在古鲁板图力嘎的有一户牧民留恋家乡没来得及迁出，垦务局便命令随绳步勇将牧人和三个儿子抓去，宣布他们是偷盗牲畜的窃贼。老牧人的老伴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儿子逃到巴彦尔灯，后又到沙巴尔台住了一段时间，生活无着落，遂迁往锡林浩特。垦地划定

之后,居住在垦地边上的牧民亦有不得安宁之情形,经常受到垦地驻军的骚扰,其中一件事发生在查干英格艾勒。有次那里发现一具死尸,垦地驻军将当地牧户沙格德尔扎布、乌日图那斯图、吉木彦等抓去,以人命案相威胁,抢走了他们的牲畜,还把他們赶到和布特哈达的沙窝子里去。垦务之初,垦务局设在苏布敦庙,一些垦务官员差役随意进出佛殿,扰乱喇嘛经会,用棍棒敲打诵经喇嘛的脑袋,抢劫寺庙内的金银器物,致使喇嘛遁逃它庙,苏布敦庙遂佛灯熄灭,钟声断绝,后来搬迁到查干沐沦河东岸。

清末,清政府对蒙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由满族贵族对蒙古民众的压迫和控制,转而由汉族官僚地主阶级对蒙古民众的歧视、压迫和掠夺。这种压迫和掠夺变过去比较隐蔽的形式为公开而明显。就巴林西部和东部的垦务来讲,清政府大肆掠夺蒙民土地,垦务官员和王公贵族坐享其成中饱私囊,而广大的蒙古民众则失去草原和土地,被迫离开祖祖辈辈放牧的牧场庐舍不得生计,贫苦牧民没有了生活出路。在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二十二 癸丑战乱焚王府

癸丑战乱,是在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之时,漠北蒙古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哲布尊丹巴在帝俄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并发兵进攻内蒙古的事件。

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帝俄就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活动。1893年2月活动在蒙藏地区的沙俄间谍巴德玛耶夫曾奏请俄国沙皇,用阴谋的手段将“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和平地并入俄国”。沙俄政府采纳了这一侵略计划,拨出大量的经费,派出大批间谍潜入漠北蒙古,进行收买蒙古僧侣上层和蒙古盟旗王公的活动。辛亥革命之时,沙俄曾派驻库伦总领事,策动漠北大活佛独立,指示凡不服从者,“则由俄人强制执行之”。此后为促成漠北蒙古独立,不断向蒙古调运武器弹药,俄国政府还馈赠给哲布尊丹巴活佛二百万卢布,以应独立之需。1911年11月,俄军800人侵入库伦。11月30日,漠北蒙古四部宣布成立“大蒙古独立帝国”。12月初张贴《独立文告》。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称“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国号“共戴”。沙俄为进一步将蒙古变为其殖民地,迫不急待地与所谓“大蒙古独立帝国”签订《俄蒙协约》及其附约《俄蒙商务专约》。“条约”规定:不许中国在外蒙古驻军,俄国可以派遣人员在外蒙古组织和编练军队;在外蒙古一切国家的权利不得超过俄国;俄国人在外蒙古任意居住、往来,占据、租借和

购买土地,无偿使用驿站及牧场;俄国政府在外蒙古可任意划贸易圈,开办水陆交通,设置领事馆,享受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这实质是将外蒙古变成沙俄的殖民地和保护国,粗暴地践踏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与此同时,哲布尊丹巴向漠南内蒙古各盟旗发出《文告》,要蒙古地方一体归顺。又发出《劝告书》,派出游勇潜入内蒙古煽动叛乱。

面对外蒙古在帝俄唆使下的重大叛乱事件,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外蒙古独立帝国,指出“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不要肢解中国版图”。1912年1月28日他还发出公开电,谓“俄人野心勃勃,寻机待发,不可依赖”,“蒙古同胞,同戮一心,群策群力,赖以图存”。民国袁世凯政府发布《蒙古待遇条例》《加进实赞共和之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凡是反对外蒙独立,抵制库伦诱降,效忠民国翊赞共和者,视为有功大局,给予在原爵加进一位的待遇。随之派兵攻打内蒙古叛乱集团和抵御外蒙古的进攻。

外蒙古独立在内蒙古一度反响强烈,呼伦贝尔一些盟旗王公响应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团,成立了所谓“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在沙俄军队的支持下控制了呼伦贝尔地区。哲里木盟乌泰发动“东蒙古独立”,到处张贴叛乱告示,云“库伦大皇帝派员归来劝告独立,又得邻国许允接济军火,竭力协助,是以宣布独立与中国断绝交通”,旋即发兵攻打民国政府军队。

哲布尊丹巴呼图格图宣布外蒙古独立之后,自封为日光皇帝并组建蒙古圣军(因外蒙古军黄色着装,巴林人称之为黄军),向内蒙古各旗派遣使者,要内蒙古归顺日光皇帝,并发出“圣告”胁迫蒙古青年参加“圣军”。当时部分蒙古上层响应,如巴林左翼旗的勤本喇嘛等赴外蒙古联络有关归顺“大蒙古帝国”的事宜。勤本喇嘛去外蒙古后被任为巴林左右二旗、阿鲁科尔沁旗的军

事长官浩荣达，并潜回巴林及阿鲁科尔沁召集兵马北去归顺。他的队伍(人数不多)后来随同外蒙古军队攻打内蒙古地区。但巴林右翼旗的扎噶尔道尔吉王爷认为哲布尊丹巴是喇嘛，是个地地道道的出家之人，喇嘛掌权坏国事，女人当家坏家事，这是蒙古人的祖训，遂采取了积极措施稳住了巴林右翼旗的民众。只有与当时刑事案件有牵连的暴乐等为数不多的人投奔蒙古“圣军”。暴乐等到外蒙古后被当作民国政府的刺探在尤古吉尔庙险遭杀戮。这个消息传到巴林旗内，从此“圣告”与“圣军”在巴林左右二旗失去了吸引力，没有多少人去参加。

沙俄和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团煽动内蒙古“独立”和“归顺”破产后，便穷凶极恶地向内蒙古发动武装进攻。1913年外蒙古军队分五路进攻内蒙古各地。乌兰巴托出版的《蒙古自治时期史》一书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共戴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913年1月)活佛政府作出决议，向处于危急状态的内蒙古派遣五路兵马。这些部队是：第一路——尤古吉尔庙，协理齐木德斯凌的部队；第二路——达里岗爱，海山公、巴布扎布长官的部队；第三路——西苏尼特，那逊拉布济赫公的部队；第四路——呼和浩特，勃林洪水道尔济的部队；第五路——乌拉特三旗，黄河、竹特格乐图长官的部队。”进攻巴林、克什克腾的这一支部队是第二路巴布扎布的部队。民国政府在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后，就对其发兵攻打内蒙有防范。1912年部署兵力调师北上防堵，热河副都统米振标被任命为前敌总司令、林西镇守使，带二十营的兵力驻林西、经棚、刘家营子等地布防。1913年外蒙古军五路并驱，气势汹汹。民国政府军队首战失利。巴布扎布率领的第二路蒙古军攻占经棚，危及巴林西部林西县。叛军奈丹扎布的队伍南进，东由乌牛台西由沙巴尔台入境，占领了林西县西北部和巴林右旗大部，对林西呈三面包围之势。林西“一旅孤悬”，“以数千之众

御五路之冲，有垒卵之危”。米振标电告热河，热河都统回电“政府以林西动关全局，电令固守，不准南退一步。特命姜上将军临边督师，并调奉军来援。无如远隔关山，急难获济”（《林西县志》）。时值米振标督师在外，林西由前敌司令部参谋长姚致远留守，指挥四边要塞，阻击外蒙古军队，当时战斗激烈，毅军子弹耗尽，援军未到，情况危急。姚乃指挥毅军集中兵力突破西路，在刘家营子至热水汤一带展开激战。毅军中路步兵第四营营长王怀有、先锋马队二十八营营长刘殿起战死。恰在这时，来援奉军赶到，毅军奉军合兵打败了外蒙古军队，经棚、大王庙和珠腊沁、沙巴尔台、五十家子等“边防要塞一律收复”。毅军受到“黄军”的打击和袭扰，憋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便朝巴林泄愤。据巴林人恩和巴图撰文记述，癸丑年八月末，王府的放马人快马加鞭来到王府报告：“有数不清的‘黑军’（毅军着黑色服装，所以巴林人称黑军）往这边来了。”王府这边得知后，卫队随着前来探听消息的巴林左翼旗勤本喇嘛所带的十几名兵丁一起迎着“黑军”出发了。他们赶到离王爷府十多里的胡都格绍荣山顶时，后大川黑呀呀一片全是“黑军”。巴林几十名兵丁怎么能抵抗得了这么多“黑军”。但他们占领山头向“黑军”开火。“黑军”分兵三路，一路占领北山，一路占领南山，中路直往巴林兵猛扑过来。巴林兵看到这个阵势，只好放弃山头回到王府，保护着老少往东败退。这时“黑军”已到了王府西山、北山。有一个叫昭日格图的巴林兵丁利用山沟的复杂地形隐蔽，待“黑军”到来时猛烈射击，打死打伤了十多个“黑军”。他把子弹打光后，拔出佩刀自杀身亡。

往东败退的巴林王府人马行至阿巴达林台山麓时，看到沙巴尔台王府已被“黑军”占领，并被焚烧，冒着滚滚的黑烟。他们看到此情此景失声痛哭：“完了，完了，全完了！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金银财宝，经卷史书全完了！”这时有人提醒王爷的大印遗留



在府内。有一个叫傅宗宝的王府小吏自告奋勇，单人匹马往王府奔驰去寻印。傅宗宝来到王府附近时，王府上院已成为火海。他冒着炎热的火焰穿了一身大皮袄装疯卖傻唱着歌跑进王府院内，见着“黑军”就竖起大拇指哈哈大笑，直往里跑去。来到了王府的莲花池前磕磕绊绊张进池内打个滚，窜出池子就往火里钻，找到王爷大印，揣在怀里跑出来，扔在井里去。

此次毅军分兵三路攻进巴林。一路经沙巴尔台，进攻巴林南部；一路进攻巴林北部，把珠腊沁庙、乌牛台庙烧光；另一路途经南沙布尔台，焚烧王府之前，烧了岗根庙，并把乌勒慧充阿、布和夫、花吉如木等富裕户的房屋全部烧尽。他们路经一户叫呼图和、斯其格夫妻俩的家时，把他俩绑在蒙古包内活活烧死，还枪杀了牧民乌恩图，把其小儿子掳走。他们还打死一名抱着摇车子的牧民特木尔阿其嘎，并将摇车内的小孩子也打死。特木尔的母亲仁钦玛见儿子和孙子被打死，当场吓疯了。

毅军从沙巴尔台往东追击王府人员的一路从和尔逊山北麓到阿巴达林台山时，被巴林王府的兵击退（其实当时天已黑无法交战）。另一路从和尔逊山南麓到乌兰海村时，被巴林左旗的兵打回。“黑军”把逃跑的牧户抢掠一空，并把草场上的牛羊成群赶走，还赶着大铁车把牧民的粮食、奶食品全部拉走。

逃跑的牧民们回来后，看到家乡已被“黑军”抢劫一空，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也被抢光。那年秋季牧民马希毕力格等二十多人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跑到外蒙古参加“黄军”去了。从被抢劫以后，巴林王府便想派一名使节到林西找米振标司令评理，但是很多人都怕毅军，谁也不敢前往林西，一直到半个多月后也没有一个人敢去。这时第五苏木札兰乌勒慧充阿说：“‘黑军’真要想血洗巴林二旗，我们巴林人的性命都不会太长了，所以我去林西与米振标谈判，如果要死，只不过我一人先死几天罢了。

如果同意，旗王府给我找一名好翻译就行了！”这样乌勒慧充阿与赵特格喜翻译去了林西县。在县城住了两天，才获准见米振标司令。他们进县府时，毅军手端刺刀站了两行，翻译赵特格喜吓得在乌勒慧充阿扎兰身后寸步不离跟了进去。到了司令部门口，更是戒备森严，乌勒慧充阿、赵特格喜二人被阻在门外。乌勒慧充阿大声道：“米司令同意见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许进？”赵特格喜吓得没敢把此话翻译，但乌勒慧充阿怒把交叉的刺刀推开闯进了司令府内。

见到米司令后，他陈述自己的来意：“贵军认为巴林已反叛的看法纯属误解，你们说巴林有的人跑到外蒙古参加‘黄军’，这实际是极少数没有生活着落的人，而我巴林的大小官吏、富裕户一个人也没有走，连十户长及有十头牲畜的牧民也没有去外蒙投靠‘黄军’。如果我说的有一点谎言，请贵军派人调查核实；如我说的不对，请你们首先砍我的头。如果继续威逼巴林，逼急必反，那时后果是怎么样，请米司令考虑！”乌勒慧充阿这次作为巴林使节，什么礼物也没带，空手而去，据理雄辩，使米振标的行为有了一定的收敛。

191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暗助亡清宗社党头目肃亲王善耆组织“亲王军”阴谋复辟，派日本特务在哈拉河畔寻找巴布扎布加入宗社党。刚刚替沙俄卖命而遭到惨败的巴布扎布又一头扎进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被任命为内蒙古宗社党的领袖。接着巴布扎布网罗匪徒率部南下，企图一举攻下长春奉天，然后攻打北京，结果惨遭失败。在败退途中路经巴林时，听到驻林西毅军纪律松懈，不得人心，城内守备空虚，决定攻打林西。他命乃登公为先锋攻打林西县城。

是时，林西城内守备空虚，毅军大部分已由常得胜带出增援开鲁未归。林西只有四个营的兵力，重武器唯有一门大炮。米振

标电告热河都统姜桂题，请求增援。姜复电：“守土有责，固守林西，城若失陷，军法从事！”米振标为固守林西计，于10月6日派骑兵两路，向东至巴林右旗界内的查干沐沦河岸侦察情况，继派步四营管带石成金、步一营马帮带率两营人马于查干沐沦河阻击。于是在那里发生了一场战斗，毅军两营全部覆灭。对这场战斗《巴林右旗志·军事篇》是这样记载的：“10月7日晨，石、马二营到达查干沐沦，拟凭借河岸构筑临时工事防御巴布扎布骑兵冲击。石成金率本营到查干沐沦河东岸亚马吐山巡逻，突然被巴布扎布骑兵包围，石部猝不及防，稍战即溃，四散奔逃。巴布扎布指挥骑兵奔驰作战。石营士兵被马踩死及被套马杆子勒死者甚多，全营覆没，石成金阵亡。步一营马帮带正在查干沐沦河西岸吃早饭，亦被巴军冲垮，所部七零八落。马帮带战败畏罪，逃之夭夭。”石营的左哨哨官先于马步一营之溃兵回到林西县城，将两营被歼的消息报告米振标。米为固守林西，立将南门外演武厅驻防的步兵于营和驻色布敦庙的贾营调到林西城里，连同米之护卫亲兵共四个营防守林西。常德胜增援开鲁时，将大炮带走，城内仅有一门放在城西小山顶上。米命西门外刘营护炮并扼守西山。这一场战斗打得很苦，据林西县老年人和当年参加战斗的毅军忆述，10月8日晨，巴布扎布的骑兵分数路来到林西城外，在距城不远的东山岗安下炮兵阵地，向城内发炮。由于这日早晨巴军劫掠冬不冷地方的运酒商人，巴之炮目及日本教官喝多了酒影响瞄炮，误认为米振标的司令部在三道街，遂盲目发炮没有击中。巴之骑兵多次冲城，均被守城毅军击退。巴占据了毅军东营盘，火烧草垛及营房以壮声势。当时米振标的司令部临时设在北门里。他骑马往来指挥。据当年目击者回忆，城内外弹雨横飞，人心惶恐。米振标当即派人督查，严禁出城，以安人心。由于守城毅军兵力过少，巴布扎布的攻击越来越凶猛，林西城岌岌可

危。时米振标悬赏，有能用西山大炮击敌者，给以记功升官。有一名许克武的退役兵上了西山炮台，开了第一炮。此炮在巴布扎布骑兵中爆炸，巴部当即溃乱。第二炮将巴布扎布部一门大炮炸毁。第三炮落在巴布扎布军中央，当即将巴布扎布炸死。关于巴布扎布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据参加“圣军”回来的巴林右翼旗人敖日布嘎特乐、其木德说，巴布扎布不是被大炮炸死的，而是巴林右翼旗沙巴尔台村的巴图孟和放黑枪杀害。原因是癸丑年恢复旗军时，额尔敦孟和、巴图孟和兄弟二人由于枪法好被强迫招为旗兵，额尔敦孟和到旗衙门诉说家有老少无人照顾，要求哥儿俩保留一个照顾家里。但旗衙门不准，他们就串通几个要好的朋友连夜逃跑，到锡林郭勒参加了外蒙古的“圣军”。经过几次战斗，他俩确是枪法出众，于是被巴布扎布看中，把二人作为自己的护卫。在巴部他俩立了几次战功，得到了嘉奖。别人对他俩恭维和羡慕，他们就产生了骄傲情绪。丙辰年（1916年）春，巴布扎布军队在突泉一战中，额尔敦孟和违反军纪，使巴布扎布军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伤亡十分惨重。巴布扎布一气之下，下令当即枪毙了额尔敦孟和。巴布扎布溃退途中攻打林西城，在战斗中巴图孟和为了报杀兄之仇，放黑枪打死了巴布扎布，跑到林西向毅军司令米振标投降。

巴军见主帅身亡，斗志即无，其它头目也无心指挥作战，便用橛木把巴布扎布的尸体火化，将骨灰装入一个白布袋中埋掉，堆土以为标志，遂组织撤退。

米振标见巴布扎布火力减弱，阵地明显动摇，遂派城内姜杨两营骑兵由北门冲出反击。巴布扎布军队落荒而逃，只有巴部一统领率二百余人进行顽抗，战之日没，被困于冬不冷村中，弹尽力竭投降毅军，三名日本教官亦被抓获。此夜大雾弥漫对面不见人，毅军虽然追剿，所获甚微。对于外蒙古军的窜犯，内蒙古王公

喇嘛上层,大部分都有明确的立场与态度,对叛军的残暴行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民国政府给予了嘉奖。巴林左翼旗四等台吉色钦扎布噶拉桑,在动乱中“捍卫地方,保护蒙众”有功大局,其本人及40余人均得到奖赏。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扎噶尔强烈谴责帝俄侵略蒙古的罪行,反对《俄蒙协约》,对外蒙古叛乱集团“远征军”的抢掠行径,积极上报给予揭露,亦以功晋为昭乌达盟盟长。巴林左翼旗扎萨克被委任为盟务帮办。扎噶尔还晋为亲王爵位,得到中华民国大总统授予的一等大绶嘉禾章和勋章。热河都统赠送给扎噶尔两块金字匾额,分别写着“东蒙锁钥”“倚若长城”。

由于战乱,巴林右旗特别是沙巴尔台附近的蒙古族牧民们深受其害,四处逃跑,人心不稳。民国政府为了稳定人心,让扎噶尔王爷返回巴林。同时,对蒙古各盟旗原封不动地保持清朝时期的设置,保留王、公、协理、章京等官职。巴林深受战乱之苦,民国政府拨给了救济金、救济物资,减免了税赋,以缓解人民群众的困难处境。但牧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都让旗衙门官吏和贵族们吞掉了。

扎噶尔从北京回来后,派人到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地,动员逃跑者回家乡。毅军也停止了搜捕参加“圣军”的人。彼时,扎噶尔王爷对参加“圣军”回来的人员,实行不追究政策,并通报全旗今后谁也不准对他们欺压威逼、敲诈财物和歧视。准许参加“圣军”归来的外旗人定居巴林。这样郝其德旗的阿尔喜、科尔沁的唐古德、嘎海、阿木尔萨那十余户人家先后来沙巴尔台定居。后来林西毅军把嘎海抓去杀害了,从此后这些外旗人又陆续返回故乡。

扎噶尔王爷还表彰了在危难之际作出贡献的有功人员。其中将报告毅军侵犯王府消息的马信定为荣誉牧马人给双份赏

赐，将单枪匹马抵抗毅军那位勇士的牺牲地定名为昭日格图花，将闯火海抢救王爷大印的傅宗宝提升为管印梅林，将为巴林民众不顾个人安危与毅军米振标论理的使者乌勒慧充阿，从苏木扎兰提升为管旗章京，并将随同去林西当翻译的赵特格喜晋为梅林。此外还对其他大小官兵和仆人论功行赏。

癸丑年战乱中巴林王府被烧，上院全部焚毁，下院也遭到严重破坏。扎噶尔从北京回来后，想修复上院不同意迁到大板。但依照热河都统的命令和本旗多数人的建议，还是搬到大板盖了一处四合院居住，这就是如今的大板巴林郡王府。

## 二十三 日寇蹂躏巴林地

日本帝国主义对广袤肥沃的蒙古草原垂涎已久。他们在我国辛亥革命时期曾发动过“满蒙独立”。失败以后，便改变策略，由直接插手搞“独立”“分裂”变为隐蔽地逐步地向内蒙古地区扩张势力，特别是经济渗透。191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向日本天皇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上奏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同时对侵略“满蒙”的方式步骤都作了详尽的说明。按照这一侵略策略，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有步骤地对内蒙古实施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侵略，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当中，努力扩展它的侵略势力。对于地处战略要地的巴林草原，它们当然不会放弃。日本帝国主义首先以沟通与蒙古王公的关系为名，培植亲信，网罗亲日分子。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多罗郡王扎噶尔居住北京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即对其拉拢引诱，向他放债贷款，供其驻京糜费。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方曾派身穿喇嘛服装的日本特务来巴林扎王处。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两人一个叫冲、一个叫横川，是日本北京驻屯军派出以爆炸当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嫩江大桥，瘫痪俄军运输线为目标的“别动队员”。他们经古北口，过热河经茅荆坝，来到喀喇沁王府贡王处。贡王派亲信辛占柱将他们送到巴林右翼旗。扎王备极款待，派手下人敬文泰（又名赵化民）继续送到哈尔滨。虽

然日方此次行动没有成功,但日本帝国主义同蒙古王公的勾结却更进了一步。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更加积极进行侵略活动。彼时经常不断有日本人来到巴林境内,有的逗留,有的过境。这些日本人名义上游览考古或采访蒙古风土人情,实际上干着绘制地图、拍照地形、搜集军事情报等特务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扩大经济侵略,掠夺巴林资源。1909年,日本人片谷传藏来到巴林,与巴林右旗扎萨克衙门订立所谓合办“东蒙古招殖盛德公司”契约。这是一个具有殖民掠夺性质的,以日本资金来购买中国土地,掠夺中国产业资源的约定,其经营种类规定为“开垦荒地、酿造烧酒、开采矿苗、经营牧畜、收买畜产、批发杂货、发行钱帖”等项,实际上从原料到商品,扼断了巴林的经济命脉。契约还规定公司开办资金10万元,片谷传藏出5万元,其余的由旗方以提供土地、矿山(包括金矿、大理石矿、叶腊石矿、煤矿等)垫支。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扎噶尔游历日本租借地旅顺大连等地的机会,进一步实施拉拢引诱之手段。扎王此次游历被中华民国政府革除昭乌达盟长职务,罚俸一年。但之后不久,在日方参与下恢复了职务,任昭乌达盟保安长官,日本人也就随即成批地来到巴林草原。他们在巴林的西部开设了一处“东升泉烧锅”,在西南部开办种羊场。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日本人簿益三来到巴林右翼旗大板开办“蒙古产业公司”,经营收购当地牲畜、皮毛、土特产品,销售日本布匹、杂货、烟酒、米面等。产业公司以做买卖的名义,干着拉拢收买封建上层的勾当。日方还向旗王府衙门掌权官员贷款两三千至三五百元不等,共五万余元。簿益三不怕偿还不了,他说“我们不怕赔账,三十年以后见分晓”(《巴林右旗志·人物篇》)。此后这些



借贷者不断上钩，借个不休。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扎王在北京向日方借贷三万元，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向大连满铁借款五万元，以供其奢侈挥霍。借这么多钱用什么来还呢？据其签订的偿还借贷合同记载，以旗之公有牧场，从黑山头到太本敖包，沿嘎拉达斯汰河西岸，东西长四十多里，南北宽十多里的土地，永租给日本人使用。这个簿益三名义上是经商办公司，实际上进行的是特务活动。他从蒙古族中物色引诱了一些人带回日本国内，令其学习日语，还送到日本侵略者办的大连满铁育成学校“培养”，以日后供其侵略之用。这些人中有的在日寇侵占内蒙古以后，果然成了它们的猎物，被派往各级日伪政权充任它们的侵略工具。1933年日寇侵占昭乌达盟时，打前站的就是曾经在巴林右翼旗办过产业公司，与巴林蒙古上层交过“朋友”打得火热的簿益三的儿子簿守次。而去赤峰迎接日本侵略军的其中就有与日本多年“交好”，借过日本贷款，领受过日本恩遇的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扎噶尔。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以后，无时无刻不在垂涎内蒙古草原，以实现其侵占全中国，独霸全世界的野心。他们不断地在热河地区发动武装挑衅，收买奉军汤玉麟部旅长崔兴武、团长李守信作内应，然后在通辽锦州两地集结兵力。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制造进攻热河的舆论。2月，日本侵略军分三路向热河进犯。北路日军第六师团驱动伪军张海鹏部、程国瑞部由通辽出发侵占开鲁；中路日军第八师团由义县进犯朝阳；南路是混成十四旅团，侵犯凌源。另有飞行大队和铁路第一联队80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日寇在进攻热河的时候，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近20万，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大小军阀希图保存实力，无心作战。在日寇茂木骑兵第四旅团由通辽开出进攻开鲁时，驻守在开鲁的热河骑兵第九旅

旅长率部逃往林东。在巴林左翼旗筹集粮食、马匹，成立“抗日补充团”，假作抗日准备，但等日军占领开鲁，全旅即向西撤走。所谓的“抗日补充团”实际藉抗日之名进行掠夺而已。2月，投降日寇的刘桂棠匪部窜入巴林左右二旗，这支匪队离离拉拉在宽十多华里的草原上过了三五日。他们一路遇马群就赶，抓住牛羊就宰吃，强奸妇女，抢劫民财，无恶不作。3月1日，日寇“宣抚官”斋藤率领的南满警备军进犯林东。3月3日，日寇小柳津骑兵联队入侵巴林，遭到巴林左翼旗二八地人民的阻击，使日军缓进一天。当地人民被日寇杀害18人。

在巴林右翼旗，国民军热河一个团的兵力驻扎大板附近。在日寇侵占之际，他们亦借口组织力量，抵御外敌，任意抓畜派款，还到处抓“乌拉”（摊派牛车马匹）。3月1日，这个团全副武装，十分威武地出发，声言前去抗击日寇，但未曾接火便乱乱轰轰向西撤去。就这样，3月5日，日军侵占了巴林右翼旗。驻巴林草原西部林西县的石文华旅惶惶撤离林西，3月4日林西县长邱振中弃职逃离。3月6日日军侵入林西县城，巴林全境沦陷。当年目击日军侵占巴林的巴林右翼旗居民莫胡尔撰文记叙了日本侵略军侵占大板的情形。一天，他在大板北喇嘛坟西山放羊，看见由麻斯他拉东少荣山北坡上，过来了几十辆马车和军队，还有一些盖着苫布的炮车，由十几匹马拉着。尾随的人都背着背包和枪，头戴钢帽子，身穿土黄色军装，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不到二百人。前头的打着日本旗。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没放一枪没打一炮，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板。日本进入大板不久，伪满洲军就跟进来了。人数很多，全是骑兵，身穿土黄色军装，打着黄红蓝白黑满洲国旗。他们到处找人遛马喂马号饭，还打人骂人侮辱妇女。

日寇铁蹄践踏巴林以后，很快在巴林左翼旗成立伪兴安西分省临时办事处，废除林东县制，将巴林东部的旗县分治并为巴

林左翼旗。7月，建立伪巴林左翼旗公署，日本人小手川胜彦任参事官，末代王爷色丹那木吉勒旺宝任伪旗长。在巴林右翼旗设立伪兴安西分省大板办事处，将旗扎萨克衙门改为伪旗公署，以旗扎萨克扎噶尔充任伪旗长。日军占领林西以后，即成立日本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林西顾问处，日本人盛岛任顾问处机关长。5月成立伪林西县公署，以苏绍泉充任伪县长，满铁种羊场场长内田任指导官。旗县公署设科股，主要头目悉由日本人充任。旗县下设区村，任伪区村长。在巴林右翼旗，旗下设四科十五股，有总务科、行政科、警务科、实业科，庶务股、人事股、经理股、行政股、文教股、动员股、烟政股、政务股、警务股、保安股、司法股、特务股、经济股、畜牧股、农林股。此外还在城乡设立多处警察署和警察分驻所。所有这一切都是操纵在日伪手中的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

日伪时期，日寇不断强化对蒙古草原殖民统治，在各地广置军警宪特机关。他们占领赤峰后，就在赤峰设立关东军司令部，在巴林全境驻扎关东军和伪警备军。在巴林左翼旗驻扎的日伪军是伪兴安军第四支队乌古廷部的两个连，1934年有日军奥来部队、常川部队驻林东古城外，称南大营，1939年又有伪兴安骑兵第六团驻扎林东。在巴林右翼旗的驻军是伪满第九军管区警备军司令部的一个旅，驻西拉沐沦河以北。此旅第四团驻大板。在巴林西部的林西县驻军更多，有伪警备军三团、山炮连、机枪连、速射炮连、陆军医院，有兴安骑兵第三团、日本关东军第九军属血银部队、日本关东军陵军留守队四七五部队。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为了补充兵员，在占领区强行征兵，凡年满19岁男性青壮年都要接受检查，合格者入伍，服役3年。1941年起日伪颁布劳务新体制，称“国民皆劳”实行“勤劳奉公”，亦称勤劳奉仕。将所谓国兵不合格的统统编入“勤劳奉仕队”，强制劳

役。1943年巴林左翼旗有145名劳工修筑林东飞机场。1944年有200名劳工在哈达英格、衙门庙一带修公路。1945年有620多人被强行拉去本溪修道。巴林右旗劳工200人,1944年在赵家湾一带修路,1945年被强行拉去抚顺服劳役。日伪为了强化其法西斯统治,凡是有日伪军驻防的旗县都设立宪兵队。1935年伪满洲国设立宪兵司令部,1938年设立宪兵总团,在通辽设立第九宪兵团,下分3个团和两个分遣队。1943年在林东成立分遣队,1944年成立林东宪兵分团。林东宪兵团内设特务系警务系司法系,宪兵20余人。在林西设日本宪兵队独立分队。日伪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的罪行,无不有关东军宪兵队参加。除军宪而外,日伪在其侵占的各地设立庞大的警察队伍和层叠的警察机构。警务司是伪满初期的警察总部,下署警务厅、警务科,地方设警察署和警察分驻所,警察人数逐年增加,仅以巴林左右二旗为例,到日伪垮台之时,警察人数占日伪职员过半,财政开支增加了四倍。警察衔级无定,警尉警长当中增加警尉补,警尉之上设监督警尉和执行警尉。正如人民群众所说“满洲国成了警察国”。

日伪时期除了军警宪各种镇压群众的机构外,还设置公开或秘密的特务机构。各旗县公署都有特务机构和特务人员,有明的暗的调查班、矫正局、缉私队。日伪特务中心是伪满洲国保安局,为专门从事“秘密战争”的机构,它对外的主要目标是外蒙古和苏联,对内目标是民族抗日力量,是一个完全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秘密联系的特务组织,有庞大的地下组织网,通常以秘密身份活动,权力极大。1934年,日本特务头子岛村三郎,以伪“蒙政部”要员身份,来巴林左翼旗进行特务活动。长期驻巴林左翼旗索博日嘎的岗歧就是这一类特务。

岗歧1939年来到巴林,受命在巴林左翼旗索博日嘎秘密设

特务据点。他通常妆扮成一个极普通的驻蒙古的日本人，经常在喇嘛庙住，出来进去穿喇嘛服装，还同当地牧主莫力黑梅林打得火热，娶了莫力黑的女儿当老婆。但他的权力很大，驻伪蒙疆的一些特务机构派人经常到他这里汇报，驻林西县的日本军宪警特和邻近旗县的参事官也常到他这里联系。其后几年，为了进一步遮人耳目，掩护其特务活动，他还在索博日嘎庙开了个小卖铺，收购畜产品，实际是个秘密据点。1941年岗歧将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扎萨克以私通外蒙古之名报告给日伪当局逮捕，还将喀喇沁的甘珠尔葛根扣押。

更为恶毒的是，日伪一方面利用蒙古贵族实行其对广大蒙古族人民的统治，将蒙古贵族升任各级官吏给以优厚待遇，如巴林右翼旗和硕亲王扎噶尔在昭乌达地区爵位较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日伪利用这一点，极尽引诱之能事，说此人“性情温和，容貌魁伟，性情直爽，懂事务”，让他当了伪兴安西省省长，后来又不放心，把他调出兴安西省当兴安总省总裁，实际上监视起来。另一方面挑拨蒙古民族同其它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关系。他们在征兵时，优先选用蒙古青壮年，驱使他们来镇压抗日的人民群众。他们把征来的蒙古兵编为第九军和第十军。在日寇对热河地区“治安肃正”时，这些蒙古族军人在日寇的驱使下参加了军事行动。在诺门罕的对苏战争中，也驱使蒙古军人上前线，使许多蒙古族青壮年丧生。

协和会是日本法西斯的又一统治机构。1939年西拉沐沦河北部各旗县相继成立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各旗县本部。关于协和会，关东军植田司令在《满洲帝国协和会根本精神》声明中说它“既不是政府的附属机关，也不是与政府对立的机关，而是政府的精神团体”。其实质是“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其目的是从军事到思想征

服亚洲和世界,使被侵略者从思想到行动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各旗县协和会都建立本部,本部长与副本部长均由伪旗公署参事官和伪旗长充任,下设事务长,多由日本人充任。所辖三个班即庶务班、青年班、指导班为办事机构。从1938年起旗下各村也建伪协和会组织。旗之伪协和会基本任务是实施国兵劳役制度,募集赞助,协助征兵,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殖民宣传和强制训练,培养所谓“国民中坚”分子,以实现其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

日寇出于灭亡中国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不但采用军事占领、政治压迫、思想毒害之手段,更为恶毒的实行奴化教育,给青少年灌输亡国奴精神,即所谓“日满一心一德”、“日满亲邦”、“大东亚共荣圈”的建国精神。他们废除了蒙古地区原有学堂、艾勒学校以及一些旗办公立学校,如喀喇沁旗的崇正学堂,巴林右翼旗的普励学校等。改变原来的教学秩序与教材,强制全部以日伪的课程与教材教学。在所有的课程中,国民课(日语)占所有学时的一半以上,在校学生不得讲蒙古语和汉语。每课要崇拜“天照大神”。学校从校长到教师多为日本人充任。1937年日伪实行“新学制”,将初小改为“国民初级学校”,将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原“五年制”,缩短为“四年制”,称“国民高等学校”。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贯彻殖民奴役制度,培养所谓“忠顺国民”,使青少年诚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每日每时赞颂“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拥护“大东亚圣战”等,学生在国高班里,还要受军训,演习战场救护、爆破、侦察、通讯、消防、射击、投弹、旗语号令、战时掩护、构筑工事等,培养其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本领。

日本侵略者为了不断扩大战争的需要,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残酷的镇压。为了掠夺蒙古草原,1938年动员蒙

旗实行土地奉上,即由伪满洲蒙古各旗王公自愿将多少年来的清朝封疆土地权奉献给满洲皇帝。1938年7月昭乌达盟各旗王公齐聚满洲国首都新京向皇上敬出昭乌达土地。日寇通过土地奉上和整理地籍,巧妙地由满洲国出面剥夺了蒙旗土地所有权。这是对蒙古族最大的掠夺。于此同时,日寇还在被侵占地区推行强制“出荷”政策,在各地建立“兴农合作社”机构。这个机构由参事官和伪旗长任正副社长,掌管各种粮谷牲畜出荷,进行疯狂掠夺。在巴林右翼旗当时“出荷”一匹马一头牛仅仅能得到几尺棉布三五斤茶叶。日伪统治者一方面出荷掠夺,一方面实行所谓的配给制,对蒙民日常需要的食油、蒙盐、火柴等进行禁运,限量配给到户到人。就这样也长期见不到实物,牧民生火取暖只得用火镰,采摘山草代替砖茶。日伪统治机构还在交通要道设立检问所,牧民们稍有不慎,就被当作走私犯缉拿。疯狂的掠夺使经济日渐萧条。这些名目繁多的粮谷出荷、皮毛出荷、煤油出荷等给农牧区经济套上铁索,紧紧勒住人民的脖子,人民衣食无着,饿殍遍地。《巴林左旗志·大事记》记载:伪康德十一年(1944年),民无以为食,饥寒冻饿,死者无数。常常人自相食,惨不忍睹。许多当年从死亡线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回忆,当时粮食吃光了,伪满苛捐杂税又多,为了求条生路,只好携儿带女投奔它乡。时值寒冬,冻饿致死的逃荒饥民数千人。仅白音敖包的兴胜村就饿死48人,碧流台中段,当时那里人口集中,死的人更多。在林东街北塔山下,尸体任野狗吞噬。街东西两个石桥底下,成了穷人逃荒者的栖身之所,同时也是死丧相枕之地,几乎每天都从石桥底下往外抬死人,后来竟争相以死者肉体充饥。

为了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日伪对殖民地严加控制,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和自由。1932年实施《治安警察法》,1941年颁布《治安维持法》,特别是1944年公布的《时局特别刑法》规定

了各种“犯罪”名目，什么“反对皇室罪”、“军机保护法罪”、“治安维持法罪”，还有各种“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罪名。为了给日伪军警任意捕人杀人的权力，还有“预防拘禁”和“保护监察”等规定。有了这些，只要随便给殖民地人民加上一个“有可能犯罪”的名目，就可以抓人打人杀人，以实行其恐怖的法西斯统治。

日寇暴行，历历在目，数不胜数，今日忆起，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切齿扼腕。在巴林左翼旗，日寇占领林东镇后一面宣传“满蒙一家”、“日满和亲”、“大东亚共荣”，一面大施淫威，露出法西斯凶恶嘴脸，当天杀害三名无辜居民。1939年日军声称丢失机密信件，在林东街戒严搜查，将街内所有居民百姓，驱至伪警察署和伪街公所盘查，逐个“相面”，稍有可疑即严刑审讯。如此追查两天，百姓被残害数百人，致死数人。在巴林右翼旗数不清的蒙汉民众被捉被打被押，日伪败退前夕，还从狱中提出被监押的无辜民众枪杀，可见侵略者穷凶恶极之甚。在巴林西部的林西县，侵略者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仅据新编《林西县志》记载，就有“天朝山惨案”、“日伪活剥人皮事件”、“日本特务分室杀人”、“收烟干施暴”等事件。

天朝山惨案发生在1940年春，日本侵略军有一排人开进夜来改村，赶走了这个村的居民后，用卡车从外地拉来一百多人。这些人多是从锦州一带捉来的百姓，内中有少数是朝鲜族人。日军在天朝山四周拉了三道铁丝网。这些抓来的人被日军驱赶着每日打山洞，修筑工事。1942年，巴林左翼旗海青河王姓农民骑马路过天朝山靠近铁丝网，当即被日军开枪打死。1943年一卖丝线的商人误入“禁区”，亦被日军开枪打死，曝尸三天。同年夏有两劳工逃跑被捉，一个被扔进臭水坑活活泡死，一个被绑在石柱上活活饿死。天朝山工事修完，将搞被覆的劳工全部杀害。据



从被覆工地逃出去后来参加解放军的九连庄村民宗长有回忆，日军说晚上要“犒劳”劳工，一个专为日军做饭的朝鲜族人懂得日语，且和宗长有关系较好，告诉宗长有“日本人要打发劳工上路，让宗长有小心”等话，宗长有明白日本鬼子要杀人，偷出两双胶鞋，乘人不备，把一双绑在膝盖上，一双套在手上，爬着逃了出来。其余的人全死在里面。建国后，1969年在天朝山后的野狼沟找到了两个大坑，一个坑内有30多具无头尸骨，另一个坑内是30多个颅骨。坑内白骨层叠，惨状令人发指。原来在天朝山工事搞被覆的劳工，只有两人逃出，其余全被日本鬼子用战刀砍死。“活剥人皮”是日本侵略者在巴林犯下的又一罪行。1940年农历十一月，日本侵略军的一个指挥官在林西县城被人用刀刺死，日军官亦开枪将刺客击伤，刺客逃走。宪兵队全城戒严，搜捕捉人。有一个姓于的被认为是刀杀日军指挥官之人，遂对其严刑拷打。后来发现不是于所杀，但是宪兵队抓人是有进去无出来的。残暴的日本宪兵将于捆在日本陆军医院的一根木桩上，由日军少佐板本吉田指挥，残无人道地将于活活地扒了皮。林西县伪“兴安总省保安局林西派遣办事处”（亦称特务分室）更为残忍，从1940年到1945年，共杀害了无辜中国百姓60余人。1944年特务分室理事官山田真治声称林西县公署经济科长有反满抗日情绪，命特务分室事务官将其家五口人全部杀害。此年4月，又将林西县城东门外的一农民以抗日嫌疑分子捕来，经严刑审讯，由中村、水野三郎将其头、手与脚砍下，将内脏扒出喂了狼狗。此年8月9日，还是这些恶贯满盈的家伙捉来两名商人，一个是从林东到林西做买卖的农民，一个是竹编手艺人，由米久田审讯，审后绞杀，砍下头手埋掉。

以上实录仅见一斑，日寇在巴林杀人如麻，罄竹难书，对蒙汉各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血债要用血来还，1945年抗日战

争胜利,噬血者没有逃出他们彻底覆灭的下场。

## 二十四 不甘沦亡抗敌倭

1937年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作出开辟敌后战场的决策。决策中分析到,沦陷区人民饱受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的暴行后,国仇家恨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日寇侵占巴林草原以后,即开始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占领巴林左翼旗林东的当天就杀害无辜民众,暴尸旷野。在林西县他们任意抓人、打人,甚至活扒人皮。在县北天朝山对劳工集体屠杀。即使在行将灭亡时他们仍穷凶极恶地杀人放火。在巴林右翼旗大板,纵火烧毁了古建筑康熙行宫。在日寇统治的13年里,他们施行了野蛮的殖民手段,强化治安、“集家并村”,组织伪警备军、治安军、警察队、缉私队,清查户口实行居民连坐,控制粮谷和钢铁,勒令种植鸦片,组编“勤劳倖仕队”大肆压榨劳工,实行奴化教育,进行政治欺骗等。残酷的殖民政策将草原蒙汉民众推向水深火热的深渊。多少人冻饿而死,家破人亡。有着强烈民族气节的人民不愿亡国亡身,遭受外辱,不容许日寇铁蹄蹂躏自己的家乡。国仇家恨使他们奋起抵抗,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寇的侵略。在日寇血腥统治的年代里,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抗日,多少抗日民众的鲜血洒在巴林这块热土上,多少可歌可泣的英烈长存在人们的心中。这些人有手握锄把、套马杆的农牧民,有拉杆起伏的民众领袖,也有具有民族气节的蒙古族上层人士、伪满军中的倒戈官兵。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侵占巴林草原,日军小柳津骑兵联队洋洋得意地来到巴林左翼旗二八地村时,当地村民给侵略者当头一棒。村民们自动组织起来,不怕日本鬼子的洋枪洋炮,手握锄头镰刀冲了上去。他们要让日本鬼子尝尝中国人的厉害。愤怒的村民们截断了日本侵略军的通路,将鬼子们吓得连连倒退。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火力,他们有的倒下了,仍然大骂侵略者,有的受了重伤仍勇敢地往前冲。在这场战斗中18位村民光荣牺牲。他们虽然死去了,但是在草原各族人民的心中,对日寇埋下了更加刻骨的仇恨。他们虽然都是极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他们朴素的爱国热情不甘沦亡的牺牲精神永垂青史。由于他们的阻截,使日寇侵占巴林左翼旗林东街晚一天多的时间,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战部署。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力量是很大的。在日寇血腥统治的日子里,不断有日本侵略者被暗杀,这便是对日寇怀有深仇大恨的蒙汉民众所为。1940年,驻林西的日本侵略军指挥官被杀,日寇逮捕一于姓的嫌疑者活活扒皮。于为当地一穷苦百姓,临死不屈,大骂不止,表现了蒙汉民众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人民不可辱。随着日寇殖民高压政策的逐步实施,人民反抗的力量越来越大,从单个的报仇雪耻到有组织的武装抗日。正如毛泽东同志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事实正是如此。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在巴林北部大兴安岭崇山峻岭中出现了。这支巴林蒙汉群众组成的武装抗日队伍首领人物名张才,号北霸天,久居兴安岭南麓乌牛台沟南泉子村。他和附近村落的蒙汉弟兄们不堪忍受日伪的压迫和凌辱,以镰刀作武器,夺了日伪警察的枪,然后拉杆起事武装上山。他们以家乡的高山大川、森林草原为据点,矛头直接指向日本侵略者和它羽翼下的警察特务、恶霸土

豪。北霸天发过誓言：日本鬼子在一天就打一天，不死，就跟他们干到底！北霸天的队伍袭击日伪据点，打开“出荷粮”的粮仓分粮给蒙汉群众。许多蒙汉青壮年参加了北霸天的队伍，很快由20多人扩展到200多人。他们起初转战在巴林草原，继而活动在西拉沐沦河以南。这支由蒙汉民众自发组成的抗日队伍，从1934年起到1940年，共战斗了7个年头，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北霸天因此赢得了民众的爱戴，至今在巴林草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满洲皇帝没爹，北霸天有爹。”意思是褒扬北霸天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不甘沦亡奋起抗击的精神。

蒙古族上层人士是日本侵略者引诱拉拢的对象，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不可凌辱的强烈的民族气节。巴林左翼旗札兰和子章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他不堪忍受日寇对蒙古族的压迫与欺辱，与日本参事官直言抗争，后被捕入狱，出来后隐居他乡，再不为日本人办事。即使在日伪军中也不断出现武装哗变抗日倒戈的事件。1939年，驻巴林左翼旗林东街伪警备军中的蒙古族士兵，在聚宝的带领下掉转枪口指向日寇，在开鲁一带杀死日伪上尉招抚官以示抗日的决心。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有三个基本弱点，即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和指挥失误。敌后抗日就是要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来看），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巴林草原蒙汉民众抗日武装正是扬我之长，击敌之短，抓住了日寇致命的弱点。不管是二八地村民截击日军，北霸天聚众抗日，还是聚宝率部倒戈抗日等都是利用了敌人这三个弱点，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北霸天张才武装抗日正说明了这一点。1931年日寇侵略我国东北,1932年利用末代皇帝溥仪作傀儡成立满洲帝国,1933年侵占热河,占领了巴林草原。在巴林,他们兵力十分不足,侵入巴林的军队不过是小柳津的一个联队,之后,虽然建立伪政权,成立地方伪警备军和伪警察署,但在巴林北部大兴安岭一带,数百里才有一两个警察分驻所。警察分驻所几乎没有日本人,只有蒙汉人充当的伪警察。北霸天张才拉起抗日的旗帜以后,几个蒙汉结义弟兄用几把镰刀就缴了伪警察分驻所警察的枪支。北霸天已经起事近两年了,1935年春天,日伪才顾得上清剿,因为当时伪兵少得可怜,清剿队只有老房身警察分驻所所长带领20多伪警察到兴安岭坝根一带清剿。北霸天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并且一鼓作气捣毁了附近的警察署。1936年日本鬼子盛怒,林西县公署参事官亲自出马,调集的也无非是些伪警备军和伪警察,被北霸天一举击败。北霸天的队伍已达数百人,在人数上多于伪警备军和警察。日寇作为异民族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尤其来到蒙古草原,他们是聋子是瞎子,听不见也看不见,象野兽一样疯狂乱扑,终究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下面几个战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1936年11月,日寇出动大批军警开到兴安岭山地“围剿”北霸天。北霸天巧妙地绕到兴安岭北麓,转到锡林郭勒草原,使日寇扑了个空。他们连北霸天的影子也没有看见。1937年5月,日寇又派伪警备军和伪警察组成的讨伐队,在林西县北黑山头与北霸天相遇。北霸天凭借熟悉地形和当地群众的支援,一举将讨伐队击溃。当年8月,日寇又组织大型讨伐队,并派日本指挥官山口幸春指挥。讨伐队直扑北霸天的驻地石匠山。时近中午,战斗中北霸天望见站在山隘口的山口幸春,手起一枪,将他打得脑浆迸裂,当场毙命,余者落荒而逃。蒙汉民众敬仰北霸天,说他是一条龙,口喷真火烧死了日本鬼子。其实北霸天正

是利用我们的三个优势攻打日寇的三个弱点,才取得了胜利。

草原蒙汉民众武装抗日,确实打乱了日寇的如意算盘,使他们在占领区一天也不能安宁。由于北霸天抗日队伍的活动,日寇龟缩在旗县里不敢出城;由于愤怒的民众暗杀日本侵略者,日寇如惊弓之鸟不敢出屋;由于伪警备军的蒙汉士兵倒戈,把枪口指向日寇,更使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日寇的严重威胁。日寇本想安安稳稳地占领这些地方,并把这些地区作为战争基地,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里非但不是基地,而是致他们于死地的战场。从北霸天率领队伍抗日的那一天起,日寇便是今天围剿明天讨伐,动用了大部分兵力,讨伐队由几十人增加到数百人千人,最后动用巴林两旗一县及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的兵力,兵种由警察队、宪兵队到警备军、关东军。他们煞费心机地东奔西跑,疲于奔命,不但追剿不到抗日民众,有时还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手脚被捆住,不能肆无忌惮地向其它地区进攻。从这点来说,巴林蒙汉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支援了其它抗日战场,它是全国抗日战场的的一个组成部分。

巴林草原从清朝末年垦种移民以后,大量汉族和其它民族人口来到巴林谋生。这样使原来单一蒙古族的居住区,变为蒙古族、汉族和其它民族杂居的地区。相对来说,巴林左旗、巴林右旗蒙古族较多,而林西县汉族、回族人口较多;在城镇,汉族的人口比例大些,在牧区,蒙古族人口比例大些。以巴林右旗为例,1945年全旗人口近4万,其中蒙古族人口占49.1%,汉族人口占50.8%,其余为其它民族。多年来,各族群众共同居住在巴林这片沃土上,农牧经济互补,思想文化交流,在长期共同的生产与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民族友谊。日寇侵略巴林以后,在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利用蒙古王公等上层人士拼凑伪政权,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在林西县则是起用汉人地主豪绅作他们

的傀儡,对普通蒙古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劳动民众则极尽剥削压榨之能事。蒙汉同胞一样被强迫当警备军替日本侵略者当炮灰,一样被拉去当劳工遭奴役,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他们有着共同的抗日要求。北霸天的抗日队伍中有汉族,有蒙古族,也有其他民族。北霸天从1934年抗日起事,六七年间转战巴林草原,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波及锡林郭勒草原、克什克腾草原和翁牛特草原。他们的抗日行动得民心顺民意,得到穷苦的蒙汉群众的广泛支持。他们的队伍开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主动给他们提供给养,为他们保守秘密,日伪一旦来追剿,群众便为他们通风报信。1936年,日寇清剿队伍到兴安岭坝筒子一带没有找到北霸天,便抓走了当地的蒙汉群众8人,并严刑拷打,逼问北霸天的去向,还要把他们解送到林西县警察署。北霸天得知这个情况,为救出蒙汉百姓,他带人冒着生命危险星夜赶回,埋伏在路旁,把日寇打了个人仰马翻,救出了群众,并把他们护送到家中。日寇一招不灵又施新招,密令当地牧主、地主在当年阴历八月节的时候给北霸天送酒肉、月饼和糖果,日军则随其后包围北霸天。岂不知此事早有当地蒙古族的马倌预先报知北霸天。北霸天把队伍拉到外围,反倒把日伪军包围到里面,狠狠地打击了日寇,取得毙敌数十人的辉煌战果。如果没有蒙汉群众的参加,就没有北霸天的抗日队伍,没有蒙汉群众的友谊,北霸天的队伍就不会纵横驰骋于日寇的“围剿”之中。既使是在北霸天战斗失利,日寇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到处搜捕的时候,巴林草原的蒙汉群众仍不惧危险,把北霸天保护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日寇殖民统治巴林的13年,是蒙汉各族群众团结抗日的13年,是各族人民在腥风血雨中结下战斗友谊的13年。这期间处处闪烁着民族团结的光辉。



## 二十五 炮火连天迎解放

公元 1945 年 8 月,是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日子。

8 月 8 日,苏联向日本宣布从 8 月 9 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9 日至 14 日,苏军粉碎日军主力部队,前进至中满平原。8 月 15 日至 9 月 2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苏军发展战果,前进至我国东北中心地域。9 月 2 日,日本政府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

从 8 月 9 日零时到 11 日晨苏军越兴安岭进入巴林境内。这一期间的战事,《远东的胜利》(N·H·弗诺特钦科著,沈军清译)一书记述道:8 月 9 日零时 10 分,后贝加尔方面军各部队的先遣支队和侦察支队不经炮火和航空兵火力准备,在夜幕掩护下,同时在所有的方向上跨过了国境线。4 时 30 分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开始进攻,尽管大雨和缺乏道路带来的困难,但部队进攻的速度却很高。后贝加尔方面军当面有日军两个步兵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和伪满军及德王的近十个骑兵师和步兵师。日军第三方面军主力已撤回纵深,位于沈阳和长春地域。由于这一情况,所以苏军向纵深进展迅速。后贝加尔方面军以蒙古塔姆察克布拉克突出部为中心,各部队向前推进,如同从一个中心点发出的无数支箭头所形成的扇。主力从阿尔山筑垒地域旁边通过,向大兴安岭进攻。越兴安岭进入西拉沐沦河以北地域的苏军分为

东西两路。东路的苏军是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之一部和方面军二梯队五十三集团军之一部。他们在锡盟农乃庙、乌拉盖地域集结后越大兴安岭到达天山林东。其右翼保障部队的一个团，拟于天山南通过西拉沐沦河南下，因河底不坚固，机动车不能通行，故改变方向，仅少数侦察分队徒步过河进入海日苏地区。西路为后贝加尔方面军第十七集团军经林西县、巴林中部，过西拉沐沦河开赴赤峰。

苏军过大兴安岭进入巴林地区的主要通道是五条。西边的两条通道是大水波罗和二支坝，这两路的苏军人数较多。中部的是巴林右旗的北部塔拉索博坝和朝鲁坝。东边的是巴林左旗乌兰坝。靠近巴林的西路由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进入，这是一部蒙古机械化骑兵集群，通过经棚到林西集结后南下。东边的一路由阿鲁科尔沁旗黑山口进入。它的先头部队佯用日军的军用电报频率和密码给驻罕庙的日军发来电报，命令他们在指定的日期列队出迎，接受日本关东军的视察。日军信以为真，苏军到来时毫无作战准备，被苏军一枪没放缴械。经过巴林的五路苏军究竟有多少人数，尚无精确统计，估摸有40万之多。据当时目睹者回忆，苏军到达巴林左旗乌兰坝口时，因道路狭窄，坦克车不能通过，遂由工程兵炮轰石岩拓展通道。坦克的隆隆声和炮弹的轰炸声林东街内都听得见。苏军大部队通过林东，不断头地行进了三天三夜。前面是履带坦克车，后面是炮车汽车，再后是步兵。车辆的隆隆声响十几里外都听得见。步兵行军也很整齐，头戴钢盔在太阳的照射下闪光。

苏联进军，日军投降，盘居在巴林草原的日伪势力立即土崩瓦解，沦陷区的人民经过日伪十三年的统治和蹂躏重见天日，骑在殖民地人民头上的侵略者及其走狗终于灭亡。他们还要作垂死挣扎，负隅顽抗，但是他们逃脱不了彻底覆亡的下场。

1945年8月12日,苏军开进林西县城,林西宣告解放。8月11日苏军一路由坝筒、碧流汰、统布、嘎岔、庄家店、大营子进林西,一路由毡铺、永盛号、九连、官地、大井、冬不冷进林西,一路由朝阳沟、东边墙、石门子、五十家子、九连、龙头山、官地、冬不冷进林西。苏军经过天朝山时,摧毁了日军在山上构筑的作战工事。8月12日午后3时苏军来到县城东门外龙王庙村敖包山时,受到没有逃走的十多个日本人的截击。苏军当即将其全部击毙。苏军开到城边后,发出信号,从四面八方迅速涌进县城。苏军进县城后,立即进行全城搜索,抓到两个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日本人,还发现一个日本军人开枪打死妻儿子女后自杀身亡的几具尸体。林西县伪县长兼警察大队长中尾慎一、参事官高桥,逃到杏树洼村,被村民捉获交给了苏军。在林西北部边墙梁工事防卫的日本鬼子兵听说苏军攻进林西,便想绕道潜逃,在小爱林沟,被南下的苏军发现。苏军即以炮火猛烈射击,日军垂死顽抗。日军伤亡惨重,少数未亡者乘晨时雾重逃跑。经过林西的苏军全是机械化部队,坦克、重炮、装甲车,还有军用汽车、摩托车等,日夜兼程向南开进,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间断。苏军大部南下以后,只留百余人驻防,成立城防司令部,司令员是少校瓦尔库斯夫。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驻林西苏军同林西街人组织了一个“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佩戴臂章,上面印有国民党党徽和苏联国徽图案。加入协会的大多是地主富豪等上层人物。林西是军事要塞,日伪时期被认为是满洲国的西部过境地带,日寇多年处心积虑苦心经营,建有国境检查所和飞机场。在县北大兴安岭一线构筑许多军事工事,但是所有这些都

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

在巴林左翼旗,1945年8月10日,伪旗公署参事官堀田太郎将旗公署日本人伪官吏召集到他的私邸,说苏军要攻过来,巴

林左翼旗要以伪警察队为主组织保安队，一部分拉到索博日嘎、敖尔盖、查干哈达、碧流台一带伏击苏军，一部分在衙门庙、花加拉嘎、十三敖包、兴隆地以及林东周围戍守，一部分拉到乌尔吉、海力根台、土木富州一带驻守。堀田太郎还给日伪军打气说，如果苏军占领林东，要打游击，等待日军反攻。伪旗公署向后召庙转移。紧接着堀田召集全部伪职员训话，谎称日本人退出林东是圣战的需要和暂时的战略转移，要伪职员恪尽职守。训完话，堀田太郎就带着日本人和二三十警察逃奔召庙。8月11日林东街群众蜂涌而起，砸了伪兴农合作社，捣毁了伪旗公署。在后召庙，日本参事官堀田太郎带去的伪兴安军骑兵团的一个新兵连，由一蒙古族中尉发动蒙族士兵倒戈，将包括堀田太郎在内的日本侵略者全部击毙。8月12日，苏军的一辆汽车经由索博日嘎开进林东，车上为首的苏军军官名叫伊万。林东街推举有影响的实力人物和子章出面迎接苏军。和子章遂率领部分伪职员和街上群众到西门外迎接。他们每人手里都打着一面小白旗，以示投降苏军。苏军伊万见他们手举白旗迎接很不满，命随从士兵将白旗掠过来全部扯毁。在场的伪职员惶惶然不知所措，有脱帽鞠躬者，有点头哈腰强作笑容者。翻译说欢迎苏军要持红旗，持白旗大不敬，众人才放心下来，簇拥着伊万进城。来到十字街口时，金宝光带领伪警察夹道欢迎。伊万从警察手中取过两支日本造三八大盖，命苏军士兵当场把枪摔坏。伊万到了伪旗公署，指令和子章成立地方维持会，维护社会治安。8月13日和子章召集林东街的头面人物共同商讨如何应付时局。他们有的主张成立巴林左翼旗自治委员会，有的主张成立巴林左翼旗维持会，后以多数赞成临时组建了巴林左翼旗维持会，公推和子章担任会长。维持会组织保安队维护社会治安。8月14日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大部队经乌兰坝、莫力图坝进入巴林左翼旗境内，经乌尔吉、浩

尔图、土木富州、十三敖包到达林东。留守部队的临时司令部设在林东后山，苏军大都在古城内。那里全是军车、帐篷，还开辟临时停机场，直升飞机时起时落，汽车大炮排列如林。8月15日，碧流台一带蒙汉群众数百名，将海力根台伪警察署砸毁，杀死伪警察署长。日伪败退时期，居住在巴林左旗的日本人家属49人，于8月12日由伪林东史迹保存馆大内健氏率领取道开鲁准备回国，未到开鲁，转向锦承铁路线。在奈曼听到苏军控制了铁路线，走投无路，全部自杀。

巴林右翼旗的日伪官吏，从1945年7月初，有的就东窜西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当时伪旗公署人事股股长日本人末永借结婚之名离开巴林，届时未归不知去向。为追捕他，参事官派警务科长日本人木内馨去东北，此人亦一去未归。8月初，日本侵略者预感到灭亡命运的到来，伪旗公署的日本人寺西、沼崎、桑高、福岛、渊源、佐滕、佐佐木、椎名等轮流值班值宿，看守战务电话。8月10日，伪巴林右翼旗旗公署参事官多田正美召集全体日伪职员，在伪旗公署门前的空场上开会。当时，按照战时编排整队，伪警察一队，伪职员一队，自卫团员一队，日本军政人员也独成一列，由多田正美训话。据目击者巴林右旗大板街人道尔吉、张明乐回忆，当时多田正美穿着笔挺的将校呢军服，佩带警正肩章，挎着银柄指挥刀。虽然态度骄矜傲慢，但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恐。他造谣惑众地说：苏联背信弃义，破坏了互不侵犯条约，已于8月8日向我日本国宣战了。目前我满洲国和我们巴林右翼旗已进入了非常时期，我们要准备对付他们的侵略。从即日起成立国境警察守备队，旗之所有警察、自卫团员、职员都是守备队成员，发给枪支子弹，跟着日本人上山打游击。会上日本参事官和伪旗长阿拉坦瓦其尔还作出了暂时放弃大板，全部撤退到阿贵庙的部署，要以阿贵庙为据点抵抗苏军，阻止苏军前进，以

迎接日本皇军的反攻。紧接着警务科把武器库打开，把库存武器弹药分发给没有武器的人，并紧急进行烙大饼备衣物等各项准备。汽车开出来，车上装着日本军官的家属。日本人打算把家属送到通辽上火车再转移它处。此日上午10点钟左右，日伪人员分三路逃出大板街，一路由伪旗公署参事官多田正美、特务股长沼崎带领，这伙人多是日本人及其参事官的亲信。一路以伪旗长阿拉坦瓦其尔为首，这一路多是伪警察和自卫团员，这一路由都希奔阿贵庙。还有一路多是伪职员，过查干沐沦河奔白音和硕山。逃走之前，多田正美下令焚烧伪旗公署和兴农合作社。当时伪旗公署设在清代康熙行宫。数百年的古建筑毁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幸而大板街群众起来，扑灭了大火保住了行宫的部分建筑，使这一著名的古建得以保存下来。

日伪撤出大板一小时以后，大板上空出现五架苏联飞机。飞机低空飞行盘旋扫射，逃得晚的日伪人员及运送日本人家属的汽车不敢逃出大板，只得半路返回。那辆汽车被击坏，日本家属爬下汽车四散奔逃，但未能逃脱，苏军占领大板后他们即成了俘虏。随后，苏联军队开进大板街。目睹者道尔吉撰文回忆：“在大板街西头，出现了五辆苏军汽车。苏军在西山坡停住车，找到一个放牛的人详细了解了大板街的情况，并用汽车拉上他绕大板街一周，然后停在街中心。此时以赵化民为首的伪官吏及街民出迎苏军。苏军官通过翻译向赵询问大板日伪情况，赵一一介绍，并将苏军引到他家中去。苏军进了赵家，仔细清查了院子才进屋内，接着便由通讯兵安装上无线电话机，然后向赵发指示：其一是召集大板街民宣告，苏联红军是按苏联政府的决定和统帅斯大林的命令，受苏联人民的委托，来中国打日本帝国主义，是来尽义务的；现在大板解放了，群众要安居乐业，并要协助苏军消灭日本侵略者，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其二是由赵派人通知联络

那些跟着日本人逃跑的伪官吏,也包括日本官兵,要他们向苏军投降,如继续顽抗,苏联红军将围剿消灭他们;其三是由赵为苏军驻防指挥部和投降的日伪人员安排住处。

赵化民立即一一照办。按着苏军的指令派人到昂嘎吐把苏军招降的通知转告给伪旗长阿拉坦瓦其尔等人,促使他们将日本参事官等抓起来送交苏军。一面在经堂庙召开民众大会,宣布苏联红军的安民告示和巴林解放的情况。之后,赵家烧茶做饭,热情招待苏军先遣部队。午后,从大板街北部传来震天动地的轰鸣声,苏军的大部队开了过来,全是装甲车队。他们到了大板兵分两路。一路经宝力格、哈日毛都过查干沐沦河至乌丹南下;一路经大板顺路直达赤峰。赵化民组织大板街一百多人排队站在路旁迎送。苏军有一个团的兵力驻屯大板,其余南下。驻屯大板的这个团,有二百多辆坦克、炮车、汽车。团指挥部设在大板街,其它野外宿营,从指挥部到宿营地架设电话线。苏联的军用飞机也不断起落。8月16日上午,逃出大板的伪旗长阿拉坦瓦其尔、乌尔图等,在阿贵庙将日本参事官等日本人杀死,用车拉着日本人的尸体回大板向苏军投降。他们在阿贵庙是怎样把日本参事官等杀死的呢?张明乐有一较详细的回忆文章,简要摘录如下:

“我当时是伪警察,从大板街奔逃时,我随着阿拉坦瓦其尔,刚过了查干沐沦河,就遇上苏联飞机的轰炸扫射,大家跑散。晚上在都希村,遇见了李如坦、乌尔图(他俩都是伪官吏),他们已经接到大板赵化民的信件,要我想方设法杀死参事官,投降苏联红军保个活命。我们听说参事官跑到阿贵庙,便于8月12日晨来到阿贵庙,果然参事官多田正美等日本人都在。我们向那里的伪官吏警察说了赵化民传达的苏军招降的话,想要在庙里杀死他们。但是庙主持嘎活佛要求在庙院外面办事。我们用计诈说苏军攻到阿贵庙,将日本参事官等哄出庙门。我紧紧跟着多田正

美,准备在他上马时开枪。谁知我在给他紧马肚带时,那马驹骡子把我弹了一下,等我起来,他已经跑出去。我立刻乘马在后面追。在过一个土坎子时,我追上了参事官多田正美,便朝他开了枪,其他的人也向日本人开了枪,参事官和其他三个日本人当场被击毙。”

1945年8月15日,苏军驻防大板的长官把赵化民找去,通报了一个特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苏联红军胜利了,日寇占领区的人民得到了解放。接着苏军鸣枪放炮以示庆祝。晚上把所有的探照灯、车灯都打开,把大板街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苏军官兵在明亮的灯光下彻夜吃肉喝酒,跳舞狂欢。赵化民等人为苏军筹集给养,忙得不亦乐乎。

“八一五”光复,巴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深渊,走向了新的生活。



## 二十六 曙光初上地平线

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八路军延安总部为了配合苏军蒙军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从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两天中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这些命令都是由周恩来等起草，毛泽东审核修改定稿，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中央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张学恩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还要求所有沿北宁线、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等铁路沿线及其它解放区一切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战争进展迅速。内蒙古沦陷区在苏蒙军的援助下，在我抗日军民的积极配合与奋击下光复了。包括巴林在内的广袤内蒙古草原获得了解放。

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妄图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把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公开支持蒋介石集团，实行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法西斯专政。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一道，要把中国引向光明，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45年9月19日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指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

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蒋介石为了夺取胜利果实,也竭力部署兵力,要在热察建立“防共隔绝地带”,企图遏制我北上。

巴林草原是战略要地,是热河边境地区,又是大兴安岭南段连接锡林郭勒——昭乌达草原的重要通道。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天党就派王逸伦来到赤峰地区成立热北司令部。翌日,王逸伦又到紧靠巴林的西拉沐沦河南翁牛特组织地方武装。8月29日中共中央电示: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按照中央这一指示,9月1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成立。中旬杨雨民等到达承德,热河行政公署成立。这一时期,为实施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晋冀鲁豫抽调十几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下旬,党组织派卜汝英、白晓山、张治中、李淑等7人来到林西开辟工作。关于我军最初接管林西县的情形,阎国山在《林西文史》著文回忆:卜汝英接管林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卜汝英七人来到林西,苏军发现他们七人中有一个叫白晓山的人,遂对卜汝英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产生怀疑,加之卜未带中共首脑机关的介绍信,便拒绝他们接管。原来这里有一个小插曲。8月10日苏军占领林西,驻林西的伪速射炮连闻讯撤出县城。待林西成立维持会后,这连人要求向苏军投诚。苏军遂接收他们。时逢林西北部土匪作乱,苏军派两名战士带着这一连人前去剿匪,得到苏军的褒奖,将他们都释放回家。这里边就有白晓山。白在回喀喇沁路经赤峰时,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跟随卜汝英来林西开辟工作。10月初卜汝英乘苏军汽车回赤峰办理介绍信等手续,在乌丹遇见上级领导张焕然。张指示卜暂回林西待命。11月初,张焕然带领一连人经由巴林右旗来林西与苏军接洽。苏军热烈欢迎。苏军驻林西城防司令部的瓦尔库

斯夫陪同张焕然检阅了驻守林西的苏军部队，然后，苏军将林西交由张焕然接管。张焕然与卜汝英等开始组建林西县人民政府。责令林西县维持会移交有关维持会人员名单、各种财产及公安队人员名册、枪支弹药等。1945年11月13日，维持会宣告解散，林西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张焕然出任林西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卜汝英任林西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这期间，于10月末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冀热辽军区、热河省委和热河省政府。11月初中共热北地委在林西县成立，王逸伦任地委书记。热北军分区在林西建立，卜云龙任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11月下旬，热北专署于林西县成立，专员张盘新。热河省委明确热北的管辖范围为西拉沐沦河以北的巴林二旗一县、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旗都是蒙古族聚集的地方，怎样办好热北蒙旗的事情，中央总结民族工作经验，分析蒙古族各阶层动态，强调在蒙古民族工作中当前要抓住争取伪蒙古军这个中心环节，在争取改造伪蒙军的同时，建立维护群众利益的蒙古族人民的军队。还强调要注意争取民族上层，逐步改造盟旗政权。根据这一要求，热北党政军向所属蒙旗开展工作。但是事情是曲折复杂的，期间同巴林二旗地方民族武装和子章部队发生过几次“摩擦”。

究其原因当从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说起。8月初，苏军对日宣战的时候，一部分伪满兴安军官学校的职员和师生，联络在伪兴安省任职的蒙古族人士，杀死日本教官，脱离日本侵略当局的控制，在日本侵略者投降敌伪政权作鸟兽散的情况下，宣布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其东蒙古总部，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为了寻求内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1945年10月，“内人党”派出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组成东蒙自治运动代表团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探讨东蒙革命及其出路等问题。蒙古人民共

和国领导人向代表团提出建议：东蒙问题要想得到彻底解决，必须坚决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争取早日实现民族自治，建立人民自治政府。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邀请东蒙自治运动领导人组成东蒙人民代表团参加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东蒙古遂组团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便着手筹备召开东蒙人民代表会议。1946年1月中旬，在葛根庙召开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中共西满分局、西满军区支持并参与了这个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东蒙自治政府，确定东蒙政府的辖属范围中包括巴林蒙旗在内的昭乌达盟等五个盟，随后向各盟委派官员。自治政府向林东派出萨嘎拉扎布等人筹建昭乌达省政府。

在萨嘎拉扎布等人到达林东之前，巴林左翼旗和子章所统辖的部队与驻林西的热北方面已经发生了两次摩擦。和子章在巴林地区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实力人物。日伪时期曾被以“反满抗日”罪名拘捕过。光复以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哈丰阿委派当时在乌兰浩特的进步青年恩和森（和子章之子）、老布森普日来、呼和德力根三人到巴林左右二旗开展工作。东蒙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委任和子章为昭乌达自治委员会会长、巴林左翼旗旗长，昭乌达盟共同防卫警备队总指挥。苏青嘎、和子章遂尽快组建东蒙自治军。和子章在原巴林左旗自卫队的基础上，与奈曼旗、巴林右翼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扎鲁特旗联合组建了六个骑兵团，与三个司令部直属连，扩大了自治军力量，并在林东召开了卓索图、昭乌达两盟联防会议，成立了总指挥部，和子章被推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巴林左翼旗的林东街。

热北地委在林西成立以前，王逸伦、张焕然等同志来到乌丹林西等地，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扩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也是为了接管光复地区的需要，开始迅速收编一些敌伪武装，对各地蜂起的匪股进行招抚，当时共编为18个支队，人数二千余。由于时

局的原因这些武装虽然被收编,名义上打着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号,实际没有经过整顿和改造,指挥失控,各支队基本上自行其事,有的为了抢占地盘进入蒙旗招摇撞骗。这些人大多是西拉沐沦河以南的汉族地主武装,根本不懂得执行党的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9月下旬有个名叫陈荣久的支队长,自称奉王逸伦司令员之命,找巴林左翼旗“责任者”,商讨接管之事宜。巴林的实力人物何子章以上宾相待,宴请于巴林左旗林东镇三庆园。陈在日伪时期曾于伪兴安西省供职,何的部下那苏图曾经认识他。加之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一问三不知,何子章遂对陈是不是共产党八路军产生怀疑。10月中旬,林西方面派支队长张振山率领一百多人去接管林东。张来到林东后,到四乡召集土匪,胡作非为。据热北档案资料记载,“张本人抽大烟,又是大汉族主义,与林东汉人邢桐仁结合,在街上贴打倒何子章的标语”。和子章一怒之下将张振山所部缴械,为了不把事态扩大,将张逐出林东。10月底11月初,热北盛世恩又率十三支队六支队从乌丹经大板去接管林东。在大板盛部纪律非常不好。时任巴林右翼旗旗长的赵化民连忙派人去林东向和子章告急。和闻讯立即派自治军第一大队32人来到林东与大板之间的老道板地方警戒,一面派代表来大板与盛世恩商谈缓进。盛世恩不听,率部向林东进军。在老道板双方交火,盛部死亡2人,扔下汽车,撤回大板。在大板抢劫民户百余,缴了大板警备中队的马匹枪械,还把牧民捐资兴学的马匹没收,名为没收日伪留下的财产。此次行动,给党的民族地区工作造成极坏的影响,还被巴林右翼旗保安队扣押盛部五六十人。事件发生以后,热北方面对此极为重视,立刻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昌前来大板。

刘昌同志是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并且参加中央党校学习过的老同志。他来到大板后,发扬党的民族工作的优良传

统,向巴林右翼旗旗长赵化民宣传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这一件事刘昌同志曾撰文回忆说,当时他在大板同旗旗长赵化民和旗自卫团团团长钟乃交谈时,转达了热北地委负责人向巴林左右两旗各族人民的致意,向两旗旗长和子章、赵化民表示问候,赞扬了他们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的成绩。他代表热北向旗方献上两条烟卷。赵化民等以上宾之礼接待他。席间饮酒谈心通宵达旦。他取出自己在延安时入中央党校的证件给大家看,详细介绍中共的历史、一贯主张及对内对外的政策,特别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还介绍中共蒙古族代表人物云泽等人的情况。旗方了解到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他们说真八路来到草原,都十分高兴。赵化民钟乃也谈了巴林蒙旗情况和巴林蒙古人的愿望。大板街的一些群众过去听说八路军个个飞檐走壁,但没见过什么样儿,这回八路军领导人来了,都在窗下偷听偷看,争先恐后一饱眼福。次日,在大板街召开群众大会,刘昌根据协商好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介绍八路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同时也毫不隐瞒地公开地在大会上检讨盛部一些指战员违犯群众纪律的错误行为,也分析了一些客观的情况。明确表示凡是拿走的东西,有物还物,无物照价赔偿。刘昌回林西以后,对在大板破坏群众纪律的干部撤职解除武装。这次会议开得气氛和谐非常成功,后来称此次为第一次“摩擦”,这次在双方努力下解决得十分圆满。

大板摩擦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只是局部和解,有关管辖地域的大局没有得到解决。1945年12月27日和子章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昭乌达盟政治委员的身份,致信热北党政军负责人王逸伦、卜云龙、张盘新、张焕然等人。他在信中说:“本委员即奉内蒙人民解放委员会之命,建设昭盟一带,因责任及管辖的领域攸关,不得不先行通告,故所诸位责任者,务于本月三十日

以前率领真正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退出林西经棚等地，余将由当地编成之武装土匪应交我方处置，并巴林右旗内损失之枪弹马匹牛羊及钱款衣类（如赔偿契约）、林西县内损失之枪弹马匹人员以及捐入之宗教款项全数交出，以作本党治下受害各旗县地方行政、教育、治安等正当用途。对上项之损害，诸位责任者若无适当交待，难免破开情面，至使发生重大交涉。”

此信之前，12月上旬，和子章命团长恩和图布新率自治军四百人占领当时属林西辖属的五区、二区和一区的一部分，抓走五区副区长张治中、民政助理李涛。和军推至林西城下，一时气氛十分紧张。王逸伦当时不在林西，带着克旗旗长礼通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要员张雨，去赤峰找有关人员寻求解决热北地区地域管辖的办法。苏军留守部队将机枪大炮架在城头，阻止和部进攻林西县城。在战斗一触即发之时，林西县长苏雷请示热北地委同意，只带一名警卫员，坐上苏军汽车，前往大板找和子章赵化民交涉，几经周折最后在林西冬不冷村周家大院找到了和赵。这一情形苏雷曾著《1946年我热北当局与和子章会谈忆述》一文。文中是这样记叙的：当时和赵住在一家地主的大院里。他们听说我去了，感到十分惊讶，严加戒备，士兵个个荷枪实弹，并架有机枪，如临大敌。他们让我和警卫员在荷枪的士兵中间通过。会谈中我提出立即释放张治中、李涛二人，并向和赵坦诚地耐心细致地说服他们认清形势，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及实行区域民主自治的主张。经过交涉，和赵同意释放张治中、李涛，为了不发生武装冲突，自治军撤出林西，热北方面的军队也不越界，并商定迅即在林西谈判。苏雷回到林西后，王逸伦和苏军驻林西负责人马丁洛夫回来了。12月31日会谈开始，和赵并没有如期赴会，而是派那苏图、查干朝伦参加。会谈中苏军马丁洛夫按照上级指示，要求和部退出林西县境，恢复和平局面。热北方面党政军领

导热情接待了那苏图和查干朝伦，临别时向他们赠送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并希望二人回到蒙旗后转告热北方面对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各族人民的问候。此次冲突告结。后来将这次军事冲突认为是双方第二次“摩擦”。

此后逾年，热河八路军主力三十旅六十八团开进林西，热北方面的军事力量增强。同时对解放初期王逸伦、张焕然组织的十八个支队“旧兵”进行了清理。此次清理裁汰 1600 多人，仅留下 180 人。兵员虽然减少，但部队的战斗力增强。第二次“摩擦”后苏军出面调停，和部退兵，但和子章认为林西东北部的五十家子原归巴林左翼旗管辖，因而未从这些地方撤兵。后来屡经协商，热北方面要求和退出五十家子，和对撤军很不情愿，以等待“赤峰谈判”而拖延时间。热北方面则进军五十家子。这一情况在孟克执笔撰写的《和子章与蒙旗四师》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和子章与警卫连住在五十家子村东的一座庙里，派扎拉嘎呼、哈斯道尔吉等进村宣传东蒙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扎拉嘎呼等住在一户姓王的百姓家。王家告诉他们形势紧张，请他们赶快撤到河东。2月23日，和子章一面向白塔子方向撤离，一面派哈斯道尔吉回林东向那苏图告急。24日黎明，六十八团和林西部队向永生号五十家子发起进攻，和部死亡二人，被俘二十余人。24日下午，金宝光率一连人来报复，热北方面牺牲指导员一人，战士二人。2月25日，巴林左翼旗出席赤峰谈判的代表归来，带来由八路军胡锡奎政委与内人党代表包玉昆共同签署的协约。其内容为：双方停止一切冲突，八路军在热北方面的工作保留现实状态，双方公务往来互相保护，百姓和商人往来不得限制，若有土匪双方联络剿除。

3月中旬，以萨嘎拉扎布为首的东蒙工作团到达林东。3月17日，按照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命令，昭乌达省在林东成立。萨嘎



拉扎布任省政府主席、那苏图任秘书长。同时组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四师，和子章任师长。明确昭乌达省所辖范围为克什克腾旗、巴林右翼旗、巴林左翼旗、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

这一时期，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冀热辽分局由东北局划归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任命以程子华为书记的冀热辽中央分局领导人。中央书记处指示，内蒙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群众，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提出内蒙古政策要点，即帮助各盟旗建立政权，组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以此作为建立内蒙古统一的自治政府的基础；准备成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发展蒙古民族经济文化改善蒙民生活。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热河形势与军事方针的指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云泽（乌兰夫）任联合会主席、军事部长、党委书记。联合会着手解决东蒙古问题与东西部内蒙古统一领导的问题，并筹备在承德召开东西蒙自治运动会议，明确东西蒙的统一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

3月20日，东蒙古自治政府准备参加承德会议的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哈斯巴特尔等人到达林东，指示昭乌达省政府和自治军骑四师，内蒙古自治运动要靠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热北地委和军分区是真正的八路军共产党，要与热北方面真诚合作，共同开展工作。要求和子章、萨嘎拉扎布亲自去林西商谈消除误会，并经过联络，决定会谈地点在林西县城。3月25日，昭乌达省会谈代表团组成。和子章因感冒身体不适未能成行，萨嘎拉扎布、那苏图、确吉敖斯尔、贡嘎丹儒布一行四人于3月底到林西。因热北方面领导人去承德开会耽延几日。承德会议结束后，4月8日至12日，中共热北地委与昭乌达省代表经过商谈达成协议。昭乌达省接受中国共产党热北专署的领导。昭乌

达省政府与热北军分区联合发出《关于林东大板两旗目前工作暂行办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于漠漠荒原跋涉中的包括巴林在内的昭乌达各族人民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出路！会谈的内容在云泽 1946 年 4 月 10 日《关于昭乌达盟行政军事及蒙汉关系诸问题的决定》中是这样叙述的。

A 关于热河北部昭乌达盟行政军事及蒙汉关系问题，与博彦满都等决定，解决办法如下：

(一)、开鲁、林西、经棚三县、林东汉民行政委员会及克什克腾、巴林左、巴林右、阿鲁科尔沁、扎鲁特五旗、归昭乌达盟民主政府领导；开鲁暂归西满军区；昭盟受热河省政府领导。

(二)、林东汉民区设汉民行政委员会，直接归盟领导。

(三)、大板、天山、鲁北设汉民自治区，并在旗政府内设汉民自治科。

(四)、盟政府委员蒙汉各半，盟长为蒙人，副盟长为汉人。

(五)、一切汉民工作由八路军去作，责任人选由八路军提出。

(六)、民主盟政府的选举，应尽速进行，于最近期内办妥。

(七)、八路军之分区司令部等机关迁驻林东。

B 规定各地内蒙古军队分别地域属八路军各军区领导指挥。

C 此次热河省政府已给东蒙银洋三万，救济王爷庙机关工作人员及贫困蒙民。

承德会议决定和《暂行办法》的制定充分体现了昭乌达省政府拥护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愿与共产党八路军实行合作，实现蒙古族长期以来要求民族自治和民主平等的热望，也表明了热北党政军民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支持草原蒙汉人民实现民主和自治愿望的要求。双方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的，本着毛主席中

## 曙光初上地平线

---

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与东蒙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的原则，在互助互爱协同工作，为蒙汉人民服务的精神下，实施《暂行办法》的初衷。

荒原耐跋涉，曙光在前头，一轮红日在巴林草原冉冉升起。

## 二十七 民主自治的号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信任八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内蒙古向何处去,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朝什么方向发展?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新的抉择。

日寇投降,统治内蒙古东西部的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政权伪满兴安总省和伪蒙疆政府随之垮台。内蒙古草原广大地区蒙汉各族人民一面欢呼抗战胜利,一面忧心忡忡。国民党政府为夺取胜利果实,抢占了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并宠络少数王公贵族,派遣特务,秘密建立国民党党部。1945年8月25日,国民党政府根据波茨坦公告,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内蒙古怎么办?一时成为内蒙古各地各阶层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一些蒙古族上层人士,大造舆论,力图把内蒙古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大蒙奸伪蒙疆政府头目德王、李守信之流则妄图使内蒙古“独立”,从中国的版图分裂出去。1945年9月9日,以原伪蒙疆高级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为首的一伙,欺骗拉拢引诱一些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在苏尼特右旗建立“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还打出国旗,派出外交使团。在东蒙古地区,少数曾在伪

蒙疆和伪兴安总省任过要职的官僚政客和王公，打起民族的旗号，搞“内蒙古独立”和内外蒙合并活动，借宣布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发布《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之机，主张内蒙古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发动内外蒙合并的签名运动。广大内蒙古人民渴望早日获得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贫穷落后状况，对那些政治煽客搞“独立”“合并”极大愤慨。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但又不愿意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他们渴望民主自治，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缺乏明确的方向。在这关键的时刻，领导内蒙古人民走向光明，取得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胜利的重担，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人民的命运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一直十分关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为解决蒙古民族解放问题，不仅制定了理论和政策，培养了大批蒙古族干部，还着手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工作，组建中共绥蒙区委员会、绥蒙政府和绥蒙军区，派大批蒙汉干部来到内蒙古地区，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针对国民党建立“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的企图，中共中央作出“力争绥察热全境”的战略决策，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目前我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古在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适当解决民族问题，不但关系到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的后防及同苏蒙军联系的有力地位”，“对内蒙古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为了实施这一方针，中央派2万名干部10万大军挺进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这就为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创造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央还派云泽(乌兰夫)率一部分蒙族干部到内蒙古领导民族自治运动。

1945年9月,云泽、奎璧等来到内蒙古后,首先解决“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他们来到苏尼特右旗,同参加“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深入到蒙古族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阐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蒙古民族解放面临的形势,揭露补英达赖打出的“独立”旗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及使蒙古族陷入深渊的可怕境地的危险性,从而孤立了反动势力,争取了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和谋求民族解放的上层人士。通过选举,改组了“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云泽当选为主席,剥夺了补英达赖的领导权,将这个临时政府迁到张北,下令解散。“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遂停止了活动。尔后,云泽电告中央,准备成立一个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组织,以便开展工作。11月10日,中央书记处回电,同意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自治运动联合会是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首脑机关。11月23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进一步明确提出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具体政策:首先建立各盟旗区域性自治政权,发展各盟旗的经济和文化,改善蒙古族人民的生活,逐步建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权;发动群众建立和改造各盟旗政权,在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了保证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顺利进行,在各盟旗组织保安队和民兵,维持地方秩序,改造旧军队和训练军队干部,建立维护内蒙古人民利益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

1945年12月25日至27日,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领导下,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昭

乌达盟、卓索图盟的各旗与阿拉善旗、额济纳旗、郭尔罗斯后旗、东西布特旗、索伦旗等 36 旗代表和军政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云泽主持会议并向大会提交《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的意见案》，提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在内蒙古的历史上，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内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赞助下，才能求得彻底解放，才有光明灿烂的前途。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方针是：在政治上通过自治运动，首先建立各盟旗民主自治政府，逐步实现全内蒙古的自治，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军事上建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以肃清境内的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巩固革命的社会秩序；在经济上提倡合作贸易事业，禁止和取缔奸商，发展蒙古族人民的畜牧业生产，发展原有的手工业，没收敌伪资产，创办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和救济贫苦人民；在文化教育上，发展教育事业，创办内蒙古自治学院和各种训练班，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在卫生事业上，在各盟设立一小型医院，组织和改造喇嘛医中医等医疗人员，为人民为生产服务；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庙财产。大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以及一系列关于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的决议案，还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谢电。会议选举云泽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真正竖立起来了，自治运动的号角在内蒙古草原吹响了，也标志着内蒙古人民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自治运动的群众团体，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前，代行政权职能，是半群众团体半政权性质的组织。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以后，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政策,使蒙古族人民真正认识到民族解放的道路,消除了历史上由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实行了真正的民族平等。联合会派出东蒙工作团,到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兴安盟王爷庙一带开展工作,以推动东蒙自治运动的发展。1946年1月,中共热北地委成立,领导昭乌达盟工作。4月,在王爷庙成立了中共东蒙工委,以八路军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为了解决东蒙古的问题,经中国共产党东北局提议,在中共冀热辽分局主持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自治政府于1946年3月30日,在承德召开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问题的会议。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和民主协商,最后统一了思想取得了一致的意见。4月3日,举行正式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实现。目前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各盟旗建立分支会,实现其纲领,应建立各盟旗民主政府,分别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的领导及帮助。二、解散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总分会,领导东蒙自治运动。三、蒙汉杂居区实行蒙汉分治,盟管旗,专署管县。在蒙旗汉人集中的地方,实行民主自治,受民主盟政府的领导,盟旗政府根据情况应有汉人委员。四、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事武装,并处理内蒙古建军、整编、训练、人事等问题。各蒙古军队按地域属八路军各军区领导指挥。五、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民主自治运动,大量发展会员,建立分支会,改造旧政权,预防特务破坏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及一切反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行为以打击。

这一次会议是蒙古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打破



东西部蒙古民族数百年来的分裂局面,使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明确地提出了内蒙古自治运动是群众性的民族民主自治运动,而不是少数封建上层人物的封建的民族自治运动,也不是反动人物的民族分裂自治运动。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及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内蒙古的民主自治运动一步步走向胜利,“四、三”会议有着深远的意义,它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

“四、三”会议的成功召开使昭乌达盟的问题应刃而解。会议期间作出的《关于解决昭盟军事、政治及蒙汉关系诸问题的决定》,为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三”会议结束以后,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和“四、三”会议精神与决定的主要事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决定派联合会执委会常委乌力吉那仁来昭乌达盟,负责领导昭盟分会的筹建工作。哈丰阿等人也向冀热辽中央分局要求派党员干部到林东筹建分会。分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决定派徐子干等到昭乌达盟工作。

4月下旬,徐子干到达巴林左翼旗林东。4月末5月初,乌力吉那仁从承德出发,经赤峰到林西,与中共热北地委、二十军分区接洽工作,之后来到林东。经过紧张地筹备,1946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在林东成立了。按照《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规定,分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委员9人。乌力吉那仁任主任,那苏图任副主任。委员有乌力吉那仁、那苏图、萨嘎拉扎布、和子章、却吉敖斯尔、徐子干、义德嘎苏隆、阿民布和、斯布吉德。这些委员中除萨嘎拉扎布、和子章是民族上层人士外,其余都是进步的蒙古族青年。分会设组织

科,科长义德嘎苏隆;宣传科,科长却吉敖斯尔;秘书科,科长徐子干;军事科,科长阿民布和;青年科,科长斯布吉德;妇女科,科长那仁高娃。

分会建立后,为了尽快建立昭盟各旗支会和努图克支会。于6月份在林东举办干部训练班,从中选拔积极分子,派到各旗筹建旗支会。克什克腾旗支会于1946年3月份先于盟分会建立,旗支会主任查干楚伦;巴林右翼旗支会7月建立,旗支会主任额尔恒巴图;巴林左翼旗支会7月份建立,旗支会主任扎拉嘎呼,副主任额尔敦朝克图;阿鲁科尔沁旗支会7月份建立,旗支会主任道布钦巴拉珠尔,副主任哈日乌拉。12月道布钦巴拉珠尔牺牲后,哈日巴拉接任旗支会主任;扎鲁特旗支会7月份建立,主任赛音巴雅尔,副主任额日巴拉。旗支会受盟分会的直接领导,内设组织股、宣传股、军事股、青年股、妇女股、秘书股。各旗支会建立以后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建立各努图克支会。至此,昭乌达盟分会的所属各旗支会及大部分努图克支会相继建立起来。昭乌达草原在盟分会和旗支会的领导下,民主自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开展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选择积极分子培养民族干部。民族地区的工作要靠民族干部来完成,民族干部的选拔与培养是第一位的工作。盟分会旗与努图克支会建立起来后,缺少干部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一段时间,一些支会架子虽然搭起来,但是缺少干部,特别是蒙古族干部。分会为了选拔和配备各支会干部,1946年6月,在林东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民族干部训练班。学员由各旗选派,条件是热心于民主自治运动,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的蒙古族青年。为了保证学员的政治质量,还规定入学青年要重点选拔那些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奋斗者,决心为内蒙古人民服务者。为了照顾学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还规定只要具备条件不分平民、贵族和喇

嘛都可入学。经过选拔,此期学员共 150 余人,大部是有革命热情具有初级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是青年同盟的成员。训练班学习的内容是关于国内形势和政治动向,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和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宗旨、纲领和任务等。培训班还学习了“四、三”会议的有关文件。学习的方法灵活多样,听报告谈体会也开展讨论。热北地委书记王逸伦副书记权星垣、二十军分区司令员喻楚杰、盟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萨嘎拉扎布副主席吴广文、四师师长和子章等都在训练班上讲话或做报告。这期民族干部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分赴各地,绝大多数充实到旗努图克的领导岗位,成为领导民主自治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些人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担当重任,做出了很大贡献。

其二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盟分会成立后,本着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精神,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关于发动蒙民群众清除封建特权的宗旨,从 1946 年 7 月开始组织工作组,由盟分会和旗支会的主要领导带队,分赴各旗和各努图克,开展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放“新苏鲁克”的民主改革工作。工作组到基层后,走艾里串牧户,访贫问苦,同贫苦牧民交朋友,向他们宣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的实质,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宣传实现民主自治的重大意义和美好前景。通过这些宣传工作,启发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团结一致,推翻封建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各旗普遍开展了清算复仇、减租减息斗争。

分会秘书科长徐子干、宣传科长确吉敖斯尔带领 28 名蒙古族青年积极分子,来到蒙古族人口集中的巴林右翼旗发动群众,

清算斗争了大牧主喇嘛上层民愤较大的葛万普乐,没收了其房屋及部分财产,很快打开了局面。分会主任乌力吉那仁、青年科长斯布吉德、巴林左翼旗支会主任扎拉嘎呼、林东行政委员会主席苏雷、骑兵四师师长和子章带领工作组和武装人员来到巴林左翼旗蒙汉杂居的碧流台努图克发动群众,清算恶霸地主崔海三。工作组到了努图克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民主改革主张和民族政策,很快消除了蒙汉群众的思想顾虑,组织起近千人的清算队伍。斗争清算工作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按照减租减息的政策规定,清算出马牛等大牲畜 320 多头匹,粮食 1000 余斤。这次清算斗争,不但贫苦的蒙汉群众分得了胜利果实,而且使农牧民基本群众看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同时消除了蒙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增进了团结。分会组织科长义德嘎苏隆于 1946 年 8 月到扎鲁特旗,组建由旗支会主任赛音巴雅尔为团长、副主任额日巴拉为副团长的 60 多人的群众工作团,分两个组分别到恩格敖包和西王府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清算复仇废除封建特权的群众斗争热潮。阿鲁科尔沁旗支会于 8 月组成了群众工作队,由旗支会主任道布钦巴拉珠尔带领,到罕苏木、乌兰达坝、沙尔他拉、昆都努图克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斗争,解放了一些家奴和奴隶,发展了会员,建起了努图克支会。

其三是改造旧政权。盟分会建立以后,按照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宗旨,积极参加昭乌达地区的行政管理和对旧政权的改造工作。昭乌达地区在“四、三”会议以前,1945 年 11 月中共冀热辽分局热北地委、军分区和热河省热北专员公署在林西建立后,负责昭乌达地区的政治军事工作。1946 年 3 月,东蒙古自治政府派出以萨嘎拉扎布为首的东蒙工作团,在林东建立了昭乌达省政府,辖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巴林右翼旗、巴林左翼旗、

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开鲁县。当时的旗县政府除林西县政府是热北专署建立的,其余“五旗一县”都是东蒙自治政府在光复初期的地方维持会的班底上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大都是原伪政权的人员。“四、三”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决议,并经过协商达成昭乌达地区政权建设与改造的意见和办法。热北专署与昭乌达省政府合并,建立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除林西县外,其它五旗实行蒙汉分治。在巴林左翼旗建林东行政委员会,领导汉民区的工作,克什克腾、巴林右翼、阿鲁科尔沁、扎鲁特四旗在旗政府内设汉民科,管理汉民区的事务。当时开鲁县划归西满分局。“四、三”会议以后,本着已经协定的办法,5月9日,热北地委、军分区领导机关迁驻林东。6月5日建立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接收了前昭乌达省政府的一切行政事宜,宣布撤销昭乌达省政府。

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即开始了对盟旗两级政府改组工作。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和各旗支会本着“四、三”会议决议的宗旨参与了盟旗政权改组事宜。在改组的过程中,为了充实政权力量,将热北专员公署的部分老区干部和盟分会旗支会的一些干部,充实到盟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旗政府。党派到蒙古草原开展革命的老区干部吴广文担任了盟临时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盟分会副主任那苏图担任了临时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分会组织科长义德嘎苏隆、宣传科长却吉敖斯尔担任了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在各旗政府改组时,一批革命老干部出任领导职务,苏雷担任林东行政委员会主席,陆棣担任克什克腾旗汉民科科长,雷代夫担任巴林右翼旗汉民科科长,惠北海担任阿鲁科尔沁旗汉民科科长,秦纯一担任扎鲁特旗汉民科科长。各努图克支会建立以后,对努图克政府也普遍进行了调整,各努图克支会主任大都担任本努图克的努图克达。至此,昭乌达盟各级政权的

干部成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有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保证。

其四是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建立以后,为了实施“四、三”会议决议中制定的“团结内蒙古各族各阶层人民,建立广泛的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注意并着手在那些拥护人民解放战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上层宗教上层人士中开展工作,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团结他们,把他们吸收到民主自治运动中来,给他们以工作,有的还让他们担当军政要职,以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和子章是昭盟地区影响较大的民族上层人士。他握有军权,在昭盟地区是实力人物。争取和团结他,同他合作,稳定昭盟局势,发展民主自治运动,是党在昭盟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分会建立时,分会秘书科长徐子干来到林东后,首先会见和子章,向他传达“四、三”会议精神和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动员他出来在分会担任领导职务,在蒙骑四师整编中,继续让他担任师长和蒙汉联军副司令员。和子章深明大义,在党的信任和政策感召下,与共产党真心合作。1946年11月,国民党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派特务携带劝降信阴谋策反他。他毅然将3名特务拘捕交给蒙汉联军司令部,并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枪决。和在公审会上痛斥蒋介石坚持独裁,发动内战,搞大汉族主义,欺压少数民族的无耻罪行。他说:“为保卫我昭乌达盟,为我蒙古民族解放,我将率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师全体指战员,对反动派作殊死战。”在解放战争的艰苦时期,他主动将自己的部分财产捐献出来,表示了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心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他在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党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诸多有益的贡献。

阿鲁科尔沁旗的苏达那木先生清代在旗扎萨克衙门当过协

理,日伪时期当过伪旗长。“八、一五”光复以后,他拥护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主张,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四、三”会议以后,分会支会的领导同志认为他有民族气节,很受群众拥护,在阿鲁科尔沁旗是有威望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物,便团结他,信任他,帮助他,在蒙汉分治其间,仍让他任阿鲁科尔沁旗旗长。苏达那木感谢党对他的信任,在任期间,为民族自治民主改革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还主动参与减租减息斗争,把自己家的财产率先献出来分给贫苦牧民。

蒙古民族的宗教上层人士,在蒙古民众中有着一定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拥护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团结吸收他们当中的进步人士,发动他们参加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和民族解放斗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分会对待宗教上层人士,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政策。分会建立后,开办了几次蒙古上层人士培训班,每期培训班,都吸收一些葛根喇嘛和一般喇嘛参加学习。第二期培训班,经各庙推荐有18名喇嘛参加。在训练班上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启发动员他们参加到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中来。另一方面,在清算斗争和牧区民主改革中,尊重他们,一切按政策办事。巴林左翼旗善福寺的活佛阿民葛根,在清算斗争中蒙族群众分了他的浮财,把他心爱的全鞍马牵走了,分会的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主要去做牧民群众的工作,把全鞍马退还给他。他很感动,积极主动地参加自治运动,后来还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回来后,他走村串户宣传大会的情况和人民政府施政纲领,在蒙古族群众当中产生良好的影响。分会在团结宗教上层人士时,十分注意宗教习惯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1946年秋,分会的乌力吉那仁、徐子干、斯布吉德等人到巴林左翼旗敖尔盖努图克床金庙开展工作。在庙会期间,不少蒙古族群

众来庙里给元敦扎木苏葛根磕头，因有分会的人在，活佛不敢出来见信徒。分会的人员允许活佛出来接收蒙民群众的膜拜，同时向活佛讲述党的信教自由的宗教政策。活佛很高兴，之后他积极参与民主自治运动，订报纸学时事，后来被推荐到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嘹亮的民主自治号角鼓舞着巴林草原各族人民，走向新的胜利。



## 二十八 蒙汉联军战旗飘

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灾难深重的东蒙古人民获得了解放，获得了自由。解放区的人民正兴高采烈的庆祝这一伟大胜利的时刻，国民党在东北建立了兴安省，妄图统治东蒙古各族人民。对此，在蒙古地区的各界仁人志士和广大劳苦群众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这一手段。尽快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实现民族平等，把革命推向深入，是当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这关键时刻，东蒙古进步知识分子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各级组织。宗旨是：清除一切封建余毒，发展经济，保证劳动人民的自由平等和美好生活，保证蒙古地区的人民无论什么民族都能实现平等的权力；配合中国革命的政党彻底完成蒙汉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国家和民族政权未建立之前要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在内蒙古地区建立各级临时自治委员会，维护地方治安；在工业、交通、内务、外事、财政、文教、卫生、经济建设等方面要模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验；继续协助为我们东蒙古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作战的苏联红军，彻底清除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积极参加人民的解放事业。由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和苏联红军的支持，西拉沐沦河以北的各旗县相继

建立了维持会等临时政权机构。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维护民族利益,各旗县都成立了自卫队、警备队等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地方武装。以巴林左翼旗和子章为首的进步人士组建了200余人的自卫队。不久和子章对自卫队进行整编,此时人数超过500,枪支300余,初步形成了一支捍卫地方的民族武装队伍。这支队伍大部分是当地蒙古族青年。他们自备马匹和武器,不脱产不离家乡,保卫地方治安和维护蒙古族牧民利益。和子章本人虽不是封建贵族出身,但以其思想开拓,不畏强暴,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经验,在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地方实力人物。昭乌达盟各旗在和子章和巴林左翼旗地方保安自卫队的带动和影响下,都纷纷组织地方自治武装。巴林右翼旗的一些嘎查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自卫武装,公推钟乃统一指挥。克什克腾旗则由一些进步青年倡导,组织起120多人的自卫队。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也形成了由民族上层、伪军警人员组成的武装。这些武装大体上都有二三百人。为了统一行动,1946年1月3日,在巴林左翼旗和子章的倡导下,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扎鲁特旗、奈曼旗、翁牛特左翼旗、开鲁县、喀喇沁旗共九旗十八名代表在林东召开联防会议。会议商定成立昭乌达盟警备总队指挥部,统辖各旗自卫队,公推和子章为总指挥(和子章当时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昭乌达盟政治委员、昭乌达盟自治委员会会长)。

不久,东蒙古自治政府在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的帮助和支持下于王爷庙(乌兰浩特)成立。自治政府决定组建东蒙古自治军,并派萨嘎拉扎布等来昭乌达盟筹建昭乌达省政府和自治军骑兵第四师,萨嘎拉扎布出任昭乌达省政府主席,和子章任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师长。和子章受命后当即发布命令,原来的昭乌达盟自治军(警备联防总队)所属各团悉听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的

指挥,共编为六个团(巴林左翼旗建两个团,巴林右翼、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扎鲁特、奈曼旗各建一个团),统称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师司令部于1946年4月1日在林东(当时昭乌达盟所在地)正式成立。司令部设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卫生、生产六处。师辖六个团:三十二团,团长恩和图布新,驻巴林左翼旗;三十三团,团长博拉哈,驻巴林左翼旗;三十四团,团长钟乃,驻巴林右翼旗;三十五团,团长额尔登格,驻阿鲁科尔沁旗;三十七团,团长鲍长寿,驻克什克腾旗;三十六团,团长洪富升格,驻扎鲁特旗。

这支民族武装,是昭乌达地区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人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6年4月3日,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在承德召开了东西蒙统一的“四、三”会议。会议确定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次会议决定:内蒙古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散内蒙古革命党的各级组织,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在未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前,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发动蒙汉人民,搞好民族团结,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反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后防根据地。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派党代表吴广文、徐子干等到昭乌达盟开展工作。4月15日驻林西的热北专署王逸伦和林东东蒙古自治军和子章谈判获得成功,达成了共同协议。和子章欢迎林西的热北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机构迁往林东。从此,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和昭乌达省接受了中共热北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

不久撤销了昭乌达省政府,建立了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东蒙古自治军骑四师也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四师,接受热北军分区统一指挥。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议,

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东北，党中央制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军事战略方针。10月初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通辽开鲁。10月10日，占领了赤峰。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军区和省政府机关从承德迁驻林西。以林东大板林西为中心的昭乌达盟成为东蒙古解放区的后防，冀热辽的政治中心，连接华北、东北、晋绥解放区的交通要道，因而这里也是国民党拼力争夺的地方。这时保卫解放区的后防，保卫昭乌达盟，保卫巴林草原在战略上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活跃在草原上的这支民族武装力量——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师当然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拼死争夺的对象，他们在武装进攻昭乌达地区的同时，不断派遣特务到昭乌达地区进行活动。他们采取封官许愿等拉拢收买手段，向刚刚建立的自卫军第四师策反。因此迅速地团结、改造这支军队，使之真正成为人民武装，是当时十分迫切的任务。

在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中共昭乌达盟地委、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决定成立蒙汉联军司令部，对自治军第四师进行整编。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中共热北地委派刘昌、吴广文、徐子干等先后到自卫军第四师开展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培养和选拔蒙古族干部到四师的领导岗位上。孟和舞乐极、道布钦、斯布吉德道尔吉、敖德斯尔、巴嘎雅、白英等民族干部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师团的主要领导岗位，并通过他们团结民族干部使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连排的主要领导岗位，为四师的整顿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10月18日，按照冀热辽军区的命令，组建了昭乌达盟蒙汉联军司令部，司令员喻楚杰、政治委员权星垣、副司令员和子章、副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参谋长阿民布和、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副参谋长卜云龙、政治部副主任刘昌。10月28日在林东召开蒙汉联军成立大会。蒙汉联军司令部建立后，

即着手对骑兵四师进行整编。10月末,在阿鲁科尔沁旗天山召开蒙汉联军所属连以上干部会议,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李运昌到会作了形势报告,检阅了蒙汉联军所属部队。这次整编选拔了一批青年官兵到内蒙古自治学院、内蒙古军大和二十军分区教导队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军政素质。在组织上,从师到团增设政治部(处),配备政治委员。经过整编,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师改编为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师长和子章、政委乌力吉那仁、参谋长阿民布和、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政治部副主任刘昌。整编后的四师下辖5个骑兵团和3个师直属连,兵员为3386人,战斗力大为提高。

1946年九、十月间,在整编与改造的进程中,四师中的一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勾结国民党叛变投敌。9月份,在整编中被免去团长职务的原三十七团团团长洪富升格,连长宝音陶格陶(二虎)等人叛变,绑架了民运部长范文彩,杀害了团政治部主任阿民塞和。11月份,驻巴林右翼旗三十四团三连连长韩桑杰及排长丁合尔扎布、二连连长乌尔他叛变,杀害了蒙汉联军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及却吉僧格、王金宝等8人。三十五团团团长额尔登格,与其兄反动喇嘛塔尔巴叛变,绑架了副支队长兼参谋长业喜扎拉森,杀害了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裹胁驻守在阿鲁科尔沁旗的三十五团官兵,与相继叛变的公安队长孙根全投靠国民党李守信部。这一时期,在生死抉择的革命斗争形势面前,四师广大官兵,尤其是蒙古族青年,在师部的领导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谋求蒙古人民的彻底解放,不惜流血牺牲。四师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听到乌尔他要叛变的消息,为稳定三十四团官兵,不顾个人安危前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料被叛匪逮捕。敌人软硬兼施逼他投降,蒙和舞乐极誓死不屈英勇就义,年仅30岁。四师第一支队参谋长叶喜扎拉森,被叛匪额尔登格绑架到国民

党那里时,他不为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动摇,最后壮烈牺牲。三十五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在全团几乎被额尔登格欺骗叛变的情况下,赶赴团部进行劝阻和坚决斗争,最后被叛匪杀害。许许多多为谋求解放的蒙汉各族坚强战士用鲜血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四师的广大官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在两个前途两个命运的残酷斗争中,和子章更加坚定了跟随共产党的决心。他为了提高蒙骑四师指挥员的政治素质和指挥能力,1946年6月与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李子光联系,选拔10名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到冀热辽高级军事研究班深造。这些人回到四师后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7年2月四师进行了第二次整编,主要内容为,一是将蒙汉联军第四师所辖四个团(原五个团,驻扎鲁特旗的三十七团在整编前划归辽西军区)编为两个团。将原三十四团与三十六团的一部分编为三十一团,将三十二团与三十五团编为三十二团。新编三十一团驻巴林右翼旗,团长却吉敖斯尔,政委斯布吉德道尔吉,副团长吴振邦,政治处主任白英。新编三十二团驻克什克腾旗,团长包英昌,政委张华廷,参谋长乌兰巴尔斯,政治处主任敖德斯尔。二是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各连都配备政工干部,在训练中增设政治课,进行阶级教育、政策教育、形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三是审查部队成分,进行组织清查,清除坏人,纯洁队伍。四是对干部加强培训,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送到内蒙古自治学院、内蒙古军大、二十军分区教导队进行短期轮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五是在连队发展党团组织。整编完毕每个连队都有五六名党员和十来个团员,这些人成为连队中的骨干。整编后的骑兵四师司令部的组成人员为师长和子章,政委乌力吉那仁,副师长阿民布和,副政委刘昌,参谋长郎布仁钦。政治部的组成人员为政治部主任刘昌、组织科长徐子干、宣

传科长博彦陶格图。还有保卫科长农乃扎布、敌工科长色仍尼玛、总务科长宝音乌达拉嘎、供给部部长图们仓、副部长乌梁海巴音福。为了搞好整编，司政两部组成了工作团，团长阿民布和、副团长刘昌。

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和子章被调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师长阿民布和接任骑兵四师师长。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经过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英勇奋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整编后的骑兵四师，以崭新的姿态参加解放战争中去，按照冀察热辽军区命令，四师全部投入剿匪战斗。

从四师叛变的几股匪徒，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暴露了更加凶恶残暴的本性。他们回窜昭乌达草原，破坏土地改革和人民政权建设，残害革命干部，拦劫交通，抢掠民众，无恶不作，给新生的革命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这几股较大的土匪头目有阿鲁科尔沁旗的塔尔巴，翁牛特旗的好特老秃喇嘛，克什克腾旗的白金辉、于秀成，林西县的“东坝天”，翁牛特赤峰一带的“二嫂子”，其中百人以上土匪有20余股。蒙汉联军四师为保卫昭乌达盟的革命胜利果实，在物资供应和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匪徒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间有几次大的战役，主要为天山保卫战、克什克腾旗陶力庙、白岔沟围歼战、对叛匪韩桑杰、二虎的追剿战，多伦外围的剿匪战等。

天山保卫战于1946年12月15日打响。当时从四师叛变出去的额尔登格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以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天山林东支队长，他率领300余匪众，纠合当地反动武装，妄图夺取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占领昭乌达解放区。对于敌人的进攻，蒙汉联军骑兵四师三十二团和天山支队在师参谋长阿民布和、师政

治部主任刘昌的指挥下,将部队部署在天山街及附近地区。战斗打响时,冀察热辽军区增派一个加强营,也火速赶到战场。1946年12月15日,叛匪额尔登格纠集达里扎布东鲁布等匪伙,共1300余人袭击天山街东30华里的黄羊洼,随后大举向天山街发起快速进攻。与此同时,乌尔他、好特老匪伙配合额尔登格在马鬃山白音布统一带侧翼向天山运动。天山街处于敌人的钳形攻势之下。额尔登格匪部占领了天山街的东山,控制了制高点。战斗形势对蒙汉联军十分不利。联军曾派出部队夺取山头,但未能成功。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阿民布和、刘昌指挥蒙汉联军骑步兵,佯装撤往北大山麻痹敌人。匪徒们以为阴谋得逞,欲下山占领天山街。这时,蒙汉联军炮兵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东山阵地猛烈开炮。敌猝不及防,机枪阵地和指挥所被摧毁,阵容大乱,东如布率其匪部逃跑,其余的纷纷溃散。蒙汉联军乘胜追击,在巴奇楼子庙、白音他拉大村一带重创匪部,取得了天山保卫战的胜利,残匪仓惶逃回开鲁。2月26日,我军一举攻克开鲁,国民党守城部队被我军全部歼灭。国民党骑兵司令李守信扮妆商人逃命。

克什克腾旗境内的陶力庙白岔沟围歼战,是蒙汉联军同叛匪及反动地主武装又一场激烈的战斗。活动在克什克腾草原的布里亚特匪帮与当地悍匪白金辉、从四师叛变出去的乌尔他等匪伙破坏革命政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47年4月,他们在达里诺尔湖边亮子河畔袭击了蒙汉联军骑四师三十一团政委查干楚伦率领的一个连,给蒙汉联军造成很大伤亡。为了歼灭这些匪徒,巩固后防,骑四师师长阿民布和指挥三十二团与三十一团之一部,在陶力庙附近包剿敌人。经过激战歼敌70余,击溃300余,缴获重机枪两挺,战马600余匹,夺回被匪徒赶走的当地群众的牛羊万余,骆驼400余,此外还有车辆物资。6月,四师三十



一团又在师政治部主任刘昌的指挥下,在克什克腾旗白岔沟一带歼灭残匪 30 余。至此,克什克腾境内的土匪大部被肃清。

韩桑杰、二虎是 1946 年 11 月从蒙汉联军叛变出去的,在昭乌达盟作恶多端。匪首韩桑杰叛变以后,死心塌地甘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与人民为敌。他先后流窜到阜新、敖汉、阿鲁科尔沁、巴林左右二旗等地。到处袭击革命政权,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人称“韩闫王”。对于韩桑杰、二虎两股匪徒回窜,蒙汉联军四师广大指战员义愤添膺,决心全歼这股匪徒。1948 年初,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统一部署,蒙汉联军骑兵四师同卓盟纵队一支队在冰天雪地物资供应不足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指战员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马不停蹄地追剿 45 天,从巴林草原到阿鲁科尔沁旗,经卓索图盟的翁牛特旗、敖汉旗,一直追剿到扎鲁特旗、乌珠穆沁旗,全歼匪部。韩桑杰只身潜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被蒙古捉获引渡回国伏法。在这次战斗中,毙敌 50 余,迫使二虎以下 88 人向四师投降,缴获大小枪支 80 余,战马 170 余匹。这支部队在完成任务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战斗力。

多伦剿匪战是 1948 年 3 月,蒙汉联军骑四师奉命配合兄弟部队参加解放多伦的一场战斗,主要担负剿灭多伦外围土匪的任务。四师接到命令后,4 月中旬向西部进军,三十一团抵克什克腾旗西北的大王庙,切断了多伦土匪与锡盟土匪互相联系的通道。三十二团开到克什克腾旗西南的大克头,堵住多伦土匪向河北围场逃窜之路。这样对多伦土匪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四师共歼敌 20 余,缴获了枪支 30 余,牛千余头,保证了多伦战斗的顺利进行。4 月 23 日,多伦宣告解放。

革命战争的烈火锻造了这支民族队伍,他们高举着革命的

战旗,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革命武装力量。

1948年10月23日,蒙汉联军与卓盟纵队合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十师。师长孔飞,副师长阿民布和,政委乌力吉那仁,政治部主任刘昌,参谋长慕汝瑞,副参谋长包英昌。下辖二个团。原四师三十一团与三十二团合编为三十一团,分四个连560人,团长唐巴图(不久平安接任),政委张华廷,副政委斯布吉德道尔吉,政治处主任白英;原卓盟纵队一支队编为三十三团,分四个连560余人,团长陶格陶,政委席达,参谋长宝音,政治处主任张健。

1949年3月22日,骑兵十师在林东召开了庆功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一级功臣9人,二级功臣39人,三级功臣76人。昭乌达盟委和二十军分区首长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骑兵第四师建军以来的作战成绩和经验,明确了今后作战任务。据不完全统计,蒙骑四师经过了大小战斗118次,共歼敌1291人,俘敌408人,向蒙骑四师投降的368人,缴获各种武器877件。这支铁骑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英勇顽强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骑兵特点。作战中行程万余公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战斗考验,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党和人民对这支人民铁骑给予了“打不垮,拖不烂的人民铁骑兵”的荣誉称号,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民族武装积累了经验,并在我军建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册。

## 二十九 震动大地的脚步

1946年12月13日,巴林草原西部的林西县城洋溢一片欢腾的节日气氛。机关团体、临街商店张灯结彩,大街小巷人来人往,驻军、干部、百姓冒着寒风站立在大街两侧,从街中心十字路口一直通向南门外。下午,几辆汽车驶进林西城,从车上下来十余个人,为首的一个高高身材魁伟健壮。他身着黄大衣,头戴狐狸皮帽子,脚上穿一双青毛毡疙瘩,微笑着同前来迎接他的冀热辽中央分局、军区,热河省委省政府,以及热北地委、军分区、专员公署,林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一一握手。他就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云泽(乌兰夫)。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蒙古地区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十分激烈。这场斗争既从属于全国革命力量对反革命的斗争,又有其特殊的斗争内容和斗争形式,说到底是在内蒙古实行什么样“自治”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革命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区域民主自治,反对“独立自治”和其它形式的自治。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织,解决东蒙自治政府问题和内蒙东西部统一领导问题,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1945年11月25日,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在张家口成立了以云泽(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东西蒙自

治运动统一会议，内蒙古自治运动开始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各地积极进行改造盟旗政权、减租减息、清算恶霸、发动群众等工作，使内蒙古革命斗争全面深入地向前发展，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党中央把握时机，1946年12月26日指示有关中央局和分局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做准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46年末云泽从锡盟贝子庙出发，由西乌珠穆沁旗经林西、大板、林东，赴王爷庙进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筹建工作。

在林西县，乌兰夫主席等来到的那日晚上，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冀热辽军区、热河省委省政府召开大会，热烈欢迎云泽一行的到来。次日，中央冀热辽分局的机关报《民声报》头版头条发表《内蒙人民领袖云泽主席抵达林西，今日召开欢迎大会》的重要新闻，同时登载了云泽主席的简历。云泽主席不顾旅途劳顿，向林西的党政军民发表讲话。讲话中痛斥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将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罪行。揭露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的阴谋。云泽强烈指出，这个伪国大内蒙古人民是不承认的，伪国大无权讨论内蒙问题。为了反对伪国大的召开，我内蒙二百万人民未选派任何代表参加。此种伪国大既不能解决中国内政、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更不能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云泽义正辞严地说：我代表二百万内蒙古人民否认伪“国民大会”，伪国大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内蒙问题的权力。云泽在讲话中还指出，内蒙古人民以新仇温旧恨，已经认清了敌我友，不论王公、上层喇嘛、知识青年、普通牧民均以高度团结的精神，组织自己的政权军队，与共产党八路军并肩作战，反击蒋介石的进攻。内蒙古人民自治自决权力属于二百万人民，我们有力量拿起枪来，粉碎大汉族主义的进攻，完成蒙古民族解放事业。《民声报》发表题为《欢迎云泽主席》的社

论。社论高度赞扬了云泽主席作为卓越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领导才能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的伟大业绩。“云主席二十年来献身于中国革命生活,也就是为谋求内蒙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生活。正当蒋介石扩大内战,挑拨离间,积极进攻内蒙的时候,内蒙人民领袖云泽主席来到了昭盟,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与敬意……今天全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已经空前提高了,内蒙人民已打破了奴役的枷锁。为了保卫已得到的胜利果实,要求蒙汉人民以无比的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坚决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只要蒙汉人民亲密携起手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驻林西县各级党政机关以云泽莅临为契机,大力宣传1946年12月14日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作出的《关于热河蒙民工作的指示》精神。这个文件与云泽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文件中提出“内战炮火燃遍热河,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法西斯大汉族主义的统治灾难,直接威胁着热河蒙胞与热河全体同胞”,号召“内蒙古的成吉思汗子孙团结起来,反对内蒙古人民的首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内蒙古自治与自决而斗争”。指出“内蒙古民族的斗争,必须跟全国人民在一起,特别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争取内蒙古民族解放与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的胜利”。要求各地结合贯彻云泽主席的讲话和“一二、一四”文件精神,实行初步的土地改革,解决蒙汉土地纠纷,建立内蒙古民族的人民武装,发展经济文化建设,重视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12月20日,云泽主席应邀为途经林西的内蒙文工团做了时事报告,出席了冀热辽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并讲了话。1947年元旦,云泽主席参加了驻林西的冀热辽中央分局、军区、热河省委政府等党政各界,为欢度1947年新年举行的大型团拜活动。在林西期间,他还接待了来自巴林右翼旗的慰问团。慰问团是巴林右翼旗政府与自治运动联合会巴林右翼旗支会组织的。右旗的

各族群众闻听云泽来到林西十分高兴,纷纷要求去林西慰问内蒙古人民的革命领袖。他们推选时任巴林右翼旗旗长的察隆阿先生代表党政机关、他木代表牧民、旗供销合作社主任那顺代表各界人士、武云格日勒代表妇女界去林西慰问云泽主席。关于在林西慰问云泽主席的情景,武云格日勒曾发表回忆文章怀念这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到了林西,云泽主席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云泽主席身穿黄大衣,头戴皮帽子,面带微笑和我们握手。晚上与慰问团的全体人员开茶话会。旗长察隆阿代表我们和全旗各族各界人民向云泽敬献了洁白的哈达,赠送了礼品。云泽主席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时隔四十年,云泽的讲话还回响在耳际,云泽讲完话后,我们大家都发言,畅所欲言的反映蒙旗情况和各族群众的要求。”

1947年2月1日,云泽主席来大板,受到了巴林右翼旗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时跟随云泽主席途经大板去王爷庙的记者鲁获在《内蒙古自治报》(第76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了这一消息,曾作了如诗如画的描述,可见当时的实际情景。“我赶上乘云泽主席的汽车到王爷庙去,是今年正月的事情,汽车驶出林西城,再爬上一个土坡,土黄色的林西城即没于烟雾中了。眼前展现一片平坦的草原。长蒿鬼华的草原上冰封了的西拉沐沦河(应为查干沐沦河)蜿蜒在草原上。汽车正平稳的行驶,坐在我身旁的一个警卫员,突然摇着我的肩膀指着远方。远方白色的河床上,骆驼与马群正拼命奔驰。一种辽阔而兴奋的心情,把我埋没于草原与草原之间——大板上。离大板十里路的地方,前面的汽车坏了,于是我们的汽车畅行无阻地驶向大板,过了一道小小的山梁,散落于西拉沐沦河(查干沐沦河)北岸的大板,已展现于眼前了。”

云泽主席一行来到大板西十家子村时,大板地区各族各界

群众百余人骑着马赶来迎接，来到大板街时，群众夹道欢迎。云泽一行下了汽车，步行来到街中心荟福寺。云泽主席停下，站在寺殿台阶上向数百名群众作了简短讲话，才来到下榻之处。当天晚上7点多钟，旗里召开党政军干部和各界人士各族群众代表会议欢迎云泽主席。云泽主席出席会议，作了精辟的发言，题目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中心意思是向群众学习，并要求大家提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毫无拘束地提出有关革命、民族、青年运动、妇女翻身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云泽主席一一解答，还重点解答了关于形势的问题，关于对待反动势力的问题，以及关于当前减租减息妇女解放运动等问题。散会之前，云泽同与会者共同歌唱《蒙汉民族大团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已经是夜半时分了，会议方散。次日晨，喝完早茶，云泽主席一行离开大板赴林东。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三十四团指战员护送。

云泽主席一行在林东逗留时间稍长，并几次在林东干部会议上讲话。1947年2月3日，云泽主席向干部会议讲了内蒙古革命运动的几个问题。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内蒙古过去和现在的管辖范围，关于内蒙古经济组织形式，关于共产党才能解决蒙民问题，关于革命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包括政治上实行普选的政策，团结上层发动群众的政策等，还讲了关于自治运动和自治政府，党、军队和干部作风问题。他的其它几次讲话主要从理论上阐述内蒙古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内蒙革命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内蒙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内蒙划境等问题。云泽同志的讲话大多是在与会同志发表意见提问题的情况下发表的，因此很有针对性，很现实具体，同巴林的实际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联系得很紧密，因而很解决问题。

关于形势和政策,云泽着重提出,内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在革命这一点上有共同的任务。这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属于无产阶级领导范畴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革命在各个阶段上怎样开展,各地却不完全相同。在同一战略方针下,策略运用是不一样的。内蒙革命的性质既然如此,则革命的主要动力将是牧民、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而不是王公喇嘛。王公喇嘛有的也会参加革命队伍中来,因为他们本身也同样是有一些要求的,我们尽量吸收他们来参加,结成一条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有些青年不懂得这一点,过早地提出打倒王公喇嘛的口号。这些人不了解蒙古社会,不了解王公喇嘛。在今天,不要王公喇嘛,就等于不要王公喇嘛影响下的群众,何况今天还有许多王公喇嘛跟着革命队伍一道走呢。我们今天说的团结上层,不是单纯的为团结而团结,而应是为了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而去团结他们。关于自治政府的问题,云泽主席分析说,党中央的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内蒙古革命是有阶段性的。我们头一步成立联合会。联合会在未成立自治政府前起着全面性的作用,我们叫它半政党、半政权、半群众组织。而后条件成熟了,就要成立自治政府。关于减租减息问题,云泽在讲话中特别提出,减租减息是反封建,内蒙古民主革命这一阶段是逐渐削弱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实行全民普遍选举,在经济上不是一般地没收土地,没收牲畜,而是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内蒙古经济结构形式可分三类,即农业地区、半农业地区、纯牧地区。减租减息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办理而不应机械执行。在经济上,应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将牧民对王公的无代价劳动变为有代价的劳动。经过清算斗争,没收罪大恶极的蒙奸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牧民。在半农半牧地方,取消二地主租佃形式和不等价交换。在纯游牧地方取消商业高利贷。我



们提出在政治上、经济上削弱封建的上层势力,并不影响整个民主革命进行。恰恰相反,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广泛地发动群众,使他们轰轰烈烈地参加革命,也就不能彻底地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对待反动势力问题上,云泽主席强调特别要注意政策,凡是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不管他们政治出身如何,我们都要争取,都要用团结的政策来对待他们。我听说以前有一小部分人开始跟着国民党跑了,现在又跑回来投靠我们工作队。有的地方的工作队不分情况不看现实表现,对他们跑回来一个杀一个。这不好,不利于我们一致对敌,也不符合党的政策。今后凡是举手投降跑回来的一个也不要杀,要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云泽主席不畏劳苦不避风险来到巴林草原,他的音容笑貌,鼓舞着草原人民。他有力的脚步,震动着人民的心。他在两旗一县的多次讲话,使草原上的各族人民进一步了解“四、三”会议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宗旨,使革命人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明白了尽快实现内蒙古民主自治势在必行。草原人们深切地理解了实现蒙古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共同对敌。由于对于形势认识清楚了,斗争目标明确了,民心安定,革命形势高涨,各种谣言被摧毁,减租减息和各项政治运动顺利开展起来,巴林草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革命局面。

### 三十 捐躯草原的英烈

在巴林草原上，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子：

振臂跃起的蒙古青年们，  
放眼看其苦难群众的支援。  
奋斗吧！喜迎世界的新曙光。  
为人类的宏图伟业作出贡献。  
生与死自有定律，  
实现真理是我们的任务，  
立起胸怀宽广的蒙古——  
欲与宇宙共同前进。

.....

这是牺牲在巴林草原的革命烈士蒙和舞乐极创作的《劝告青年歌》。这首歌道出了蒙和舞乐极献身民族解放事业，追求真理的宏伟志愿，也道出了捐躯草原的所有烈士们的心声。他们的革命精神彪炳千古，永垂不朽，他们虽死犹生，永远活在草原各族人民的心中。为了革命，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革命又使他们的年华永葆青春。血沃草原，鲜花和绿草更美丽；忠骨长存，永远激励着后人。

1946年10月，冀热辽二十军分区和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师联合成立昭乌达盟蒙汉联军。蒙和舞乐极任政治部主任。联

军的主要任务是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保卫昭盟蒙汉人民民主自由新生活。但当时的形势是严峻的。国民党占据了赤峰、通辽和开鲁，叫嚣进占巴林。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虽然改编为蒙汉联军，但没有来得及整顿，内部成份复杂。如叛变投靠国民党的骑四师第二支队司令员（原三十五团团长）额尔登格，日伪时期当过警务科长。跟随额尔登格叛变的阿力本嘎日伪时期在伪旗公署行政科任股长。三十四团二连连长乌尔他和三连连长韩桑杰或是当地牧主，或参加过伪警备军。1946年11月，联军洞察到三十四团二连乌尔他胁迫全连士兵阴谋叛变，为了侦察情况挽救全连官兵，蒙和舞乐极带领确吉僧格、乌恩奇等11人由联络员毛小当向导，于11月15日向乌尔他连的驻地牌毛都出发。时至严冬，风雪交夹，道路难行，从林东到牌毛都有三四百里路程。蒙和舞乐极不避风寒，战胜困难，于11月18日来到。为了慎重起见，他派向导毛小先去见乌尔他，通报联军已经派人来，希望他不要脱离联军，背叛人民。乌尔他不思改悔，一意与人民为敌，制造假象，谎称并没有叛变，听说联军乌主任来到，恭派副连长双喜前来迎接。在此之前，乌尔他已经把反对叛变的连指导员赛乌由图关押起来。蒙一行11人到达二连驻地后，乌尔他托故不见面，密令曾经当过伪兵痞的双喜等对联军的人突然袭击。由于叛匪们早有准备，蒙和舞乐极和他带领的战士们终因寡不敌众落入了“魔掌”。乌尔他逮捕了联军政治部主任欣喜若狂，要把他们送到国民党那里去邀功。蒙和舞乐极从林东出发时，联军立即通知驻巴林右翼旗的三十四团派兵前往策应。三十四团接到命令后，由团长确吉敖斯尔带领数名战士火速从大板出发，19日来到益和诺尔宝冷艾勒，不料被反动牧主告密，受到乌尔他的袭击，1人牺牲5人被捕。确吉敖斯尔立即向联军报告了乌尔他叛变的情况。此时蒙和舞乐极等人被押着出了巴林右翼旗境，来到

翁牛特旗龙化图庙北查干营子。蒙和舞乐极识破敌人的企图，这天夜里趁机逃出，不幸跌伤，当爬起来再跑时，被叛匪开枪击中左腿再度被捉回，当夜牺牲。农历11月23日，在西牌毛都西北沙窝子里，乌尔他叛匪杀害了联军政治部干事确吉僧格、三十四团参谋长乌恩奇、二连指导员赛乌由图，还有联军战士敖其尔、昂萨格乐、斯钦格日勒。1947年2月中旬，三十团指战员在牌毛都西沙窝子找到被叛匪杀害的4具革命烈士遗体，送至白音布统安葬。

蒙和舞乐极是蒙古族，阜新人，日伪时期曾在巴林右翼旗大板小学教书。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立志追求真理，振兴蒙古民族。他同情苦难的蒙古族民众，写下《牧马人之歌》：星星渐渐稀疏，/东方刚刚发白，/云雾遮上晨光，/突然刮起狂风。/马群受惊炸群，/顺风四处逃散，/牧人心中发慌，/赶忙寻找马群。/草原辽阔难寻，/人困马乏难言，/但因散巴贫穷，/苦死也得忍受。“八、一五”光复后，蒙和舞乐极参加革命工作，随同萨嘎拉扎布来到巴林，进行筹备昭乌达省的工作。1946年“四、三”会议后，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期间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决心成为她的一员。1946年6月他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政府工作转入军队工作以后，他成为联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牺牲时年龄仅30岁，党龄仅仅半年，但是他的高大形象和光辉业绩与日月同晖与天地共存。

在今天的巴林左旗林东镇烈士陵园内，有14座无名烈士墓。他们是谁呢？墓碑上为什么没有刻着姓名？原来他们是异乡的革命战士，捐躯在巴林草原与阿鲁科尔沁草原。1946年5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分会在林东成立，当时财经紧张开支困难。盟分会便派白晓山去东北做买卖。白晓山想方设法弄到军需民用物资装载15辆胶车运回。时值1946年旧历十

月,为了行动方便和安全起见,白晓山将 15 辆胶车分成两个梯队朝林东行进。先行的第一梯队是 6 辆胶车,由卓盟纵队司令部的一位科长特木勒领队。继行的第二梯队 9 辆胶车,由四师的于乐图领队。第一梯队共有 13 个人,其干有包括特木勒在内的卓索图纵队派出的两名干部两名战士 6 名车夫,还有 3 名随车探亲的旅客,他们两男一女。当一梯队满载物资的大车行进距终点林东 60 华里左右的姚家段时,遭受歹徒的突然袭击,双方交战一个小时,生产车的人员终因寡不敌众被俘。歹徒抢劫了生产车上的全部物资,将 13 个人全部杀死,其中那名妇女被轮奸后杀死,最后焚尸灭迹。第二梯队赶到时,看到的场景令人发指:6 辆胶车横躺竖卧,空弹药箱遍地都是,死难者已经被烧得面目皆非,大堆的麻绳还亮着火光。第二梯队的同志们立即赶到林东将这一严重情况报告给卓盟纵队。卓纵派人到姚家段,用车将十三位烈士的遗体运至林东安葬。这些歹徒是什么人呢?经查明,原来他们是原骑四师三十五团叛匪金巴、昂苏等 24 人所为。据白晓山、白寿峰等人撰文回忆,大体情况是:当时,金巴、昂苏等人都是骑四师三十五团的战士,时值秋季,三十五团准备外出执行任务,因士兵们大多是本地人,要求回家探亲,安排秋季家务,这样团部决定轮流放假回家。金巴、昂苏等人回到胡吉河,发觉村中少努家停着几辆胶车,车上装满物资,一打听是卓盟纵队的生产车。日伪警备军出身的金巴遂与昂苏等 24 人连夜出村,埋伏在通往林东的必由之路乌兰达坝山脚的一个小山沟里。次日上午当特木勒率领的第一梯队 6 辆生产车经过时,金巴、昂苏等向马车射击。生产车上的保卫人员也隐蔽还击。双方交战一阵后,互相报明身份。生产车的特木勒科长说他们是卓纵调往林东工作的八路军,金巴提出要卓纵保卫人员接受检查,遂下令将 13 个人全部捆绑起来,开始抢车上的东西,抢完东西将 13 人拥进

山沟杀死，然后焚尸。金巴、昂苏等人由吐古塔拉来到阿拉迪沙漠，在德博勒庙见到叛首额尔登格、塔日巴。额尔登格大为赞扬，说金巴这样的好汉一人顶一百人。金巴等人遂成为叛匪额尔登格的元凶，此后参与杀害我三十五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我骑四师参谋长业喜扎拉森、阿鲁科尔沁旗支会的斯楞拉布坦、我三十五团副连长斯钦朝格图等人的罪恶活动。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烈士陵园时，将 13 位烈士的遗体葬于陵园之内，墓碑无名，仅以序号代替。近年史志工作者经多方面调查，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身份。姚家段遇难的 13 人中，除特木勒外，有一位喀喇沁人，当时是内蒙自治学院搞生产的王九锡烈士。一位名叫通福，蒙古人。据白晓山回忆，旅客中的二男都是喀喇沁人，一女子是王爷庙驻军一位名叫小喇嘛的家属，林西县人。

牧区土地改革开始以后，从我蒙骑四师叛变的几股叛徒，纠集当地的土匪、恶霸、豪绅疯狂地与人民为敌，到处杀害我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如今安葬在巴林左旗的有刘永凤烈士，云旦仲乃烈士，李怀德、郑喜文烈士。刘永凤烈士是河北省平山县人，解放后随干部团来到草原。1946 年 11 月，叛匪孙根全率 200 余匪徒包围了阿鲁科尔沁支队，孙在指挥战斗中不幸牺牲，遗体埋葬于马家烧锅后沟。云旦仲乃是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人，1946 年 11 月，在截击叛匪额尔登勒时，于阿旗南部乌纳干沙爱里战斗中不幸牺牲。战斗结束后，遗体在德博勒庙火化，后安葬于林东。李怀德烈士解放初随干部团来巴林草原，任巴林右翼旗隆昌区政委，1946 年冬在隆昌区尹家沟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时，被当地地主尹殿有告密土匪头子李景阳，李匪将李怀德和郑喜文二人捕去，施以各种酷刑，李郑二人终未屈服，壮烈牺牲。李怀德烈士遗体葬于隆昌镇北，郑喜文烈士葬于下东家沟。在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树中村西的查干沐沦河东岸，矗立一座革命烈

士纪念碑，上刻着烈士丹参敖日布、敖力玛斯楞的名字。丹是查干沐沦树中嘎查民兵连长。敖亦是树中人，土改积极分子。1946年初旧历腊月十四日土匪韩桑杰骚扰到这一带，旗里通知树中嘎查一要迅速掌握匪情，二要保护基层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三要保护群众土改果实，四要防范坏人的破坏活动。树中嘎查的干部正在研究部署时被突袭的韩匪包围。丹敖二人虽然冲出包围，但在查干沐沦河上被捕，被杀害于查干沐沦树中嘎查北葱根山。据清格勒巴图撰文回忆说：他同丹敖二位是同乡，从小在一起放牛放羊，参加革命后在一起工作。那年腊月十九日，土匪们撤走以后，他们带领当地群众在葱根沟门莫日根其格山西南沟找到嘎查干部丹敖二人的遗体。两个人绑在一根绳子上被杀害。他们用勒勒车将尸体运回珠腊沁庙，借庙仓的大屋火炉将尸体化冻。在修面换衣时，于丹参敖日布的靴筒里发现一份土改果实登记表。这说明二位烈士没有向匪徒投降泄露土改秘密，而将果实分配表保护到生命最后一刻。腊月二十日树中召开革命烈士追悼会，于当地安葬了烈士的遗体。

在巴林西部的林西县，人们永远忘不了在小城子区政府保卫战中光荣牺牲的顾虎烈士、董国春烈士、李春华烈士、林长喜烈士。这是发生在林西县境内的一次比较重大的事件。1947年初，林西县的革命形势很好，土改工作即将开展，干部群众的革命劲头很足，为了庆祝胜利鼓舞士气，小城子区政府干部和区小队的干部战士联合组成秧歌队，准备大年正月四日开始给烈属军属拜年。初四这天早晨，秧歌队的同志们正在化妆准备演出。突然从后山传来枪声。担任警卫的区小队战士报告有大股土匪包围了区政府。这股土匪的头目叫于秀成，外号于大头，有三百多人，武器精良，配有“六零”炮和轻机枪。于匪大地主出身，是林西一带的悍匪，对土地改革恨之入骨，声言要活捉我区委书记、

区长和区政府干部。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潮水一般地涌进村里，扑向区政府大院。当时，区政府大院有 60 余人，仅有二十几条“三八”枪，其余都是土枪土炮，明显的敌众我寡。区长范裕指挥若定，凭借高大的院墙和炮台，抵抗匪徒的冲击。激烈地战斗一直继续到中午。土匪们的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于大头狗急跳墙，用“六零”炮向院墙轰炸。下午四时，东南炮台被炸了一角。富有作战经验的区小队队长郑树轩命令战士们用几层湿毡子堵上。一直到晚上，我方虽有 4 位同志牺牲，但匪徒始终没有攻进院子。落日以后，土匪听说七区区小队和县支队赶来增援，慌忙扔下几具尸体逃走。打退土匪后，区政府为 4 位烈士召开了规模很大的追悼会，安葬了他们的遗体。

除了这几次比较大的战斗，从 1945 年 8 月光复到 1949 年 10 月共和国成立，牺牲在巴林草原的革命烈士还有很多。据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巴林左旗有刘景云烈士、于文烈士、倪万臣烈士、蔡祥烈士、孙福祥烈士、召兴烈士、周凤林烈士、王树起烈士。巴林右旗有曹殿成烈士、王凤林烈士、拉布扎烈士、旺其格烈士。林西县有边树雨烈士、尚德全烈士、马成云烈士、杜金贵烈士、杨占全烈士、杨贵烈士、胡广文烈士、张纪奎烈士、李飞烈士、宋文义烈士、丛海烈士、韩检阳烈士、张海廷烈士、王庆生烈士、黄好明烈士、朱少清烈士、张作训烈士、李臣烈士、孙国登烈士、吴井堂烈士、马青山烈士等，此外还有许多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士。革命烈士血洒巴林沃土，草原遍开英雄之花。人民永远记住他们，草原永远记住他们。



## 三十一 庆祝“七一”悼忠魂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7年已经走过26个年头。但那时党在内蒙古腹地的巴林草原还未公开,虽然在巴林的一些地区,如巴林右翼旗的白音布统隆昌等地建立了党组织,但在牧区的广大牧民当中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事物,多数牧民们还不甚了解,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1947年农历五月份,巴林右翼旗旗支会秘书股长曹都毕力格等人,接着旗政府关于开展牧区减租减息放新苏鲁克的部署。来到旗北部查干沐沦努图克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当时,巴林地区民主革命形势很好。4月初,中共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林西召开。到会的10个代表团,代表冀察热辽地区23万中共党员。会议听取程子华《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黄火青《关于建党工作的报告》、赵毅敏《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高自立《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李运昌《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一年来形势的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4月下旬,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召开。会议经过代表们严肃认真的讨论协商,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云泽(乌兰夫)所做的政治报告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临时参议会。云泽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自治政府的成立和两个重要会

议的召开,使内蒙古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紧接着昭乌达盟人民政府成立。7月,昭乌达盟工委发出进一步深入土地改革与发动群众的指示,巴林地区的主要工作转入发动群众开展牧区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上来。按照这一方针,盟政府派出以徐子干、确吉敖斯尔为首的减租减息工作团来到巴林右翼旗大板努图克和查干沐沦努图克,开展牧区减租减息试点工作。旗区干部配合进行。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当时虽然革命进程发展很快,但在牧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展,广大牧民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模糊,对民主改革的各项政策还不了解,对于革命的发展前景还不清楚。以牧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还统治着他们,封建思想还束缚着他们的头脑。特别是从1946年下半年以来的严酷的流血斗争震撼着他们的心灵。那一时期,国民党军队网罗当地土匪一度窜犯巴林毗邻地区的通辽开鲁,还向阿鲁科尔沁旗的天山城进攻,并扬言要占领林东、大板、林西。后来,人民军队虽然打破了敌人的美梦,夺回了通辽和开鲁,将国民党大部队赶了出去。但是当地土匪仍然很猖獗。韩桑杰、乌尔他、嘎尔布匪徒经常合股袭击人民政权,残杀干部群众。他们不仅杀害蒙汉联军正规部队的干部战士如蒙和舞乐极等人,甚至连当地无辜的群众也不放过。他们对民主革命恨之入骨,叫嚣“打八路,灭共党,抓住干部就听响”,将贫牧团主任扎木萨抓去在西拉沐沦河边大卸八块扔到河里去。在巴林的西北部以额林亲为首的布利亚特反动上层勾结国民党为非作歹。这些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斗争情景牧民们历历在目。他们热切地盼望得到彻底解放,但是出路在哪里,他们还不清楚。一些坏分子乘机造谣惑众,说共产党呆不长国民党还要打过来。闹得人心慌慌不得安宁,一个时期减租减息工作深入不下去。

在这种情态下,为使工作开展下去,试点工作队清醒地认识

## 庆祝“七一”悼忠魂

到,必须要搞好宣传教育工作,首先要使广大牧民群众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和牧区民主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了解党领导牧民实现民主改革,打垮封建势力,使蒙古民族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和宗旨。工作队的同志们深入牧户,千方百计地宣传群众。工作队成员曹都毕力格同志有一天翻看日历,发现这一年的公历7月1日,正是农历五月十三日。7月1日是我们党的生日,是党诞生26周年纪念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在巴林牧区是举办盛大敖包会进行祭祀活动的日子。查干沐沦努图克一带的习俗是祭祀格斯尔大汗、祭祀关帝佛,祈雨给关老爷洗枣红马磨青龙刀。自古以来,这一日附近牧民都要集会,进行这一传统的祭祀活动。能不能把这两个纪念活动结合起来办,利用蒙古族的传统集会纪念党的生日,把祭祀佛爷大汗变成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的活动呢?他将这个想法报告给旗委(当时称政治处)。为郑重起见,曹都毕力格同志还给旗委宣传部长方驰辛写了信。不久,曹接到了旗委的回信,信中说旗委仔细地研究了他的意见,认为可行,这确实是一个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的好办法。在当时虽然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身份没有公开,但是党的领导是公开的。在公开的场合宣传共产党不违背保密原则。旗委要求曹与工作队队员们共同拟定一个活动计划,并指示活动要开展得好,还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盟工作队和旗委领导所以这样强调,因为当时旱情严重,群众生活困难,不能增加群众负担。信中还特别提到这个活动搞好了,一定会对巴林草原乃至昭乌达盟的工作是有推动的。

盟旗工作队按照上级的指示,立即着手筹备“七一”纪念活动。对于他们来说这项活动头一次搞,生疏得很,再加上离“七一”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一时困难重重。巴林右翼旗人民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旗长察隆阿积极支

持, 签批为纪念大会用的米面糖茶、牛羊肉类、粉条豆油等, 数量颇丰。查干沐沦努图克达额尔德木也给会议提供了一些牛羊、白酒和烧柴等, 旗供销社主任那顺孟和闻讯赶来, 供给制做标语牌彩旗等各色布匹和纸张。旗长察隆阿亲临现场, 确定纪念大会的会址在查干沐沦努图克公署迤西一公里处的巴罕宝力格泉水的后阜上。这里正是清代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每年大年初一祭祀的地方。这里确实环境很美, 阜地稍高, 周围风物尽收眼底。阜前是一宽阔的草坪, 一个很理想的天然广场。搭设主席台由努图克小学校长宝音诺木和负责。为了不误会期, 额带领师生立即行动, 材料不足, 就从学校找, 从师生家里借, 很快将台子搭成。旗长察隆阿亲笔为台柱撰写楹联。上联是“蒙汉人民是一家, 爱戴共产党, 拥护自治政府”, 下联是“各族群众团结紧, 打倒蒋介石, 建立富强国家”, 横幅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六周年暨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察精于书法, 笔走龙蛇, 令人鼓舞。主席台里面的正面壁上, 因为当时党组织没有公开, 不能悬挂党旗, 只得挂中华民国的旗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旗子。这些旗子也都是现做, 发动当地妇女缝制了几个通宵。这些五颜六色的旗子挂在主席台上, 显得又醒目又壮观。参加纪念会的群众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帜, 都觉得新鲜奇特, 远近的牧民们纷纷来这里观赏, 一时显得热闹非常。当地群众说, 自从巴林王府搬到大板后, 这里就没有这么热闹过, 就是王爷在的时候, 也不这么热闹。纪念会的另一件大事是悼念和祭奠革命烈士。烈士的灵龛设在会场西约 50 米处。工作队将当时被土匪杀害的从延安来的苏区长、蒙汉联军骑四师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蒙汉联军骑四师干事确吉僧格、骑四师三十四团参谋乌恩奇、三十四团指导员赛乌由图等烈士的灵牌依次摆列在灵龛中。当时由于条件所限, 灵牌木制, 虽不大却庄重。每个灵牌都用白布围着, 四周装

## 庆祝“七一”悼忠魂

---

饰缙纓素花。在巴林草原,这些烈士的英雄事迹已经广为流传,因此分外引起人们的敬仰。除此而外,为了满足牧民群众祭敖包、祭格斯尔大罕,远处的格斯尔庙堆立了敖包,立了牌位,由牧民群众自己管理祭祀活动。

7月1日来到了,这是巴林草原有史以来第一次纪念党的生日,这是一个十分庄严的日子,气氛热烈而庄重。大会隆重而热闹的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关于这一情景,当时筹备纪念活动的曹都毕力格同志曾撰文回忆。

“6月30日下午,旗政治处李子富政委,旗汉民科雷代夫科长,宣传部方驰辛部长,三十四团确吉敖斯尔团长等盟工作队领导、巴林右翼旗领导来到查干沐沦努图克公署。三十四团还派一个连来做保卫工作。这个连的士兵驻在前艾勒,以防止土匪的突然袭击。我们筹备大会的人员将会议准备情况如实向领导作了汇报。他们很满意。

“7月1日这天,天空晴朗,暖风习习,天公为我们开好这个大会准备了一个好天气。上午十时左右,纪念大会开始,昭乌达盟工作队的领导和巴林右翼旗的党政军领导们在主席台就坐。由我主持会议,掌握会场秩序。由确团长发布命令放礼炮。因为当时当地无炮,仅以鸣放冲锋枪代替,虽然如此,也足以烘托起纪念大会的气氛。在会上首先上台讲话的是李政委,他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讲演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党的26年发展历程,以及党的各阶段方针政策和远大的奋斗目标。他说,党的任务概括起来就是打垮蒋介石,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在会上,雷代夫讲了党在民族地区执行的政策和牧区减租减息工作办法。方驰辛宣讲了内蒙古自治区施政纲领。确吉敖斯尔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的捷报和追剿韩桑杰匪徒的情形。因为事先安排

得好,领导的讲话都很精练,简明扼要,都用蒙汉两种语言讲,使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明白。会场上人很多,大家都在用心听,肃静得很,完全没有往时散包会吵嚷嘈杂的情况。看来领导的讲话效果很好,深入人心。

“纪念大会之后,便是祭奠革命烈士,旗政治部李子富政委担任主祭。祭祀程序不拘一格,采用传统习俗和现代仪式相结合的办法,焚香、燃烛、酌酒,奏哀乐,全场肃立默哀三分钟。我在李政委扼要讲话之后,将几位烈士的生平、革命历程、英勇壮烈牺牲经过一一作了介绍。这几位烈士当中,牺牲时年龄最大的是蒙和舞乐极,年30岁,最小的仅十几岁。他们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牺牲在巴林草原。他们的热血融进高原泥土,他们的生命同巴林共久长。敌人是凶残的,但革命一定会成功的。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人们的翻身解放,活着的人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面对革命烈士的英灵,无不为他们的英勇牺牲的精神所感动,许多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会场嗷嗷一片,人们在痛楚中觉醒。纪念活动达到高潮,达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预期目的。纪念大会以后,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减租减息为内容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展起来,试点获得了成功,经验很快推广到昭乌达草原各地。

“会后,在宽阔的草场上举办传统的野餐,人们品酒吃肉喝茶唱歌,甜丝丝的奶子味和着蒙古歌悠扬的旋律在草原的上空回荡。巴罕宝力格的甘泉流淌,仿佛为歌声打着拍节。旗领导到蒙民群众中畅谈,各嘎查的小学校都带来为大会演出的节目,台子不够,就在草地上演。演出的内容大都是爱国参军、识字扫盲、防奸防特抓土匪、讲卫生防疫病、慰劳解放军等内容。这样的节目大家过去没看过,觉得新鲜活泼,很受教育。会场上还开办物资交流,三十四团的生产车运来许多烟酒茶糖布匹和日用品,牧

## 庆祝“七一”悼忠魂

---

民群众卖皮毛、卖牲畜，换回所需商品。还有传统的摔跤、赛马、射箭等比赛项目。虽然当时物资紧张，但奖品还算是丰盛的。

此次庆祝大会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它所取得的效果却是无尽的。许多老干部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这次活动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回想起来象昨天一样，在当时确实对民主改革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三十二 “牧改”运动大风暴

1946年5月中旬,为贯彻东北局关于“内蒙古工作要彻底发动广大农牧民群众,为要发动群众,必须通过训练和培养青年干部,才能实现自治、进行民主改革、解决蒙民问题”的指示精神,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在林东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学习内蒙古自治运动方针、民运工作、军事工作及时事政治等。王逸伦、谢志群、权星垣、萨格拉扎布、吴广文等昭盟党政军领导在干训班上讲课。巴林左右二旗有百余名蒙古族进步青年参加。训练班结业后,分会以民族学员为主体组成牧区工作队深入到各旗区嘎查。分会任命额尔很巴图为队长,孟和毕力格为指导员,盟分会宣传科长确吉敖斯尔、秘书科长徐子干参加指导的工作队,来巴林右旗发动群众开展以除奸反霸为主要内容的削弱封建特权和民主建政工作。工作队来到大板后,即发动大板地区蒙汉群众300余人斗争了巴林右旗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很大民愤的三喇嘛葛万普乐,动员僧俗群众控诉其罪行,没收其房屋和部分财产。此后在盟分会召开的各旗县反霸清算斗争汇报会上,对巴林右旗斗争三喇嘛的作法给以肯定,并在各旗推广。随着除霸斗争的开展和人民群众的发动,旗和基层政权建立起来了。6月巴林右旗人民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巴林右旗支会在大板建立。6月下旬,由冀热辽



中央分局派出的由崔泽林为团长的工作团来巴林右旗，在旗东部白音布统成立了中共巴林右旗委员会（当时称巴林右旗政治处）。旗东部白音布统和隆昌为农业区，工作团在那里按照热河省委发出的《关于减租减息增资和生产的指示》精神，明确发动群众将减租减息同清算复仇、清租清债、退租退息等项运动联系起来搞。在隆昌区的小新店、南湾子、全胜村、吴家买卖、乌兰套海、十二段、瓦盆窑、九家村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成立了巴林右旗第一个村党支部。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向人民解放区进攻，冀热辽中央分局执行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驻热河党政军机关由承德而赤峰迁驻林西。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了通辽、开鲁和赤峰，西拉沐沦河以北昭乌达盟广大地区成为冀热辽的大后方。巴林草原党政军民在以程子华为书记的中央分局直接领导下发展生产，扩大军队，支授前线。盟分会和旗支会的大批干部由政权和群众工作转入军事工作。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中共热河省委发出《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提出土地改革、武装斗争与建立根据地三位一体的方针。到1946年11月，农区经过减租减息、分散土地、贯彻“五四”指示三个阶段，大部分地区已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昔日地主阶级压迫统治人民的两块基石即政权与土地已经回到了人民手中。热河的牧区民主改革怎样进行？1946年12月，在云泽（乌兰夫）的参与下，冀热辽中央分局专门研究了蒙民问题，14日，发布《关于热河蒙民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阐述了热河蒙民问题与现状，制定了热河蒙民工作和民主改革的总方针和具体的方针政策。“一二、一四”指示，是热河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为广大牧区民主改革指明了

方向。

“一二、一四”指示指出，内蒙古的成吉思汗子孙应当团结起来，反对蒙古民族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为内蒙的自治自决而斗争。为了保证斗争的胜利，在民族内部要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对于勾结敌伪，压迫蒙汉人民的罪大恶极的蒙奸必须坚决清算；在内蒙古的今天只是消弱封建势力，而后消灭封建势力；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想方设法改善贫苦蒙民的生产和生活。还特别提出牧区的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在牧业区进行适当的减轻封建剥削的改革，在农业区应该保护蒙民的土地所有权，在牧区应当保护牧场，农业区应进行初步土地改革。同时对消弱王公贵族喇嘛的权利，清算汉人“二东家”的剥削等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规定。文件还指出在进行这些改革中，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对象与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不同的方法，有步骤地进行。该等待的必须等待，切忌操之过急，宜多采用调解的方式，不要采用剧烈斗争的方式。

根据“一二、一四”指示，巴林左右二旗以减轻封建剥削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始起步。在牧区，改变了“苏鲁克”的老章法，实行“新苏鲁克”制度。1947年春，昭乌达盟先后两次派出减租减息工作团，由道布钦巴拉珠尔、徐子干、确吉敖斯尔、娜仁高娃等人带队，分别进入大板努图克和查干沐沦努图克，开展减租减息和牧区民主改革试点工作。他们深入到各嘎查艾勒后宣传牧区民主改革，培养积极分子，落实实行“新苏鲁克”的方法。在牧区将贫苦牧民为牧主放苏鲁克繁育的羊羔、马驹、牛犊由过去的正“二八”分成，改成为倒“二八”分成，即牧户得“八”，牧主得“二”。牧民为牧主种漫撒子地分粮，也改成牧户得“八”，牧主得“二”；在农区，取消“二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即耨青户减百分之二十五给地主地租。这一作法在全旗推开后，在贫苦农牧民

中产生很大反响,维护了贫苦农牧民的利益。发动起来的农牧民看到了自己手中的力量,自觉地参加到民主改革运动中来。

在牧区以“新苏鲁克”为主要内容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1947年七八月份,旗政治处在大板召开旗、努图克(区)级干部会议,批判党内外一些同志走民族上层路线,对民族上层“斗争”不力,犯了“右”的错误。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会精神,并结合其精神对前一段的减租减息工作进行总结。会议批评了一些同志的上层路线错误,这些同志有的被撤销了职务。会后,对旗区两级领导班子和军队排以上干部进行了整顿。一些人进入自治学院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将革命老干部、由内蒙古军政大学和自治学院毕业分配的民族青年干部,以及从当地减租减息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

当时,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开展土改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明确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废除封建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还制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一切财物,按乡村人口平分土地的方法等。“大纲”的颁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要求实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的积极性,在全国各解放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11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在宁城五家召开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盟旗两级干部会议。巴林右旗派清格乐巴图等四人参加了会议。热北地委也派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取消汉民科,成立蒙汉联合政府,全面贯彻《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改革(在牧区称“牧改”)。五家会议结束以后,12月初,各地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学习东北中央局发布的《中共东北中央局告

农民书》中有关号召各解放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贯彻《土地法大纲》,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精神,学习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实行土地法大纲并制定补充办法令》,学习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几点说明》等文件。会议结束以后训练土改工作队,1947年12月工作队深入各嘎查艾勒。至此,一场深刻地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群众运动在巴林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此次牧区贯彻落实《土地法大纲》主要内容是划分阶级成分,对地主、牧主、恶霸和反动分子进行清算斗争,将牧主的土地牲畜和财产分给广大贫苦牧民。为完成这个任务,各地首先召开干部会议,整顿干部思想,调整各努图克区领导成员,重新任命了各区区长努图克达和自治运动努图克区支会主任,成立旗农牧民联合会,统一领导牧区各努图克的牧改工作。工作队深入到各嘎查村后,发动群众对贫雇牧困进行整顿,使党员和贫雇牧积极分子掌握领导权。为了加强领导,还实行旗委委员分片包努图克区,努图克区领导分片包各嘎查村的办法。工作队进村后即着手发动群众,首先向牧民群众宣讲土改工作队的基本任务。这任务就是消灭封建势力,进行民主改革,使广大贫苦牧民不但政治上要得到翻身,经济上也要得到彻底翻身解放,号召贫苦牧民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站起来闹革命。接着引导牧民算牧主的剥削账,算以牧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对劳动牧民的压迫账。旧社会广大劳动妇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蒙古族奴隶妇女则生活在最底层,有的几辈子当“印吉”(陪奴)。在巴林右翼旗查干沐沦努图克一牧主家中的女奴翠梅和花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工作队进艾勒后,看到她们身上穿的蒙古袍子补顶摞补顶,不知有多少层,也不知穿了多少年,连颜色也分不清。盘在头上的发辫象毡片一样。她们从十几岁就给牧主当奴隶。花梅到40岁还是老处女,牧主逼迫她跟斧

子拜了天地，她非常悲痛地向工作队员说，我一辈子忌斧子的名字。

土改工作队通过深入群众，算放苏鲁克剥削账、挤牛奶出官工、“对半分”的剥削账和对封建牧主压迫穷人种种手段的揭露，提高了贫苦牧民的阶级觉悟。许多贫苦牧民特别是妇女找工作队倒苦水，说心里话，控诉封建压迫和剥削。工作队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了贫牧团，由他们领导各艾勒群众开展“牧改”运动。

“牧改”运动一开始即宣布牧场公有，废除封建特权，划分阶级成份。牧场和牲畜是牧区畜牧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牧区的王公、贵族、牧主以及部分宗教上层占有大量牲畜，并依赖封建特权支配着牧场，这些就是牧区封建主所有制的标志。牧改就是消灭这种封建所有制。“牧改”一开始，人民政府就宣布，废除封建的牧场所有制，废除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特权，废除奴隶制。

牧主阶级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正确地划分牧主和牧民阶级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牧改工作在划阶级成份中照搬农村土改划成份的作法。划分各阶级阶层主要依据是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收入中的劳动收入与剥削收入的比例。

牧主：拥有牲畜和牧场，本人不参加劳动，靠出租“苏鲁克”和土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靠剥削收入。

富牧：拥有土地和牲畜，本人参加部分生产劳动，家庭经济来源的部分收入靠出租“苏鲁克”或出租漫撒子地剥削收入。当时剥削率达15%就定为富牧。

中牧：不剥削他人，也不受他人剥削，自食其力。在划中牧成份时，视中牧拥有牲畜和土地的多少划分为上中牧（富裕中牧）、中牧和下中牧。

贫牧：无有或仅有少量的牲畜和土地，其主要经济收入靠租放“苏鲁克”或租种土地，当雇工。

雇牧：无畜、无地、无生产资料，专靠放“苏鲁克”、租种犏青、当长工打短工为生。

“牧改”工作在划成份时由于忽视了牧区的实际，机械地搬用农区的作法，在评定成份上犯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未能很好把握划成份的经济依据。经济收入和剥削收入计算得不准，一些地区为了赶进度，不作深入地调查研究，而作表面文章，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有的在给牧主定成份时，不算细账，只看其穿戴和住房好坏，个别地方还出现相面定成份的可笑事情。二是在指导思想犯了“打倒的越多，成果就越大，对富户斗争的越狠，革命就越坚定”的错误，从而混淆了敌我界限，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团结和依靠面，给政治和经济工作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在划定阶级成份的基础上，清算牧主牲畜，挖浮财分浮财。各地清算复仇挖分浮财斗争在盟工作队的指导下，先在查干沐沦努图克进行试点，在他本花清算斗争了德吉尼玛和益希好日老。德吉尼玛群众称其为白喇嘛，是这一带的大牧主。旧社会与其兄扎兰向群众收税时私自增加数倍自吞，贫苦农牧民交不来时，他以大加一的利加税，还放高利贷，家中有奴隶，雇有长工。工作队进村后，德吉尼玛逃跑在外，工作队发动群众，一面搜集线索，四处寻找，一面以贫雇牧为主组成清算委员会，召开斗争会。一连开三次会，发动群众诉苦，许多群众上台揭发德吉尼玛的恶霸事实和残酷的剥削行为，如他的马群吃了贫苦牧民的庄稼不但不认错还要霸道，穷人给他打羊草不给钱，放高利贷到期不还就要大加二的利钱等等。沙巴尔台的贫牧宝好，在斗争会上积级发言诉苦，还主动外出挖浮财。益希好日老又称佟喇嘛，祖辈是王爷府的牌旦尼达，日伪时期当大板伪警察署署长，横行乡里，欺压

群众，霸占妇女。工作队发动群众给他定为恶霸封建牧主。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对他进行清算复仇。工作队组织积极分子成立清算委员会。清算委员会的秘书、宣传、调查、自卫都是由群众积极分子担任。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各处挖找浮财，挖出一大坛子银大洋，一千多块。群众关心这些财产，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血汗。对于这些浮财的分配，采取办法是：（一）不动产之贵重物品交换成牲畜分给群众；（二）动产不动产统统计价，从总额内抽出10%给军属；（三）余下的分为6个等级，群众以赤贫、贫牧为主排出等分，得的是生产生活用具；（四）对受迫害受剥削最深重的奴隶特别对待，多分给一些果实。由于清算斗争，许多群众靠近工作队，认为政府是为他们办事。清算斗争挖浮财试点后，很快在巴林牧区推开，打击了封建牧主地主阶级的顽固势力。斗争恶霸，清算复仇，“该斗的斗，该杀的杀，该分的分”，一场革命风暴席卷巴林草原。但一些地区由于政策掌握得不准，出现了刑罚多、关押多、杀人多的错误。

清算复仇之后，实行“牧者有其畜”，平分牲畜。巴林各牧区在平分牲畜的时候主要采取以下原则进行。即分畜不分群，口齿搭配匀；马按户，羊按人，衣粮照顾赤与贫；贵重物品发股票，农具衣被按户分；总的照顾赤与贫。具体地说是将全艾勒的人口、牲畜、衣物等统统调查核实，经过贫雇农评议分配。其一分畜不分群是因为牧区居住分散，通常几户为一敖特尔，在分牲畜的时候尽量照顾到便于饲养，防止牲畜分出原群而丢失。其二是将犏牛乳牛口齿搭配均匀，因为蒙古人生活一靠奶食二靠炒米，不能没有乳牛和漫撒子地，因此在分配时要搭配均匀，将同一口齿的犏乳牛合为1个牛头数，根据应分人口多少分配。其三是马按户分，因马匹在蒙古人中只是骑用，每户能有马骑即可；而羊是牧民肉食品，又能出产皮张绒毛解决衣物，因按人分配。衣服之类

主要照顾特贫户。其四是在挖浮财中清出来的金银元宝大洋之类不分物而分股票给群众,以使用这些股金组织生产互助、拉盐备荒等。总的来说这种分配是照顾赤贫、贫牧和中牧,叫一赤二贫三中牧。

以巴林右旗查干沐沦努图克吉林艾勒为例。这个艾勒“牧改”时将物资搭配均匀后,衣服赤贫每人4件,即皮衣1件,棉衣1件,夹衣1件,单衣1件;贫牧每人2件,即皮衣1件,单衣1件;中牧每2人一件。银洋共计1116元。赤贫每人15元,共计135元;贫牧每人5元,共计645元;中牧每人3元,共计96元;余下240元分给艾勒内的贫苦汉人。这些银元都只分股票入合作社组织运盐等生产项目。吉林艾勒在牲畜分配中赤贫、贫牧、中牧都分得了牲畜,按全艾勒人口,不管富牧、富裕中牧和中牧,每人分配两条牛。但不是打乱平分,而是抽掉富牧和富裕中牧多余的牲畜,连同牧主的大部牲畜分给赤贫和贫牧。羊按不同成份分山羊228只,因羊少不能平分,重点照顾赤贫和贫牧。马127匹,按户分配,除被斗牧主外,每户都有马骑。

牧区贯彻落实《土地法大纲》因为实行了与汉族农区同样的政策,没有考虑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和它特有的发展规律,一段时间出现牲畜无人看管丢失和乱杀卖现象,牲畜头数急剧下降,全旗大小畜总头数减少4万余头只,其中牛马尤甚。

1948年初对牧改中的问题复查纠偏。巴林草原复查纠偏工作是贯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发出的《关于生产、纠偏、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的。此次纠偏的重点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错划阶级、错分错斗等问题。纠偏中把原来规定富牧的剥削率15%的计算方法一律改为25%,这样原来定为富牧成份的改为中牧成份的较多,退回牧改时没收中牧的牲畜和财产,纠正被错划的阶级成份。1949年5月按照中央指示,热河省将昭乌达盟移交给



## “牧改”运动大风暴

---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二旗一县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内蒙古制定的“牧改”三不两利（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份，牧主牧工两利）政策下达时，巴林“牧改”运动已经完成一年多，主要的工作已经转入建立基层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上来了。

### 三十三 巴林人姓氏渊源

蒙古族人的姓名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一样既有姓又有名,只是为了简便通常直称其名的时候比较多,因此也有人误解为蒙古人有名无姓。

姓氏的由来是一种民族的历史现象,随着人类的进步,姓氏也在不断的演变。一般地讲,民族的姓氏的结构形式与语言系统相联系的,欧洲人多是名前姓后,亚洲人一般是姓前名后,蒙古人的姓氏排列顺序类似汉族,也是姓前名后。成吉思汗的姓名为孛儿只斤铁木真,“孛儿只斤”为成吉思汗的姓,“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的名字。即使取汉名的蒙古人也有蒙古姓,清代蒙古族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尹湛纳希则姓孛儿只斤,汉名宝衡山,字润亭。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则姓西鲁特,字文子,号午塘。

巴林蒙古族有部族和姓氏之分,而且把部名姓氏的名称、更替、含意传授子孙后代,同时还清楚自己姓氏的来源及有关的传闻等。大多数巴林人能用几种文字记述自己的姓氏和名字。

巴林部作为古老的蒙古部族之一,他们的姓氏和部族无疑是在氏族社会中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的。

蒙古学者们研究和撰写的著名历史典籍,如《蒙古秘史》、波斯人拉施特历史名作《史集》、俄罗斯学者符拉其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多桑的《蒙古史》等都对蒙古氏族的血缘关系作了

较准确的论述。

巴林部作为蒙古古老的部族之一，同蒙古其它各部落一样历来随父姓。巴林部是从博尔特赤诺阿、古阿玛喇勒的十三代孙孛端察儿的长子巴阿邻歹开始形成的。《元朝秘史》等有关史书明确记述了巴阿邻歹是孛端察儿的长子，是许多蒙古贵族部落的始祖。

巴阿邻(巴林)部按照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原来的巴阿邻，分出尼楚坤巴阿邻( *ᠨᠢᠴᠦᠬᠤᠨᠪᠠᠭᠠᠯᠢᠨ* )，篾年巴阿邻( *ᠮᠡᠨᠪᠠᠭᠠᠯᠢᠨ* )等众多的姓氏，到成吉思汗时代很有名气。从1181年蒙古族部落首领铁木真被封为蒙古大汗至1189年归附成吉思汗的二十八个部落中，巴林部(巴阿邻)的豁儿赤、兀孙额布根的部落就是其中的一个。1202年成吉思汗向泰亦赤兀惕进军时，巴林的失儿古额秃额布干的两个儿子阿刺黑、纳牙阿投靠了成吉思汗，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器重。以后成吉思汗封纳牙阿为蒙古国中央万户的首领，把阿刺黑封为千户之首领。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建立了蒙古大帝国，封巴阿邻部的兀孙额布根为“别乞”。根据《蒙古秘史》等著名的历史典籍记载，那时作“别乞”的人骑白马，着白衣，在众人之上，同诸王一样自由，他骑的白马可以同成吉思汗的马栓在一起。扎奇斯钦的《蒙古秘史译释》中有这样的记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上的诸部落，建立了蒙古国家，在建国大典上成吉思汗论功行赏时对巴阿邻部的豁儿赤说，“豁儿赤所辖的巴阿邻三千户外，再与塔孩将脱乾劣思、帖良古惕等部凑成万户……”

巴阿邻氏同整个蒙古其它部落一样，起源于蒙古高原蒙古语群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部族，巴林人有共同的牧地，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心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有共同的祖先和姓

氏。巴林人塔·乌力更对居住在巴林右旗的蒙古族人的姓氏历史来源进行过研究。他发现巴林人的姓氏依他们的根源、分支名称来历各有不同,现有六万多人的巴林右旗蒙古人中蒙古语姓氏大约百余个,其它来源的姓氏六十余个。

孛儿只斤氏( *ᠨᠠᠵᠢᠷᠢᠨ* )在巴林蒙古族人中比较多。该姓氏的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所以在巴林称孛儿只斤家族为贵族和台吉。巴林姓孛儿只斤的台吉分为四门台吉、外八门台吉、二十户台吉等。

四门台吉来源于成吉思汗的二十一世孙巴林一世扎萨克色布腾与固伦淑慧公主所生的四个儿子。色布腾的长子郡王瓦其尔为主门台吉世袭罔替。主门台吉的子孙们居住在王府附近的大板、沙巴尔台,王陵附近的巴彦尔灯、其其尔图音格根一带。还有部分到弘吉刺惕迁住的东八佐领担负驻防任务。色布腾的次子公爷格日勒图为第二门台吉,世袭罔替。他们的后人居住在白音汉山脚下的查干沐沦河流域。色布腾的三子公爷那木札为第三门台吉,世袭罔替。驻地为西拉沐沦河北岸,古日古勒台河流域。色布腾的四子协理阿拉布坦为第四门台吉,世袭罔替,驻地为今巴彦他拉苏木的昭胡都格、哈嘎一带。据传色布腾王爷的原配夫人查干达日生有一子名叫却金扎布,安置在巴林南部的查干诺尔,那里碱度相当浓,牲畜不能饮,湖边不长草,远远看去是一片雪白色,因此当时居住的牧民称其为碱水湖。当时在王府内掌权的官吏们为了控制这个同父异母所生的却金扎布一系,不仅把他们安置在不长草的湖沼附近,还令“却金扎布之家人不许超过二十户,畜不许超过一千头”。所以后来人们习惯的称其二十户台吉。

外八门台吉,是早在1660年归附巴林的弘吉刺惕部台吉和从外地归附的其它姓孛儿只斤的台吉所领的八个苏木,驻巴林

右翼旗的东南部。后来人们根据他们的驻地称准奈漫苏木，习惯称奈漫苏木台吉、古日本苏木台吉和塔本苏木台吉等。此外还分西翼台吉和东翼台吉，西翼台吉是巴林王公贵族和官吏们为了监视、控制外来归附巴林的这些部落，专门从四门台吉中选派去统辖他们的达诺谚们的支系，东翼台吉是归附巴林的弘吉刺惕台吉和其它台吉们。这就是巴林准奈漫苏木的两翼台吉的来历。

古日本浩特台吉(也称塔本浩特台吉)驻牧地为乌力吉沐沦河流域。古日本浩特台吉后来分三支，据传弟兄三人分家的时候各分到一个祖传下来的佛像而得名。这个家有三个佛像，一是祖宗满珠习礼，另一个是召，还有一个佛为甘珠尔。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分到一个佛像，分到满珠习礼的支系姓满珠习礼，分到召的支系姓召，分到甘珠尔佛的支系成了甘珠尔姓氏的人了。这些姓氏一直传到如今。三个浩特台吉们现在大部分住在巴林的东南部西拉沐沦、益和诺尔、胡日哈、宝日勿苏、洪格尔一带。

巴林右翼旗封王公、协理、毛根达、达诺谚等爵位的时候，首先从四门台吉中挑选。

巴林的孛尔只斤氏台吉们都有仆人。如果台吉违背了祖规，也有被撤销台吉爵位变庶民的例子。弘吉刺惕部台吉兀拉代、兀苏台弟兄二人在清代由于被陷身亡革去了台吉爵位，所以他们的后人们就自然成了庶民。

在巴林右翼旗庶民改成台吉的例子几乎没有。但是，在翁牛特左翼旗北的西拉沐沦河畔驻牧的部分陶高楚克氏人，当地人称他们陶高楚克台吉。据考陶高楚克氏的这部分人被称台吉的来历，是早在十六世纪巴林部与其它四个部落从蒙古高原的阿拉坦杭盖往南迁时，归附巴林部的一个小游牧部落陶高楚克随巴林南下，途经乌珠穆沁昆兑(大川)到达查干沐沦河和西拉沐沦河汇流处定居，其中的一部分在呼和苏勒举部渡过西拉沐沦

河归附了翁牛特部，在翁牛特这部分陶高楚克人被当地人称陶高楚克台吉。实际不是命名的台吉爵位。

在巴林右旗也有少部分贵族孛儿只斤氏人没有爵位，他们更没有臣仆和附属百姓。

巴林台吉和他的门弟等分十分清楚，特别是用汉字记姓时，以头一个字的字母来记“宝”或者“鲍”来区分。

巴林台吉孛儿只斤氏不仅本旗内部的同姓氏不能通婚，而且同一个姓的扎鲁特、乌珠穆沁、克什克腾、敖汉、奈曼等旗人也不通婚。

在巴林，普通平民的姓氏较多，这些姓氏多来源于部落名称、山水地名、头人的职责或者职业、特殊的标记和纪念物、爵位、崇拜物(图腾)、财宝、风景等。

巴林平民姓氏中，人口较多的姓有陶高楚克、尼楚古惕、布和楚惕、客烈亦赤惕、宰桑、扎力赤惕等。

陶高楚克( *ᠲᠤᠬᠤᠴᠢᠬᠡ* )姓，据传巴林部从蒙古高原南迁到此地定居时，随同巴林来的有三千户。陶高楚克氏族的人自己解释说，陶高楚克因来源于成吉思汗时期的名人乌由图斯钦的后人居住在陶高楚克山麓，得名陶高楚克部，以后逐渐变成了这部分人的姓氏。也有的人把陶高楚克解释为陶高其(厨师)或者是陶尔其格(帽顶)，把陶高楚克分为陶日根陶高楚克和哈日陶高楚克。姓陶高楚克的人分布在巴林中部的伊逊毛都、召胡都格、翁根毛都、查干诺尔、查干勿苏等地。陶高楚克部的长者们每隔三年正月初三到指定的地点聚会续陶氏家谱。陶氏家谱直到1947年曾在伊逊毛都的色音高力布扎兰家保存着，后在“土地改革”中遗失。

尼楚古惕( *ᠨᠢᠴᠢᠭᠤᠲᠢ* )姓，分布在巴林的嘎拉达苏台、归勒苏台、博林古日班坤兑、阿都钦浩雅尔毛都等地。古代尼楚古惕氏

有德高望重的失儿古额秃额布干(额布根为老人、长者之意),他本是泰亦赤兀惕部人的家臣,当泰亦赤兀惕部的大部分人向成吉思汗归顺时,失儿古额秃额布干看出了成吉思汗统一天下的卓越才能,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纳牙阿、阿刺黑归附了成吉思汗,对成吉思汗的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蒙古大帝国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失儿古额秃额布干死后被追封淮安王。尼楚古惕部人在成吉思汗时期,常光膀子走,尼楚古惕意为光着膀子的人们,后来尼楚古惕一词逐渐成了该部落的姓氏。尼楚古惕氏人同整个巴林部人一起从蒙古高原搬迁到巴林驻地后,又出现了几个分支,如召恩格日(百户)、召恩额日(一百条汉子)、召恩图日乐(百世)、吉仁萨达格(六十个箭袋)、查干艾玛克(白部)、额木格德(老妇人)、宝楞(山弯)等。

关于召恩格日和召恩额日还有这样的传说。原来巴林的洪格尔地方住着一户姓尼楚古惕的人家,他的妇人到了高龄后才怀孕,主人很担心老妇人难产,所以把老妇用勒勒车送往巴林左旗境内的“善福寺”(格力布尔台)拜佛烧香。他们一路顺利的到达目的地格力布尔召,烧完香后往回赶路,途中突然老妇腹部阵痛,而且越来越厉害,到了赛音山脚下这位老妇实在难以坚持,就要临产了。妇人临产时让他的丈夫到山脚下种田的盘营去借来种地的犁铧子割断脐带助产。老妇人果然安全的生了个男孩,于是祝愿繁衍成召恩格日(百户)、召恩额日(百条汉子)、召恩图日乐(繁衍百世),从此出现了召恩格日、召恩额日、召恩图日乐的名称。这个妇人分娩的山脚名额木格德(老妇人),这些名称逐渐成了这个家族的姓氏了。

关于吉仁萨达嘎和阿日班萨达嘎的来历,据传曾在嘎拉达斯汰河畔的尼楚古惕氏人每年六月聚会,在一起祭山祭水召开那达慕盛会续家谱,从此失去了与嘎拉达斯汰河西岸尼楚古惕

氏人的联系,以后逐步发展成萨达嘎的两个姓氏了。有人说尼楚古惕氏的家谱曾在巴林末代管旗章京乌勒慧充阿家保存过,乌死后这一宝贵的家谱失传。尼楚古惕氏的各个支系把自己的姓用汉字“乌”和“白”来记姓。

布和楚惕( *ᠪᠣᠬᠤᠴᠢᠲᠢ* )姓,源于古老的尼楚坤巴林中出色的摔跤手,后来成了这部分人的姓氏。布和楚惕(摔跤手们)在《蒙古秘史》中记载为“布和努惕”、“布和楚惕”。“努惕”“楚惕”二字在蒙古语中为复数形式。今布和楚惕用汉文的“博”或者“布”字来记姓。巴林的布和楚惕人分布在各地,沙巴尔台、巴彦尔灯一带较多。

客烈亦惕( *ᠬᠡᠯᠡᠢᠶᠲᠢ* )姓,来源于蒙古强大部落的名称。《蒙古秘史》作客烈亦惕,《元史》为克烈亦惕,客烈亦惕部人分布在今幸福之路、巴彦他拉、宝日勿苏、胡日哈、哈日毛都一带。据传客烈亦惕人有不吃敖乐盖(牛羊的盲肠),不烧椴木等独特的习俗。客烈亦惕部人的家谱曾在巴林右翼旗管旗章京客烈亦惕人笃古尔扎布家中保存过,后在兵乱中丢失。

木苏臣( *ᠮᠤᠰᠤᠴᠢᠨ* )姓,来源于成吉思汗时期专门制做箭杆而且在该部落中出了箭技高的人而得名。据《蒙古秘史》等典籍记载,阿兰豁阿哈屯用五个苏木(箭杆)教子的历史故事。现在木苏臣氏的人分布在幸福之路、巴彦他拉、巴彦尔灯、宝日勿苏、白音汉等地。木苏臣氏的人用汉字的“穆”、“木”、“牧”来记姓。

宰桑( *ᠵᠠᠰᠢᠨ* )姓,源于官职的名称。成吉思汗时期每鄂托克(每一部落)之长为宰桑。此姓分部于沙巴尔台、巴彦尔灯、查干沐沦等地。宰桑氏的人用汉字的“解”和“霍”字记姓。

扎力赤惕( *ᠵᠠᠯᠢᠴᠢᠲᠢ* )姓,源于送信传令的职业名称。但另有一种传说称扎力赤惕来源于扎力尔部的后裔,也有的人说是来源于“扎达”(古代兵器中的矛),他们说扎力赤惕人曾用长矛刺



杀过猛虎而得名。扎力赤惕氏人常用汉字的“吉”“扎”来记姓。

通事(  $\text{ᠲᠣᠩᠰᠢ}$  )姓,源于能说会道有雄辩能力精通事理的人。通事是汉语。通事中有苏木通事、诺木通事、萨达嘎通事之分。这些人分布在都希、巴彦他拉、查干沐沦一带。通事姓用汉字的“通”或者“佟”字来记姓。

此外,普通平民的姓氏来源于部族名称的还有内喀尔喀五部的扎鲁特(  $\text{ᠵᠠᠷᠦᠲᠦ}$  )、巴阿邻(  $\text{ᠪᠠᠭᠠᠯᠢᠨ}$  )、弘吉刺惕(  $\text{ᠬᠣᠵᠢᠰᠢᠲᠢ}$  )、巴约惕(  $\text{ᠪᠠᠶᠣᠲᠢ}$  )、兀者惕(  $\text{ᠠᠭᠤᠵᠢ}$  ),及察哈尔(  $\text{ᠴᠢᠬᠠᠷ}$  )、克什克腾(  $\text{ᠬᠢᠰᠢᠻᠢᠬᠢᠲᠦᠩ}$  )、益和利思(  $\text{ᠶᠢᠬᠡᠯᠢᠰᠢ}$  )、巴尔虎(  $\text{ᠪᠠᠷᠬᠦ}$  )、陶日古惕(  $\text{ᠲᠠᠣᠷᠢᠭᠦᠲᠢ}$  )、珠尔赤惕(  $\text{ᠵᠢᠷᠴᠢᠲᠢ}$  也称“珠申”,来源于肃慎姓氏)、泰亦赤兀惕(  $\text{ᠲᠠᠢᠶᠴᠢᠷᠠᠭᠦᠲᠢ}$  )、唐兀惕(  $\text{ᠲᠠᠭᠠᠭᠦᠲᠢ}$  )、塔塔尔(  $\text{ᠲᠠᠲᠠᠷ}$  ,也称鞑靼)、兀良哈(  $\text{ᠠᠯᠠᠭᠠᠬᠠ}$  ,也称兀良海,属古老的迭儿列斤部落)、帖良古惕(  $\text{ᠲᠢᠯᠠᠭᠦᠲᠢ}$  ,林木中三部之一)、敖勒虎努惕(  $\text{ᠠᠣᠯᠡᠬᠦᠨᠠᠭᠦᠲᠢ}$  ,与李儿只斤同一源,后归附弘吉刺惕部而名)、敖尔赤兀惕(  $\text{ᠠᠣᠷᠴᠢᠷᠠᠭᠦᠲᠢ}$  )等。

来源于职业的姓氏有豁尔赤惕(  $\text{ᠬᠣᠪᠡᠷᠴᠢᠲᠢ}$  )、豁尼沁(  $\text{ᠬᠣᠨᠢᠴᠢᠨ}$  )、兀合尔沁(  $\text{ᠠᠭᠤᠬᠡᠷᠴᠢᠨ}$  )、阿都沁(  $\text{ᠠᠳᠤᠴᠢᠨ}$  )、塔日阿沁(  $\text{ᠲᠠᠷᠢᠠᠬᠢᠴᠢᠨ}$  )、合日木沁(  $\text{ᠬᠡᠬᠢᠮᠴᠢᠨ}$  )、哈布哈沁(  $\text{ᠬᠠᠪᠪᠠᠬᠢᠴᠢᠨ}$  )、宝乐哈沁(  $\text{ᠪᠠᠯᠠᠬᠢᠴᠢᠨ}$  )、哈日玛沁(  $\text{ᠬᠠᠷᠢᠮᠠᠴᠢᠨ}$  )、色热沁(  $\text{ᠰᠡᠷᠡᠴᠢᠨ}$  )、阿拉塔沁(  $\text{ᠠᠯᠠᠲᠠᠴᠢᠨ}$  )、阿拉西沁(  $\text{ᠠᠯᠠᠰᠢᠴᠢᠨ}$  )。

来源于地名的姓氏有奥矣毛都(  $\text{ᠠᠣᠶᠢᠮᠠᠳᠤ}$  ,即树林,该氏由古老的“林木中百姓”演变而来)、海拉苏(  $\text{ᠬᠠᠢᠷᠠᠰᠤ}$  ,即榆树林)、宝楞(  $\text{ᠪᠠᠯᠠᠭᠢ}$  ,即山名)、敖日楚克(  $\text{ᠠᠣᠷᠢᠴᠢᠻᠢᠴᠢᠨ}$  ,即山弯)、呼卜苏勒(  $\text{ᠬᠤᠪᠰᠤᠯᠡ}$  ,即沼泽地)、岗嘎(  $\text{ᠭᠠᠩᠭᠠ}$  ,即山岗)、道老惕(  $\text{ᠲᠠᠣᠯᠠᠲᠢ}$  ,即丘陵)。

来源于珍宝物品的姓有布斯沁(  $\text{ᠪᠣᠰᠢᠴᠢᠨ}$  ),这是成吉思汗统一天下后奖赏一个臣民一条腰带,这个臣民的后代为了纪念大

汗的恩慈姓布斯沁，以后逐渐形成布斯沁家族）。

来源于头人的名称的姓氏有查哈岱（ $\text{ᠴᠢᠬᠠᠳᠠᠳᠠᠳᠤ}$ ）、赤怒兀惕（ $\text{ᠴᠢᠨᠤᠨᠤᠮᠤᠳᠤ}$ ）、齐木惕（ $\text{ᠴᠢᠮᠤᠳᠤ}$ ）、囊亚惕（ $\text{ᠨᠠᠰᠢᠶᠠᠳᠤ}$ ）、兀格惕（ $\text{ᠤᠮᠤᠭᠦᠳᠤ}$ ）、达来明安（ $\text{ᠳᠠᠯᠠᠮᠢᠨᠠᠨ}$ ）。

来源于图腾的姓氏有双哈尔（ $\text{ᠰᠤᠬᠠᠷ}$ ）、昆（ $\text{ᠬᠤᠨ}$ ）、芒古惕（ $\text{ᠮᠠᠭᠤᠳᠤ}$ ）。

在普通平民的姓氏中还有哪力叶惕（ $\text{ᠨᠠᠯᠢᠶᠡᠳᠤ}$ ），也有的人称宝很乎珠，此姓氏的人分布在巴林的洪格尔一带、宝给（ $\text{ᠪᠠᠭᠢᠭᠢ}$ ）、阿日根木扎（ $\text{ᠠᠷᠢᠭᠢᠨᠮᠤᠵᠠ}$ ）、哈日楚惕（ $\text{ᠬᠠᠷᠢᠴᠢᠳᠤ}$ ）、哈日牙惕（ $\text{ᠬᠠᠷᠢᠶᠠᠳᠤ}$ ）、赛楚兀惕（ $\text{ᠰᠠᠢᠴᠢᠮᠤᠳᠤ}$ ）、扎苏楚兀惕（ $\text{ᠵᠠᠰᠤᠴᠢᠮᠤᠳᠤ}$ ）、巴达嘎（ $\text{ᠪᠠᠳᠠᠭᠠ}$ ）等姓。

由于联姻等原因在巴林还有源于外来的姓氏。

主要有清顺治五年固伦淑慧公主下嫁巴林第一世扎萨克色布腾时带来陪房三百户，固伦荣宪公主下嫁巴林第四世郡王乌尔滚时带来陪房二百四十户，清朝乾隆帝三女儿和硕和婉公主下嫁巴林右翼旗扎萨克多罗郡王琳沁长子德勒克时又带来陪嫁四户。这些人原为满族或其它民族，但来到巴林后与当地的蒙古族通婚，逐渐融合为蒙古族。清时这些陪房人被编为两个佐领。今这部分人分布在巴林各地，特别是大板、沙巴尔台、阿日本格日、格根少荣、古日古勒台、幸福之路等地较多。据了解在巴林右翼旗有陪房人的姓氏六十余个。

还有由于战争及生活所迫迁入巴林，与巴林人通婚、入赘、收养等原因演变为姓氏的。如哈达图河流域孟根希热图一带的魏桑氏是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这部分人把自己的姓写成“周”。据传清代巴林军队征讨吴三桂时弘吉刺惕部的首领兀苏台、兀拉代弟兄二人从战场上俘获了姓周的两个小男童，男童聪明伶俐，兀苏台、兀拉代收养了他们。因为是从吴三桂军营中俘获来的，

## 巴林人姓氏渊源

---

所以巴林人都叫他们吴三桂部的人，后来逐渐演成“魏桑”了。这显然是吴三桂三字的谐音。后来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在巴林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的后代就用“魏”来记姓，也有的仍然用“周”字记姓，还有的用“于”字记姓。

总之，巴林人的姓氏从产生到发展，是各部族相互融合的过程。

### 三十四 巴林早期教育史

清朝统一蒙古以后,为了使蒙古贵族和官吏能够奉行清廷所制定的各种法令,不但要求掌权的大小官员懂得满蒙文字,还要求各旗必须培养一批贵族与官员的子弟担任必车赤。固然,统治者的这种要求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也起到不断发展蒙古族文化的作用。朝廷一方面将蒙古八旗贵族子弟及八旗兵丁中的某些聪敏者,送到北京国子监及热河驻防八旗的“蒙古官学”中进学,还在各旗王府衙门开办必车赤学斋,提倡贵族兴办家学,教授蒙、满、汉文及儒家经义,以便把这些人培养成为官吏及其翻译人才。

巴林右翼旗自十七世纪中叶建旗以后,扎萨克府邸和衙门的扎赫拉其、梅林开办家学,清皇室固伦淑慧公主、固伦荣宪公主下嫁给巴林扎萨克后,亦延请教师办家学培养他们的子孙学习满、蒙、汉文字。荣宪公主的丈夫是固伦淑慧公主之孙,曾担任昭乌达盟盟长,董督二十三旗戎务,不知书达理是不行的。民间传说固伦荣宪公主曾对独生子琳布整天酗酒不读书很伤脑筋,由于思夫忧子,五十岁病歿。清代巴林地方人口少,居住分散,通常几户便是一个艾里(村落),旗之贵族官吏邀师在艾里家中延教,在当地习称“艾里家学”。

据巴林右翼旗从事教育多年的达木仁巴斯尔撰文考证,清

代,这种艾里家学曾经培养出不少人才。如誉满欧亚的蒙古史编年巨著《水晶念珠》的作者拉西彭楚克,谙熟蒙、满、藏、汉文以才识渊深受到同治皇帝奖赏破格升公的伯赫吉雅,能言善辩智谋过人的管旗章京乌勒慧充阿等,这些人最初都在艾里家学读过书。据有关部门调查,仅巴林右翼旗从1860年到1949年近百年间就有百余人先后办过艾里家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艾勒门图萨拉嘎其阿布日敏德家学、和硕阿他家学、波尔来拉喜家学,还有曾经任管旗章京的哈丰阿家学,梅林阿拉丰嘎、巴参道尔吉、达瓦嘎日布家学,喇嘛毕勒格图家学以及诺谚曾格嘎日布家学等。据巴林老年人回忆,波尔来拉喜的家学从他的曾祖父起就开始办,一直延续一百余年。办学者的有的是旗之官吏或诺颜,也有的本身就是教师。这些办学者的都出身书香世家,有书房,有文房四宝,牧民们恭敬而亲切地称之为“查干乌日格”(圣洁的书房)。书房有藏书,多则数百册,其中不乏精典著作,有些精典大都是手抄本,流传下来的主要有《蒙古秘史》、《黄金史》、《巴林大黄金史》、《巴林小黄金史》、《成吉思汗箴训》、《世祖圣训》、《智慧之鉴》、《天文研究录》、《资治通鉴》、《五分元音》、《格斯尔传》、《唐王传》、《东汉故事》、《东辽故事》、《济公传》、《施公案》等。

艾里家学的教师,大多从当地和外地聘请,蒙古语称之为“巴克西”,其学生称为“沙比”。尊长敬师是蒙古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艾里家学,沙比首次入学拜见巴克西时,要向巴克西敬酒献哈达,行蒙古叩首礼。从这天起,学生就要从师读书,一切听从教师的管教不得违背;教师受礼之后也要负起责任,千方百计使学生成才。倘有学生对教师不尊重有违师命之行为,艾里家学的主办者就要罚学生一匹马,并要求其向教师送牛羊赔礼道欠。教师的吃穿费用全由艾里家学的主办者承担,除此而外,每年还要给一匹全鞍马或一头四岁牛酬谢,学生们也都以献牛羊等礼品

报恩。清代，蒙古地区教师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是很高的。学生一般都是主办艾里家学的家庭子弟，艾里的其它家庭也可以送孩子入学，大体上每个艾里家学的学生不超过二三个三五五个。

艾里家学教学遵循一定的教程。教师对初学者，首先教以蒙文字母和满文字母。学会字母再教授拼认，继而教授蒙古语文传统教材、满蒙文字对照教材和藏文满蒙文对照教材。清初叶和中叶，清政府禁止蒙古地区学习汉文字，所以艾里家学只教授蒙满藏文，后来随着蒙禁松弛，艾勒家学也教授汉文，而且愈到后来，汉文的教学比重愈大。清末，艾里家学使用的教材一般为蒙汉文字对照的教材和纯汉文教材。这些传统教材多是巴林人编写和翻译的，如《训蒙联句》就是巴林右翼旗历代文人编纂的，此书以蒙文对偶句的形式写成，内容多为名言警句。其中一些警世之言多是从汉语文中翻译而来，如“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现存有麻吉格扎布的手抄本。《益寿篇》是巴林右翼旗家学教师用蒙文编写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学生怎样健身，提高身体素质，延年益寿。如书中写道“人生在世健身为贵，春季早起早睡，违者伤肝。夏季晚睡早起，违者伤胆。秋季少吃酸多吃甜，冬季吃苦辣忌酸食，酸多伤脾”。还有早饭吃饱，晚饭吃少等。《尼莫根乌斯伯合》一书汉语译为“浅易杂文”。这本教材是巴林家学教师琶嘎巴扎布编著的。主要内容为“爱惜财物”、“处事公道”、“不骄不躁”、“不尚虚荣”等课程，是一有关道德品质方面的教材。此书叙述有秩，评论有序，以那些浅显易懂的说教来教育学生，如“具有真理的人，遇艰险不避，逢穷困不欺，看富贵不贪，遇权势不畏，舍生命不惧，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等。《莫日根葛根训诫》一书是乌拉特前旗莫日根庙葛根喇嘛老布僧比扎拉参所著。内容主要是劝导学生怎样学习做人。此书以格言谚语的形式写成，读来很有趣味。《苏布喜地》一书是萨

班·贡嘎坚赞以藏文格言的形式写成,巴林所用的教材都是蒙译抄本。书中多比喻,如“双雁夹飞的赖蛤蟆,张口自夸在村头,不知恩惠愚蠢人,终有一天摔跟头”等。

艾里家学的教学方法,已经进入学校教学领域,基本方式是课堂授课,强调个人进度,不搞整齐划一。学生学得快,教师教得快,学生理解快,教师讲得快。这种教法称“号书”。一本教材下来快者半年,慢者二年三年,因人因材施教。教学阶段大体为识字阶段一二年,能够记帐写文书信件二三年,能够讲读和翻译撰写文章三四年。授课方法先领读后听讲再指导写作,学生死记硬背,生搬硬套。除此而外,教师为了训练学生讲话和书写,提高其记忆力和注意力,还教学生说对口好来宝,背诵格言、民间谚语、赞歌、颂词、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等,还教笔算、珠算等。艾里家学的校规很严,学生见到教师要屈膝行礼,在教师面前要半跪半坐,不能说污秽话唱低级歌曲,不准吸烟喝酒,否则就要鞭挞罚跪,学生缺课必须请假,否则以逃学处罚。这些严格的学校纪律和教师高度责任心使得每一个入学学生都能够学业有成。

在清代,巴林左右旗扎萨克衙门还开办类似官学形式的必车赤学斋。这种学斋是官办的,专门为培养官府文书人才和翻译人才,培养忠于清朝统治,衷心为朝廷服务的蒙古官员,也培养一些为奉行清朝政府的政策法令,懂得蒙满语言文字,按照需要能够准确的通达文书信函翻译书信文章的必车赤。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必车赤学斋还学习藏文字,以便翻译藏传佛经中的有关医药学、天文学、历法学的经文等。清中叶以后,清廷下达文件多用汉文,因而必车赤学斋又以汉文字教学为主。必车赤学斋学员起初都是蒙古贵族和满蒙官员的子弟,后来也吸收一些平民为王公看中的敏捷机灵者入学。例如后来任巴林右翼旗管旗章京的乌勒慧充阿、金奇贤等人都是平民阶层,经过学斋培养

而任旗级官吏的。教师多从外地聘请。这种具有现代学校性质的学斋从公元十六世纪末叶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普励学校”建立,历经二三百余年。据记载巴林右翼旗最后一名学斋教师是毕力格图。

必车赤学斋所使用的教材跟艾里家学差不多,有《成吉思汗箴训》、《巴林黄金史》、《巴林实录》,此外还有《圣谕广训》、《天文研究》、《五体合碧》等。清末,主要以汉文“四书五经”为教材。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施行新政,筹章改制,撤销各种禁令,一时朝野出现了许多改制的奏议与舆论,不但朝廷大臣提出奏章,蒙古封建上层也提出变革图强的建议。与巴林毗邻的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提出“敬陈管见八条”,主张设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练新军、办巡警、普级教育。1902年贡王在喀喇沁王府开办蒙古族近代社会第一所新式学校崇正学堂。这座学堂按照清朝制订的学堂章程教学,开办有算术、地理、外语等新课,吸收女子入学,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创举。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扎噶尔和贡王在朝都为郡王品级,都是地方有影响的人物,素有南有贡王,北有扎王之称。在贡王崇正学堂的影响下,巴林的一些开明人士,包括王公上层也提出筹办学校的建议。当时任管旗章京的乌勒慧充阿代表一些进步势力向旗扎萨克扎噶尔提议办学。扎噶尔对此赞许,并批准由乌筹办。乌对此十分热心,他不辞辛苦安排校舍,聘请教师,动员学生入学,还用自家的五套大马车,从赤峰等地运来课本、桌椅、文具等。1910年春,学校在原公爷府的东院正式开学,学校的名称为“普励”。

普励学校正房七间为教室,东西厢房为学生宿舍,门房五间为教员办公室兼起居室。校门前面是一座影壁,上书蒙汉文校训“智义”二字。教室后面有两个圆仓,盛有师生的食粮。校院的北角辟有运动场地,装有射箭靶子足球门等。校长阿拉兴嘎,教员



有乌伯山等人。初办时有学生 70 余名。师生的吃穿住及教学所需全部由旗里供给。学校实行正规学校的全日制授课,分班分级教授课程。教材既有蒙汉语文又有算术,也教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于学校经费发生困难停学。1926年在旗衙门沙格德尔扎布的提议下又招生复课。学校名称改为“巴林右翼旗旗立学校”,学生来自全旗,有百余名,还有十数名女生,教授蒙汉语文和算术珠算。教员有哈斯巴斯尔、陶崇阿、韩海丰等人。学校由旗里开办,对贫困学生的读书费用由旗里供给。此校一直到日寇侵占巴林时止。

在巴林草原漫长的早期教育活动中,出现了许多至今为人们称颂的潜心教育热心办学的人物。在乡间艾里,著名的有查干沐沦胡斯宝冷福林台教师。他少年时代在喀喇沁读书,学成后回旗教学,起初他学的是汉文,教的也是汉文。后来学生家长要求他教蒙文,他又求师学蒙文,几年后回来教蒙汉文。居住在大板附近的业兴敖日布老师通晓蒙汉满三种语言文字。他酷爱藏文,书房里收藏有数千册蒙汉藏文典籍。巴彦尔灯的波尔来拉喜老师,以讲读分析文章透彻深刻而著名。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因而他的学生中出现许多人才。此外,还有教学不要报酬的哈斯巴特尔老师、都楞毕力格老师,自制粉笔教具授课有方的温彦老师,边教学边翻译教材的阿木古冷老师。在巴林值得一提的是至今为人们称道的一生效力于教育的阿拉恒阿和潜心教育的奇女子陶崇阿。

阿拉恒阿是巴林右翼旗查干沐沦珠腊沁艾里人,少年时期求学于巴林名师巴斯巴扎布,精通蒙、满、藏、汉语言文字,尤其对天文学感兴趣,还精于算术和珠算。曾在巴林右翼旗扎萨克衙门任梅林职。他平生不愿为官而愿教书,于是便在巴林右翼旗必车赤学斋任教,是当时东蒙古地方有名望的教师。1910年蒙古

地区兴学办校，他十分热心于开办新式学校，为筹办巴林普励学校甘心情愿将自己的宅院让出作为学校教堂。他在这所新学里先任教员，继任校长，一直辛辛苦苦十余年。1922年虽然学校因无经费来源停办，但他仍然为勤于学习的儿童在自己家里上课，当时他已年过七旬。积数十年对天文的研究，他撰写了《天文研究录》和《执法者戒律》等著作。这些著作后来成为艾里学校的教材。

## 三十五 光彩夺目古文化

巴林草原广袤富饶,远在七八千年以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历史上这里一直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居地。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留下许多人文奇观。这些文化遗迹源于各朝各代,遍布巴林各地。遗存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类型和契丹辽文化。

据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的文物工作者多年考古,发现巴林草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新石器文化遗址不下百处,有的遗址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受到考古专家们的注意。1956年夏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7位同学在系领导吕遵涛、教授裴文中的指导下,于巴林西部的林西锅撑子山、沙窝子和西门外山坡等地进行发掘,发现了新时代遗址数处。在沙窝子发现有粗砂黄褐色陶片。上饰带状篦纹和细绳纹。还有许多石器,这些石器大体上分为大型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打制的石器如用砾石制做的砍伐器、石核、石片、有孔重石、使用的砾石石砧等;磨制的石器有石磨盘和石磨棒;细石器有石核、石片、石钻头、装饰品的石环、筒形串珠、石串珠等。质地大多是玉、石、水晶、玛瑙和蛋白石,此外还有兽骨。在锅撑子山和西门外山坡上分别发现有陶片、有孔重石、石钻、石钻头、石片刮削器和黄褐色细泥陶、砾石砍伐器、小型犁头残块等。从遗址地层分析和采集

到的文物分析,考古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沙窝子遗物中典型的细石器 and 大型的打制石器数量较多,陶器器形简单,纹饰以篦纹为主,是细石器时代较早期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址。锅撑子山的文化遗存其形制特点和沙窝子有些接近,从整体观察,其时代稍晚于沙窝子遗址。西门外的遗物其文化性质与赤峰红山的彩陶和细石器接近。从林西县城周围分布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来看,有的早些有的晚些,但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在巴林西部广大地区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巴林东部,应以巴林左旗富河沟的遗址为代表。1962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富河沟发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屋址 37 座、灰圈 12 个。屋址地面平整,有些经过捶打,地面有大片的篝火痕迹,中央有灶,有柱穴。根据屋内柱穴和烧土块上的痕迹,屋为借助土坎敷泥结构建筑。在遗址上发现的遗物有陶器,主要是筒形陶罐,陶质是夹砂陶,饰纹以压纹为主,是“之”字形弧线。除了罐,还有钵、圈足器、小杯等。石器发现很多,共 2000 余件。分为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大型石器为打制,有砍砸器、石片石器、锄形器、铤形器、凿形器、尖状器、刮削器、磨盘、磨棒、磨石等。细石器有镞、锥、圆刮器、钻、尖状器、条形石片石器、石核、石片等。还发现有锥、镞、刀柄、针、匕、鱼钩、鱼瓢等骨器,此外还有卜骨。通过遗物分析,富河沟出土的器物,陶器的器形和纹饰,石器的器形和制作技术,都标明其具有独自特征,虽然也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的泥质陶钵完全相同的细泥红陶钵,但从整体器物来看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但不同于红山文化时代和夏家店铜器时代的文化。这种文化类型在西拉沐沦河南少见。因而考古学界将其命名为“富河文化”,认为是距今五千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在巴林草原的中部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据巴林右旗文物工作者普查,旗境新石器时代遗址有40余处,典型的是那日斯台遗址。1980年,巴林右旗文物工作者对那日斯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遗址的房址为圆形、长方形或略方形,还有灰坑。在遗址采集和征集的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石雕和玉器。彩陶陶质有泥质红陶、夹细砂红陶和泥质灰陶,陶质坚硬,火候较高,表面磨光,多施黑色。纹饰有平行斜线纹、菱形纹、三角形纹、竖线纹、弧线纹、鳞纹、三角涡纹和条带状花纹。纹状大多为“之”字,有指甲纹、网络纹、“回”字纹、凸形纹、乳钉纹、凹弦纹、点状纹、螺旋纹等。器形主要有罐、钵、碗、盆、瓮、斜口器、器盖、壶、盅、纺轮、纺瓜、饼状器等。石器有磨制、打制和细石器。磨制石器主要有耜、斧、镑、凿、刀、圆饼状器、三角形器、板斧、铍形器、棍棒头、磨盘、磨棒;打制石器有锄形器、镰形器、镞形器,还有石斧、石耜、石凿、石镑等;细石器主要有石镞、石钻、尖形器、刮削器、石片与石叶、石核、石容器、石鸟形块、兽面形器、翅形器,质地多为燧石、玉髓和碧玉等。遗址中采集到的玉器较多,有百余件,质地大都为软玉,多为淡黄绿色,雕品有玉蚕、玉鸮、玉鸟、玉鱼、钩形器、三联璧饰,龙形块和云纹饰件等,还有坠饰、玉管、玉斧及纺瓜等。那日斯台的文化遗存类型,从陶器来看那些夹砂灰褐“之”字纹陶器、泥质彩陶器,无论是质地、纹饰及器形都与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的文物接近,在石器中也与红山后遗址出土的石器接近,由此看来那日斯台是西拉沐沦河以北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原始文化遗存之一,属“红山文化”类型。从以上几处典型的遗址看,古代巴林草原土质肥沃,气候条件好,水资源丰富,具备古人类生存的农耕牧养与狩猎等条件,因而是古人类的重要栖息地。“红山文化”时期,居住在西拉沐沦河北岸巴林草原原始人类已经形成聚落,从那日斯台聚落遗址上看,还具备一

定的规模,有氏族社会的繁荣景象。

从氏族原始社会进而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商周以后,活动在巴林草原的主要民族为东胡、乌桓、鲜卑、契丹。东胡是古代中国北方一个较大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居燕国北部,活动地区之一在西拉沐沦河流域。乌桓、鲜卑是东胡的分支之一亦活动在这一区域。那个时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巴林右旗出土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陶鬲、陶鼎、青铜短剑,以及冶铜鼓风管坩锅等。巴林西部林西县大井境内则有着典型的古铜矿遗址。1976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古铜矿进行局部试掘,发现有关古代采矿、冶练、铸造遗迹。经碳 14 测定,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处具有大规模采、冶、铸全工序的古铜矿遗址。仅初步发掘就发现有那时工棚遗迹四处,在那里采集到大小不一的完整石制锤镐等采掘工具 1500 余件。锤镐多为亚腰形。所有石器体形厚重粗糙,石料为天然砾石。在坑道内,古冶址较多,遍布坩锅残片、鼓风管、陶范。陶范有刻划符号,具有商周时期陶范的基本特征,此外还发现有冶炼焦渣。这个遗址证实,早在两千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就在巴林草原进行原始的冶炼活动,在简陋的露天矿道里,使用着原始的工具,创造着青铜时代的文明。同时也说明,巴林草原的冶铜与西拉沐沦河以南出土的古铜器是息息相关的。1974年1月,我国湖北省铜绿山发现战国时期古铜矿遗址。而巴林大井铜矿遗址,却比它早八九百年,这说明青铜时代巴林草原是我国北方古代先民创造的最早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

公元四世纪,鲜卑的一支自号契丹,发祥于西拉沐沦流域的广大草原。《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始祖涅里时代,把契丹族从“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的原始游牧状态,改为“始制部族,各有分地”的定居生活。匀德实时代“教民稼穡,善畜牧,为以殷富”。德

祖撒刺时代“教民鼓铸”，其弟述澜则“始以板筑，置城邑，教民桑麻，习组织，已有广土众民之志”（《辽史·太祖记·赞》）。到了耶律氏时代，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为契丹八部大人，其所领的契丹大部落是迭刺部。迭刺部居住在潢河（西拉沐沦河）迤北，狼河、南沙河两水之间，周围有天梯山、蒙国山和别鲁山。耶律阿保机意欲仿中原帝制营建都邑，公元908年耶律阿保机登上了契丹汗位，于是他以这里“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在芦苇丛中射出一支金镞箭，箭落之地，就是城邑之址。耶律阿保机便居于此裁处军国大事。时称其宴寝之所为“龙眉宫”，史书上亦称其为“西楼”或“西楼邑”。此年春二月，耶律阿保机作为契丹诸部之主在龙眉宫“御正殿”受百官及诸国使臣的朝贺。十月建“明王楼”，公元912年建“天雄寺”。后来这些建筑在刺葛、迭刺、安端的叛乱中毁于兵燹。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平定叛乱建国称帝，为辽太祖，国号契丹，遂在公元918年龙眉宫的废墟上兴建皇都。从此上京的建筑开始大规模地有规划地进行。首建城廓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告竣，五月建造孔庙、佛寺和道观，于次年八月建成。耶律阿保机去世后，其子耶律德光即位，为辽太宗。太宗朝“展郭廓，建宫室”，到公元930年，建起开皇、宣政、安德、五銮四座大殿和一些宫室、楼阁、寺庙等。公元931年太宗再次“诏修京城”，修造了太祖建国碑、太祖庙、菩萨堂、日月四时堂等。公元938年辽太宗下诏改国号“契丹”为“大辽”，改“契丹皇都”为“辽上京道，设府临潢”。临潢府是“道”的治所，也是皇都所在地，后人又称其为“波罗城”。全国政协常委全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苏赫曾赋诗以记：“群山环绕潢水横，塞北雄都尚留痕。铁骑百万横朔漠，金甲千重镇五京。管弦曾庆升平日，楼阁也吐紫烟轻。大辽而今成千古，春风又绿波罗城。”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勘察，发现上京建筑格局分为南北二城。据史籍载北为皇城，南为汉城。

皇城是契丹贵族居住之地。城是方形，分为外城和内城。城有四门，史籍称南为大顺，东为安东，西为乾德，北为拱辰。城外有护城河，河外有堤。城内建筑物虽无存，但很多地方有莲瓣柱础、琉璃砖瓦残片、建筑饰物、砖墙、砖铺地面和夯土台基，这些多为宫殿州廨寺庙及贵族的住宅。地面除裸露建筑遗物外，还存留有石刻观音像、龟形碑座等。石刻观音像以红砂岩雕就，高4.2米，头戴金冠，颈饰缨络，着长袍，拱手胸前，双手捧着法轮，立于莲花座上。这是辽代极少见的大型艺术作品。汉城在皇城的南面，是匠人和平民的住宅区，方形城，城墙土筑。城中尚存有大量的建筑构件。作为辽国国都的辽上京，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在塞北草原建立的第一座皇都。它的兴建，促进了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契丹设置府下为州，巴林境内有祖州、怀州、庆州、饶州等。其中祖州、怀州、庆州都是祖陵、庆陵和怀陵的奉陵邑。祖陵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位于皇都西北的一个巨大袋状山谷。四周群峰环绕，山间豁口修筑封堵石墙。谷口朝南两座巨岩耸立，形成自然山门，《辽史》称此处为“黑龙门”。由“黑龙门”北二里许谷之中央有太祖天皇帝庙，庙之后即为祖陵。现庙后西北方有一山峰，山前有一巨大土堆，当地人称“大券坟”。《辽史·地理志》载，“太祖凿山为殿，曰明殿”。文物工作者认为明殿为地下宫室，因此认为此山是祖陵。在祖陵东南五里许有祖州，是辽太祖的奉陵邑，于辽天显二年（公元927年）辽太宗置。此处是辽皇室迭剌部家族之地，耶律阿保机四辈先人都在这里出生，耶律阿保机秋猎多在此地，建城后取名祖州。祖州外城东南向，略呈长方，城周1785米，内城方位与外城一样，周880米。《辽史·地理志》记载，祖州“城高二丈，无敌楼，幅圆九里。门东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兴国。西北隅有内城……凡三门，上有楼



阁，东西有角楼”。内城建筑有“奉安祖考御容殿”及“二仪殿”。“二仪殿”内供奉白金铸的太祖像。陈太祖兵杖器物及服御皮裘之类，用以“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辽史》）。内城外的东侧，建有“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西侧有一巨型花岗岩板构筑的平顶石屋。石屋内平置石床。城之布局是由一丁字形大街贯穿内外二城，下接市肆，四隅有楼对峙。由内城兴圣门至外城大夏门有一条大街，将内外城之间划为东西二区。东为长霸县，西为威宁县，俱属祖州辖。越市肆过溪涧石桥，是通往上京之路。今内外墙均遗有残墙，城内建筑遗址发现有许多柱础、琉璃瓦片、滴水、石刻经幢等。

怀州是怀陵的奉陵邑。怀陵葬有辽太宗耶律德光、辽穆宗耶律述律。怀陵怀州的位置在“祖州西五十里，有西山，辽太宗葬此，曰怀陵，置州，以奉焉”（《辽史》）。陵址在今巴林右旗东部的床金沟。沟北侧山崖下有一与山势平行延伸的台地，陵区的大部分建筑都分布在这里。陵园由陵门、石砌围墙、祭殿和陵墓构成。在陵园中部有一道石墙将陵区分为内外两区，通称东陵区和西陵区。两陵各有一组祭殿。东陵区祭殿后有一陵墓，考古工作者认为是太宗的寝宫，今遗址清晰可见。怀州在怀陵西六华里，正南北向，有南北两门，四角有角楼。除城内西部发现有两处殿址，其它遗迹不见。据《辽史》记载：怀州，唐为归诚州，后以渤海俘置此，始有城。继又以所掠中国俘置其地。太宗崩后，州愈发展。《辽史·卷三十七》记载得更明确：“怀州，奉陵军，上节度，本唐归诚州。太宗行帐，驻牧于此。天宝中以太祖破鞏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大同元年（公元947年）世宗置州以奉焉。”对于太宗的死，史书还记述这样一件事。说太宗死那年，有十来个骑马打猎的人行至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忽见太宗骑着一匹白马，追赶一

只白狐狸。太宗弯弓搭箭，只一箭，射死狐狸，悠忽太宗也不见了，人们只拾到狐狸和那只箭。当日，太宗并没打猎，而是在滦城死去。以后，辽朝便在太宗射狐的地方建庙以祭，还在州的凤凰门上画太宗驰骑贯狐像来纪念这件事。穆宗是辽代第四个皇帝。史书记载，他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尝杀不已。对待奴尤其残酷，常以小疵，妄加炮烙铁梳之刑，京师有百尺牢拘系囚犯，设有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等酷刑。辽保宁元年（公元969年）穆宗在怀州射猎回帐后，被著帐奴仆近侍小哥，盟人花哥，庖人斯奴古等杀死，死后葬怀陵侧。

辽庆陵在祖陵西，于巴林右旗北部的大兴安岭南麓群山怀抱之中。庆陵的名字来源于庆州，辽庆州在陵西南30里。《辽史》记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州废，后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还爱慕说“吾万岁后当葬此”。圣宗歿后，其子辽兴宗耶律宗真依父之遗命葬圣宗于州东北庆云山下，建陵寝，筑享殿，称永陵。圣宗永陵的祭殿有望仙殿和御容殿。陵墓除葬有圣宗，还有圣宗钦哀皇后、仁德皇后。兴宗歿，道宗耶律洪基将其葬于圣宗之墓东侧隔低谷溪流的坡麓上，此墓葬有兴宗及仁懿皇后。道宗耶律洪基和宣懿皇后亦葬于此，在圣宗之墓西侧，亦隔低谷小溪。三个皇帝陵寝之地统称为庆陵，因圣宗之陵曾经称永陵，因而又称其为永庆陵。三陵北依庆云山，地势向阳，下面是开阔的草原。山上柏桦丛生，山下牧草青青，小溪流水不断，景色极佳。后来人们习惯的将圣宗之陵曰中陵，兴宗陵为东陵，道宗陵为西陵。辽庆陵是辽代极盛时期所建造的帝陵，全部砖木结构，占地方圆十余里，规模宏伟，工程浩大。陵墓形制与中原皇陵截然不同，挖凿于地下，陵墓作穹庐形。东陵被盗后，文物考古部门曾对东陵进行清理发掘。发现入墓门有甬路通向各墓室。甬路

涂有白灰，壁间绘有人物。墙壁上部、棚顶及各室门上有装饰花纹。中央大型墓室绘四季山水。室中置棺椁，棺前排列木偶。东陵多次被日本侵略者及军阀盗掘，随葬之物被洗劫一空。现地面仅存享殿的残砖败瓦，别无它物。庆州是庆陵的奉陵邑，此地于辽穆宗时即有城池，号黑河州，穆宗每岁来幸，射虎障鹰。辽圣宗将此州改名为庆州后，成为三朝帝后的奉陵邑，州一度十分繁荣。《金史·地理志》记载，城中有辽帝行宫，比它州为富庶。辽时制此郡者，非耶律肖氏不与。辽国宝多聚藏于此。州城建于查干沐沦河上游北岸的冲积平原上，衔山抱水，景色秀美。从遗址上看，州由内城和外城构成，平面作“回”字形。内外城墙均为堆土夯筑，基宽10米，高约四五米左右。内城城墙每隔百米有马面建筑。外城东西南北各有相对的城门，门宽20米，四门外均有瓮城，作四方形。门两侧遗有高大封土堆，似为门楼。内城东北角还有一小城，只在南墙开有一门，门宽4.5米。内城偏北正中处有一高大建筑群落遗址，封土堆东西长50米，高2米，似为殿址，两侧有方形土堆似为配厢。其北不远处有一高大土堆，东西42米，南北30米，似为主殿。在内城主建群中轴线上有一宽17米的大道直通南门。《辽史》记载圣宗钦哀皇后曾居住在庆州守陵。《金史·地理志》记载“庆州有行宫，辽主常于此驻蹕”。由此看来，此处似为辽帝行宫遗址。内城东门北侧有一水沟，西流环绕中部建筑群，折而从西南出城。在建筑群附近有人工池塘遗迹，地面上还有人造假山玲珑石三处，此处似为庆州园林建筑。内城西北角有一殿宇回廊遗址，遗址东西两侧有围墙的遗迹，附近发现经幢，似为寺院建筑。在佛殿东南侧即城中西北隅有八角七层砖木结构空心楼阁式辽塔一座，为辽代皇家寺庙的前置佛塔，通高71米，至今保存完好。塔基八角，素面砖砌，上部为一米高的仰莲。塔基之上即为塔身。塔身七层，层层出檐，转角檐上

有脊。墙分八面，每面转角为砖砌圆柱。柱头有铺作，每面柱头与柱头之间亦设铺作。每层檐上都有栏杆，每层东西南北四面开券顶塔门。门之两侧都有浮雕金钢力士，其它面上则浮雕飞天、狮、象、人物、供盘、经幔等。券门之上雕有二龙嬉珠或缠枝牡丹。门眉上横排五块铜镜，门两旁各有两块较大铜镜，力士头上悬两块铜镜，行间铺作四块铜镜。铜镜形状有序，奇数层为棱形，偶数层为圆形，计算起来铜镜 828 面。各层檐脊上蹲螭首，下挂铁马。最顶一层中部为八角形砖座，上为宝瓶相轮塔刹宝珠。塔内空心。每层起砖券，上铺柏木，再其上以砖平砌。1988 年国家拨付专款彻底修缮，发现塔碑塔铭。据碑铭所载，此塔名为释迦佛舍利塔。是辽兴宗之母章圣皇太后特建。此塔始建于辽重熙十六年，竣于辽重熙十八年，约两年时间建成。修复时于塔顶相轮膛内和塔刹槽发现许多珍贵文物。有数以百计金属及木制小塔，保存完好的各种经卷，以及辽代精制的丝织品、绣制品。此外还有风格独特的塔之构件。这些众多的珍品文物，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建造于巴林的辽代都城、辽陵及奉陵邑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生活巴林草原的人们无不为此而自豪。

元明清各代巴林一直是蒙古族居地。特别是有清一代蒙古巴林部驻牧于此，被清廷定边封爵，迎娶皇室公主，广兴寺庙建筑，遗有王府、行宫、庙宇等古建筑，至今保有完好的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巴林左旗境内的善福寺，和位于巴林右旗境内的荟福寺。善福寺又称格力布尔召，习称后召庙。寺庙建在真寂寺石窟前面。真寂寺是唐代窟寺。据善福寺的庙史记载：唐太宗时，有玄奘的弟子，身背行囊从长安出发北行，云游至此。他发现桃山岩峰俊美，景色幽邃，便决意在此修行。他用自己的积蓄请来石匠，就悬崖开凿石窟，利用横在石窟一块巨石雕卧佛一尊。辽朝时崇

尚佛教，这里便成为佛门重地。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名叫札门史达毕的葛根喇嘛来此传经，午夜发现桃石山上出现五彩祥光，认为此是圣地，遂告知巴林左右二旗扎萨克。二扎萨克则聚资兴建喇嘛庙，初称“阿贵图庙”，又称“塔本五台寺”，后改称“格力布尔召”，理藩院赐庙号“善福寺”。佛殿供奉铜质鍍金观音像，还有各式铜制佛像 400 余尊。盛时有喇嘛 170 余。建国后屡经修缮，至今保存完好，为巴林左旗宗教活动场所。善福寺位于巴林右旗人民政府所在地大板镇内。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初名虎庙。清雍正年间扩建，称“哈日新杜钢”，清理藩院定名“善福寺”。清乾隆年间增建楼阁式佛殿“曹格钦杜钢”，同时建钟鼓二楼和四大天王殿，寺门前面建影壁一座。清光绪年间在寺后殿前建覆钵式喇嘛塔一座。中华民国初年大部建筑毁于火，不久重建。现今过影壁进山门，便为前殿。前殿为会经殿，高 20 米，占地 676 平方米，纵深 49 间，殿内正中有高大龙井柱四楹，盘龙抱柱 34 楹，殿外环廊抱柱 28 楹。重檐歇山，精雕门窗。正脊中间是鍍金宝顶，两端高卷鸱尾。经殿前内壁绘有 36 幅《西游记》故事图画，正门前悬挂木制立匾。匾周精雕九条金龙。匾面立书“善福寺”金字。后进大殿为供佛殿，高 18 米，占地 120 平方米，供奉三世佛等。此寺喇嘛最多时 500 人，如今仍有数人驻寺诵经，为巴林右旗喇嘛教活动场所。善福寺善福寺以其宏伟的建筑、迥异的风格和宗教价值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制定了文物保管收藏政策法规。文物工作者收集到各朝各代文物上万件，建有巴林右旗博物馆、巴林左旗博物馆和林西县文物所。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文物五千余件，其中不乏世之珍品。如出土于辽庆陵的石刻契丹文小字，属国内首次发现，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辽代覆户小

帐、鹊雀登梅拐杖为世之孤品。还有清代金箱子猫眼石等为世之罕见。这些众多的流金溢彩精美绝伦的文物丰富了草原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地区的文化层次,为世人所瞩目。

## 三十六 民间文艺绽奇葩

在巴林草原，独具特色的民间文艺首推歌舞。说它有特点，大体有三。一是人人都唱，孩童唱，青壮年唱、白发没齿的老年人也唱，不分男女老幼都唱。在时空上，他们闲暇无事时唱，生产劳动忙时唱，感情兴奋时唱，感情郁闷时也唱。唱歌不问时间，什么时候想唱就唱出来。一般的只要有聚会的场合都要唱歌，喜庆节日唱，宴会饮酒唱，久别重逢时唱，多人在一起比赛唱。无怪谚语说“三个巴林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歌手”，“草原的鲜花多，巴林的民歌多”。二是歌曲表达的情感广泛深刻，贴近生活，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巴林蒙古族人感情豪放喜爱生活，因而产生许多赞美生活的歌曲。比如赞美劳动，牧民们在广阔的草原放牧，面对蓝天绿草雪白的羊群，便唱起牧歌。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白云下面游动着雪白的羊群。/羊群又好象般般的白云，/撒在那大草原上多么喜煞人。热爱生活必然要热爱自己的家乡，赞美高山大河牧场和牛羊。美丽的罕山，/山后有温泉，/一十三座峰峦，/召引十方前来祭奠；我的云青马哟，/跑起来如驾云，/内四十九个旗属你最有名。/宽宽的花头囱哟，/月牙儿象弯弓。/蹬开四个蹄，/疾驰快如风。蒙古族人性格剽悍，崇敬英武之人。他们把自己崇敬的人编成歌曲来赞颂。是谁赋予，/蒙古的统一？/是他赋予的，/圣杰的成吉思汗；绿缎的被子，/折叠的印痕已经破了，/

圣母的化身，/惦记着将军王爷。将军王爷是清朝出镇乌里雅苏台的巴林王爷，此人勇武刚直，巴林人怀念他把怀恋之情编成歌唱。对于其它地区的有影响的赞美英雄的歌曲，人们也唱，如反垦英雄嘎达梅林之歌、陶格套胡之歌。巴林蒙古族人性情敦厚朴实，热情好客，反映这方面的歌曲也不少。比如在宴会的场合，主客互相对答着唱。彩云把您接来了，/我尊贵的客人；/骏马把您驮来了，/我敬爱的客人。/吃一口肥颤颤的乌查肉，祝福您永远安康；/喝一口淳香的奶酒，/祝福您世代吉祥。阳光照在哈那上了，/我尊贵的主人；/彩云落在陶敖上了，我热情的主人。/吃一口肥颤颤的乌查肉，/祝福长河般的幸福；/喝一碗淳熟的奶酒，/祝福高山般的长寿。在巴林数不清的民歌中，要数情歌的比重最大也最感人。唱这样的歌曲，仿佛大草原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马一羊，一花一草都有了人的感情。这些歌唱起来情感激越，思绪绵绵，用语幽默，比喻贴切，韵味优美，表现出草原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生活和无比高尚的道德情操。比如男女相爱的《胡仁海》，嘴唇红又红，/心窍灵又灵。/年轻小伙望着你呀，/谁个不动情！/脸蛋白又白，/心窍开又开。/年轻小伙望着你呀，/谁见谁不爱；还有一首《韩密香》，震动山峰的，/是黑马的四只蹄，/搅动人心的，/是韩密香的两只眼睛。/阳光下的松树枝，/离不开影子。/我和韩密香，/相爱一辈子。还有抵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主的歌，如《道尔吉拉布华》，他那紫绸头巾再好，我也不愿去啊，妈妈。/……只要女儿不中意，堆座金山也不去啊，妈妈，/要是女儿心情愿，/下地狱也心甘啊，妈妈。在巴林有一个德穆其格章京，反对残暴的丹纳王爷，携带情人白小姐离开兵营出走。丹纳王爷派兵追捕，白小姐不幸中弹身亡。德穆其格章京守护着白小姐的遗体，唱道：尽管炮声如雷鸣，/哥哥我置之不理。/但愿我死后的灵魂，/来世和妹妹在一起！/尽管弹丸落如



雨，/哥我一点也不躲避。/但愿我们俩的魂灵，/死后能够在一起。……在不同的场合还唱不同的歌，有虔诚礼拜的宗教仪式歌，豪迈奔放的摔跤歌，缠绵甜美的摇篮歌，热情洋溢的迎宾歌等。巴林民歌的特点之三是且歌且舞。常见的有筷子舞和盅盏舞。宴会场合随手以筷和盏就可舞动。可单人，可双人，也可多人舞。观者击掌相合。舞助歌兴，歌伴舞唱，将欢愉的感情达到共鸣，推向高潮。

在巴林民间文化长河中，值得一提的是说唱艺术。“说”是指蒙古语说书，“唱”指唱好来宝，通常说唱结合。蒙古语说书中有好来宝段子，唱好来宝也夹杂道白。蒙古语说书，大多是蒙古族中老年人。蒙古书特点是边说边唱，说唱还要伴奏，通常是拉四胡或马头琴。因而说书人既会说又会唱还会给自己伴奏。人们喜欢听蒙古书。若在夏季的夜晚，便在野外架起牛粪火熏蚊蝇，就着满天的繁星，听说书人说书；若在冬天，便围坐在蒙古包内，烤着锅撑子或泥制火炉的牛粪火听书，一听就是大半夜。说书人一般不用固定的脚本，随说随唱随编。书中的故事一般都是以自己熟悉的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编成书，然后以其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形象的表达力来吸引听众。说书的道具也十分简单，仅一张小桌即可。桌子上摆着听书人献上的一碗好酒。说书人盘腿打坐在草地上或蒙古包里，说唱到嗓子干时，便喝口酒润润喉咙。说书人大多有广博的阅历和丰富的知识，特别要熟悉历史、民歌、地方掌故和风土民情。蒙古族人喜欢听书，亲切的称他们为“胡尔沁”，意即“说书艺人”。赞扬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五行八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艺人们不断研究开拓自己的说书艺术。各种说书流派竞相发展，形成具有不同特点和风格的说书派别。在巴林，大体上有以好来宝为主的演唱派，有叙唱结合的说唱派，有以讲述传说为主的讲书派。好来宝演唱派

说书故事情节以好来宝唱词推进,讲究唱嗓高亢有力,演奏弹弦与打弓;说唱派注重语言运用,多以比喻、夸张、对比等手法叙述故事,特点为语言诙谐,吐字清楚,衬词重沓;传统派说书一般取材演义故事,有着较为固定的表达手法,讲究语言富有哲理,故事情节严谨,演唱较多,演唱一般采用“勃(萨满)”或佛经的曲韵。蒙古语说书是一门高深的艺术,说书人大都拜师入门,出徒后自己在实践中不断钻研提高,丰富和发展本门派说书艺术,因此说蒙古书的艺人们大都有师承关系。在巴林左旗白音勿拉呼 and 哈达至今保留着一把说书用的四弦胡琴,学说书的人都到这里来祭拜它。它的主人是巴林草原乃至东蒙古著名的说书艺人锡尼尼根,琴是他一生中的生活拐杖,艺术伴侣,巴林的许多有名望的说书人都是他的学生。锡尼尼根 1889 年出生于巴林,自幼就喜好蒙古民间文艺,尤其喜欢唱好来宝和说蒙古书,十多岁时就学会好多段子,15 岁那年迫于生计,离开家乡荡游草原,以说书为生,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的足迹遍及扎鲁特、达尔罕、巴林、阿鲁科尔沁及乌珠穆沁草原。由于他的艺术功底深厚,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欢迎。锡尼尼根记忆力强,对上至商周,下至隋唐各朝各代的演义背得滚瓜烂熟,随便讲起哪一个就能说上半年或几个月。他说书艺术中难能可贵的是说起书来感情奔放,情节动人,语言丰富,曲调多变,善于把握书中的人物,对人物形象和内在感情表达得准确。他说起书来把自己的情感也揉进去,故事情节紧张时,他本人也提心悬意,仿佛身临其境;说到好人的悲剧时,他自己也十分悲痛,如同掉进万丈深渊;说到恶人办坏事时他切齿扼腕,忌恶如仇;说到希望与光明处,他也象书中人物一样尝到了生活的美酒。锡尼尼根说书语言极为丰富。他特别注意学习和运用群众的口头语言,因此他说的书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正因为如此,他的语言永远不贫乏,他唱的曲调永远保

持活泼新鲜。锡尼尼根为人爽直豁达不保守，他教的徒弟遍布巴林各地，其中不乏佼佼者，著名的当代蒙古说书艺人帕杰就是其中之一。

“好来宝”汉语意为“联韵”。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也很受蒙古族喜爱。它韵律和谐节奏鲜明演唱起来气氛浓烈引人入胜。它虽有诗的韵，但不象诗歌那样凝重含蓄，讲究顺口合调通俗易懂。演唱好来宝的形式不拘，可根据需要多种多样的变化。在巴林演唱方式有四种：一是单人演唱，这种形式的好来宝蒙古语称“札达盖”。二是对口演唱，称“额勃合”，即由两人围绕叙述某一事物对唱。三是问答好来宝，称“达日拉查嘎”，不用乐器伴奏，随编随唱。一般一人提问一人解答，用这种形式比赛知识、智慧和口才。四是群口好来宝，即多人演唱，又称舞台好来宝，这种形式多用来歌唱新生事物，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建国后，各级人民政府十分关心蒙古语说书和好来宝这种艺术门类的发展。电台录制巴林说书艺人们的说书段子，在专题节目中播放。城镇开办蒙古语说书馆，把这种民间艺术从乡间搬进城市。

说起巴林的民间文艺不能不提那独具特色的民间绣纳。这些绣纳既是工艺品又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艺术内涵。因此说巴林的民间绣纳是一种民间文化艺术。这种艺术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然后还原于生活中去，是一种美的思考，美的制作，美的享受。应该说这种艺术属于蒙古族女子的专利。他们一代传一代，艺术水平越来越高，艺术作品越来越精湛，融进了蒙古族妇女多少代多少人勤劳聪明与智慧，其出类拔萃者可谓十指春风百代功夫。大体上说蒙古族绣纳分三个程序来进行。第一是画样。绣什么画什么首先要有样子。样子是最初的创作，称样稿。或动物，或人物，或花鸟虫鱼，或云纹盘肠如意万寿及花边图案等，先画在纸上再往绣纳的布帛上描。有的不画直接用剪刀剪出样子贴

上再绣纳。艺术高超者直接描画。描画的用具也很简单,大锥插子醃粉或胭脂即可。其更高超熟练者不打稿,看样子绣或靠心中想象绣。其绣法有平绣、纳绣、堆绣,其纳法有平纳、套花纳、戳纱纳、扒车轱辘纳。蒙古族女子绣纳时执针的方法也很讲究,大都于食指戴角制或骨制的顶针,拇指与中指执针,针尖向内戳纳自如。在绣纳品中最典型的要数绣纳蒙古靴、荷包与佛像等。绣纳蒙古靴有盘花、贴花和绣花之分。盘花以纳为主,用蓝线或青线盘纳成回纹图案或双纹图案;贴花纳绣结合,一般贴大绒或蟒缎,这样纳绣鲜艳夺目;绣花即用五色丝线直接在布帛上戳绣,可以随心所绣色彩纷呈。荷包是作为一种艺术赠品来看待的。蒙古族人互相赠送荷包表达其美好的祝愿。荷包主要靠绣,讲究小巧玲珑,鲜艳精美,活灵活现。主要有青山绿水、飞禽走兽、骏马奔腾、鸳鸯戏水、彩蝶飞舞等。绣佛像则是一种庄重高雅的艺术创作。绣制时需先焚香净手,用线香头在帛缎上画底稿,然后一针针地平绣,讲究技法高超一丝不苟。完成一帧绣像,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半载。

## 三十七 巴林习俗趣话多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各种风俗习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和心理状态,有些风俗既实用,又有趣,同时含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蒙古族是古老的游牧民族,历来择水草而居,居住为蒙古包。蒙古包包顶高四米左右,围壁高一米五左右,门宽不到一米大多向南或东南。蒙古包的大小虽不相同,构造却一样,几百年来都是同样的格式。一般在水草适宜的地方画一直径七米左右的圆圈,照圆圈大小垒起比平地稍高的包基。包顶由上下两部构成。下部叫乌乃,以长约二米多的柳板,互相衔接,绑在架的顶端,成为一固定的圆形顶壁;上顶叫“套脑”,直径一米二左右,上雕各种美丽的花纹如八卦纹等。

蒙古包在大风雪中阻力小,不积雪,下雨时包顶不存水。蒙古包占地圆而小,且连地面,寒气不易侵人;包“哈那”是用数根相等的细木棍和毛、皮绳(扣绳)连结而成,拉开便成圆形的蒙古包墙,搬迁时宜折叠,又能当牛车的车板。包的顶端有个口,就是蒙古包的天窗,可通风、通烟、通气,又可采光。蒙古包冬季盖毛毡,用绳索勒住,夏季围以布帘,易拆装,便游牧。

一般蒙古包内地上都是根据各自的经济条件铺矮木板,铺

毛毡、花毡、羊皮、牛皮等。包内的摆设，通常是正面设长方矮桌，矮桌的左端摆大小衣箱，右端放橱柜、奶桶等器皿。包的中央有图力嘎，高一尺左右，上面放铁锅或铜壶，烧树枝和牛粪，烟从顶孔喷出。

包外庭院设置也有一定的格式。一般用柳条笆或榆树条笆围设院墙，墙附近夹一个畜圈，圈前堆积牛粪或羊粪，做为燃料。有的以蒙古勒勒车二、三辆数十辆，排列在蒙古包的周围，每户庭院都养着狗，这种狗非常凶猛，它能帮主人看家、围猎，也有的能帮主人放羊，所以蒙古族人对狗总是精心饲养，特别喜爱。

蒙古包随游牧经常搬迁，冬季营地一般找山弯或洼地，这样一则牲畜便于放牧，二则可避暴风雪的侵袭。夏季的营地选择高处和通风的地点设包，这样可以防止牲畜受病，也有利于轮换草场，便于观察畜群。春季和秋季移场则要看水草的情况而定。

蒙古族历来以狩猎、游牧为主，所以为适应生产和地理条件，其服饰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巴林蒙古族人男女皆喜穿长袍、靴子，这是为骑马之便。男子服装多为宽领大袖，以成幅彩绸系腰，不垂穗，带火镰，还带烟荷包及精巧的蒙古刀象牙筷子。冬季多戴毡帽或蒙古式尖顶狐狸皮帽羔皮帽。妇女一般身着红、绿色泽鲜艳的衣裳，以最鲜艳的丝绸束腰，双结穗垂于左右。

便服有“浅木其”（长衫）、“庞库”（棉袍）、“屋夹”（坎肩）、“得勒”（大皮袄）等数种，皆右开襟，嵌对扣或斜大襟扣。男服镶单边者为多，女子服饰较为讲究，且有闺女之分。姑娘喜梳双辫上系有饰件，以彩绸缠头或围巾，足穿花鞋靴。蒙古靴多为牛皮革制，女靴多为布制，冬季内套毡袜，既轻且暖。已婚妇女梳盘发，喜戴金银、宝石、珍珠、玛瑙、珊瑚等精制的首饰。平素牧区女子一般不戴帽，多用红、绿等色的长绸缠头。

蒙古族的饮食大致为三类，即粮食、乳食、肉食。粮食以炒米

为主。炒米由糜子加工而成，历史久远，是北方少数民族很早以前的主食，形成很有特色的民族食品。蒙古族牧民一般一日三餐；早上、中午一般喝奶茶，吃炒米，也有早上吃肉食的；晚上吃羊肉、面条、大饼、饺子等，常食的还有图古来汤、肉粥、阿木萨等。

乳食蒙古语称“查干伊德”，是纯洁、吉祥的意思。乳食品在饮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除熬奶茶外，多制成乳制品佐食。在巴林其传统做法有：

奶茶，蒙古语称“苏太切”，是蒙古族最喜爱的饮料，一日三餐都要喝茶。奶茶的做法一般是先把砖茶捣碎，放入茶壶或铜锅内熬煮，然后加上新鲜的牛奶，烧沸以后，用勺频频撩扬，待茶奶交融时，加少许盐，即为奶茶。

酸奶子，蒙古语称“爱日格”、“查嘎”、“塔日嘎”，做法是将鲜牛奶放入缸或盆，待发酵后，奶脂上浮，其下沉凝结部分就是酸奶子。酸奶子既可以和炒米吃，也可以做酸奶豆腐。

奶子酒，蒙古语称“萨拉音阿日黑”。做法是用鲜奶淋成汁子储于缸内，使其味酸酿制。奶子酒蒸馏方法与制粮食白酒相同，惟用具简单，把发酵的奶子放入锅中慢慢熬煮，蒸馏后便酿成透明醇香的奶酒。这种饮料酒精度不太高，酒性很柔软，不易醉人，如果饮醉，其醒酒也较慢。草原上的牧民常用奶酒招待尊贵的客人。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忽必烈在皇宫宴会上曾把奶酒盛在名贵的碗里，犒赏有功之臣。奶酒有驱寒、活血、舒筋、补肾、消食、健胃等效能。所以，蒙古族常把它当消炎药品治疗胃病、腰腿疼和肺结核等疾病。

奶皮子，蒙古语“乌日莫”，即浮在奶子表面的一层油脂。把鲜奶子放入缸内，经一定的时间（夏天约一天半左右即可），奶子就自然凝结，同时表面上浮一层油脂，这就是“乌日莫”；另一种

奶皮子称“哈它存乌日莫”。这种奶皮子的做法是将鲜奶放入锅内，用勺频频撩扬，稳火烘煮沸，使奶沫浮在上面，同时点上生奶，奶上即成一层皮，这时用筷子挑起，放在通风处阴干后，即成“哈它存乌日莫”。奶皮子可以和炒米吃，是非常浓香可口的食品。

奶豆腐，蒙古语称“胡日达”。做法是将取出奶皮子后的酸奶子经稳火熬煮，捣粘，抹制成块，干后即成。奶豆腐有微酸的有微甜的，是牧区冬春季节的好食品。

白油，蒙古语称“查干陶苏”。做法是将乌日莫放入桶内，搅拌后，使其发酵，等到脂肪浮在上面呈白色即成白油。

黄油，蒙古语称“西阿日陶苏”。做法是将奶皮子(乌日莫)经短时搅拌，加稳火熬煎，用勺频搅使水分和油质分解，待色泽微黄，便成黄油。

奶酪，蒙古语称“毕喜拉格”。通常做法是将制黄油所余的奶子放到热处，待其发酵沉淀，然后将沉淀的粉块装入布袋压榨，捏成各种形状，干后即可成奶酪。

羊肉，是蒙古族最普通也是最喜爱的食品。各地蒙古族对羊肉的吃法不下几十种，巴林一带常见的而且享有盛名的有“手扒肉”、“羊乌查”(即全羊)等几种。“手扒肉”的做法是将全羊剔卸成若干块，白水下锅，加一些佐料煮沸后就起锅，肉香味美，鲜嫩异常。“羊乌查”的做法和吃法都比较讲究。做法是将全羊由脊上第七肋骨到尾部割为一段，再割四肢、头、颈各为一件，带尾入锅。煮熟后，将全羊的肝、肺、肾、血肠等各部分同肉一起放在大盘里待客，肉又嫩又脆，宴客、祭奠以全羊为上品。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平定天下，大犒功臣，设全羊席即“乌查”之宴。

“是百灵鸟就要唱出最美的歌，是巴林人就要讲究礼貌”，



“有桥的河流显秀美,有客的人家显和美”,“有朋友的人游遍草原,无朋友的人道路窄小”。这几则蒙古谚语生动的体现蒙古族是一个热情好客,豪放爽朗,而且讲究礼貌的民族。

牧民对来客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一见面总是热情问候,“他赛音白努”(您好)。有时还双手按右膝前屈,左腿后弯,上身前俯,并向客人问“阿木日白努!”(安好)。随后主人把右手放在胸前微微躬身,请客人进蒙古包内。客人进蒙古包后尊者坐正面,自左至右依次排坐,右边不能坐客人,是女主人特有的地方。客人坐好后,主人敬烟,献奶茶,客人用右手接,吸烟者接过烟后再把自己的烟回敬给主人。嗅鼻烟壶,通常是躬身互接,客人在鼻端嗅嗅即可送还主人。这时全家老少围着客人坐下,问长问短,好比自家人一样。平常待客在喝奶茶之后,慷慨大方的主人总是把香甜的黄油、奶皮子、醇香的奶酒、酥脆的油炸果子和炒米、奶茶、奶酪以及巴林草原风味的“手扒肉”等,一一摆在客人面前,请客人痛饮饱餐。主人若对客人特别敬意,常把奶酒捧在哈达上端出来向客人敬酒。蒙古族人把酒看作是食品的精华,敬酒是表示对客人的热情和尊敬,有时还唱一些表示欢迎和友谊的赞歌来劝酒。客人接杯畅饮,主人格外高兴,如果遇到宴请特别尊贵的客人或祭奠时常摆全羊席(称秀子和乌查、布胡勒等)。草原上的蒙古人民对客人的食宿常不取酬金,无所计较。若收取便认为对客人招待小气,是看不起人的表示。当客人道别的时候,常常是全家相送,指明去路。

巴林蒙古族以父系为主,同一血缘的男女不能结婚。结婚一般是女到男家,个别也有男到女家入赘的。配偶的选择多由父母作主,如果父母不在由亲属中长辈作主。订婚的办法通常是男家请媒人,以哈达和美酒等礼品去女家说媒,如果女家同意,即作为定亲。一般男方须多次上女家求婚,才能得到女方的许诺。如

果女方谢绝,男女青年不能再见。如果双方商定可以定亲就喝“开口酒”。喝“开口酒”时媒人带上全羊(羊乌查)和酒送到女方家,女方家请来亲朋好友陪客人喝酒,表示正式订亲,提出彩礼数。彩礼常以“九五”计算,最多为九个“九五”。一个“九五”是十四头牲畜,一般平民为一个“九五”。但是富人家就增多,甚至有的九个“九五”。彩礼送到女方家,男女青年始知自己的婚事。结婚那一天,男家在所住蒙古包附近另设一新蒙古包。早晨,新郎身着绸缎长袍,腰束金黄色的宽带,脚蹬高筒马靴,负弓带箭,由媒人、伴郎陪同,跨上骏马,沿途歌声不断,向女家奔驰而去。当这群骑士兴冲冲地来到女家的时候,女家的蒙古包却闭门不开,新娘的亲戚朋友在门前围成圆形,作出阻拦迎娶姿态。这时由善于词令的伴郎(祝颂人)走出来,向新娘的伴娘们陈说以下的意思: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前来迎娶。在说出这样的话后,女家仍不开门,伴娘须高唱蒙古民歌发问,请伴郎也用民歌来作答。这种民歌对答的风俗至今在巴林草原上仍然留存。伴郎对答如流,女方的伴娘才开门把新郎和同新郎一起的伴郎等一行人请到蒙古包内。进蒙古包后新郎向佛像叩头,然后向新娘的父母献哈达。这时女家的主人上全羊、摆酒席向来宾劝酒,盛情招待。然后,新娘也在伴娘的帮助下,戴上珠光闪闪的头饰,蒙着鲜红的面纱,穿上桃红或草绿色的蒙古袍,足蹬长筒皮靴或蒙古式精制的云纹花靴子(一般有十二、十六或二十四云纹),在送亲的礼乐歌声中新娘向父母和朝夕相处的姐妹们依依不舍的告别,在女家亲友的陪同下出发,奔向新郎家。按着习俗,迎亲路上双方要互相追逐戏逗。常常是女方有人争抢新郎的帽子或弓箭。如果被抢去了,新郎就随即献哈达和敬美酒求还。总之一路上双方欢声笑语不绝,纵马奔腾充满生活情趣。迎新娘到家后,男方向送亲的伴娘(一般二或四人)敬双杯酒,方下马。新娘下马或下车时铺鲜

红的毛毡。这时男家已经选好的一对老夫妇(分头老)手拿鲜牛奶给新娘吃“开口奶”,并用羊肋骨给新娘分头发。然后拜天地、拜火神以表示爱情忠贞不渝,也包含着对新人今后兴旺发达的祝愿。走进蒙古包内的新娘新郎向佛像和新郎父母跪拜献哈达、敬美酒,同时对长辈也要叩头敬酒。

礼成以后,紧接着举行宴会款待送亲的一行人和亲朋好友。在蒙古包内男女老少围坐一堂,矮桌上摆满酒杯、食品和一盘盘鲜嫩的羊肉(也有全羊和羊乌查等)。这时伴郎和伴娘手执酒壶让新郎和新娘向诸位来宾逐一敬酒。敬酒时,在场的人们弹起三弦,拉起四胡,拨动马头琴,一面畅饮,一面高歌。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放下酒杯,和着欢快的琴声,翩翩起舞。这时,新郎的父母及其长辈们高兴得合不上嘴,不断地说着:尽情地唱吧!今天的歌声最优美;尽情地喝吧!今天的喜酒不醉人!富裕人家的结婚宴饮,往往连续好几天。

蒙古族人的传统娱乐,一般为赛马、摔跤、射箭、音乐、舞蹈等,赛马、摔跤、射箭历史悠久,早在十三世纪就闻名于世。那时弓箭是狩猎的工具,骑兵把弓箭作为进攻和防御外敌的武器,摔跤是训练战士体能的手段。从那时起,蒙古族各部中都有“那达慕”(游艺)活动。而赛马、摔跤、射箭这三项技能,又称蒙古族“男子汉的三项竞技”,是衡量男子有无本事的标志,还作为各种庆祝活动不可缺少的娱乐形式。一般以盟、旗或苏木为单位,半年或一、二年举行一次竞赛,对三项竞赛的优胜者奖给马、牛、羊以及其它物品。

赛马是巴林草原上最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传统娱乐活动。每年七八月间举行“那达慕”大会时,周围百里以至几百里以外的牧民都驱车、乘马赶来参加赛马活动。赛马的人数多少不等,少则二、三十多则上百人。赛马人的年龄有七、八岁的男女儿

童,有青年和壮年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赛程一般为三五里或数十里,终点必设在会场。为减轻马的负荷,不论男女老少赛马时都不备马鞍,骑手们身穿华丽的彩衣,头匝红绿绸飘带,显得既轻便又英武。比赛开始,赛马人跃马竞驰,争先恐后,扬鞭飞奔。观众欢呼助威,声震草原。当骏马疾驰的时候,赛马人如腾云驾雾一般,表现出娴熟的骑艺。比赛结束时,取上名次的马匹由骑手牵到主席台前。这时台上祝颂艺人们大声朗诵起赞马诗歌,并为取得前三名的骏马前额上洒奶酒,随后依次授奖。

摔跤是蒙古族喜好的游戏。蒙古人赞扬摔跤手是草原上的英雄好汉。蒙古族的摔跤同其他民族的摔跤不同,它在规则、方法、服装、场地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蒙古式摔跤都必须站着摔,一上场就互相抓握,膝盖以上的任何部位着地示为失败。摔跤的人数是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二百五十六等双数,总数不能出现单数。报名不分民族、不分地区、不限年龄、不限体重。安排对手由德高望重的裁判员负责,不征求摔跤手的意见。比赛实行单淘汰制,即每轮淘汰半数,一跤定胜败。摔跤手的服装比较讲究,下身穿肥大的裤子,外面再套一条绣有各种动物和花卉以及云纹图案的套裤;上衣是用牛皮制做的,上边钉满银钉和铜钉,后背中间有圆形银镜或云纹之类的图案。腰间多系红、蓝、黄三色绸子做的围裙;脚蹬蒙古靴或高筒马靴;脖子上套着五颜六色的布条项圈。看上去煞是威风英武。比赛的场地较简单,只要有一片草坪或松软空地即可。观众席地围坐,摔跤手就可以在中间进行比赛了。比赛前,双方都有几个人放声高唱挑战之歌,以声助威,唱两三遍之后双方摔跤手跳跃而出,在场地上争斗相扑,盘旋相持,直至一人倒地,即决出胜负。然后胜者扶起败者,握手而散。最后胜者受奖。

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娱乐活动之一。弓箭的式样、重量、

长度、拉力等都不限。一般规定每人射九箭，分三次射完，以中靶的箭数多少评定名次，对优胜者给予奖励。比赛之前，射手身穿紧身彩袍，带上弓箭，当裁判员发令后，便开始拉弓搭箭，瞄准箭靶，当射中靶上的某一环时，靶环便自动脱落，观众不断给优胜者喝彩助威。这项比赛活动，至今仍然为巴林草原牧民喜爱，并在每年的“那达慕”上都有射箭这个精彩的项目。

“吉日格”是牧民游艺活动项目。“吉日格”的游戏多种多样，有“宝根吉日格”、“穆日古吉日格”、“额博日吉日格”等。但不管那种都需要棋盘和棋子儿。棋盘和棋子儿都可就地取材。若在牧场田头，平地划印作盘，石子小草梗作子儿即可。宝根吉日格两方共用 26 个子儿，其中一方两个子儿，曰“宝格”（鹿），另一方 24 个子儿，曰“敖海”（狗）。游戏时“宝格”在盘上蹦走，每蹦一格“敖海”就被吃掉一个。“敖海”一步一格走。若“敖海”围住“宝格”使“宝格”无处可蹦，“敖海”一方赢；若“宝格”将“敖海”吃掉则“宝格”赢。“额博日吉日格”共 3 个子儿，其中一方两个子儿，曰“敖海”，另一方一个子儿，曰“狼”，每方走一步，若“敖海”将“狼”赶到棋盘的尖上，使“狼”无路可走，“敖海”赢，否则“狼”赢。“乌木都吉日格”每方两个子，曰“白狗”“黑狗”，一方把一方圈住走不了为赢。“穆日古吉日格”共 24 个子儿，每方 12 个子儿。曰“白狗”和“黑狗”。两方轮流上子儿，争占有利位置。然后在棋盘上走，逢蹦即将对方的子儿吃掉，最后剩子儿多的赢。

喜塔日即蒙古相棋，类国际相棋，由棋盘和棋子组成。棋盘有深浅两色间隔排列的 64 个小方格。浅色方格称“白格”，深色方格称“黑格”。棋子共 32，双方各 16，有诺颜（王爷）哈屯（王后，也称博尔斯），哈萨嘎（车）、骆驼、厚（儿子）。对奕时“白格”先走，以后双方轮换各走一着。吃掉对方的棋子，由原停的格“王车易位”，到达对方最末一格时，都可变成自己一方的被吃掉的任何

一个棋子。玩喜塔日不能吃掉对方的乌努钦厚(孤儿)。“王”被对方将死就输棋。双方均剩“王”或者同色格的单骆驼就算和棋。

“帕尔吉”是蒙古族特有的玩具。帕尔吉也叫益布、润布、嘎西帕尼。因为是贻贝做成的,所以又称之谓贻贝。帕尔吉的棋盘是在四方形或十字形的白布上面划分方格,边角绣以图案。对奕各方要有数目相等的棋子,以不同颜色相区别,帕尔吉分三种,为帕尔吉、白帕尔吉、海螺形帕尔吉。玩的人数不限,可一人也可以几个人结组,各方人数相等。如果一方投帕尔吉(在木盘内或毡子上都可投)算其正反两个面的数字,以此确定棋子的行走。棋盘上各方棋子的多少是决定胜负的标准,投撒帕尔吉确定棋子上棋盘的个数和行走步数,只是胜败的基础。而盘上的对奕则是胜败的关键。每个棋子在棋盘上按顺时针方向行走,不得后退,中途如不被对方吃掉,转一周后安全返回自家门内,可谓完成使命,得一子。帕尔吉也和其它棋类一样,讲究技法奇绝,使人大动脑筋,但又以投撒帕尔吉为基础奕棋,所以充满游戏色彩。

蒙古族喜狩猎,巴林蒙古族把狩猎作为体育娱乐活动来看待。秋冬猎狐、狼、野猪、黄羊,春季猎兔,都有不同的猎法,大体上用枪杀,狗捕。围猎的时候,有了、卡、赶杖等不同的分工,布置得有条不紊。有合围、放围、轰围、整围、推围、紧围、撤围等程序。有围猎中,如果谁玩忽职守,走错围猎路线,违犯了狩猎的规矩,就会受到众人的指责,由阿宾达(打围的头领)仲裁是非,惩罚肇事者。如果两个人因猎物发生争执一时难以分清是非,则把猎物放在一定的射程之内让争执双方各射箭三次,猎物归赢者所有,倘若两人都未射中就送给没获取猎物的人。

蒙古族的葬礼简单,特别是巴林蒙古族的葬礼更为简单。葬式大体上有野葬、土葬、火葬三种。

野葬,又叫天葬,过去在巴林一带是常见的一种葬式。人死

后,把尸体用白布裹好,载在牛车上,到野外的一定地点后,松开绑绳尸体被车颠落,落地处为安葬净土,任各种野兽、飞禽吃掉。过三天去看,若被吃掉,就认为死者已“升天”了,对于后人吉祥之兆。若尸体还存在,则死者生前有罪过,并且罪恶很重,所以请喇嘛诵经,替死者忏悔、超渡,并祈求死者尸体早一天被吃掉。

棺葬,也叫土葬。人死后,家人给死者更换新衣或用白布缠尸,然后将尸体连同死者生前所用的衣帽、鼻烟壶等日常用品及死者较喜爱的东西一起纳入坐棺,入土埋葬。

火葬有两种,一种是喇嘛死时,把尸体放入油锅内,以烈火烧,最后光剩骨灰,这时将骨灰装入小箱内,然后将其放置于山上,周以石块垒成圆坟。

另一种是给死者全身缠上白布,涂上黄油,请喇嘛诵经超渡,然后将尸体投入烈火中焚烧。这种葬式多用于患痲病妇女病或难产致死以及其它一些因有传染病死的人。

无论那一种丧葬仪式,皆请喇嘛诵经超渡,一般平民家诵三五天,大户人家诵七七四十九天以至百日,期间不许做婚事,不许饮酒作乐,不许剃发,不许穿红袍匝红腰带等。

春节是蒙古族最盛大的节日,蒙古族把春节叫做“查干萨日”,意为“白月”或“白节”,因为“白色”对蒙古族来说是纯洁、吉祥之兆,所以蒙古族常以白为吉。因此,春节叫做“白节”。

蒙古族十分讲究熬年,即大年三十整个一夜,蒙古包内外灯火辉煌,优美的马头琴声和歌声不断,人们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天一亮,男女老少都换上新的服装,晚辈给双亲和老年人叩头,献哈达,逐一拜年,然后敬奶酒,祝愿老人和长辈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老人和长辈们也对晚辈赏奶食品、糖果等,祝愿子孙们生活幸福。

拜年仪式结束后,男女老少纷纷跨上骏马,带上漂亮洁白的

哈达,三五成群到亲友家逐一拜年问安。他们到每一家都受到热情的款待。

祭火神是蒙古族的一个主要祭祀活动。每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日为祭火神的日子。蒙古族对火神格外崇敬,认为火神可以赐予幸福与财富。阴历腊月二十三日这天,在“图力嘎”(即锅撑子)前烧香、供献牛羊肉、奶酒、黄油、奶皮等高级食品,然后全家老少对着火焰向火神祷告祭火神爷。祭火神爷的日子特别讲究全家共同祭祀,团聚欢乐,吃团圆饭等。

祭敖包也是蒙古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祭礼之一。敖包原为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等宗教活动的地方,巴林草原一直延续至今。祭敖包有两种,一种是一个村或几个小村联合举行,他们在固定的敖包地点请喇嘛诵经,供羊乌查、奶食品,奠酒祭祀,人们围跪祈祷人畜平安,无病免灾,然后举行那达慕赛马、摔跤等游戏活动。另一种是由旗举行的名山大川敖包祭,巴林左右二旗常聚会在赛汗罕乌拉山举行敖包祭,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这一天,王爷亲自带领旗民去罕山焚香奠酒,设奶食品和“全羊”祷告祭祀,奏乐诵经后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游戏。

蒙古族古老的运输工具主要依靠牛、马、驼及“勒勒车”。“勒勒车”是蒙古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搬运工具。这种车的结构简单,造形美观,使用方便,用处很多。它可以拉水、运米、运蒙古包,也使用于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这种车的轮高,直径约一米四五左右,一般相当于牛身的高度,车轴、车网子用桦木榆木制成。勒勒车不仅用于牧草繁茂的夏季沼泽草原和积雪厚、风沙大的冬春草地沙漠地带行路,也能于崎岖不平陡路上通行。“勒勒车”即使折损也可随时修理。“勒勒车”能节省劳力,牧民常常用“勒勒车”进行运输时,各个车头尾相连,一个人常赶七、八辆,



甚至十几辆，他们在第一辆车上用皮张、毛毡、树枝以及其它物品架棚，坐在里面赶车运输日常用品如燃料、食盐、蒙古包等。

驼骆是沙漠地带的重要运输工具。巴林南部地区沙漠较多，牧民行路、搬运除使用勒勒车外，还使用骆驼。沙漠地区水草缺乏，所以骆驼能食用沙漠与半沙漠中生长的植物，具有耐饥渴、耐寒、耐暑、能负重的特性。一峰成年骆驼能驮二百到三百斤的物品。骆驼也能驾勒勒车，这样的勒勒车每车拉载上千斤，同时骆驼身上还能负二百余斤重的物品。

## 后 记

《巴林史话》作为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三辑(汉)出版了。这部作品从1994年完稿到如今已经4个年头,期间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完善,使之臻于完美。作为她的作者,我们感到辛苦耕耘后终于有了些微收获的喜悦。

我们是多年的文史工作者,在长期的研读地区史籍,抢救、征集与调查近现代史料的过程中,对巴林草原产生了浓厚的感情。由衷的感到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蕴藏着灵气,她的每一道辙印都留着一串故事,她的每一段时空都闪烁着多彩的光环……

建设巴林要热爱巴林,热爱巴林须了解巴林,不但要了解其现状,还要了解其历史,以此启迪智慧,激发情感,开阔眼界,吸取经验。将这些感人肺腑的历史展现出来,这是当代文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们写这部书的动力。将历史记载与人们的亲闻亲历互相印证,以史实为主,辅之以传闻轶事,集史料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

体,多棱角多侧面地再现历史面貌,这是我们写作这部书的初衷。

在撰写中我们注意突出文史的功能与特点。述大势大略,以博大精深展示事物之真谛;记细枝末节,以感人之笔再现历史之瞬间。在取材上不拘一格,凡发生在巴林草原的重大历史事件,或以人物为线,或以事件为线,或横陈,或纵述,或议论,或记叙,都是曼曼写来娓娓道去。在表现手法上力求体现文史的要求,记述每一事有来龙去脉,有头有尾,本末清楚。

在写作中,为展现历史事件的全貌,凡属于巴林地区包括巴林右旗、巴林左旗和林西县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都通盘记述,全面采撷,特别注意吸收地区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过去已经发表过的史料研究文章、“三亲”文章,我们都悉心学习与考订。凡记入本书中的历史典籍都注明出处,凡“三亲”文章都注明作者。书中大部文章都是作者过去撰写过的,此次出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增加和修订了部分内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除阅读大量的史籍外,还参阅了赤峰市各旗县史志资料,特别是巴林右旗、巴林左旗和林西县的文史资料,在此向

这些作品中的文章作者和编者表示谢意。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旗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旗委书记芒来亲为作序,旗政协主席特木热等领导审阅文稿。1997年政协巴林右旗五届四次全委会作出出版《巴林史话》的决定,并列入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项目。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中一定有舛错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

一九九七年十月于大板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巴林古族文史资料第三辑(汉)·巴林史话

作者 =

页数 = 3 0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